

林礪儒著

教育危言



大正十一年七月一日發行

序

抗戰以來，我拉拉雜雜寫的稿子積起來有了幾十萬字。朋友們勸我整理付印，我就選擇一些還可以再看的共得三十六篇，託文化供應社印行。

我在教育界一向埋頭工作，不願多說話。民國十七年我曾對北平師範大學同學們這樣說：

「教育家要培養進步的人格以適應進步的社會，他們取道甚迂，成功甚緩，然而又堅信其可能。所以在未成功之前，教育家總要斃氣奮鬥，不必多言。然則斃氣與不斃氣，是教育家與文藝家之相異點。我們既任教育工作，只合斃氣，不該說話。可是「天禍中國」，學校窮死，因之以飢饉，加之以斃氣，為教育家者不亦太受罪乎？！說話若太多了，就會耽於想像的快意而忘卻奮鬥，這自然是教育家之所忌。然而我們生逢今日，既怕斃氣致死，那末，以不淫於想像為限，遇着肚子裏米麵俱缺，而卒歸滯澇的時候，也未嘗不可以「下氣一通」。」

近七八年來，我好似有點斃不住，寫作多了一點。最近傳聞某先生給我診斷，說是

因爲營養不良。這是一種唯物論的見解，可以接受。可是另一位朋友馬上給兩種解釋：其一是神經衰弱，其二是「俄其體弱」。畢竟那種解釋正確，這又說不清了。

稿子選定之後，要起一個總名。始初打算定名爲「教育論」，或「論教育」，都嫌容易雷同，最後定名爲教育危言。孔老先生說過：「邦有道，危言，危行」。我們中國，前有四項諾言，後有五大協議，不管怎樣，至少也有了路線，有道。那末，在這裏工作的教育者若還不肯危言，就未免太對不起阿！

著者：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於桂林獨秀峯。

520.78
256
2-1-

目次

甲

汎論

兩年來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驗與教訓

(一)

今後教育底量和質

(四)

今後我國知識分子之命運

(七)

為學術大衆化進一解

(三三)

從克利浦斯說到羅素

(一九)

精神刺鬚論

(三八)

教育改造與世界改造

(四五)

憲法與教育

(五四)

養士

(六九)

乙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底戰鬥性

(八一)

民族建國與國民教育……………(八八)

產業革命與國民教育……………(一〇三)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一三三)

國民教育底輔導和被輔導……………(一四七)

籌措國民學校基金問題……………(一五三)

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一五九)

丙 師範教育

恭候明日的教師……………(一六九)

現今師資缺乏是壞現象麼？……………(一七四)

答檀仁梅論師資慌……………(一八二)

話說新師範生……………(一八三)

歷史賦予今日師範教育之使命……………(一八九)

關於培養師資再說幾句老實話……………(一九五)

教育自由……………(一九八)

世界師範教育運動史之戰鬥性……………(二〇二)

丁 中學教育

- 四十年來中學教育之彷徨……………(二一四)
- 怎樣做中學校長？……………(二二二)
- 讀康得耳論中學教育普及之糾紛……………(二四〇)
- 國民中學與中國教育之出路……………(二四八)
- 論中學公民科……………(二六六)
- 漫談課外活動底指導……………(二七三)
- 今後中學教育往那裏走？……………(二七六)

戊 雜碎

- 循環論與責任感……………(二八五)
- 女權與女禍……………(二八九)
- 五四運動底評價……………(二九三)
- 八、二七路綫……………(三〇〇)
- 話別……………(三〇八)
- 一別十年……………(三一七)



甲 汎論

兩年來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驗與教訓

——國民公論徵稿——

抗戰兩年間，我未曾離開學校工作。老陪着一班青年；在兩三度播遷過程中，雖也常常協助所在地方做點兒民教工作，出征軍人家屬訪問，和後方補充兵團改訓等事，還夠不上說是正地道的後方服務。現在要我說，只好就狹隘的經驗範圍聊貢一得。

第一、在抗戰期間，青年們應該走的大路，要不是求學，便以服務；申言之，應該以服務的態度求學，而以學習的態度服務。可是據我的經驗，現在還未做到這層，中國人奮習，工作固然是爲出身，讀書也是圖出身，這套舊習到了現在還未見怎樣動搖。讀書的青年們，多數心目中還是以升級畢業爲第一，而學問爲第二。服務歸來的又多半是感到不得志，而很少感到自己學問能力不足，這類現象，我認爲是環境使然。青年們實在不乏有志者，而受環境陶鎔，若不降服同化，就難免徬徨煩悶。現在海間技術人才如



此缺乏，誰敢說青年不該加緊讀書？然而制度及習慣着是還把文憑學位看作人格的商標，青年們便不得不力求貼上金牌，而輕視貨真價實，那一套科舉與教會混合物的畢業試學位試，其實早應廢除，可是現在我們還有一「我愛其禮」之概。學校課程，都應以致用為鵠的，而中間分爲許多短階段，使青年們可隨時因環境需要和個人志願，完一段落便可出去服務；也可隨時回來繼續學問。學校變成真正供給學問能力之場所，無所謂畢業，使青年爲所求而來，得所需而去，自然比半真假的畢業試好得多。至於具體辦法，只是立法的技術問題，却不是辦不到的，有志工作的青年們，大抵抱有他們的理想，雖未必全對，可是這是他們勇敢負責之徵。領導者儘可以教育家的態度，懇切指點，使他們得憑着事實實踐而修訂他們的理論，好似不必有許多忌諱，也不必要求他們工作成績硬化於紙片格式上面，更不可使他們感到倚靠人事的奧援汲引？抗戰期間，使青年們各得其所玉成，確是一個要項，所以拉雜說幾句。

第二、兵役規避或逃避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在精神上鼓吹國家民族意識，固屬重要，而據觀察所及，顧慮室家底贖養，確是一個很有力的原因。現在既奉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底大原則，各鄉鎮似該有應徵軍人家屬贖養會這一類組織，務期貧家壯丁應徵者無內顧之憂。道筆款項由本鄉鎮內富室負擔大部分乃至於全部，也是公道事。此

外軍隊裏官兵實行同甘苦，也是要着。

第三、民衆教育必須以充實民衆生活內容爲先行條件。好多年前，我的見解如是，經兩年抗戰底印證，更覺其不謬。如果民衆生活還是依舊那樣缺乏內容，就要推行識字教育也不容易，因爲在他們生活裏感不到有這需要。組織民衆並不限於部勒，而必須使他們有至低限度的，一致的生活內容，在生產，交通，衛生，防衛等等方面。自治區域內若能憑事實證明各種生活大衆都有份，都有權有責，大衆都要認識它，處理它，在這裏，教育就呼之欲出，否則民衆很容易誤會出席成人教育班是一種徭役，抗戰是提示我們民衆有共同生活內容的一個極好機會，應該別讓它錯過了。

第四、抗戰兩年來我得到的教訓是：抗戰是我們這老大民族遺產的一個極好機會，這場大轉變是必然的，誰也擋不住，也不該擋住。我們所謂知識分子的，不管是青年，是「黃年」，是名流前輩，是無名晚輩，都該誠意地，決心地，改造自己，因爲舊腦筋舊習慣不適應這巨變的實在不少。不能老實改造自己的夠不上說改造社會。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於融縣榴園

今後教育底量和質

抗戰期間，我們盡力在後方推行義務教育，民衆教育，這自然是在量方面做工夫。而臨時中學，臨時大學種種設置，至少也是使中上教育底數量不因戰事而減少，政府這樣看重教育，確是可喜的事。可是常常聽人說：教育量底激增，便難免質底降落。這自然也道中了不少實況。然而這樣說法，好像是說量影響到質，必然是相裂濫造似的。其實因增量而變質是難免的，而不一定就變壞，也很可以變好，不過變了之後的好，不是原先的那種好罷了。

記得七八年前，我曾經提出國內教育這種矛盾現象：一面看見教育遠未普及，而同時又感到教育過剩。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的不過百分之三十，成人文盲者佔百分之八十，中等學生人數不過全國人口千分之一。這顯然是教育太不足了。然而中學畢業生升學的不過十之一，而十之九彷徨無路；師範畢業生沒有教席，工科畢業生找不着工廠，農科畢業生找不着農場，留學外國習理工農的回來行政機關任秘書科長；每屆畢業，學生們輒同聲大哭，畢業即失業；教育當局者在厲行其縮減普通中學，取締文法科大學底政

策。這可不又顯然是教育過剩麼？到底是過剩呢？還是不足呢？

前清時代，廣東全省每屆科歲考取錄的秀才名額，因為手邊沒有確實的文獻可攷，不能說出確數，然據我所知，大約估計是四千名左右，即每三年考取秀才約四千名。近年全省每屆參加畢業會考的初高中及師範畢業生就有一萬四千乃至五千。其中高中畢業者約佔五千人。那末高中畢業生約等於舊時秀才底三倍了。初中畢業生全省合計大約多過舊時考試童生了。每科鄉試廣東全省取中舉人八十八名，而近來省內每年各大學畢業約一千人，即大約三十倍於舊時舉人名額，而與秀才名額相差不甚遠了。這樣比較，並不是想輕別舉人與舉士執貴，只是要證實取得高等士人資格的人們比較舊時多了好多罷了。常常聽見老先生們批評近來大學畢業學士文理多欠通順，這自然不很冤枉，可是從前秀才文理通順的又何嘗多呢？而且假使現在個個舉士都比上從前優廩生甚至於名舉人那樣文理清通，而問題又何嘗解決了呢？

韓愈說得好：「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二，而用器之家六。」這是大不得了事。原來在中國舊社會，讀書人——士人——是多不得的，多了就會出毛病。因為停滯在小農業，手工業狀態之下，大多數民衆無須受教育，而大一統的專制帝國，既沒有世襲的貴族，就必須有少數士人與皇帝共治天下。他們是勞心者，是治人者，是食於人

者；換句話說，讀書就是準備做官。是準備食於人——喫人。這種人就不能多；若多了，一個士人，便少了一個農工，喫人者衆，而被人喫者寡。這便不得了。韓老先生是忠實擁護士人階級的，是熱中做官的。他看見老道和尚也和官紳士人一樣地食於人，曉得這是危機，於是乎大原其道，要把老道和尚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就是要他們還俗耕田，「日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在舊社會裏，這觀點是對的。近來取縮文法科大學及普通中學底見解也有好多分和韓老先生一樣。韓老先生掌教國子監，而還不免妻兒啼飢號寒，大概他曉得是給和尚老道分薄了份子。民國十二三年，南開大學學生們發表一篇輪迴教育，教授們大生氣，認爲侮辱師長。那時我曾說這是嚴重的教育問題。虧青年們煩悶之餘，慧心偶得；教授們不虛心研究，而竟被虛面子蒙蔽了理智，未免太可惜了。

民國成立之後，教育是無疑義地必須盡量推廣，趕快普及，可是若還是和從前同樣的性質，養成士人，準備做官，其弊必不免與從前相等。二十餘年來，民國其名，而封建其實，由是教育也現代其形式，而科舉其精神，數量又加倍激增，就難怪其「畢業即失業」或「輪迴教育」了。

這回全民族抗戰，一心一德要建設三民主義的中華，教育就非急進不可。然而必須

把往日準備官僚的教育變質為訓練公民的教育。一般普及的教育，第一要使人人都能運用四權，這便是政治訓練，而決不是舊日文法科那樣地只曉做官而不能做人的。第二要人人都能使用現代的生產工具，這是生產教育，而決不是準備「輪迴」的。第三要人人都能使用現代武器，這是軍事教育，而不是製造小軍閥。這樣的教育非趕快普及不可。由此而上的教育，我以為第一必須剷除學位資格等等帶有科名臭味的階級，破除院系科別底間隔，第二須隨着社會國家底需要和個人的志願，隨時供給人們以所需的學術，理工農醫固然必要，而文學法政也斷不能少。學生們來學一年也行，兩年也行，乃至於三五七年也無不可；總要使他們有所得而去，再有所需而來。這才是教育機關，學術機關，而不是一「輪迴」。那末，帶有封建臭味的門戶派系也可以消除了。我以為抗戰教育底輪廓應該如此。

九三九，十二，十。於乳源。

今後我國知識份子之命運

——廿九年三月十一開學日講——

據上學期成績底統計，學科不及格者比較操行有缺點者底人數少，這可見大多數同

學對於自己學業尙知留意，而能夠檢點自己行爲的人却少了。重視關係升級畢業的學業，而輕視無甚關係的行檢，這畢竟是舊日讀書人的陋習。又據這次擴大兵役宣傳各中隊底工作情形報告，低年級的隊伍工作較爲緊張，紀律也較嚴整，又可見得高年級的同學們閱歷深了不負暮氣。

記起高爾基作契訶夫回憶底斷片，述一段契訶夫指摘帝俄時代知識分子底話：

「俄羅斯人是奇怪的動物。年青時期，他貪饞地用他碰到的隨便什麼東西充實他自己，但過了三十歲以後，除了一種灰色的廢物以外，什麼都沒有留下。……爲了要活得像人，就該工作，用愛和信念工作。但我們却不能做到。一個建築家造了兩三棟過得去的房子以後，就坐下來玩紙牌，玩過一生，否則混在什麼戲院後台裏面。一個醫生如果開了業，就不再研究，除了醫科新報之外，什麼也不讀，到了四十歲就認真地相信一切病源是感冒。對於他自己底工作意義多少懂得一點的官吏，我一個都沒有碰見。大概他總是坐在首都或省城裏而起草文件，送到茲麥夫或斯莫爾賈去施行。但那些文件在茲麥夫或斯莫爾賈會奪掉誰底活動底自由——關於這，和無神論者不會想到地獄底苦難一樣，官吏是一點也不會想到的。一個律師，因爲一次勝利的辯護而成了名以後，就再不顧到正義，只是爲財產權辯護，買賽馬香檳，吃牡蠣，裝出對於一切藝術都是內行的面孔。

一個演員，比較滿意地演了兩三個腳色以後，就不再費力去研究他要扮的人物，帶上絲帽子，自以為是天才。俄羅斯是一個無壓的和懶惰的人們底國家；他們放狂地吃，喝，喜歡睡午覺，一睡下就打起鼾來。他們爲了要人來照料家務而結婚，爲了在社會上得到聲望而交結情婦。他們底心理是狗底心理：挨打就尖聲地汪汪叫着跑回牠底窠裏，得到了愛撫就仰在地上四脚朝天，搖着尾巴。」

我想誰看了這一段文章，都會覺得這好像是給中國知識分子寫真。社會底存在規定人們底意識，大概舊俄羅斯底社會存在有許多和中國相同之點罷！中國知識分子，受了歷史的社會條件所規定，向來在統治者與民衆底中間討生活。他們底生活路線是「獲於上而治民」。既然是「治民」的，當然要爬上民衆頭頂，而其所倚仗的便是統治者底勢力。要這樣，他們才能夠分潤統治者聚斂剝削所得的餘瀝而「不以爲泰」。他們的口號雖然是一「寡尤寡悔」，「守先王之道」，「信於朋友」，「守身以誠」等等；而老實說：一切學問，才華，信用，名譽，都是換得「獲於上」底工具。這個歷史的，社會的條件，限制了中國底學問，藝術，政治，道德底發展，其中最優秀的也超越不了這限制。例如「仁政」「王道」底政治理想，究其實也不過「一日一金蛋」主義；就是說：別一下子把母鵝殺了，應該留牠每天給我們下個金蛋。在這自然沒有分析地說明底餘暇，只

想指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社會條件之下，被造成許多不良風習。而這類惡習，今後決不容我們不改造。

第一，不做平民：號稱四民之首，介在統治者與民衆之間，最大目的是往上爬，就算做不了官的，也要盡力結交官紳而自別於平民。自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以後，結交洋員洋商洋教士也算是一種榮耀。偶然也發出看重民衆底論調，例如「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可覆舟」之類，那不過是對着統治者說句危辭，使他動聽罷了。碰着亂世，也有加入草澤綠林的，然一旦物色了真主，也就邁步上凌煙閣去了。我們的知識分子有了這種惡習，直到現在，遇事還不能平等合作，盡自己一份義務，而動輒鬧意氣，立門戶。

第二，不守法，不守紀律：因為法律向來是箝制平民底工具，而知識分子既不甘做平民，自然以守法爲失體面的事。直到現在民國，而我們的知識分子還要求自己站在法律之外。紀律與投機是決不相容的，而知識分子求顯達，只靠着投機鑽營。在中國底士大夫底社會裏，您如果請求朋友守法，重紀律，那是等於侮辱他；要肯通融才算夠朋友。

第三，絕對利己，小己之外，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該給自己做利用底工具；知識分子底地位，不是靠世襲繼承，而要憑自己掙扎。因此，就連小團體的，階層的自利也

說不到，只有個人的自利。一貧賤則父母不以爲子，富貴則親戚畏懼。父子夫婦之間，實在也互相利用，此風由來已久。至於學藝事功，更是敲門磚，打開了門，那塊磚頭便該不要，這和契訶夫描寫的毫無二致。讀書，信教，甚至於慈善，救國也無不可變爲晉身之階，發財之門。真的！終南山甚至於首陽山都是捷徑，唯物辯證法也可用作八股文，試帖詩！

第四，尚不重公帑，不愛護公物：從來專制政治之下，根本無所謂公帑公物。只有統治者從民衆身上搜刮來的東西。而知識分子既從中幫忙，當然分潤不厭其多，因此，實情實在是中國歷史的，社會的產物。未得志時，儘管是窮措大，是吝惜鬼，而一旦公其財物到手，就沒有不開掉揮霍的。

第五，早熟，早腐。在這樣環境之下，人們要習得以上所說的性質，就要很快地把少年底天真的火能熄滅，才能適應，這便是早熟，所謂「少年老成」，至於爲好奇而探討學問，爲團體服務而不圖利己，「用愛和信念工作」，我們的小學生天真爛漫，是辦得到的；中學生已經差了，大學生又不如中學生，大學畢業生更不如未畢業的，一旦跳出校門，置身社會，那簡直別三日，非復吳下阿蒙了。

以上所列舉是舉舉大者。而從舊觀點看，還不失爲「佳子弟」；因爲如此便可以克

家樹業，飛皇騰達。老實說：一般家室兄弟對這期望於自己底子弟底最高理想也不過如是。只可惜不適於抗戰建國！經這回神聖抗戰，中國社會的改造，是鉄壁也擋不住的趨勢。我們知識分子的命運，大概不出下列三種：

(一) 民族復興，而知識分子自動地全體改造，和民衆攜手踏上復興的坦途。
(二) 民族畢竟復興，而許多知識分子落伍。
(三) 知識分子與民族同歸於盡。現在世界潮流已顯示着帝國主義快到末日，帝國主義者既不會長久存在，便不會有四萬萬五千萬的民族淪爲奴隸。因此，第三種結果不會有的。頭一種結果當然是我們所最希望的，可是太過於理想。照現在情形看，很難達到。剩剩的只有第二種結果，可能實現的成數最高。問題只在覺悟的知識分子究竟可有多少箇中。

中國民衆大多數是知識極簡單的農民。要沒有知識分子給他們効勞，就很難負得起復興底偉大工作。如果能夠領導民衆底知識分子人數較多，則民衆與知識分子交受其利。若不辛而知識分子覺悟者少，而大多數落伍，是棄於民衆，則雙方都不免吃大虧。我以爲現在教育文化工作底路綫就在此。要努力培養大多數的真正覺悟的知識分子做民衆底忠僕——**蘇葛亮**。

我們的知識分子比較民衆只多了一點知識，而原來不在民衆之列，向來對民衆又欠

老實。現在要能革面洗心，把自己底知識才能去効忠於民衆，才可得好結果。好比妖仙雖能呼風喚雨，而原不是人，修成人形之後，要真能做人，才可成正果。否則封神傳裏通天教主那班高徒便是好榜樣。

一九四〇，三，十一，於文理學院。

爲學術大衆化進一解

最近朋友聽說：甲乙兩位學者談論辯證法。甲先生底談論，陣嚴而鋒銳，乙先生無以難，就帶笑說道：「您老人家的是齷齪的辯證法，可是我的辯證法是十字街頭的。」一場辯論就這樣「藝術化地」結束了。記得我幼年時，費了很大勁纔看完一部綱鑑易知錄，可是先生告訴我，要懂歷史，還要讀通鑑。四史，甚至於廿四史，看看那幾箱書：不覺望洋興歎。後來不久偶然由書坊買得一本普通新歷史，大概是抄譯東洋人作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全書只得一百多頁，而上下五千的歷史都有了，登時快活到了不得。心裏想道：「新學真好，沒有舊學那樣麻煩」。於是乎就把廿四史看不起了，也不怕那班讀過廿四史的老先生了。因爲那時我以為他們都是冤大頭。這兩段故事都隱藏着一句口號：

學術大衆化。

學究先生們每提起這句口號，便不勝「絕道喪」之感。而歡迎學術大衆化底青年們也往往趾高氣揚地像辛亥革命爆發時阿Q看不起趙鄉紳似的。如果十字街頭的辯證法便不妨胡說八道，有了歷史教科書便不妨燒掉廿四史，那真怪不得學究們痛哭而阿Q得意。然而其然！豈其然乎？

學術自然有深淺，有難易。簡易的部分雖然可以而且應該大衆化，而專門高深部分要求人人全都通曉，那是絕不可能的事。高深學術必須艱苦鑽研，更不容人剽竊，如此阿Q斷不能叫掉辮子就立地成爲革命黨。然而喬裝古雅，故作高深，又確是歷來學者們底臭架子，例如寫古文，作古詩，用古字，乃至於添註不必要的西文，真令人作三日嘔，他們目的不在求真理，而在嚇唬人。擺架子，那非打倒不可。

如果有人以爲學術大衆化便是通俗，便不妨寫就，不妨歪曲，甚至於不妨謬誤，那真是誤會之至，公之於大衆，就必須真實。二二如四，徑一圓三這類通俗的知識，何嘗有半點虛偽？反之，號稱古奧典雅的學術之所以不能大衆化，往往因爲裏面藏有不少虛偽，不能把給大衆看。大衆化是要給民衆應用，增加大衆底力量，豈容有半點虛偽？如果要借用推背圖，燒餅歌來鼓勵民衆抗敵，其侮辱民衆之罪幾乎要等於漢奸。清廟明堂

固然不能文淺陋，而十字街頭又豈能文謬誤。

也許還有人以爲大衆化就是應用，而純理論便不能大衆化，這也是誤解。應用的學術未必就是膚淺，熟習應用化學的未必懂得應用力學，而理論也不見得一定高深，任何人都訂他一套哲學，這點真理早經實驗主義者道破了。理論與實用不過是學術進程中交織連續底階段，高低深淺都有的。

「大衆化」底意義，若把它解釋爲人人都一樣通曉，那只有常識，而社會上便不能有學術存在。治學早已踏上專門分工底階段，就斷不能要求人人通天曉，無論是實用或是理論。那末，大衆化畢竟意味着甚麼？我以爲只好從人類歷史上縱觀學術演進底大勢。

學術底起源無疑是生活經驗底積疊。然而從文化黎明之後，社會階級早已形成，知識便和政治權，財產權先後陸續歸於治人階級底掌握。他們憑着知識驅策大衆，麻醉大衆，裝點自己底尊嚴，擁護自己底權利。他們憑藉大衆底勞力而享受富裕優游的生活，便自命爲勞心者而從事於求知，學術從此成了統治階級所專有；換句話說，學術自其成長發育之日起，早已御用化了。古代君師合一，政教一致，便是說明學術與政權同一所關。古來所謂英主明君，不管是中國的，歐洲的，都要來一趟提倡學術，崇高文化，他

們目的不外是御用。其中雖然也有極少的部份給民衆用的。例如農業，工業，航海，水利之類，然而結局是增進王侯們底產業罷了。學術在如此環境之下成長，雖也會發明了多少真理，而有一個鐵定的限度。就是說，以不動搖統治者底尊嚴，不妨害他們底特權爲限度，到了這限度，任何真理都要歪曲。中國固有的學術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試問中國固有的哲學，除掉擁護上下尊卑貴賤貧富等等所謂「大倫」，和教人樂天知命，安分守己，知足自得之外，還有甚麼？固有的文藝除掉歌功頌德，點綴昇平和描寫醜態豪華或閑情逸致底生活之外，又還剩餘多少呢？天文曆法在中國算是比較發達的學問了，然而始終不能動搖陰陽五行星象那一套鬼話，就因爲那是統治特權底壁壘。

話要說回來了，學術自古迄今雖然成長於御用環境之下，而漸漸滋生起來，達到一個階段，就會把御用環境打破。近世自然科學是一隊先驅者。歐洲底大學，號稱學術中心，原來是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可是近世自然科學就在那裏滋生，地動說的天文學，原子論的物理學，進化論的生物學一旦發表，其教統治者吃一大驚。好比現在英國人吃驚日本人底強橫，自己養大起來哈吧狗要咬主人。前兩世紀底民主革命得力於自然科學不少，因爲它搖動了神權君權底信仰。同時產業革命也給自然科學發展以很有利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對於自然科學當然要羽翼它發達，以便應用來增加他們底財富。

，可是又怕真理太顯明了會動搖他們底統治。再三思量，最好的對策是把物質科學和精神科學納入根本不同的範疇，中間畫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每說到社會人事，就仍舊要罩上中世紀那一套神祕的外衣。一班學者有意地或無意地被統治者操縱着而大爭論心物之元，又往往有歐美學者來到中國不久就佩服孔子，老子，其原因都在此。縱觀首年來的世界學術，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之不相稱，有點像腐子底兩條腿，一健，一軟。

求真畢竟是人類天性之一種。智慧之果已經給人們嘗了幾口，而又要禁止他們多吃，他們便要垂涎三尺，甚至于會像孫悟空那樣拔開樹根。百餘年來，不管統治階級之如何惡其害己，而用種種手段來攔阻，預防，還不斷地有人努力用嚴正的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來改造精神科學。人類學，人種學，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陸續加緊地自然科學化，逼到哲學也大起動搖，憑科學底基礎改造哲學，又用哲學底思維檢討科學，確是近百年來的趨勢，這番偉大工作雖然直到現在也還未完全成功，而這新趨勢所發見的真理，已經大體解決了許多從來所看作神祕難解之謎，給大家以顯明的解釋，同時就觸犯了統治者不少的忌諱。換句話說，學術裏面那些愚弄大眾底成分一經科學的光照射，漸漸要被消毒了；學術要由御用化變而為大眾化了。適值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端百出而快要沒落底時候，就反映到學術界加速地科學化，要衝破從來的御用底環境。學術

大衆化這句口號便不期然而然地衝口而出。意思是說：這回學術要嚴正地直指真理，不可歪曲，不許附會。革命黨向來是歡迎真理，不怕真理的。要是科學的真理，纔可教大衆認識。纔能指導大衆實踐，也須是大衆化了的學術，才能無所顧忌而直指真理。例如：大和民族是甚麼？日耳曼民族是甚麼？嚴正地從民族學，歷史學得來的答案，大衆便容易信用。倘若說是天孫底後裔，是上帝底寵兒，那只有神道學者納粹學者懂得。大衆却懂不得。黃帝是甚麼人？堯舜是甚麼人？依據古史底研究，慎重地，蓋然地斷定是上古有力的酋長。大衆也可以信用的。如果定要說是銅頭鐵額，彩眉重瞳，巍巍然德配天地的神聖，那只有經學先生們懂得，而大衆却懂不得。

總而言之，學術大衆化是和御用化相對待的。是嚴正地科學化底別名。學術逃出統治者底金屋，而從良下嫁於大衆，當然一却嫌脂粉汚顏色，不着絲綢不着羅，露出廬山真面目，翻頭嫁給種田哥。一好比紅拂妓要逃出了楊素府嫁給李樂師之後，纔有真愛情。統治者階級雖難免有一佳人已屬沙叱利一之感，而學者們固不必因此而浩歎「吾道非耶？人間何世！」甚至於自命爲古押衙。青年們也別妄想搖擺在十字街頭哼句「手執銅鞭把你打！」

從克利浦斯說到羅素

——評教育上愛國主義——

報載三月一日倫敦路透電：「今日英蘇青年會議上午開會，掌璽大臣克利浦斯演說：『希望青年運動應以蔑視國家主義為其基礎。吾人應對外國友好，而不應時存種族優秀或輕視外國之國家觀念，因兩者俱足以摧毀世界也』。

在英帝國國旗快要不能常浴着太陽光輝底時候，新入戰時內閣之重要閣員，不鼓勵青年們赤心愛國，而倒希望他們蔑視國家主義，這難免教俗人喫一大驚罷！回憶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之際，各國的社會黨員，除多數黨外，都突然變為愛國的社會主義者，各擁護他們底祖國作戰；我們把現在克利浦斯底演說和二十多年前那一段歷史，「佳話」相對照，不由得不承認現在世界是進了一步罷！軸心國家底納粹主義，法西斯蒂主義，把自己的國家民族看作天之驕子，而以征服其他民族為神聖使命之執行。而同盟國的重要閣員却教訓青年們蔑視國家主義，這樣對照起來，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底意義纔鮮明的表現。為要蔑視國家主義而進行戰爭，而且堅信這纔是制勝的有力理由，這番意義多麼

深遠！我因此首先想起了總理遺教，恭錄幾段如左：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爲世界上的
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
護法政府，一天有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加入協商國，出兵
到歐洲。我就向那位英國領事說，爲甚麼要出兵呢？他說請您們去打德國，因爲德國侵
略了中國土地，佔了青島，中國應該去打他，把領土收回來。我說：「青島雖廣州還很
遠，至於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有緬甸，布丹，尼泊爾，像那些地方從前是那
國的領土呢？現在您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
量，恐怕先要取回英國佔去的領土罷！德國所佔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甸便比
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如果我們要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我們的文
化已經比您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您們上前，等您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
，讓您們拖下去。因爲我們二千多年前，便去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
想已完全達到了這種目的。您們現在戰爭所豎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您們本來很喜歡
的，但是實際上您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爲您們專講強權的行爲
是很野蠻的，所以讓您們去打，我們不必參加。等到您們打厭了，將來或者有一日是真

講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纔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去求世界和平。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您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您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用您們有經驗的軍官，又補充極精良的武器，在六個月之內，一定可以練成三十五萬精兵，運到歐洲去作戰，打敗德國，到了那個時候，便不好了」。英國領事說爲什麼不好呢？我說：「您們從前用幾千萬兵和幾年的時候都打不敗德國，只要加入幾十萬中國兵，便可以打敗德國，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國的尚武精神，用幾十萬兵做根本，可以擴充到幾百萬精兵，於您們就大大不利了。現在日本加入您們方面，已經成了世界上列強之一，他們的武力雄霸亞洲，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列強一樣，您們是很怕他的。說到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國遠甚，如果依您今天所說的辦法，我們中國參加您們一方面，中國不到十年，便可變成日本，照中國的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到了那個時候，以您們全世界的強盜，恐怕都不夠中國一打了。我們因爲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纔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理，所以不願加入這次大戰」。……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的爲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甚

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民族主義第四講）

「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纔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纔算是治國平天下。」（民族主義第六講）

我們敬讀「這兩段遺教，便可曉得現在克利浦斯是有心要講理而不專講打，比二十多年前那位英國領事確進步了。英國大哲學家羅素，也許因為二十年前曾來中國游學的緣故——總理曾嘉獎他能了解中國人的好處——對於帝國主義的愛國教育，很不忘諱的加以指摘。「太陽常照臨着國旗」這是英國人自己誇耀得最厲害的，然而羅素在他的名著教育與羣治，却揭破了英國國旗的真相。他說：「國旗乃是表示一國軍力的符號。它所暗示的，乃是一個不列顛納爾潘或達拉法爾加，並不是莎士比亞，牛頓或達爾文。英國人促進人類文明所做的事業，並非在旗幟符號之下做的。英國人就對不列顛國旗表示

尊敬時，也不會想到這些事業。英國人的偉大事業並不是以英國人的資格所做的，而是以個人資格所做的。英國人以英國人的資格所做的事情，都是那種不大值得稱讚的事，因為他們做這種事業時，總覺得他們是英國人。可是不列顛國旗使我們讚揚的正是這些事情。不列顛國旗既是這樣，美國旗或其他強國的國旗亦復如此。羅素肯定的說現今強國的國旗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的符號，它所含有的威嚴便是殺人越貨底成績；在這樣條件之下，所謂愛國實在是崇拜侵略，讚揚強盜行爲。他說：

「西方各國男女兒童，都被教以兒童們最重的社會忠誠，應該輸給他們所屬的國家。他們對國家的責任就在遵從政府的指導。又恐他們懷疑這種理論，因此又教以謬妄的歷史，謬妄的政治學，謬妄的經濟學。教以他國的惡行，可是本國的惡行却隱而不張。又設法使他們承認自己國家所從事的戰爭都是防禦的戰爭，別國的戰爭則是侵略的戰爭。又教他們相信他們本國克服他國時，目的乃在傳播文明，福音，崇高的道德禁令，或其他高貴的東西。又教他們相信別國是沒有道德標準的。……每一個國家和別國來往時，就儘其武力所許的可能範圍內，犯了許多過失。而其本國的國民，即使是最公正者，對造成這些犯罪的行爲，也完全表示承認。因為他們不知道當時的真象，也不知道真正考慮事實的將來。一般國民所以這樣願毫無意識做了殺人越貨的共犯，其主要原因應

歸咎於教育。……現在學校中所教的國家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可說是人們極易染患的一種大衆的歇斯特利症病。這實在是不幸的。爲防止這種不幸起見，必須從知識和道德兩方面設法保障。國家主義確是我們現代最危險的一種惡德——其危險且甚於歷來道德教育所遏阻從事糾正的飲酒，藥物，商業上的欺騙，或其他惡德。凡窺測現代世界大勢的人，都覺得國家主義之存在，對於一種文明生活的方法之將來，實在是一種危險。即是說，大凡明白了解世界國際情況的人，都有此感覺。可是不論何地的公款，仍然用以宣傳增長這種破壞的惡德。若有人主張不應教兒童讚揚蔣批的屠殺，便斥爲叛徒。有人或以爲人類具有自然的感情，想到其兒女悽慘而死，必會感覺痛苦。其實並不如是。縱然明知危險當前，可是設法應付危險的人，在多數國家中，仍被握有實權者認爲作惡。大衆都把從軍認爲捍衛本國的一種高貴的準備，却不使青年人知道本國軍事的活動（假設她是一個強國）極易成爲侵略而非自衛」。羅素因此斷定愛國主義的教育有四大缺點：一是毀滅人類文明；二是教人民殺人越貨；三是教人民仇恨別國；四是認妄虛偽，歪曲事實，以麻醉青年。

羅素指摘愛國主義的教育的弊病，可說是淋漓盡致。然而爲甚麼流毒至此呢？他說：「愛家愛本國，甚至於相當程度內誇耀本國歷史，偉大的成績（只要這些東西值得誇

耀)都不應遭受輕視。這種愛乃是一種複雜的情操，一半是確實愛土地及所習慣的環境，一半和擴大的家庭之愛有關。其根源一半是地理的，一半是生物的。但這種原始的感情，本身卻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的，乃是愛護本國的一種感情。並非反對其他國家。只有那種足不出戶生活於鄉村中的人，才有這種原始的感情。至若城市人民，因為居處常常變更，沒有一塊土地可說是他自己的，因此他所有的原始情操為愛國情操所從出者，自然不及鄉村地主或農民所有者多。反之，城市人所有的情操大半是造作的，多半是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所讀的報紙之產物，差不多全是有害無益。這種情操很少是愛家庭愛本國人，多半是恨外國人，想掠奪他國，並且也像其他一切不良的情操一樣，外表仍假裝做對國家的忠誠。那末，原來是非政治的又非經濟的而本沒有毒素的愛家鄉的情操，到了城市人的心裏，為甚麼變成如此兇狠呢？關於這一層，羅素也像隱約地看到似的。他說強國向弱小國家投資，要「第一，採取煤油的技術的直接費用，第二，使當地人民不搗亂的政治費或軍事費。但只有前一部分纔要他擔任；而後一部分則落在納稅人身上。國家必用愛國的宣傳引誘他們負擔，因此，愛國主義和財政使這樣發生一種極不合理的關係。然而這種事實，却被教育者所隱瞞，不讓兒童明白。較偏於軍事形式的愛國主義和經濟有密切的關係。國家的武力就用以增加其國的財富，其方法有數種：一是錫

力勒索貢稅或賠款；二是盡力堅持賠償債務；三是奪取原料，強訂貿易條約。這一套手段若不用愛國主義的魔術加以掩蓋，其卑鄙與不德，必被頭腦明晰的人所察覺。從這一段話可以隱約看出原始的愛家鄉的純潔的情操之所以墮落為兇狠的愛國主義，原因就在不合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關係。羅素所謂「城市人民」應當是指布爾喬亞，他們的人生觀當然是不愛家鄉只愛錢。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機構成熟之後，他們更向國外奪取市場，掠奪原料，榨取弱小民族的廉價勞動，便自然而然地利用他們掌握中的政權，支用國家的賦稅，驅策民衆的壯丁，向弱小民族進攻，而一面高唱愛國主義以掩蓋殺人越貨的勾當而麻醉青年。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發展而成爲帝國主義，國家必然成爲強盜團，愛國教育必然成爲謬妄，欺騙，麻醉。可是這樣顯明的理由，羅素還不明白說出，也許他還未肯十分承認；因此，他在教育與羣治的開首一章，居然以自認定個人的陶冶和公民的教育的本質的對立，好像沒法解決似的；而又想乞靈於有形而無質的國際聯盟，編纂歷史教科書，以解除愛國主義的教育的流毒，這真是妙想天開！

在資本家統治下的國家，所謂良好公民當然是「無良心者」的御用工具，那與人格價值發展之不能一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羅素所指摘的：「政府所理想的公民乃是讚美現狀努力擁護政府的人」。假若公民教育的目光短淺，必致阻礙個人的發展，

強迫個人成爲政府利用的工具」。『近代的教育已逐漸成爲一種反動的勢力，對於保守的政府則擁護之，政府進步則反對之。更其不幸的，現在學校及大學中所重視的公民資格底成分，並不是最好的，反而是最壞的』。『政府用精緻的方法隱飾他們認爲不當的真理，而對於傳播所謂有害於大眾的知識的，則施以種種懲罰』。這類流弊其實全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底國家所應有的產物，而不見得是公民教育底本質。如果剷除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公民教育當然可以瀟灑環繞。羅素他自己也說：『除蘇俄而外，因爲宗教及中等階級的影響，致使凡是社會黨得勢的地方，大部分的教育局都是反動的』。他又說：『世界各國的教育家，除蘇俄而外，彷彿生來就是儒怯的。不論看他們的收入上，或勢利行爲上，都附和有錢的人』。然則爲甚麼蘇俄能除外呢？顯然因爲在他們那裏清除丁人喫人底制度。羅素又說：『個人教育與偏狹的公民教育最重要的衝突，乃在對於可疑問題所持的科學態度方面……凡具有科學精神者都容易做發見的工作，絕不使人堅信當時科學的定理。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却無發見的能力，因爲他敬重比他年長比他較好的人。他敬重過去的偉大人物，他畏懼一切反叛的學說……所以我們這個時代實在是衝突的，一方面科學既是權力之淵泉，尤其是政府威權之淵泉，而他方面科學的進步又全賴科學家的心理狀態是無政府的……這種科學精神與政府的利用科學的衝突，終

必使科學的進步陷於停滯」。然而羅素的背國的兩位知名之士——韋白和克羅守，就他們觀察所得，一個說，「蘇聯政府熱心提倡科學顯然非世界任何政府所能及」；又一個說，「科學化的思想方式又必須透過其執政者的理智活動以爲其間架」。由此可見一旦清除了「不合理的政治的經濟的關係」，便一切事情全改舊觀了。

現在我們正在努力進行「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戰爭，我們的戰略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目的在建設救國而又救世界的三民主義，我們的愛國和勇敢作戰當然和羅素所指摘的截然不同。在三民主義實現成功的社會裏，當然是「良好的公民與良好的個人之間並無衝突之可言」；「把兒童看做個人所得的教育結果和把兒童看做是未來公民所得的教育結果」當然是是一致的。這是事實的可能，而並不只是「黑格爾之徒的主張」底「形而上學的真理」。一九四二，兒童節，於桂林。

精神剃鬚論

——成年人憑什麼而指導青年？——

「矛盾」這個名辭，現在看來好像有點兒刺眼，因爲它容易教人聯想及唯物辯證法。

。其實這名辭固然不是唯物論辯論法所專有，而且還是中國二千多年前底古典，一段極有趣味的諷刺故事，古色古香，典雅得很，決沒有危險性。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予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我爲什麼搬運這一段通俗古典呢？因爲近來翻閱幾種介紹外國青年訓練底刊物而得到一點感想。這類刊物大抵摘錄各國底宣傳資料，譬如說：希特勒青年團怎樣，突擊隊怎樣；意大利底巴里拉怎樣，青年法西斯怎樣；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怎樣，少年先鋒團怎樣；也都依照他們各國自家宣傳底口吻，說得天花亂墜，世界上有第一，沒有第二。我們中國人只覺得羨慕，佩服，而又像民國初年留學生們口頭帶回來的紐約倫敦底月亮，比北京上海底月亮大得多，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模範，理想。這類刊物在前幾年，也未嘗不可以把它當作鏡花緣底君子國，歧舌國底故事一樣，只看看開心消遣罷了。然而到了現在，希特勒青年團底國家正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國家在拚命較量胳膊，要分出你死我活，其存假亡，巴里拉也在那裏吶喊助威，可不是現實地「以子的矛陷子之盾」嗎？到底會怎樣呢？也許有人這樣想：等到結果誰打勝了仗，便算是誰行。然而這種滑稽的實驗主義，希密士，杜威固然不會承認，就是胡適之先生恐也未必肯肯罷！

第一，要把青年訓練期以公平的原則，或以爲至重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現在國家爲什麼要訓練青年？第二，成年人怎樣能夠指導青年？第三，成年人在什麼條件下能指導青年？第二個是歷史底事實問題，第三是心理底事實問題，第三是教育價值問題。總合起來纔能解答成年人應作什麼指導青年。

現代國家爲什麼把青年訓練工作攬到自己手裏呢？簡單答一句：便是：因爲青年們不願受成年人指導，他們討厭成年底虛偽和殘酷，而渴望着自己自由地生活。請看世界上唯一的正地道的青年運動，德國底遊鳥團（Vandervogel）不是要向他們認爲不理解的青年問題底成年人們宣布革命麼？說來也好笑，青年不要成年人指導，而成年人偏老着臉要去指導他們，這便成了現在流行偏地球底青年訓練。我們中國報道世界各國青年訓練底先生們，竟不注意細看這一點富有意義底奇妙現象，實在是更好笑的事。原來青年人在舊日禮教森嚴，王道蕩蕩底封建社會裏生長，決不會起甚麼波動，因而也沒有什麼像蘇有介事底青年訓練。請看管子弟子職一篇，關於青年們底服裝，飲食，起居，自晨興而至就寢，大而受業問難，小而盥漱，吃飯，飲湯，執燭，都有極嚴格的規則，青年們在那裏每天「朝益暮習，小心翼翼」地「周而復始」實踐那所謂「弟子之紀」。經過那樣封建的烘爐，真是百鍊鋼化爲繞指柔，就必然「溫恭自處，志毋虛邪」，還敢胡思亂動

禮記再續禮記少儀記載古代青年必須遵守底那一套繁文縟節。便曉得古代封建社會怎樣憑禮教來「正國」，「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真是一教化也微，止邪也於無形」。青年們生長於那樣銅牆鐵壁之中，當然「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可是青年畢竟是社會裏底生客，他們天賦地懷疑現實，反抗現實，就在禮教森嚴的封建社會中，也不能絕對沒有多少微波。請看孟子：

「公孫丑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曰：『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夫章子，父子責善而相夷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

由這裏可見在封建時代，青年們也不喜歡受長輩指導。雖以正統派的孟字也不得不承認「責善朋友之道」，就是說只有青年們還可以互相指導。可是封建社會畢竟有一個定標，即是所謂「正」。禮教——誰對着個也不敢反抗，真是尊長自己「未出於正」，「不守禮教」——而與一味責善青年輩才教人以正。所以青年們心不服，能不服，等到青年們漸漸曉得他們自己將來長成之後，也可以自己「未出於正」，而大擺威風地教人以正，他們也就不說甚麼了。講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封建社會沒

有明目張膽底反抗成年人底青年運動，因而也沒有像那有件事的青年訓練。

十九世紀歐洲底民主革命是千餘年來世界所未曾有過的社會變革，資產階級和貴族地主對立，無產者又和資產階級及貴族地主對立，資產階級要推翻舊封建底統治而不得不引無產者援助，又因為不樂意無產者太過跋扈而「情和封建殘餘妥協，這樣三角地對立起來，把向來寧靜的封建社會攪亂了，禮教動搖了。所有的無產者和一部分資產者原來是一不降禮不由禮」底「無方之民」，在革命底時候，自然不免踐踏禮教，因而傳統的秩序對於容易懷疑煩悶底青年失靈了。社會各階層底三角的對立，在資產階級勢力還未十分強盛而封建勢力還未可侮底德國尤為顯著。一八四八年德國底革命雖然終於在資產階級和舊貴族領主們妥協之下結束了，而社會底矛盾依然存在，或且一天一天加甚，因而最容易刺激青年們底煩悶。所以世界上地道的青年運動，於一八九七年發生於柏林附近底斯忒格力齊文科中學。Steinitz Gymnasium 這個地方原來是一個寧靜的封建式的鄉邑，而到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工業化了，資本化了，因而激起中產階級青年們底反感。據德國公民教育底著者Paul Kosok說，遊鳥團是「代表中產階級青年中較進步份子底一種反動、調定冷靜的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政府要摧殘個性，要把各人照既定的模型造成一個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社會底臣民。這個團體向他們認為不了解青年人問題底成

年人宣佈革命。會員要成立一個獨立的青年運動，一切由自己主持，與現有在成年人勢力之下，甚至于受成人管理的青年組織，完全不同。所有遊鳥圖於是成爲醞釀一切解放甚至于過激觀念底中心……他們要表示自己的獨立性，常在國內各名勝地點開會或在週末舉行遠足，不許家長，教師或其他成年人參加」。由此可見青年運動底起源在他們討厭成年人不乾淨，不純潔。到一九〇六年，德意志青年工人聯合會成立了。一九〇七年社會黨領袖萊比尼克Karl Liebknecht領導於斯特格爾Sieg. Stuttgart地方舉行第一次社會主義青年團國際大會，他演講「與軍國主義奮鬥」，說：「帶有社會主義性底青年團體底成立，就是造成一種不受法律限制而特別適用於反軍國主義鬥爭底武器。」

這樣的青年運動，由政府看來，當然危險萬分，而薄弱的封建社會時代又已經過去。要青年們突然不動又爲勢所不行，因而除禁止一切有政治作用底青年組織之外，要把所有青年團體都攔在政府控制之下。他們用的方法大別有三種：第一，發揚愛國心，在歐洲那樣列強對立底國際環境之下，這是容易得多數青年接受的。其次，將勞工階級中一部份最不良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加以改善，藉以防止青年人過激思想底發展。這種預防工作底表現，就是各式各樣底青年福利事業。又其次是設法轉移青年們底注意。如各種娛樂，不帶政治意味底活動，以及爲達到這個目的而設底補習學校等。希望分散

勞工階級青年對自己不良地位注意。一九〇一年普魯士教育部長在十一月公布法令中，明白指出「本邦當局對如何使男性青年從脫離小學直到參加兵役這個時期不致誤用餘暇；如何從教學及適應的社會環境以及適宜的消遣中領導他們；如何教他們在登進階級社會中安分守己」都曾作詳盡的討論」。普魯士商業部長在一九〇八年法令中，公布「補習學校應作為小學畢業以後的青年輔導與福利的基本組織」。他們還在補習學校以外，設法影響青年思想。「目標應為造就一種為青年所願意接受感情上應影響。使補習學校學生參加福利事業底管理，對這種工作大有幫助」。以後不久，所有青年底福利事業，都歸中央公共福利局總其成。這種組織底立底本旨，原是將中上級青年底國家精神團結起來，與中級青年中社會主義的觀念相對抗。他們努力底結果，各青年團體都聯合起來，組織青年德國會。該會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首領為高爾齊將軍（Friedrich von der Goltz）自標在訓練青年作參加兵役底準備。這是各重要非社會黨底青年團體，和全國各愛國團體青年部底大聯合。在這些團體當中，有一部份是特為給青年入一種軍事訓練而設的。其中最老牌的基青年挺進隊（Jungvolk）這隊在一八九〇年時由軍官組成，但到了一九〇〇年以後，專為一般人所重視。至於社會黨底青年團體，以後都變成教育性質底俱樂部，在溫和的社會黨指導之下，產出一個德意志中央勞工階級青年局

來主持。他們底活動是：演講，遠足，午後遊戲，青年家庭，圖書館等。到了第一次歐戰，青年人被牽入漩渦，踴躍參戰，和當初青年運動底本來面目差得遠了。我們由此可見所謂青年訓練，實在是把青年活動置之於政府籠絡控制之下，以免致他們胡思亂想；所用的方法，露骨地說，便是：一、隻手給他們糖，又一隻手給他們利害，以使他們就範。這辦法出來已久，不過到了希特勒更雷厲風行了。

恐懼和貪欲是人類根深蒂固的天性。因為人類畢竟還是動物。因此，利用人們底貪生畏死底本能而控制他們是比較容易收效的。中國古代法家最看準了這一點，他們底法治底唯一手段便是刑賞，他們老實不客氣很坦白地把人看作豬狗，這倒來得真爽快直，不像儒家學說那麼虛偽。儒家事實容許統治者自己「未出於正」，而只一味「教人以正」，因而禮治主義結局是一套空論。然而利用人們底恐懼和貪欲所收穫底效果是有限的，這又是現代心理學已經證明了的事實。人們習慣了威嚇痛苦，他們底恐懼心倒漸漸變成麻木，倒不怕了。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也！古人早見及此。至於小恩小惠底籠絡底效力也很有限，因為人們欲望是逐步發展的，可以超出乎物質的利益之上。而且他們學乖了，一面接受物質的賄賂，而同時也還可以搗亂，要買收人們底真心是一件極難的事。左傳記載宋國底一個貴族在暴動場中，要送給暴徒一塊白璧，想得免

死。那暴徒乾脆對他說：「殺汝，壁將焉往！」這可證明買收津貼也沒有多大效果。一邊是集中營，又一邊是制服，徽章，獎金，以為這樣便可使世間青年盡入彀中，那未免太迷信唯物主義了。希特勒在揚言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唯物論，其實他自己走底路線是最極端最淺薄的唯物論。這是古來奸雄底公式，原不足怪。說到這裏，馬上引出一個問題：希特勒底方法如此淺薄，然而騙策德國青年也還相當地成功，這原因又在那裏呢？

一、希特勒成功底原因是：德國內部代表各階級利害底各政黨底交錯的矛盾和凡爾賽條約造成的德國被壓迫的國際地位。自一九一九年後，德國底短命共和政府毫無能力解脫民族底桎梏，以致全國各階層底民衆都憂憤煩悶不堪，而希特勒和他底徒黨至少也堅決地表示了他們聽任奮鬥底勇氣，這便容易取得青年們信任。首鼠兩端的社會民主黨，只是不惜與共產黨以外底任何政黨妥協苟合而獵取政權，其實對於國家民族底大計一籌莫展。共產黨底勢力還小，決沒有魄力負得起全國底大任，徒然刺激起中產以上階級對於赤化底恐怖和警戒。納粹一面掛起工黨底招牌，招呼勞工階級而轉移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底心理往反對外國資本家和猶太資本家方面去，又一面以不怕共產黨和號召而吸收中產以上各階層底信任。德國人被凡爾賽條約掛破了民族底榮譽，威脅着民族底生存，大眾都在皇皇然尋求民族底生路，遇着納粹毅然負起民族復興底大任，而又担保不赤化，當

國內底貴族，地主，資本家，中產階級乃至於大部份勞工中底愛國分子都急不暇擇地跟他們走。這便是希特勒成功底祕密。所以 Paul Mosso 說，納粹底「獨裁政體雖然可以算是德國歷史發展中底一個新階段，但同時也可以說是議會政體時代各方面勢力發展底必然的結果」。一國社黨興起和發展底迅速是戰後德國底危機和資產階級用平常的辦法來解決失敗了底表示」。而希特勒信徒們——一班淺薄的唯物主義者，卻想貪天之功，以爲只憑集中營和制服，徽章，獎金便抓住了全國青年底忠心。那豈非笑話！由此類推，便可曉得慕沙里尼底成功，也因為戰後意大利民生底凋敝，而國內底政黨束手無策。意大利共產黨徒然高唱國際主義，暴露了左傾幼稚病，激起了民衆反感，法西斯黨人因而抓住了機會。至於蘇聯底共產主義青年團，卻原來是革命前各工廠早有了大批青年工人和童工參加了共產黨工作。革命之後，以共產黨政府訓練早有歷史的共產主義青年，那是很順手自然底事。我們若不尋清楚來龍去脈，只看見人家底組織，規條，徽章，制服，便心醉眼花，恐怕要成大圈套中底劉老老。在希特勒慕沙里尼要驅策全國青年去向全世界打家劫舍，殺人放火，而自己國內又矛盾重重，日見凋敝，今後的情景要和從前種點不同罷！

指導青年第一步必須了解青年。若不了解而言指導，那不過都勒控制罷了。以卸

控制爲指導，那是淺薄的唯物論者幹的勾當。然他們只要青年們緘默不敢說話，低頭不敢動手，那管他「面從心違」。而是物質的，心是精神的，他們只知着重青年底肉體，雖然他們也可以滿口仁義道德，那不過是個幌子。一個人底意識——思想，情感，動機等等——只有他自己直接曉得，別人只能間接地推測，因而人格底隔離可以說是絕對的隔離。成年人對青年人，除人格底隔離之外，更有年齡階層（Age classes）的隔離。底隔離，彼此底觀點興趣多不相同，尤其是在社會變化日劇底年頭，往往相距十年八年而簡直成了兩個世界。而人生各時期之中，又以青年期一段爲最不易回憶，因而成年人對付青年，極容易忘却他自己也曾做過青年。成年人只曉得慨歎自己「無樂歸朱顏」，而不曉得他自己更無術駐青年期底丹心。有如此種種困難，所以指導青年所必不可缺的了解往往極不易辦到。那班狂莽之徒，無恥之輩，希特勒底信徒，只仗着信手胡造的教條，規則，便自命爲指導青年底權威者，那總是自欺欺人。了解既然是如此困難，若真與指導青年，便非努力跟青年學習不可。關於這一點，有一段很好的總理遺教：「欲從事於教育與宣傳者，可學馬師之教馬，而善教馬者，必先與馬。及盡待馬之情，通馬之性，然後以馬之所能解者教之，以馬之所能受者取之，於其目的可達。否則馬不受教，而人且被馬傷。」禮云：「中教然後知困。」又云：「教學相長。」斯義也。吾輩宜

終身奉之」！（見孫中山先生逸語，陸達節編）我們恭讀這一段遺教，便可曉得今之指導青年者，其不被馬傷者幾人哉！

彼此底精神越接近，便越容易了解，例如：同時代，同階級，同年輩，男同志，女同志，彼此之間格外容易共鳴同感。德國底遊鳥團不要長輩加入，就因為青年同志彼此最容易了解，所以Speiser在他底名著青年心理說遊鳥團是一種年齡階級運動。Alte Klassenbewegungs那末，成年人要了解青年，首先要破除成見，紆尊降長，而努力學青年。青年人好多好處，如：真摯，熱誠，坦白，勇敢等，固然十分值得成年人學樣，就是他們那些幼稚簡單底短處，我們也必須設身處地替他們想，纔得透徹。這一步工作，我們要叫它做「精神剃鬚」。唐少川熊秉三兩位大老因為要和青春的夫人同居，便毅然，決然，唯物地把鬍子剃掉，那是多麼果斷！然而指導青年者若還固執成見，大擺其尊長架子，可不是一面不若人，則知剃之；必不若人，則不知剃嗎？也許有人疑問道：「成年的指導者若和青年太不彼此，還有什麼紀律呢？」殊不知要真能跟青年做朋友，如手足，纔有真尊嚴，真紀律，而愛吹威信紀律者卻往往是官僚政客之流。我會聽說好多愛擺臭架子底先生們，又一面要巴結青年底歡心，竟不惜嬉皮笑臉以迎合青年底低級趣味，偏偏是那一種人最愛講究威信，紀律。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卻是：成年人要了解青

年，無論怎樣，總不如青年自己知道自己更清楚，那末，就聽青年自己指導好了，又何必成年人來多此一舉呢？而且知道清楚未必就是指導，也許因而籠絡操縱。例如「狙公餉狙，朝四而暮三，朝三而暮四」，那一段故事，可不是說明了因為知得清楚便變成操縱嗎？那末，了解怎樣纔不流為操縱呢？

關於這一層 *Spinoza* 底名著青年心理學大有參攷底價值。據他底解釋，了解 *Verste-* *hen* 和把他人底精神來忠實地模寫，或追體驗之 *gehellen* 不盡同義，也不只是和他人同情，或發生心裏去共鳴而已。了解是要把他人底精神當作有意味的精神關聯 *Geistiger Sinn* *nuzsamenhangs* 而把捉它。有意味 *Sinnvoll* 又是甚麼呢？編入一個價值全體之中而成爲它底構成部份的便是有意味。構成一個價值全體，關聯於一個價值全體，助成那個價值底實現，這樣諸部分底組織或關聯便是有意味的。好比我們讀一節文章中底一句警句，必須在整篇文章底全體價值底見地之下，纔能欣賞它底意味。從反面說，若換掉這警句，或把它移置別處，便失掉意味，而全篇文章也受影響。一個行爲須與價值實現發生關係，要能從價值關聯而被了解，纔有意味。生活底個個體驗，業績，動機都要對於生活全體有關聯，纔有意味。所謂了解便是理會得那個意味。到了這裏，便遇着一個問題：從一個人底生活全體能否完全了解他所有的一切生活意味呢？換句話說，把一個人所有的

行爲，態度，只纏入於他一個人底生活統一體之中，能否透徹地把握其意味呢？如果是可能的話，應該每個人都能了解他自己底生活意味了，然而事實不是如此。世間有許多人雖然天天在生活着，而卻對於自己底生活意味殊不了了。因爲他受其自己主觀的限制，卻看不清楚自己，恰如蘇東坡底名句說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而別人了解他，卻往往遠勝於他自己了解，這就因爲別人能立於他底主觀之外，從較廣大的見地去了解他。例如每個兒童都愛遊戲，您若問他爲什麼遊戲，他便說不出來，頂多也不過說是爲得好玩罷了。然而從兒童學專家格羅士 (E. L. Gross) 卻能說出兒童遊戲是練習將來生活重要的活動。又如齊宣王要人「以羊易牛」。而他自己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後來孟子卻給他點破是「見牛未見羊也」，使齊宣王感服到五體投地。由此可證明善於了解者往往能了解到人家自己所了解不到之處，即通常所謂道中了人家底心坎。憑什麼而能達到如此透徹的了解呢？Spencer 說是憑着超越的意味關聯。換句話說，所憑以了解人們生活底意味關聯是超越各個人底體驗世界之上底意味關聯。我們要了解青年，固然要同情他，而又須不被青年生活所牽制，超越他們底生活形式，超越他們底歷史的社會的制約，超越他們底體驗方式，而從更廣大的觀點去透視他們，洞察他們。如果說了解就是直接模寫他人底心理，好比說網製底與畜就是視鸞底知覺一樣的笑話。其實

認識必須把捉到範疇底決定和結合底形式。了解也必須意味決定及意味關聯。總而言之，Spranger 以爲我們了解青年，不只是憑模仿他們而忖度他們底心，乃是把他們底心理狀態關聯於一個超主觀的意味全體然後能了解他們。若用我們中國底熟語說，便是：「入乎其中，出乎其外」。Spranger 底心理學是著名的精神科學的心理學 *Geisteswissenschaften*，其中便含有不少真理。人們底意識常被歷史的社會的存在所規定，青年心理當然不能例外，只是他們不能自覺到這一層。成年人若能從歷史的社會的觀點把捉青年生活底意味，——即所謂編入於超主觀的意味關聯——好比給他們一面鏡子，便可指導他們。因此 Spranger 說真正了解必須超越直接生活的意識而體認得各種底客觀的精神關聯。若換成平易通達的話，便是：要了解青年必須對歷史的社會的環境和人生底全體價值有深刻的認識，即把捉着規定人們意識底法則，從而把捉他們底生活意味。好比醫師雖不能直接感覺病人底痛苦和他自己感覺一樣的真切，可是他能指示病者以病根，以治療法，那是病者本人絕對認識不了的。醫師所憑的是什麼？憑的是生理學，病理學等等科學的法則。醫師熟悉這等客觀的法則，纔能把捉病人底各種生理變化底意味而了解他，指導他，決不只是憑醫師底鬍子長，地位高。由此可見指導青年，固然要親愛青年，同情青年

歷史要對於社會人生有卓識，有遠見。只是老頭子便可給人們治病，只是老太婆便可接生，醫小孩，那是舊農村底陋習。現在我們總該曉得有病要請教于專門醫師了罷！爲什麼指導青年便可以不論學識，修養，品行，但求他有地位，有資格，有頭銜，有面子，便授權給他指導青年，如有不服，便從嚴懲處呢？孟子說得好：人們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便不遠齊楚之路去尋好醫師，至於心上有毛病，便不曉得請教于能人了。現在曉得請醫師給孩子治病，若青年導師便不管阿貓阿狗都可以幹，只要他鬻蚤緣，夠取得資格地位；如此重視肉體而輕視精神，不又是一種唯物主義嗎？

說到這裏，我們可曉得指導青年，一不是憑權威部勒，二不是憑籠絡操縱，也不是只憑同情親切，乃是憑透徹的，正確的了解。那末，能夠指導青年底成年人，好像必須是學問極高深的哲學家，然而世土那能找得出來如許的哲學家呢？倘若不是那樣登峯造極的哲學家還可不可以指導青年呢？而且就是學問高深的哲學家，他胸中所有的學理，法則，也不過當代學術底最高的造詣罷了，決不能說再沒有修訂發展餘地。換句話說，還不能說是最後終結的學理或法則。那末，他所憑藉以了解青年，指導青年底學識或法則，也只是相對較正確而還待修訂的罷了，決不能說是絕對的教條。若要憑教條憑權威來指導青年，那又不成其爲指導了。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成年人指導青年，其實就

是成年和青年共同參加社會生活底實踐，可在實踐當中，可以增益對於社會環境底了解，而把捉自己生活活動底意味，因而對於活動底未來的結果有相當睿智的先見。成年人的底底底經驗較豐富，和目前的新經驗對照起來，便更容易指導青年做一番比較，參證，反省，底工夫，而求適應新環境，改善自己底活動。然而青年也未嘗不可能對於新經驗有敏銳的觀察而提供過來給成年人參攷。在這樣場合，成年人一面指導青年，而同時又被青年指導，這便是所謂「教學相長」。只要是自由平等的社會，一切以前人類中底忌諱，猜疑，詐欺，虛偽，而子等等陋習不再能作怪，那末，人與人相處，當然彼此都是指導者而同時又是被指導者。歸結一句，要指導青年，還須能和青年做朋友，做一個無詐無虞的朋友。您如果能夠朋友，決無傷於您老人家底尊嚴，您便可以指導他們。試仿有名

的刺頭詩來一首：

說道鬚可剃，

人人該剃鬚。

有鬚而不剃，

難道等鬚長。

鬚是由您剃，

您還是有鬚。

請看無鬚者，

那裏剃得鬚長。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日於桂林

教育改造與世界改造

反侵略的戰爭快要迎接勝利底今天，關於戰後奠定長久和平的各種問題正在先後地被提出討論，教育者們不甘寂寞，也起而討論戰後世界教育方案，這是情理之常，毋足怪者。原來社會是教育的起源，是教育的歸宿，也曾是教育的桎梏；自文明開化以迄今日，社會固然給了教育以不少的推進力量，而也會成了教育發展的很大的束縛，社會生活方式自古迄今對於教育的功和罪，孰大孰小，是一盤極不易清算的麻煩賬，而熱心教育改進工作者就浩歎一聲：「教育苦不平等社會之桎梏久矣！」也不算是無病呻吟。友邦教育家這回熱烈地提出國際教育方案，是乘世界動盪之際，一吐胸中的煩悶，一雖不得肉，亦且快意，呢？抑或有心要在戰後見諸實踐呢？由前之說，則不妨把教育看作孤立的，賜教育家們的想像，刻畫一幀美滿的國際教育圖畫，藏諸倫敦紐約的圖書館，以俟遙遠未來的烏託邦。由後之說，便須把教育問題看作整個社會問題的一環，依據目前世界的現實，探求這次戰爭改造世界的可能的途徑，纔能把天國降落地土。

失望得很，近日桂林大公報和掃蕩報先後轉載英美學者們的戰後世界教育方案——

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底「教育與人民的和平」，羅素底「世界大學方案」都不脫烏託邦的描寫。請先說羅素罷！他這回世界大學的主張，實在和十多年前他的名著教育與羣治裏面的見解完全相同，可以說是不增不減，只更具體更瑣碎點兒罷了。他在十多年前看出歐洲在步步走上戰爭之路，因而大膽攻擊近百年來帝國主義者利用作宣傳侵略戰爭的工具不當，可以說是痛快淋漓，直言不諱。然而到現在經過十多年，他前時所憂心如焚的第二次大戰又爆發了四五年，而他的新建議還不過是一所世界大學，要她在國際和平機構的國際當局倡導之下，「實施新的教育方針，務使免除國家偏見，編定新教材，務使勸導人類忠誠，訓練新的師資，務使竭誠信仰超國家主義」。至於本大學的性質，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可作純粹學術的研究機關，另一方面可作制止戰爭和國際和平理論底宣傳機關。世界大學「於必要時，單設一個委員會，從事編著新書。教科書底作者完成一部著作，必須首先向世界大學辦理登記，申請執照，然後方得發行。任何國家在教育方面所採用的教材，不得與國際當局的規定相抵觸，如有採用未經國際當局審定的教科書，則認定這個國家的不忠實，立即由國際當局予以取締」。他老先生這些主張，都和十多年前寫在教育與羣治裏面的毫無二致。他始終不過要把世界大學給「國際政府」作「一個新的瞭望台」罷了。其餘那些關於世界大學底校長和教授人選及研究的課程等

問題，這回雖也說得細緻，而實在無關宏旨。我們要探究他的思想路線，還須看教育與羣治。他認識了現在國家所實施的悖謬愚民的教育是帝國主義的產物。他說：「西方各國男女兒童，都被教以兒童們最重要的社會忠誠，應該輸給他們所屬的國家……因此又教以謬妄的歷史，謬妄的政治學，謬妄的經濟學。教以本國的惡行，可是本國的惡行却隱而不張。又設法使他們承認自己國家所從事的戰爭都是防禦的戰爭，別國的戰爭則是侵略的。又教他們相信本國克服他國時，目的乃在傳播文明，福音，崇高的道德，禁令，或其他高貴的東西。」現在我們西方的主動力，乃是在資本家的事業中，而這種勢力的目的又大半在破壞。」擁護自己國家，擁護自己的宗教，擁護男性，擁護資產階級，歷來已成爲教育上的慣例。而同時他又相信帝國主義是悖謬的愛國教育的產物，而改造教育便可以消除帝國主義。他說：「其實教育這種東西，人們若加以選擇，確很容易使人類養成團結一致的感覺，瞭解國際合作之重要。則不出三十年，危害現在世界的這種兇惡的國家主義必能消滅。不出三十年，現在使我們自己貧乏的關稅壁壘必能降低，使我們有生命危險的軍備必能消滅，足以使我們自損的那種相忿亦可代以善意。現在各地猖狂的國家主義多半是學校的一種產物，這種東西若能設法消滅，則貫徹在教育上的必是另一種精神。」……凡此種種，其原因並不在外界，也不在我們的天性的純

粹認識的部分，因為現在我所知的比前人所知的都較多，實是在我們的情欲中，在我們的情緒習慣中，在我們青年時代所注入的情操中，在我們嬰孩時代所造成怕懼中。這個問題解決的方法，就在使人類的精神健全，而要使人類精神健全，非施以一種健全教育不可。他這番言論，在論理上顯然犯了謬誤，而在思想上也脫不了觀念論的窠臼。悖謬惑民的愛國教育既然是帝國主義的必然，而憑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健全精神却又可以消除帝國主義，這豈非奇蹟！

國際主義的教育怎樣纔能夠有效地實施呢？羅素以為須有一個類似於國聯的世界大同政府，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也主張國際教育組織「應該有一種斷然的評判作用，它負有嚴肅的責任來研究教科書，論文，以及教材，無論是在任何一國或所有的國家已經應用或準備應用的。」他們所描寫的取締軍國主義的教材或教法的手續，是要經過調查，研究，報告，最後一着是公開發表，提交國際總機關，喚起世界的輿論，這好像國聯從前處理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糾紛的那種作風。友邦教育家們好似忘記了老鼠會議防貓的那一段童話。當羣鼠大會通過了最好辦法之後，有一個老鼠提出質問：那一個去把小銅鈴掛在貓頸上呢？羣鼠便瞠目結舌，無言可答了。其實，這樣在教育政策上提倡「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主義，第一次歐戰後的德國也曾做過這一步工夫。一九一八年戰後，

德國教育部曾經布告各校歷史教育不要養成國民妄自尊大的觀念及對別國的敵愾心。威瑪憲法對於教育也曾強調人格教育及和別國協調的國際良心。一九二〇年全德國教育會議，也曾決議以憲法國際協調的精神為基礎，培養人人的正義觀念。一九二二年德國萊比錫舉行道德教育會議，聚教育家八百餘人，決議的第一項就是以德國的國民精神及國際協調的精神為基礎，施行道德教育，養成公民性格。名教育家史普郎格（Sprenger）主張各大學的位置，設研究外國事情底專部，以謀國際間互相理解。這種研究外國的風氣，在德國那時各大學也曾相當地盛行。在那時他們這樣的國際協和的教育運動，至少也不遜於現在羅素和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之所建議，且有國家憲法為其後盾，而曾幾何時，被希特勒魔手輕輕一抹，便雲消煙滅了。由此可見只憑四海一家的教育運動，培養正義精神，決不能消除帝國主義。只能說世界若走上大同之路，就必需要教育輔助推進罷了。

健全的國際組織——或世界大同政府怎樣纔足夠力量來實施或需要四道一家的教育呢？這是最重要的先決問題。而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對於這方面的探討，好似謙讓未遑，沒有片言隻字提及。他們只說了一串「多數人的教育」，「教育平等」，「自由教育」，「把社會組織當成工具來發展並保護個人底自由」等好聽話。這些好比新年見面底一

派吉利話，無補於實際，只是冠冕堂皇罷了。羅素對於此點，在教育與羣治裏面底第十章和十六章却說了多少。只是半吞半吐，不免取羅零碎。他說：『國家對內的目的好的，對外的目的是壞的』，『現在強國對外活動大半在武力的應用或威脅而目的不外奪取弱國所有的財富』。其實國家對內的壞事也殊不少。羅素也曾說：『握有權力的人，差不多都情願他的下屬重感情而不重理智，因為採取這種辦法他才更容易使那些在公平社會制度下被犧牲的人自願滿足他們的命運』。由此可見國家也是握有權力的人對國民底機構。那末，以如此對內對外兩面俱壞的國家怎樣可演變為正義的大同的世界組織呢？這纔是問題癥結之所在。關於這一層，羅素却說了一段大照話：『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端若不解決，世界絕不會和平的。況且若非共產主義勝利，這種爭端也決不能解決，因為到了將來，資本主義必不再會使人滿意』。『世界要達到和平，自然只有德國不再受戰敗的懲罰之一法。而要德國不再受這種懲罰，又非法國不再支配歐洲不可。可是要法國不再支配歐洲，結果又只有出於一戰。此外若不經過一種大規模的戰爭，印度能否脫離英國的支配，中國能否脫離日本的支配，也是不無疑問的。這一切大問題，說要圓滿解決之後，才能希望創造一種國際的威權以保持世界和平』。『十餘年前，羅素早見及此。那末，這回大戰能否得到圓滿解決呢？要怎樣纔能得到呢？』

國家這種組織底將來，黑格爾說要步步趨於「完成」政治的、法律的及道義的自由實現，馬克斯則說經過世界的社會革命，人類進到自由的共同團體，國家便要歸於死滅。而他們師徒倆都一致承認現實的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統制機關。黑格爾在他的名著歷史哲學裏說：「現實的國家及現實的政府，只存於身分的區別的場合，貧富懸殊。大多數人們不能由在來的方法滿足自己的欲望，到了這場合，國家總發生」。那末，不管說是由於絕對精神自己展開也能，或說是由於世界社會革命也罷，「完成」之後，人類那種共同生活組織，就儘它還沿用「國家」這個稱號，也應大變其質，而決不該是今天以前這樣的國家。我們若希望這回戰爭——就算它是絕對精神在那裏展開——可獲得人類自由，便不該再說戰後要恢復某某國家的歷史的榮譽。只該說要憑這回大戰各國自己變質，各自洗滌自己的歷史的污點——若借用羅斯福總統的話便是「歷史的錯誤」。最近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對黎巴嫩事件，爲得還要恢復法蘭西帝國的光榮，幾乎鬧出大亂子，妨害反侵略戰爭的進行。這真可令人寒心。法蘭西民族委員會還未成爲國家，充其量只可說是一個國家羔子，而因爲不肯忘却舊時錯誤的光榮，而突然露出狎狎面目，這真教人十分迷惑那一塊絕對精神飛往那裏去了。我們目前要緊的工作應該是：細心認識這回大戰引導世界邁向正義和平的可能的路線是甚麼，而努力開拓它，推動它。

又嚴正地檢討失敗的可能是甚麼，而毅然消弭它，糾正它。要這樣做，勝利纔可迅速降臨，也要這樣做，纔能產出戰後嶄新的文化和教育。談文化建設，教育建設，若不注意探討怎樣會成功，怎樣會落空，而徒然高唱將來要這樣那樣，那不是形式主義者，便是空想家。世界受了這一場空前浩劫，我們還忍心說門面話麼？

這回苦戰了六年半而還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是正要建設三民主義而飽受侵略的中國；充當擊破納粹的北角的，是建設社會主義成績卓著的蘇聯。以豐富的資源，雄厚的生產力援助反侵略同盟軍的美國和英國，又早宣言放棄帝國主義，訂定大西洋憲章，而且自動廢止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又宣言恢復朝鮮獨立，協助伊朗復興，決定菲律賓提早獨立。此類事實都是世界可得自由的有利條件。而印度問題的擱淺，中東及遠東各弱小民族問題之未明朗，及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對黎巴嫩之一度狎狹露齒，這些都是不佳的朕兆。此外，各同盟國內政的弱點，如民族未協和，民衆痛苦，官僚專恣，奸商漁利等等，不管它是中國臭蟲，或外國臭蟲，也都是制勝和建設新文化新教育的有力的障礙。凡是有利的條件，應該努力發展它，擴充它，使它成爲主導的力量。凡是有害的障礙，都該嚴正指摘它，剔除它，使它不能復萌。這纔是戰時的緊要工作。也就是戰時的文化、戰時的教育。由這番工作當然可產出戰後的新文化新教育。世界教育和整個世界

是聯繫的，而不是孤立的；戰後底教育和戰時的教育也不是脫節的。「環境的改變和人類活動的改變之巧合，可理解爲而且只有合理地理解爲革命的實踐」。該教育改造者最忌「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的一部分高出於社會之上」。

中國古代有這樣一段神話故事：春秋時，貴族葉公子高好龍。他的宮室衣服都喜歡畫龍雕龍做裝飾。上帝同情了他的嗜好，特派一條真龍飛下來給他開開眼界。怎知龍剛把大頭伸到葉公的庭園，葉公驀然地看見這怪物，就嚇到昏迷不省了。由此，人們說：「葉公好龍，好其似龍而非真龍。羅素說過：『世界各國的教育家，除俄國而外，彷彿生來就是懦怯的』。那末，動不動便擬訂一套未來的教育方案，大概也是和葉公好龍一樣吧！」

一九四三，十二，十二，於桂林，棲梧居。

威爾基近著天下一家 *The One World* 有這樣一段記事：威爾基在蘇聯各地歡宴席上屢次提起請蘇聯某著名音樂家往美國演奏，可藉此以增進美國對於蘇聯的理解。而每次同席蘇聯人士都默然不答。最後一次，席間蘇聯某人直告威爾基，說他們很不喜歡聽這一套外交辭令。理由是：蘇聯全國對納粹幾年的苦戰若還不能得到美國人理解，便決不會只藉一個音樂家幾次演奏可以造成美蘇兩國人民的親愛。現在羅素和美國教育家們想憑學校教科書造成國際大同，不知若給蘇聯人士聽見，威

竟如何滑稽？

美國教育政策委員會說：自然科學落在野蠻人手裏便成了殺人武器，所以必須以國際和平的教育使野人化為文明。其實軸心國家的財閥，軍閥和官僚都是所謂上層紳士，就因為他們是紳士，所以如此兇暴。假如六七十年前美國人和英國人輸入科學到日本，而把這套法寶交給日本的平民大眾，如幸德秋水，界利筵，片山潛之流，也許今天不至於有珍珠港事件，「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一九四四年一月附記。

憲法與教育

提到憲法與教育，教我記起一樁舊事：民國十一年，黎黃陂重任總統，恢復國會，廢續製憲，要完成所謂「天壇憲法」。那時德國威瑪憲法出世未久，創造了世界國家憲法編列教育專章的新紀元。北京師範大學同事們受着這個新刺激，要提供憲法教育章的意見給國會。當時負責擬稿的有經亨頤，韓定生，程時燧，李建勛諸位和我共五人，寫成一個草案送去了。可是事實不久証明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國會諸子正忙於抬曹錕登位

倉卒公布憲法當作幌子，而教育一章因為未通過三讀會便擱置了。我們當然也不再追問。民國十四年，北京臨時執政府又說要製憲，設委員會，我們又把舊稿略加修正送去，也無結果。十九年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議製約法，經亨頤，鄒魯兩位中委向我們徵求教育章的意見，經先生且參加了我家裏的小組座談，結果草成一稿共九條如下：

第一條 中華民國政府，為鞏固共和國基，增進人民幸福，對於全國教育負有保護發展之全責。人民就學於公立學校，由小學至大學，一律免納學費。

第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向政府有要求受教育之權利。政府有普及全國人民以充足教育之責任。是為國本教育，至少六年，應逐漸延長。在國本教育期間，應由學校給學生以教科書及學校用品。

第三條 國家及地方之教育經費應保障其獨立。中央教育經費至少須占歲出全額十分之一，各省區至少占十分之二，各縣市至少占十分之三。為充實教育經費計，得特徵教育稅。並指定國有及地方公有之財產為教育基金。其保管法及支用法另以法律規定之。

第四條 中華民國學制應成為完備有機的系統，俾就學者得各按其性能，自由選擇。國家及地方對於天稟秀穎而無力升學之學生，應給以學資，俾得受中學以上之教育。

第五條 中央及地方均設立專管教育之行政機關，其組織及職權另以法律規定之。

教育行政機關之人員須以具有教育專門學識經驗者充之。

第六條 訓練中等及初等學校教員之教育機關應獨立設置，並以法律嚴定其畢業生之服務辦法。初等及中等學校教員之待遇，應以法律從優規定，並保障其地位，俾得安心供職。

第七條 私立學校其辦學者須為中華民國公民，不得帶有宣傳宗教之性質，且必須經教育行政機關認可。

第八條 學問藝術之研究及教授，國家應保障其自由。

第九條 歷史的美術的書蹟，作品及天然名勝，由國家保護之，並禁止轉售於外國。

在上面第二條所標明的「國本教育」是經亨頤先生的主張，他強調教育應為國家對人民的義務，而在人民方面說却該是權利。第三條的「教育稅」，經先生意指鹽稅，他說鹽是人人不論貧富都一樣喫，教育也不論貧富一樣受。至於為什麼不規定教育宗旨呢？這也是經先生的意見。他說三民主義已如日月經天，無須再在這裏重述。此外都是民主黨的舊稿。這九條草案反映了當時我們這班教書先生的思想：受了威瑪憲法的鼓舞，

想給中國憲法也來一段摩登的教育章；也由於教育歷久被軍閥官僚政客所輕蔑，蹂躪，乘機想從憲法上取得一重保障，所以注重教師及和教育行政人員之尊嚴，教育經費來源之確立，及學術講習之自由。這幾條意見大半爲太原擴大會議所採納，不久成了太原約法草案。我剛巧還存有一份原稿，這裏把它抄錄下來。

太原約法草案

第一百八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凡及學齡之男女兒童，至少受六年之基本教育。

第一百八十一條 基本教育不收學費，依於財政及人民經濟狀況，當漸使受基本教育之男女兒童，其書籍及衣食費，由學校供給之。

第一百八十二條 小學教員應規定其服務年限及保障，其詳以法律定之。小學教員其子女得於中學以上免費入學，及年老退職時應給終身退隱金並其他從優待遇方法，均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八十三條 未受基本教育者，應由國家或地方設法予以補習教育。

第一百八十四條 已受基本教育成績優異或有特殊天才而無力升學者，由國家或地方考驗後，應設法補助俾得受中學以上之教育。

第一百八十五條 國家及地方保障教育經費之獨立並應有與一般政費分離之獨立教育基

金。

第一百八十六條 國家以法律指定全國固有之大宗稅收爲基本教育經費。其不足時，並得徵收教育稅補充之。

第一百八十七條 各學校教員應受檢定，其檢定方法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八十八條 中學以上之教員，其待遇及保障，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八十九條 關於學問及藝術之研究，有發教及特殊成績者，由國家受以學位及獎勵之。

第一百九十條 學術之研究及思想與社會秩序無直接妨害者，應保障其自由。

第一百九十一條 中央及地方均得設立教育會議，由政府方面，大學及學術團體方面，各派代表，共同組織，每年開常會一次，其詳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九十二條 教育會議之職權如左：

一、關於教育之立法及行政暨其他一切之教育事項，得應政府之諮詢及建議於政府；

二、關於前項事件，得提案於全國或各省之國民代表會及縣議會，并得派代表到會說明提案。

這草案發表時，曾博得天津大公報（十九，十一，一）『教育一章尤見匠心』的好評。後來立法院起草五五憲草時，是否參考到太原草案，雖不可得而知，然現在細讀此第七章全章，除一三四和一三五兩條之外，其面貌和精神都和太原草案相差很遠。試把這兩草案作一度比較，便可曉得。

其一，關於人民受一般教育的權利者：五五憲草一百二十二條『中華民國人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一百三十四條『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一百三十五條『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太原草案之一百八十條則規定基本教育至少六年，這意思是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延長。一百八十一條又規定要相機設法供給入學兒童所需的書籍費及衣食費，這又表示了切實求基本教育之可能普及。而五五憲草關於這方面都欠注意。

其二，關於高等教育者：五五憲草一百三十六條『國立大學及國立專科學校之設立，應注重地區之需要，以維持各地區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均等，而促進全國文化之平衡發展』。教育機會之不均，文化水準之不平，與其說是因為地區不同，不如說是因為階層有別，今只講究各地區的高等教育機關之分配，未免欠中肯。一百三十八條之第五項規定學生舉行俱優無力升學者，由國家予以獎勵或補助。這也很空泛，因為未說明

是中學生成小學生及如何補助。太原草案一百八十四條則指明已受基本教育而無力升學者受補助俾得受中學以上之教育。這却很切實地援助下層大眾。

其三，關於教育經費者：五五憲草一百三十七條「教育經費之最低限度，在中央為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區及縣市為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其依法獨立之教育基金並予以保障」。這是五五憲草可取的一條，也只有這一條。比較太原草案一百八十五條更說得實際而有力。而太原草案一百八十六條要指定大宗稅收及徵收教育稅以推行基本教育，像是更看重大眾教育。

其四，關於教育工作人員者：五五憲草一百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從事教育成績優良久於其職者，由國家予以獎勵。這未免空泛了。太原草案一百八十二條，一百八十七條和一百八十八條都規定得很具體而且特別注意於小學教師，這才表示了平民精神。

其五，關於教育行政者：五五憲草一百三十三條「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機關一律受國家監督，應負推行國家所定教育政策之義務」。這只堅決地表示教育統制的態度，而未免有偏重中央集權之嫌。太原草案底一百九十一條和一百九十二條授權於教育會議，這方法是否妥善，雖還待討論，而其重視地方民意及專家意見，以預防教育行政之官僚化，確較合於民權原則及分權原則。

其六，關於私立學校者：太原草案竟全無規定。五五憲章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國內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成績優良者及僑居國外國民之教育事業，皆由國家予以獎勵或補助。這總算是提到了私立學校，可是沒有表現什麼意思。我們在北平私擬的草案却規定私立學校辦學者須為中國公民，且不許宣傳宗教。這一點意思適了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制定私立學校規程時都被採納了。現行私立學校規程久被公認為我國教育法規中之最於革命性者。

其七，關於教育宗旨：五五憲章一百三十一條中「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在發揚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活智能，以造成健全國民」。這是五五憲章裏面最拙劣的一條。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十八年早經公佈是一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若無端把民權和民生抹煞，只強調一個民族精神，則和法西斯主義何異？例不如太原草案之不再複述却大有道理。

其八，關於學術思想之自由者：五五憲章無規定，只於一百三十八條之三項規定於學術技術有發明者，由國家給予獎勵罷了。不給學術以自由徒言獎勵，充其量也只能發顯些微取功名的技術，如帖括，制藝，八股文之類而已。自唐宋以迄明清，千餘年來覆

輾相尋，難道現在還不覺悟麼？太原草案一百九十條「學術之研究及思想與社會秩序無直接妨害者，應保障其自由」。按國民黨政綱，對黨政策之六，「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一般的言論出版既然無條件地完全自由，至於學術思想更不該有限制。太原草案「與社會秩序無直接妨害者」這句附加條件，實在太過小心，沒有必要。

總括地說，五五憲草、第七章全章與三民主義的精神相距很遠。其中有些條文簡直把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割得太厲害了。現在既經過七年間民族解放戰爭的體驗，認識了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之不可分割，封建殘餘之不可姑息，納粹法西斯之不可效尤，我們的憲法教育章便不該費用那樣時代落伍的陳稿。此外還有一份張知本私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據說當時是和五五草案原稿同時提出立法院而不被採納的，可是那裏面關於教育的所擬各條都比五五憲草較為中肯。此稿教育條文共十條，列為第四章民生之第二節，茲抄錄如左：

一四三條 已達學齡之男女兒童有受基本教育之權。基本教育六年，不收學費及其他教育上之必要費。其衣食絕不能自給者，並供給之。

一四四條 兒童在受基本教育期內，父母有使就教育並自為教育之義務。

一四五條 未受基本教育之人民施以補習教育。

一四六條 中等以上學校廣設免費學額於貧民免收學費。

中央及地方應寬籌貧民就學補助費，於入中等以上學校之貧民按期補助。

一四七條 國家於學校教員應優定其待遇。

一四八條 學校教員之講授，除抵觸刑法外，應保障其自由。

一四九條 中央於地方應寬籌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一五〇條 私立學校適合國家教育制度而有相當成績者，應許可之。

已許可之私立學校，中央或地方應斟酌其情形，給以補助費。

一五一條 凡於學術之研究有發明或特別成績者，國家應保護獎勵之。

一五二條 有關歷史文化及藝術之古蹟古物國家應保護及保存之。

這十條規定了人民受教育之權利，規定了貧窮穎才之培育，規定了講學施教之自由，規定了教育經費之保障，規定了教育工作及學術研究之獎勵，規定了私立學校，規定古蹟古物，辭簡而扼要，不只是遠勝於五五草，且出乎太原草之上。這草案第三章第二節劃分中央與地方之權限，而把教育及文化列入地方權限之內，尤合三民主義之精神。

●謹按 國父遺教：「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見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民國元年國民黨宣言曾本此旨，其劃分中央地方之行政，列入中央行政者只有國立學校，而教育行政及地方學校則皆屬於地方行政。蓋中國幅員之廣，各地方人民生活及文化水準之不齊，教育事業尤不宜聽中央統制。現代大國可與中國相比擬的只有美國和蘇聯，而兩國都不設中央教育部。德國威瑪憲法第十條規定：聯邦政府得以法律規定關於教育——包含高等教育及科學圖書館——之基本原則，其餘悉授權於各邦。這一點值得我們取法。

話要說回來了。我把幾份憲草來枝節地逐條比較批評，却忘記了一個基本問題——憲法裏面規定教育條文畢竟有什麼意義？原來教育諸條應是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權利之一種，而憲法的本質又是社會各階層力量之相互關係。這關係是怎樣，人民可得而享受的權利便怎樣，關係若有變化，權利也便有變化，不能架空取得，也不會無端被剝削。從來各國底憲法可大別為兩種：頭一種是統治階層對革命的民衆的諾言，第二種是革命政府領導民衆實踐革命鬥爭的實錄。頭一種最好的實例是英國。前世紀幾次的憲章運動，是英國社會的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有了變化，因而人民向統治者有了激烈的要求，統治者使不得不讓步求妥協，纔可勉強相安。這樣的諾言若和已經變化的關係恰相適應

，便不容統治者自食其言。若社會關係未發展到語言所應允的那個程度，便必成具文，無論條文規定得怎樣漂亮。德國威瑪憲法便是一個好榜樣。由於革命力量日趨銷沉，所以社會民主黨雖盡力寫好看文章，而結局是一張廢紙。第二個實例是蘇聯，他們粉碎了舊俄羅斯，而建設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又經五年計劃得到了偉大的成就，因而紀錄起來成爲憲法。然而只能紀錄既得的成就，而不能描寫未來的共產的理想。由此可知憲法必須是紀實，不管是由於勉踐諾言，或由於鬥爭成就。那末，某一國憲法裏教育諸條應該是他們那裏民衆既得的民權之一種。好比有學問的人，纔會寫文章，我們批評他的文章，纔是批評他的學問。如果一位統治公子請一個斗方名士代作一本詩集，人們若緊拿住這本詩集來批評，結局是徒勞，和那位公呼爺底文才無關。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該屬於那一種呢？自然不是諾言而該是革命成功的實錄。我們的國民政府，顧名思義，是領導民衆從事革命鬥爭的革命政府。那末，今天的憲法應該是二十年來訓政成就的實錄。教育諸條也應該是紀錄三十年來既取得的民權之關於教育文化方面者。成就到怎樣，便紀錄成怎樣。中華民國教育宗旨是「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及，民生發展」的。我們的民族獨立到甚麼程度，民權普及到甚麼程度，民生發展到甚麼程度，我們的教育便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裏絲毫不容假

借。好似沒有甚麼問題，也用不着絞腦汁，用思想。可是遺憾得很，由於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由於國內封建僵屍的頑強作梗，我們的革命尚未成功。還在對着這兩大死敵苦鬥。我們既得的民權實在少得太可憐，因而教育成績也少得太可憐了。現有的教育實錄老實少到不堪，而且還有許多不堪寓目的東西決不能紀錄的。到現在快要製憲，於是面對着一個大難題：是架空描寫呢？還是照實紀錄呢？空寫則必無效也，實錄則不足道也。這總是目前我們關於新憲法教育章的特殊問題。花轎快要臨門，而頭還未梳，腳還未裹，耳還未穿，大姑娘怎麼辦？

亡羊補牢，好在現在還不很脫。我們的政府預期抗戰結束後一年實施憲政。試預計民國三十四年倭寇肅清，三十六年頒布中華民國憲法，為期距現在還有三年。我們檢討既往，策勵將來，悟歧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比及三年，還可望有成的。恭讀製定建國大綱宣言：『積十三年痛苦之經驗，當知所謂人民權利與人民幸福，當務其實，不可徒襲其名。倘能依建國大綱以行，則軍政時代已能肅清反側，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權，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憲法而行專政者所可同日而語』。然則為今之計，亦惟『依建國大綱以行，扶植民權』而已！只有誠心誠意扶植民權，纔有教育之可言，而扶植民權之為事，便是教育。今者國民教育五年計劃，快要滿四年，而各

地所報告，只得些不甚可靠的數字。若按其實，則大多數的國民學校，還只得一塊招牌，而教師改業，兒童怠學，民衆裹足不前等等現象還觸目皆是。一言而蔽之曰，此無他，民權之未植也。現在猛然覺醒，照正國民黨的對內政綱，「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由是而「勵行教育普及」，還可期有成。只要發展的不是官權，不是紳權，而實是民權，則人民必急需教育，決不肯聽任其有名無實。那末，三年之後，可能在憲法上這樣規定：

已達學齡之男女兒童一律免費受基本教育。貧困者由國家供給其衣食書籍等費。已逾學齡而未受基本教育者一律補習與基本教育同等程度之教育。

近來中上學校學生人數雖有增加。而學生程度低落，青年意志消沉，又爲有目共觀的事實。揆其原因，還是在民權之未植，民生之未厚。社會上還只有憑資格，藉資緣的人們能登要律，發大財，恣行無忌，青年們又那能知道須要求實學修德性！只有些高頭講章，應試制藝可以獵功名，盜虛聲，又何來得學術思想呢！如果猛然回頭，毅然給學術研究及教師講學以完全自由，不加折扣，使他們得自由對真理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而不是對審查官員負責，則學術風氣及教育興趣必可恢復。又民意若得自由暢達，社會上有了真是非，真教師纔得保障。貧寒青年纔可冀得栽培，而獎學金免費額纔成爲周

急而不是繼富。那末，三年之後，又可能在憲法上規定：

學術之研究及其傳授，講習，皆由國家保障其自由。

甲等以上學生之無力

自給者，由國家資助之，俾克有成。

現在教育還不免爲士大夫階級文身之具。原因在封建舊習還未除，民權還未張，社會上勞心勞力貴賤懸殊，官民異勢。教育行政亦只爲向上級報成績，而不是爲人民謀幸福。倘民權伸張，從地方自治而至於各項建設，均由民治，民有，民享，而不是官治，官利，官享，則人民對於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恰如布帛菽粟，斷不肯聽其不足供用。教育成爲人民自己的事，各省，各縣，各市必能因應其經濟狀況，文化水準，以求適宜的發展，而共赴全國一致地建設三民主義社會的大目的。所有一切統制與文，如復試，會考，授與學位等等封建幽靈，貫辦虛榮便不復有出現的餘地。政府對於各級教育機關之考察，視導，可以真正成爲他們的精神的或物質的後援，而不是求抵制肘的積弊。倘肯立刻這樣做，三年之後，又可能在憲法裏規定：

中央政府在法律上規定全國一致之教育基本原則。地方政府得自由立法並執行之，以適應各地區之教育需要。中央及地方之財政預算均應寬籌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各級教育機關不得舉行宗教儀式，並不得授與任何虛榮稱號。

以上各節必須立刻實踐，纔可冀望得到結果。須知「革命事業，由民衆發之，亦由民衆成之」。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在民衆之能擁護憲法與否。舍本求末，無有是處也。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以銷滅，反得憑藉之以肆其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數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會計及其於本身利害何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我們恭讀這幾段遺教，能不惕然深省！憲法既然是革命建國的實錄，必須先舉其實，然後可有其文，決不能杜撰。不容虛構。教育是生活，必須使民衆有那樣的生活，才有那樣的教育。若只把幾行條文來咬文嚼字，誠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云「舍本求末，無有是處」。只有三十年前的我才那樣稚氣。到而今，早知非了！

一九四四，二，一，於桂林，棲梧。

養士

養士是階級社會在相當高度的發展後所不可避免的教育現象。尤其是像中國秦漢以來這樣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建築於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這裏的養士教育

是歷史的社會的必然，這又可稱為官僚政治底計劃教育。我們要理解中國教育底歷史的遺傳，直到現在還起作川底根，同時要預防今後侈言計劃教育者底掛羊頭而賣狗肉，都須把二千多年來底養士教育作一番考察。

士這一類人物在社會上形成一個階層或集團而對於社會起作用，是在春秋戰國之交。孟子說：「處士橫議」，就是那時期。這類人物之產生，和世襲封建的貴族政治，崩潰有莫大的關係。在貴族鼎盛的時代，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這類等級，秩序整然，根深蒂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其下便是治於人者，界限很鮮明。孟子述王制，也曾說到庶人在官者與士同祿，祿足以代其耕，然而那是極少數的卑微小吏，僅可不耕田有飯吃罷了。在這時代，教育文化當然是統治階級所專有，庶民中殊不易產出知識分子。老子的官職是守藏室史，書籍屬於國有，設專官掌管，只有統治階級的子弟纔可讀書。季札聘魯，始得觀樂；韓宣子適魯，始見易象與春秋。季札是吳國底親貴，韓宣子是有名大國晉之上卿，他們讀書底機會尚且如此難得，庶人們更不必說了。那時候，士——知識分子——就是支配階級，只有支配階級裏纔有士。後來由於商業資本底發展，在財產上陸續發生了兼併，而在政治上貴族們也互相火併，彼此篡奪，即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征利」，原日那一套等級制的統治秩序便開始崩潰了。孔子敘述那崩

潰的過程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大批高級的貴族驕奢淫逸，較容易腐化，每每被下一級所收拾，這樣一層一層翻下去，達到最低一級，便是陪臣執國命。這世卿的政局快要告終，而代之以官僚。貴族們互相火併，最後寡奪的勝利者得到一個經驗教訓：同階層的人往往靠不住，很容易有寡奪的野心。孟子對齊宣王論貴戚之卿，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把齊宣王嚇得勃然變乎色。君王們曉得貴族不易控制，卻不如由庶人援用官僚。可以任意生殺予奪。另一方面，大批中落的舊家子弟，失掉了采邑，失掉了政治地位，而他們決不甘心也不能淪為農夫，因而他們的生涯，大抵不外教書和做小官兩條。孔子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他的祖先原是宋國沒落的貴族，移居魯國。他青年時期曾做小官維持生活，而一面利用舊家風，知道多少求學底門路，向各方面游學，學成便開館授徒。貴族們天天變化，當然無心學問，因而學問底門禁絕漸疏，而在新興的小資產者有了餘暇，也有了興趣去求學問，於是學問便逸出了貴族範圍之外。讀書教書和做官便成了一條路線的幾個站頭。而走這條路的一部份是中落的舊家子弟，和又一部份是從平民新興的小資產者。這班人通稱為「士」。士是站在統治者與庶民中間的一種中間階層。孟子說：「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這是士的本來身份，和庶人一樣。所以萬章問：「庶人

召之役，則往役」。孟子答道：「往役，義也」。可見「士」若不被君三錄用，或使之爲師友，使與庶民一樣服徭役。這是後來讀書黨從役底張本。從統治者看來，士可以任意黜陟，而且經過相當的平民生活和讀書生活，又確比舊日貴族較爲可用。所以就「士」當作官吏底資源。而士自身向來與勞動生產無關係，或是脫離了關係。除了做官之外，也別無出路。所以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孟子也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統治者威權須經過士之手纔可以有效地達到民間；庶民底生死命運也須經濟士之手纔得統治者決定。士站在如此地位，對於統治者則挾庶民爲資本，而對庶民則又假統治者爲護符——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遂有舉足輕重之勢。從這個形勢，就形成了士底身份。梁子，而士之德行，操守，名節種種的意識形態就產出來。孔子「天生德於予」那一種自負，是這類自覺底先聲，孟子討論士底出處問題較多，萬章一篇裏面討論這問題的幾佔半數。孟子「天爵人爵」底區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顏淵所謂「獨前爲附勢，王前爲趨士」；「生王之前，不如死士之後」。這些言論，都是爲士張目，向着統治者示威，擺架子的。然而這種架子畢竟難免空心，還是銀樣蠟槍頭的。孟子說：「往役義也」，可見君若若不容氣，硬把士拉伏，士也沒法了。

。萬章問孟子怎樣領受諸侯底遺贈。孟子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再問道：「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假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這明白指出君王之剝削民間與強盜無異，而士君子爲什麼分潤賸物呢？這樣便駁得孟子很窘，只好用一番遁辭來解釋。從這裏可以顯然看出士畢竟要靠統治者養養，他們是不革命的，所以一貫地保持一個小罵而大捧底態度，勢不敢太決裂的。士對於庶民雖比較均接近。而決不是人民之友，他們只要給人民求得最低限度的生存，不至於立刻憔悴而死，還可以勞動生產罷了。這也還是爲着統治者底利益。正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統治者因而始終會明白士是可用的，好比對付一匹駿馬，儘管讓牠有時咆哮一下子。而給牠餵得飽飽的，加上銜勒，他便會乖乖地聽騎。士又始終把統治者看作工具，而不看他作目的。只假借他的權勢來耍弄，以滿足自己富貴功名底欲望。在統治者與士雙方利益一致底時候，固然各得其所，而遇着雙方利益尖銳地對立底時候，大多數的士還是以自己利益爲主的。魯肅告訴孫權：百官們即使投降了曹操，也還可「以一樣做官，真個惹的只主公一人罷了；這一番話是士底最坦白的自白。所以歷代奸臣汚吏佔絕對的多數。統治者也曉得這一層，所以歷代統治者對付士底手段，不是養，便是殺。總而言之，養士在封建社會底官僚政治固然是不得不然，也是一種互相利用底策

術，其中伏有不少的殺機。

自春秋末期開始，經過戰國而至於漢初，這四百年間，中國大一統的官僚政治步步發展而至於完成，養士也跟着造成一定的政治趨勢。所以蘇東坡說：『春秋之末，至於禮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其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墜白異同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質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不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斷養皆天下俊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過代，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梳皆爭致賓客……』這段文章把幾百年的養士情況速寫得簡明。然而東坡說『秦既併天下，遂不復養士』，這卻不盡是事實。按史記叔孫通傳，陳勝起兵，二世召博士諸儒三十餘人問。諸言勝反者皆瀕二世怒。通首言爲風盜，遂被賞賜。由此可見秦代統治者也養士，只是所養的不多，而且只有皇帝養士，別人不得養，也不敢養罷了。必須養士底理由，東坡說得很明白，就是：『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生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

。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這就是說：許他們——士——分潤剝削之所得，其餘的百姓便遣不了反。然而原則雖如此，而實行底方法，卻頗感困難。士底人數相當多，而且越來越多，若只靠皇帝一家來養他們，勢難免遺漏。若聽憑官貴人們也「爭養士自謀」，又恐怕回復到春秋戰國那個局面，殊不利於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秦代就是這樣，於「併吞天下隕名城，殺豪傑」之後，只收容一小部份，而「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既不能「稿頂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便「將輟耕太息以待時」，所以天下大亂。

漢興，「懲秦之禍」，又暫時恢復了舊辦法，自高帝而至於文景，都又聽「諸侯卿相爭養士自謀」。然而這並不是新辦法，只是暫時沒有辦法底辦法罷了。所以結果不免有七國之禍。直至武帝，積百年之經驗，纔把貢舉與學校聯合起來製成「養士教育」這一條大為「進步」的辦法。漢高帝二年，詔郡國氏遺賢，這是開始改換名目，由皇帝來養士。其後，文帝二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至文帝十五年，皇帝便親策賢良，這是科舉之開端。武帝幾次詔舉賢良方正，這便成了漢代底重要的選士制度，然而還不是定期的。至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這是定期的選士制。當時制定一郡兩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三人，六十萬以上五人，八

十萬以上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這又普遍而又定期了。而且又不必對策，即可委任，原來無官的任以官，原來是小官的升爲大官。可是後來應舉者竟不多，雖規定郡口二十萬歲察一人，但竟有「關郡不薦一人」的。大概是因爲地方官吏太認真了。若一定要真選出「德行高妙，學通行修，明習法令，剛毅多略」底人士，是不容易的。殊不知天子求賢，其實不過那麽一回事，而地方官又竟認真起來，選不足額，於是「求賢若渴」的天子便不得不另想辦法。至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設立博士弟子制，這是由皇帝設教育機關來養士。「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聞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史記儒林列傳序）「諸子博士弟子的，便「復其身」，就是說：已經不是庶人，可不至於「君召之役，則往役」，可以免被拉佚了。博士弟子受業一年之後，考試結果，（一）「能通二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二）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見儒林傳）從此遂奠定中國二千餘年一貫的養士教育政策底根本精神——學校與貢舉並行而不悖。這項博士弟子制，至王莽當國，始發展爲國立大學。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王莽令天下立學官

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縣曰庠，聚曰序。四年，又奏起明堂辟雍禮殿。於長安西北七里，爲學者築舍萬區，繕正式成立規模宏大的太學。王莽是一個講求中國傳統的所謂「治術」底統治者，他又追認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歷代帝身之追封孔子，也數他是第一人。長安底太學，後來（公元二十三年）被革命軍燬了。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再於洛陽興太學。漢書儒林傳序說：「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稽式古典，鍾立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宅乎其中」。由此可想見當時養士底盛況。至漢帝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太學生有三萬餘人，終漢之世。這班太學生既可以免徭役，有川資，有膏火，且可以攜家室住校，讀書擇師都可以自由，可稱爲盡養士之極致。至三國時代，天下紛爭，而青年爲求免力役兵役，洛陽太學生，也還有幾千人。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底青年入學校避兵役，此風由來已久，這是社會存在規定人們意識底一種證據。至於地方公立學校，即所謂「郡國學校」，漢初已有零星設置，至王莽始制定統一制度，令全國普遍設置。東漢以後，更爲盛行。青年就學於地方學校的雖不能像太學生那樣直接有出路，然通過貢舉制度，也可以走入仕途。此外如私人設館授徒，雖與國定學制無關，而所學的也是文學經典，都不外一套應試做官的準備工夫。貢舉底考試決定了學校之所學習，而學校底學習又促進了考試底具體方法——測驗考校底方法。這是養士制度底

妙用——學校與貢舉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東坡說：「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頭一句「三代以上出於學」是儒家傳統的理想，大抵不可靠，此外列舉戰國以後底史實，確是一貫的養士政策底表現。而自漢武帝以後，一面託古於三代而興學校，同時又配合於貢舉考試，授職、晉身，又確是養士教育底精彩。科舉制度雖大成於隋唐，而至明清兩代，這五百年間，學校與貢舉纔完全配合無間，可稱爲養士教育發展底極致。這一套養士教育愈有計劃，而遺害愈烈，直至最近四十年來的高等教育還是接受着這種遺傳病，所以難免未長先腐。

養士教育，這一套計劃教育，從它制度底自身說，確有許多優點。頭一點優點是由皇帝統一養士，不許諸侯卿相分任其勞，纔可預防第二個野心家想做皇帝。第二點是未必人人給官做，而人人都有做官的希望，即不做官也可以「役人以自養」。入太學的固然得其所養，那些不入校而取得個把孝廉，貢生或秀才資格的也可以武段鄉曲，魚肉百姓，這便救濟了「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之弊。第三點是士底教育也由官家統制，規定了學程，著爲功令，以消磨智勇精力者底精力，以「賺得英雄盡白頭」。自對策，詩賦，經義，帖括，八股，甚至於今日的自然科學，都可利用爲麻醉劑。第四點是使天下

智勇辯力者都「科舉黨爭，富貴熏心，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見明彙待訪錄）所以歷代底官學沒有不腐化的，就要他們腐化纔合統治者底口味。後來的私立書院發生，雖然想要避免官學底腐化，而最後的晉身權操於統治者底手，也不免受「朝廷之勢利」間接地影響，也「一變其本領」，而捲入「科舉黨爭，富貴熏心」那大洪流裏去。這一套計劃教育底政策，奠定了中國二千多年教育底本質，花樣儘管翻新，而教育底本質還是養士。於是一切道德、學問、藝術都變為敲門磚，掛羊頭。古來學者也往往有人想在這計劃教育裏尋求烏託邦的幻想，實在不免太迂腐而無視歷史的現實。例如黃梨洲，在他底名著明彙待訪錄，也明白指出「學校所以養士也」。然而他老先生強調了鄭子產不毀鄉校那一段歷史佳話，而幻想古代以學校為最高權威的清議機關。其實若到了「朝廷與學校相反」底時候，若不能以革命衝破這桎梏又不甘俯首帖耳以朝廷之是非為是非，而徒然「伏闕捶鼓」，想向養士者講道理，就必然「收捕黨人，編管陳歐」，不時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他不曉得「勢利以誘之」，甚至於「偽學之禁，書院之毀」，乃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底官僚政治所產出的計劃教育之所必然。

養士教育雖然是統治者底一種好計劃，然而它底有效的限度並不大。這計劃是建築於「剝削農民以供養少數的智勇辯力者」這個基礎之上的。這決不容許「生之者寡而食

之者兼」。換句話說，被養的士決不能多。韓愈排斥佛老，不是從宗教信仰底立場，乃是從政治底立場，其理由就是：「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多了和讀書人同樣不事生產底佛老教徒，便少了生產的農工，那便養不起了。所以他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這就是說：要強迫和尚老道們還俗，去做農工「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見原道〕可是這如意算盤很難實現。天下安定，智勇辯力者日多，便無法「區處條理各使安其處」。於是有一部份的士去作黃巢、吳用、牛金星而天下大亂。又要大殺一場。歷代之養士而又殺士，養不了便殺，殺。又養，又殺，反覆相尋。那是中央集權底官僚政治之必然。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於平越

乙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底戰鬥性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孔夫子遺教指示了教育與戰爭的聯繫，表明了教育的戰鬥性。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滿了三年底今日，政府決心加緊推行國民教育，按照「三年有成」的公式，真是十分必要而再不容延宕的事。自秦漢以來，中國教育已經墮落於「養士」一途，讀書久矣乎成了士大夫晉身之階，作嫁之具，看來好似與塗脂抹粉，描娥眉，修指甲同樣地逸豫而寧靜的事。其實豈應如此！三年來民族抗戰至少也可以把教育的本來面目沖洗出來。

在大一統的官僚專制政治未成立之前，教育這流露多少真面目。例如晉文公圖霸，勤工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這都是適應當時環境的民教工作。那時趙衰的辭語「少長有禮，可以用矣」。他不說「有勇」而但說「有禮」這是鄭重表示組織和紀律的訓練重於軍事技術。「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

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放蚘，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可見當時楚人的民族建國運動怎樣的在教育方面奮鬥。自從大一統官僚政治形成之後，所謂政治便是統治術，駕馭術，而教育就被圍割了。統治者最怕民衆有組織，最忌民衆覺醒。他們對於民間的智勇辯力者只好引誘他們趨入富貴利祿之途，教育變成了一「刑餘」的勾當兩千多年，幾乎要習非成是了。

辛丑條約成立，我們戴上了帝國主義者羣給予的鐵鎖，有點覺醒了，就醉眼惺忪地抄襲了世界現代的教育制度。那時規定了初等小學五年，高等小學四年，而高小畢業生獎給秀才出身。可見還是現代其形而科舉其實。那時候各地方起碼都是開辦高小，直到民國初年，各地方初小還是奄奄不振。可見所謂覺醒，其實不過伸伸腿，揉揉眼，而立刻又尋「獲士」的好夢了。民元實現空前的革命，義務教育，乃載在約法，而學制也指定初級小學四年爲義務教育。然清廷倒，而軍閥專政，義務教育也隨同革命尙未成功。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一部份知識分子分頭做啓蒙工作，而各地方的平民教育運動也零碎點滴地進行。當時北京教育部也應景地來一個八年分期舉辦義務教育計劃。正在軍閥混戰時期，這事當然無從說起。十七年國民革命成功，在濟南又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一番血的教訓，國民教育當然應該又被記起，因此，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訂有二十年實施義

務教育新計劃。然而這與國家財力，社會經濟及政治實況相距太遠了，仍不能免成爲舊辦。九一八之後，痛深創巨，至二十一年，教育部就公布短期義務教育實施法大綱。規定了短期小學起碼一年，等到完成之後，才逐步延長爲二年，三年乃至四年。這是要老實執行，而不像以前之裝飾門面了。可惜在七七事變之前，精誠團結還未實現，全國民衆還未老實踏上了奮鬥圖存的路，所以還沒有多大成功，到了現在，大衆才確信國民教育是不許含糊，不容猶豫的大事。區區這四十年間，我們也可看出中國每次國民教育運動都帶有血腥。不過以前幾次的血腥還不很夠味，所以國民教育也還集不成。現在該認識了。國民教育充滿了戰鬥性，決不是公子哥們的裝飾品，不是智勇辯力者獵取卿相之位的敲門磚。被壓迫的民衆要爭取自由解放，才要教育。

歐洲的國民教育可以追溯到古代基督教。當初基督教傳入羅馬，深爲統治者所嫉。查封放逐，虐待備至。基督教徒乃不得不取革命方式。向下層民衆傳教；換句話說教育就成了爭取民衆，反抗壓迫的工具。到後來，統治階級看清楚基督教不可消滅，而却未嘗不可引以爲己用，就把基督教定爲國教。這適合了「欲揮先捧」的公式，基督教會做成道冠帝皇，而革命性和教育性就一起被扼殺了。近世國民教育的創始者，誰都公認是路德。宗教革命實在因爲新興的中產階級要反抗教廷和天主底聯合的壓迫。他

們要抵抗這個積威，就不能不爭取民衆，所以發起國民教育運動。可是路德畢竟是半革命者，到後來農民紛紛起來沒收寺院財產，倒把他嚇壞了。有聲像小孩放爆竹一點點引，却又怕它爆炸。然而三十年戰爭也夠血腥的了。路德提倡的國民教育，卒之匯合了後起的封建明君所領導的民族獨立運動，普魯士建了一番殊勳，而德國成了全世界現代國民教育的發祥地。這就因為那時普魯士要抵抗奧國和法國兩方面的壓迫，而重建日耳曼民族的國家。有了這個好條件，國民教育才獲成功。國民教育真像春天的野外花草，外觀極其燦爛和平，而裏面充滿着劇烈的優勝劣敗的鬥爭。

工業革命給國民教育以莫大的有利條件。現代工業把大批農民從農村中遊離出來，這把封建社會的根基破壞了，却奠定了國民教育的萬世不拔之基。古代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那樣貧弱而簡單的農民生活，就假令都不受飢寒，也沒有教育的需求。他們生活是孤立的，不需什麼集團的組織。生活內容是簡陋的，除飲食作息之外，不復有甚麼文化底要求。這樣的民衆生活，最便於專制政治。要裝點教化，也不過藉傳統的教條使他們孝弟力田，安命守分，勿管閒事便行了。工人生活却大異乎農民。他們在工廠裏，少的百十人，多的千百人，同樣的做工，同樣的命運和地位，却成了天然的集團。這便可以發生力量。工作活動底自身是手腦並用的，較容易啓發人們

的智識，不像農作那樣的笨拙。試看鄉間豪紳馴策農民，頗指氣使，多麼容易。而若附他來都市管束工人可就不容易了。工人生活內容比較複雜，而需要知識就較多。例如識字，工人比較農民多得很，這原因當然在需要和不需要之差。現代工業既然造成這樣有利於普及教育的條件，所以只要加點政治力量就容易推行。試看十八世紀的普魯士那樣努力厲行義務教育，而成績却不很大，就因為工業的基礎還未成立。而現代英國的小學法令却濫施於童工保護令，這透露了個中消息。

國民教育得到這樣新基礎，同時展開幾種新戰鬥。資產階級要從封建領主手裏奪過政權，使不得不仰仗民衆的力量。而受過工業洗禮的民衆，不同古代農民那樣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喚之則醒，按之則睡。因此，民主革命成功之後，不能不給民衆生活以相當高度的文化水準。而且以工商立國也不容許有大多數不識不知的愚民。於是乎四、六年制，八年制各種各樣的義務教育便成了現代國家所不可少的事。現代資本國家之對付民衆，有點像中國古來帝王之對付智勇辯力者，決不能絕對愚民，至少也要把他們好好安頓。然而共產主義者同時就憑藉這裏活動，他們要藉教育喚起無產階級的意識，造成社會革命。試設想如果百分之九十的民衆是文盲，秘密印刷品還有甚麼宣傳效力呢？因此，普及教育便成了勞資兩方皆不可缺少的戰鬥武器。資本主義的國家要向外

求殖民地，求市場，便不能不高唱愛國，發揚國威，提高國格，把民衆的注意轉移於對外，這便成了帝國主義的教育。而較弱小的要保全領土，保衛主權，也要講求國家主義的教育。由此而教育又成了帝國主義者和反侵略者兩方所皆不可缺少的戰鬥武器。不管是資本主義者，是共產主義者，是帝國主義者，是民族主義者，都要仗着教育進行戰鬥。那末，可以證明中國向來把教育看作點綴風雅，陶冶多士之具，確不合時宜了。

教育之富於戰鬥性是客觀的事實。然而民主主義者說教育是安定社會秩序，防止惡化底戰鬥，共產主義者說教育是造成普羅力量，改造社會的戰鬥。法西斯主義者說教育是發揚優異種族，實現「八紘一宇」的戰鬥。反侵略主義者說教育是解放被壓迫民族，打倒強權的戰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畢竟誰是對呢？要簡單地給一個答案，殊不容易。然而徵諸歷史，教育供給人們的戰鬥力，總要把人類文化推進一步。間或有把教育用作防止進步之工具者，在文化停滯時期，雖未嘗不可收效一時，而結果不免失敗。我們三民主義的革命大業，對外要民族平等，解除帝國主義的桎梏；對內要喚起民衆，肅清封建陋習，這是力求進步的戰鬥。我們正在實踐不屈不撓的大奮鬥，在這情景之下，進行國民教育，可謂恰到好處。

最近公布的國民教育制度，包括着學齡兒童教育和成人教育，所以不叫做小學而叫

做國民學校。爲得是實際地喚起民衆，發動民衆，以協力抗戰建國。國民教育是新縣制中之三要素，而新縣制是抗戰建國的一個基本單位。它雖然還沿用一個固有名稱——保甲，而精神則迥異。舊保甲五家相保，目的在消極的易於被統治，那是民衆都勒而還未到民衆組織。新縣制是地方的抗戰集團，它的內容是民衆共同的管教養衛，目的在實現「政治是大衆的事」的最高理想。換句話說，要把向來無組織的無內容的農村生活變成內容豐富的集團。這是民衆組織而決不止於部勒。新縣制若實踐成功，則民衆在那裏生活便是受教育，也必須受教育才可在那裏生活。這恰符合了教育哲學者納托爾普（Natorp）的名言：「教育底社會條件，社會底教育條件。」

我盼望全國人千萬別誤認目前國民教育運動是和舊日的舉辦義務教育計劃同樣的空頭支票。我們須深切體認這裏的戰鬥性。須知道國民教育是新縣制的一環，而新縣制是各地方民衆的一個戰鬥集團。沒有新縣制，則國民教育無所憑依，而沒有國民教育，則新縣制也沒有生氣。

民族建國與國民教育

歷史上往往有許多正大光明的事，不是起因於發動者底甚麼仁慈心，道義感，而却是出自一念的自私自利。這現象也許可以使動機論的道德學者失望，傷心，然而不能不承認這是客觀的事實。歐洲近代底國民教育史就是一種例證。

十一，十二世紀以後，商業復活，都市復興，這就漸漸刺激了封建君王們底野心，借用孟子嘗一句成語，便是：「王曰：何以利吾國」。君王們向來頭上有一統治全歐底教王，而臥榻之旁又有許多跋扈不馴的侯伯子男。到了十六十七世紀以後，雄才大略的君王要擴張領土，集中政權，上面不再受教廷指揮，而內部則臣服諸貴族，這便是建國底鴻圖。民衆也未嘗不可因此而減少一兩道束縛。雄主們很容易想到收攬民衆是生財，經武，取威定霸底善法。這又應了中國聖賢底話：生聚教訓，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國民教育就在這裏發端，好比私生子之成胎是他的父母在淫奔野合。

自路德發表其「告各市當局書」，勸告興學之後，日耳曼範圍內就有十許多邦國採用路德建議，設立學校，訓練民衆底子女。例如 Saxony, Württemberg, Prussia.

Wairar, Mecklenburg, Gorn等國，在十六十七世紀都有公立國民學校 Volksschulen 底組織。而成功最偉大而且直接影響今日全世界的卻是普魯士。

十八世紀開始，弗烈特勒威廉一世即普魯士王位之後，好像中國古代底楚熊釋 奉穆公那樣的發奮圖強，開闢疆土。他由自己王室撥款成立的國民學校就有了一千八百校。一七二七年他下令學校所在地做父母的必須送其子女於冬夏兩季入學。一七三六年，他頒布了全世界頭一次的義務教育法令 *General Schulpflicht* 規定兒童自六歲至十二歲必須入學。弗烈特勒大王繼立，更銳志推進國民教育。他信用當代教育家 *Knapp* 着手改良國民學校師資，次第設立師範學校。一七六三年頒布全國普通學校規程，規定全國兒童自五歲至十三四歲為就學年齡，不只要求他們能讀能寫，而必須熟習法定之教科書。貧家兒童無力繳學費的或須做牧羊工作的，都設法使他們入學。又設星期日補習學校給青年民衆入學。兩年之後，他又特為教會學校下一道命令，公布規程 *Reglementation des Catholique Schools in Silésie* 這一份規程未易徹底執行，因為不合資格的教師們反對它。做父母的不願自己兒女放下工作去上學，反對它，領事們不願意農民知識啓發也反對它。然而自一七七一年，大王得到教育家 *Neuling* 輔佐，鄉村國民學校和師範學校都大有進步，而且在中學教育裏面人文主義也復活了。到了弗烈特勒威廉二世，他雖傾於守舊，

而學校統制權已經脫離教會掌握而轉入政府手裏。至一七九四年教育法規公布，就確定全國學校，由國民學校而至大學皆受國家監督，選拔教員，視導及考試都歸於國家。

普魯士在十八世紀底建國也可以說是成功了。她居然和俄羅斯奧大利法蘭西各大國抗衡而擴張了不小的領土，成了德意志中間的一個強國。然而我們還要看她造成了的是一個怎樣的國。她還是一個中世式的農業國。據有領土的貴族們地位優越。教會還參預政權。工商階級還在貴族底下風，和農民還在封建式榨取之下討生活。按那時底法律，貴族底土地只許賣給貴族，市民的只許賣給市民，而農民的只許賣給農民。社會裏各階層是彼此水洩不通的。政府是萬能的，而民衆沒有說話底餘地。那末，登亨家倫王室所要建的國實在是一「王曰何以利吾國」的那種國。他家熱心推行的國民教育當然是要民衆信上帝，忠國王，勤儉生產，勇敢當兵；若改用中國話說，便是一「親其上，死其長」，「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正合了「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那一點教育宗旨。具有這樣社會的政治的背景底國民教育，儘管是雷厲風行，而內容當然是貧弱得很。十八世紀普魯士教育底效果，在一八〇七年表希特忠告德國民衆書裏面已經告白出來了。他老先生說民衆各人自私自利是國家破敗底原因。斐希特先生苦口婆心勸民衆們要看清楚精神的大我。殊不知那時的德國社會，有形的大我，是層層壓迫，水洩不通的，在那裏生長的

個人只好學自私自利。霍亨索倫王朝厲行國民教育以建設「王曰何以利吾國」的國，其結果便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倒很公道。

十八世紀普魯士底國民教育，至一八〇六年受了耶那大戰一場畢業會考，斐希特先生給下了蓋棺論定的評語是「自私自利」。而同在這世紀之末，歐洲却有了一次比較正大光明的國民教育底動機便是法國大革命。這是法國底資產階級和農工大衆聯合起來推翻專制王朝，求解放，求建設自由平等的國家底大運動，是自下而上的建國運動，不是像以前普魯士那樣由上層領導的建國運動，所以他們國民教育底要求來得比較徹底。在大革命之前，一七六八年，羅蘭曾經在巴黎國會提出普通教育方案，開始注意到小學及師資訓練，然而那不過是紙上文章罷了。大革命爆發之後，民衆正要着手組織新法蘭西，而歐洲各國封建君主底聯軍四面襲來，要摧殘消滅這個新誕生的革命民族。在這樣情景之下，民族建國底情緒當然高漲得厲害。因此，在初期一切革命鬥爭中間，革命者不忘却國民教育底重要。雖然未曾有具體的實現，而他總想把國民教育建設於平等基礎之上。當時革命政府曾採用了三級的學制——初級小學，中學，專門學校。這學制系統和我們今日的差不多。民衆憑革命取得各種新權利，如沒收了封建貴族和教會底財產，解除了他們底榨取，及人民參政等權利，必須學習行使，必須擁護。他們對於這個新國家

必須認識。必須防衛。因此，他們就必須教育。在革命運動當中，革命黨人也曾想實現「事實的平等」。漢多塞曾說「財富，狀況，和教育底不平等是萬惡之原」。福祿特爾主張「讓世界上沒有失業的公民，讓世界上沒有人學不着的手藝和職業」。他們也曾做過土地，工業，食品，和交易底社會化底計劃。這些零碎的共產思想，顯然不是由頭腦中想出來，而是由那時的生活發見出來的。這樣的革命建國運動，其有利於國民教育，和普魯士比較簡直有天淵之別。

可是自一七九三年以後，法國底革命精神開始低落。克魯泡特金底法國大革命史裏這樣說：「五月三十一日的運動使革命完成了其主要任務，即無代價的最後的廢除了封建特權和廢除了君主專制。但做完了這些事情以後，革命陷於停頓。民衆仍願意繼續向前，但是被革命潮所擁上台的人們不敢前進了。他們不願革命侵犯資產階級底財富，只要它侵犯了貴族教士底財產就夠了。他們竭盡心力以緩和阻止和終于撲滅開始向這方面進行的運動。甚至於他們中間最先進和最誠實分子，當他們快接近政權時，他們對資產階級表示極大的關懷，雖然也恨他們。他們自己輪到做了「政治家」，於是日夜勤勞地建立一強有力的集權政府，它中間的各部分應當盲目地服從他們。他們在那些他們認為太進步的分子底屍身上建築他們底勢力成功，但是當他們自己上斷頭台時纔了解：他

們在毀滅那進步的政黨時，實際是絞死了革命。」

由是我們可知道法國大革命從此便走上了反動的路線。到了拿破崙執政，已公開地成了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妥協的政權。革命建國的情緒已經改變為向外侵略底狂熱的愛國心，而教育就難免陷於狹隘的國家主義，官僚主義。拿破崙只注意於中學教育學院教育和教育行政底中央集權，而把國民教育置諸腦後。大革命所造成的教育良機，就這樣斷送了。而拿破崙底侵略却給德國人一個好刺激。

十九世紀之初，德國受外力壓迫得很厲害。《Tilsit》和約（一八〇七）簽訂，普魯士失掉領土不少。拿破崙組織一個萊因聯盟，使萊因各小邦隸屬於自己。這些聯盟國家，於法國與任何國家宣戰時，甚至於與德國宣戰時，都要助拿破崙六萬三千軍隊。這是拿破崙要造成德國內部永遠分裂底毒計。及後拿破崙失敗了，民族自由還得不到勝利。因為參加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和議的不是人民的真代表，而是國王和外交家。恩格斯說：維也納會議中，最小的王朝利益，比最大的民族利益還要重要。德國還是分裂。維也納只種下許多社會震動和民族反抗底種子。

強鄰底壓迫和國內底分裂陷德國底經濟發展於可悲的狀況。鄰國對德國都建立了關稅底高牆，抵制德國底商品。德國既分裂成許多小邦，便不能保護商人在外國的利益。

德國工業又因爲國家分裂，不能支配着很廣大的國內市場。每邦亦都有她自己的徵稅章程，而邦內各省又各有其特別法律和特別稅則。在一八〇六年，德國有六十種不同的稅則。一八一五年以後，德國有三百多小邦和自由城共同組成三十九個特別區域。這頗像四五年前的小國。德國要逐漸克服這個巨大的困難，一八二七年開始成立關稅聯盟，求得一致的稅率。各邦陸續加入，直至一八七一年成立統一的帝國。

德國在這樣可悲的被壓迫的分裂狀況之中，資產階級最感痛苦，因此切盼國家統一和強大。他們由被壓迫而發生的愛國心是較真摯純正而可以代表民族利益的。一八一五年以後，德國資產階級底財富及其財富相伴的政治上的重要，均不斷增進。到了一個階段感覺着他們底最重要的利益底發展，爲其本國政治所阻遏。而同時關稅同盟底擴張和鞏固，和交通上普遍地採用蒸汽，國內貿易之競爭發展，使各邦各省底商業階級更爲互相接近。他們底利益一致了，力量集中了。其自然的結果便是要爭取政權。這個變化是從一八四〇年始，是從普魯士資產階級取得德國資產階級運動底領導開始。

德國底人民，大多數既非屬於貴族，亦非資產階級。在城市中，他們是小資產階級和商人；在鄉村中，他們是農民。恩格斯說：德國底小資產階級永久在兩個前途之間搖擺。一面希望躍入富有階級底隊伍，而一面又怕墮落於無產階級底生活；一面希望參加公

其事業之管理，以提高其利益，而進而又怕時機不宜的開罪於政府。這階級底見解是千分動搖的。德國那時的工人，因為還沒有現代生活狀況和沒有現代的工業生產形式，自然也缺乏現代思想。在現代生產系統佔優勢底工業區域，因為交通便利而得到思想發展。於是這些地方有較堅強的工人組織，有明晰的解放思想，但他們只佔少數。德國底農民，小農階級，和農場勞動者靠在一起，佔全國人民底大多數。這階級內部又分成若干小階級：大農中農小自耕農，農業勞動者。小自耕農，佃農，和農業勞動者從未問過政治，又散居於廣大區域，不能成立集團的獨立的運動。當時德國內部的階級結構既然是如此，所以德國底統一只能在普魯士領導之下進行。這是由上層統一的道路。是由普魯士地主階級領導的，是由國外戰爭勝利造成的。這同時就反映於國民教育。

三、和約簽訂之後，拿破崙限定普魯士乃實施徵兵制度。這樣一來，政府對於人民底戶籍得到很周密確實的調查。這於推行義務教育得到非常便利。普魯士底義務教育成了全世界最先進而最有成績的。然而畢竟不能超越中下層階級底教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Boas 說：這就因為普魯士雖經過自由改革之後，仍較英法落後。政權仍然在于朝，人民參政權力薄弱而未熟。社會上貴族與地主和中下級民衆還是貴賤懸殊。然而為甚麼而如此呢？恩格斯解釋得最清楚：這實在說來，是在革命（一八一八）之最初

一
事情已經是很明顯的。即是自由資產階級除依賴民衆和更進步的政黨援助之外，不能支持陣線，以抵抗那被征服而尚未被消滅的封建和官僚勢力；而他們同時卻需要封建的貴族和官僚底援助，以抵抗這些更進步的民衆進攻。由此看來，奧大利和普魯士底資產階級沒有充足的力量以維持其政權，以改造國家制度適應其自身底理想與要求，這是很清楚的。依客觀的形勢底轉變，國家或者過渡到更高級的統一共和國，或者恢復到舊舊制，封建和官僚的政制。由此可知官僚政治是德國教育發展之大障礙，而同時又是雷厲風行底動力。

普魯士於十九世紀初期已造成國家教育行政之有力的組織，一八〇七年，中央設教育部，屬於內政部，十年之後，獨立為教育部。全國教育，自大學而至小學，都由政府統制。國民教育機關是國民學校 *Volksschulen* 兒童滿六歲強迫入學，八年畢業。其學必是國語，算術，自然，歷史，地理，音樂，圖畫，勞作，體育等，而宗教也還列為必修科。國語和本國歷史地理是特別注重的。國民學校畢業後，再進職業學校或補習學校。職業學校 *Fortbildungsschulen* 供給低級工商業底學習，也有兼設普通學科的。兒童由國民學校畢業之後，若不進職業學校，則自十四歲至十八歲必須進補習學校，每週受課由一小時至四小時。小學教師底任用是很謹嚴的，師範學校畢業生，至少經過兩年以上底

試用，再經檢定考試合格，纔給以小學教員許可狀。有了這資格纔得任小學正教員。一旦被任命之後，便得享進級和保障地位底權利。如果失職或品行不端，則受處分，甚重於免職。師範學校招收國民學校畢業生，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國民學校和師範學校同屬於中下級教育系統，和中學大學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貧賤家子女纔進國民學校，決不升中學。而有力入中學的也決不進國民學校。國民學校底學生和教員同屬於中下階級，和中學生大學生有貴賤尊卑之別。在德國若有中學教員和國民學校教員結婚，那時極失體面的怪事。中學畢業生所有的資格，如升學，考文官等，師範學校畢業生不能有。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國民學校應怎樣和中學溝通，雖屢次引起德國教育界底討論，然而終於沒有辦法。

德國國民教育是如此階級界限分明的。而其師資優良，教導有方，行政嚴明，到底爲得是甚麼呢？唯一的宗旨在國家主義。一八一九年公布的學校法規概要說：『忠君，愛國，和絕對服從法令是極重要的德性，必須使少年養成。蓋學校能力之所及，向着這條件工作，各校皆成爲毫無愧色的愛國主義底薰陶機關，這是學校教師底神聖義務。完成這目的是他們功績底主要成分。』一八四〇年教育部長總括學校教育工作是『一般民衆知道怎樣而且願意侍奉上帝，國王，祖國，他們都有壯健靈巧的身體，清醒的智慧，』

和良心。『學校唱歌是喚起愛國心的，國文教材裏底故事傳記是涵養愛國心的，而尤注重歷史地理，使學生們知道歷史上豐功，偉績，名人，烈士，祖國底錦繡山河，和敵國底仇恨。總而言之，把民衆當作帝國底工具而教育他們。弗烈特勒威廉三世說過：『朕不信於民衆個人和社會有甚麼利益，如果把教育超越他們底社會的階級和職業底界線之上，給他們以用不到的修養，覺醒他們底命運所不許享受的要求和需要』。教育部長 Alvensleben 也說過：『我以為國民教育不但是教點兒空洞的文化工具——讀書，寫字，計算。可是我又想不到這原則便是宣言要把民衆抬舉到上帝和人間社會所指定的地位之上。毋寧說教育使民衆安本分受實益』。『看這幾段教育名言，其愚民底意味已夠活現紙上了。』

法國自拿破崙破崙之後，來一國王政復古，一八四八年革命，接着又是拿破崙第三稱帝。至第三次共和告成，已經是地道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除自由，博愛，平等這句口頭禪之外，大革命底風餘韻幾乎蕩然。在國民教育方面，只是學校不講宗教而代之以修身科。這還是革命底陳迹。此外還有一套嚴格中央集權底教育行政機關——大學區，是拿破崙時代底遺物。直接管轄中學以上教育。其富貴階級底教育——爲職業。國民教育——中小學是不相干的。一八三三年令各市區（communes）設立小學一所，但未會強迫入學。一

八五〇年以後，拿破崙三世當國，政治走上反動方向，小學事實上又歸教區掌握而步步低落了。一八六五年全國青年男女不能簽署自己的婚約者，男子有百分之二十六，而女子有百分之四十四。一八六七年又一度要實行義務教育也不成功，須令各市區徵稅維持小學而且與教會脫離罷了。直至一八七〇年，給德國底小學教師們打破可巴黎，法國底政治家總曉得重建第三共和國少不了小學教育。一八八一年規定初等教育免費。一八八二年公布義務教育制，限定兒童由六歲至十三歲入學，否則罰其父母。一九〇四年公立小學廢止宗教而代之公民修身。這便是法國初等教育底三大原則——免費，義務，非宗教。直到現在，法國底初等教育——一般國民的教育——也無甚變更。教育機關是幼稚園 *Écoles maternelles* 初級小學 *Écoles primaires élémentaires* 高等小學 *Écoles Primaires Supérieures* 補習科 *Cours Complémentaires*。初等教育與中學是平行的，不相銜接的，是為一般中下階級民衆而設的。幼稚園收容二至六歲底兒童，有兒童保育所底性質，而不是強迫入學的。初級小學屬於義務教育由六至十三歲皆強迫入學。以男女分校為原則，但人口五百以下之鄉村得男女同校。兒童修了七年義務教育之後，須受嚴格考試，由試驗委員會主持，合格者給以證書。高等小學收容初小畢業者，修業三年，自第三學年起，分為普通科及特別科——農，工，商，家事。補習科大抵附設於初級小

學，無力設立高小之市區則設補習科。第一次歐戰之前，法國全國底文盲曾減少至百分之三，而戰後又有增多的傾向，一九二四增至百分之六，一九二八又增至百分之九。

十九世紀後半，法國資本主義的政權早已形成，而其國民教育又是受德國打擊出來

的。愛國心 Chauvinisme 激動之餘，當然走上國家主義，標榜着國民聯帶。然而實在是仿效她的嚴師諍友——普魯士，還是給一般民衆以相應的教育，使他們平時爲勤勞忠實的農工，而戰時爲有勇知方的兵士。這樣的國民教育，在第一次大戰時已經引起不滿的評論。那時有一班少壯教育家組織一個團體 Les Compagnons de l'Université Nouvelle 要促進新教育制度。他們的根本主張是要製定機會均等全國統一的學校系統，取消以前的社會階級底界限，使全國少年之可造就者皆得受中等以上教育底機會。這種辦法叫做統一學校 Ecole unique。他們說：「貧富底教育應該一樣。全國兒童都應進小學。優秀的該准他們升中學，免學費，不論他是布爾喬亞或普羅。」這主張到了一九二五年算實現了。兒童在十二歲以下都受同樣的小學教育，課程和教員資格都一樣。舊時中學附設的預科廢止了。特設獎學金以便貧家子女升中學及中等工業學校。高等小學生也可以轉學往中學。由小學升中學的貧家學生都是免費的，因此原來中學那班富裕學戶就要說話了。

一九二八，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便把中學學費全免了。自此以後，中學生如考試不

及格，則或退學，或收費。然而貧家子雖免費也多未能升學，因為父母要他們做工賺錢，而且無力供給他們書籍衣服。只是小學教員底兒女和殉國戰士底遺孤如果考升中學，便由國家供給全部費用。

革命後德國也實行統一學校底制度。一九一九年威瑪憲法底第一四五，一四六條，規定義務教育八年而繼續受補習教育須至十八歲。全國須有統一的基礎學校，其上設各種中間學校及高等學校，兒童之升學應以其能力素質為標準，而不問其貧富，問第或宗教。貧而無力升學者由國家資助。一九二〇年，依據這條憲法，改訂學制。國民學校仍為八年，惟將前四年定為基礎學校 *Grundschule*。由此而上，便可和原有各種高等學校（中學）相銜接，以便優秀者升學。增設以德國文化為中心之德意志高等學校 *Deutsche Oberschule*。其資格與原有各高等學校同。又與國民學校之第七年連接，設一種六年制中學，名為上建學校 *Aufbauschule*。由此種學校畢業者，其資格亦與九年制之高等學校畢業同。女子的中學教育機關也和男子的同一原則，但不能男女同學。至於小學教員之訓練，也把從來不入中學系統底師範學校廢止了，而設和大學同等的師範院。

第一次歐戰以後，德法兩國底學制改革，總算把從來貧富兩階級底教育溝通了。然而貧家受經濟狀況牽制着，能否享受這項權利，殊屬疑問。百餘年來，兩國都是因歐

國而運用教育底典型的國家。然而法國底革命屢次反動倒轉，結局成了資本主義底帝國，德國底封建色彩更爲濃厚，如此的社會背景勢難實現教育平等。這樣的國家必然地走上帝國主義底路線，又加以這兩國尋仇報復，更激動了偏狹的愛國心。因此，教育上就標榜強調的國家主義以籠絡中下級民衆。納粹專政以來的德國是更顯明的一例。這兩國底國民教育都有了成績，可是畢竟不是誠心爲民衆而施教育，乃是爲鞏固資本家所獨佔的國家，所以難免有折扣，不起勁。試看法國自第三共和算起，也經過了六七十年，還未能肅清文盲，而蘇聯兩趟五年計劃便成功了。百餘年前，康德發表了極嚴正的理論——教育不是爲教會造信徒，也不是爲國王造臣民。人類是唯一可教養的生物，也必須受教育纔可以成人之所以爲人。然而這番理論於德國教育毫無影響。

查了這一大段流水賬，可以得這樣的結論：國民教育，由形式言，是國民底權利。某國國民教育底量與其實現的民權成正比。又由內容言，國民教育是國民生活。國民教育底程度與其生活之發展成正比。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於東陵

產業革命與國民教育

英國是世界最先進的工業國，產業革命的發祥地，資本主義底典型的國家。由產業革命考察國民教育，當然把英國作代表。英國底學校系統最複雜而不規則，有公立的，有私立的，有受國家補助的，有不受補助的，真是五花八門，頭緒紛繁。這就因為英國的國民教育不是像普魯士那樣由明君欽定，也不是像外國那樣由革命政府建設，乃是從社會裏自然而然地逐步長成。它是由好幾種不同的社會契機——教會，政府，經濟狀況，私家營業，慈善團體——彼此長久地互相衝擊妥協而演進出來的。英國人向來把教育事業看作教會底事，家庭的事。統治階級要把教育永久付託於英國國教手裏，而使勞苦大眾永保其愚昧狀態。因此，普及教育運動很不容易得政府認可。宗教革命所造成的少數小學，到了十七世紀因為基金不足，或因為改辦了中學，剩下来的已零落得很。十七世紀之末，新興一種義學 Charity School 收容貧民子女，給以膳宿衣服，教他們習工藝和家事。這種學校大抵靠私人捐助基金，在十八世紀中葉，英格蘭及威爾士約有一千校。負責經營這種義學的有一個重要團體，叫做基督教促進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 是一六九八年組成的。各地方若成立義學，這促進會便給以補助費，且負責維持，並派員往各校視導。義學是極狹隘的宗教教育，畢業生出來社會只充學徒保姆之類下級職業罷了。可是就這樣簡陋的教育也不是上流社會人士所高興的。十八世紀末葉，發生一種日曜學校運動 Sunday School Movement 創辦者是 Robert Raikes 於一七八〇年開設於工業區域 目的在肅清勞動階級的愚昧，不德和不潔。每星期日集貧民底兒童和成年者，給以粗淺的文字教育，教他們讀聖經。一七八五年成立日曜學校協會，得一班貴族的新人物贊助，從事推廣，十年之間，設立約一千校，學童將及七萬人。這已經是產業革命的產物了。

產業革命打破了中世封建制度的各種關係，而成立了更新階段——資本主義的社會。它的確是一個革命。它是因機械的發明而使舊社會制度崩潰的輓歌，同時又是新社會底產聲。它是舊社會一切組織及建立其上的意識形態的覆滅，又是新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機構及其上層建築的建設。產業革命，簡單說，就是機器和動力底發明而生的生產手段的變革。而這種生產手段的變革，當然又引起生產方法及生產關係的變革。機器和動力的發明以及應用於生產過程，結果便出現了工廠制度，破壞了向來的家庭工業的及工廠手工業的生產方法。在機器發明以前，生產手段是簡單而廉價，且很容易運用，所以

各個生產者當行手工業的生產時，能夠在每人自己底工作場裏進行，而沒有集合一處共同勞動底必要。可是機器一出現，情形就大不同。製作機器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此價錢便不能不增高，加以通用頗不容易，所以不能像手工業時代的工具那樣，各生產者都能獲得，也不能搬到各自底工作場。那為動力機的蒸氣機關一發明，這種傾向更加厲害。一經使用人力以外的動力，那麼集合一處來生產就比較經濟，比較便利。這個傾向在稱為蒸氣機關的動力機中，成為必然的了。工廠所在地就是勞動者集中的都市了。

工廠制度以使用機器和動力為基礎。這是高價而複雜的，因之不能被一切生產者所領有，而需要巨大資本。這裏便發生了領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階級。別一方面，工廠制度因為使用機器和動力，需要許多勞動者。中世末期，有許多農民被奪去土地，為尋求職業而流到都市來。到了產業革命，由於手工業底崩潰和小農場併為大農場，勞動者更加多了，都往都市底大工廠流去。工廠對於勞動者底需要，如果供給不足，還從僧房拉出僧尼，從孤兒院拉出兒童，把他們編入勞動者隊伍裏。這班勞動者已經沒有什麼生產手段，只能把自己底勞力提供於資本家。他們變成自身勞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了。工廠制度引起生產力的偉大的增加，市場發展到全世界。一切東西都商品化了。農夫不是為自己吃飯而耕種，織物者不是為自己穿衣而紡織，商品生產成了生產的普遍特質。勞

助者把自己的勞力從雇主手裏換取錢，勞動者因而也將商品化。產業革命造出這樣的結果，給勞動階級怎樣的影響呢？

第一、勞動者隸屬於機器。工廠的一切運動底起點，不是勞動者而是機器。機器離開勞動者而獨立存在，勞動者常營同一部分的勞動，與生產全部過程完全分離。而伺候機器，做機器的附屬物。工廠的指揮權握在資本家手裏，勞動者只遵照資本家的計劃，做機器的附屬品而活動。現代勞作主義的教育論，就想憑學校裏底手工科彌補這缺陷。那知這是社會生活變化的一種結果。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這種完全隸屬的生活，也很用力說明它底非社會性，非教育性。然而這起因是另有所在。

第二、資本家與勞動者底關係底變化。以前手工業時代，師傅與助手及學徒同室而居，共食其食，經過一定年限和一定的勤務，學徒可以升為助手，助手可升為師傅。簡單地說，做雇主的師傅和被雇的助手及學徒，屬於同一階級；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溫情主義的，協調的，而不是對立鬥爭的。產業革命却把這層雇主與雇傭的關係，從根本上變革了。他們兩者已經不屬於同一社會階級了。一方是領有生產手段，以金錢購入勞動的資本家，別方而是勞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因此，兩者的這種階級的差異，當然在利益關係上是對立的。這方面剝削榨取，那一方面忍痛賣力，彼此利害不可並立。

其中底關係必然是冷酷無情的金錢的契約的關係。這不應該從道德上尋判斷，而應該尋之於生產力底變革和生產關係底變革。這樣刻薄寡恩的生活當然是從來莊園制度，行會制度所未曾有過的。然而要在學校教育設法恢復人格的紐帶，或摹擬家庭的溫情，却不見得是治本的方法。

第三，給予勞動者底肉體和精神底影響：產業革命，農村崩潰，大幫赤貧的勞動者集中於工廠所在地的都市，而這種都市並非準備好了收容那樣多數羣衆的。沒有上下水道底設備，飲料不足，不潔，穢水溝渠不通，煤煙蔽天，這都是傳染病底來源。據說棲息於曼徹斯特公園底鳥類因爲工廠日多，都減少孳生，在廠內終日勞動的那班工人底受害便可想而知。資本家目的在賺錢，花在工人身上的錢越省越好，那時又沒有什麼法令和輿論底拘束。所以工人們的生活狀況極惡劣而工作時間極長。資本家只知愛惜本錢，愛惜機器，而不管工人底死活。因此，肺癆，癩癧，傷寒，霍亂種種傳染病蔓延不絕。機器勞動激烈而單調，使人沒意味而易於疲勞。機器並沒有從勞動裏把勞動者解放出來，反而從他們的勞動中剝奪了一切內容。貧民一家之中，父母和兄弟都上工廠做工去了，小孩們沒有人養護，流浪街頭，健康和品性都受極不良的影響，兒童死亡率增大，甚至於造成殺害嬰兒的惡風。在勞動者羣中最通行的惡習，頭一宗是酗酒。他們極度疲勞

而且鬱悶，使追求便宜而發散的快樂，這就是飲酒。醉醉了可以暫時忘却疲勞痛苦和難堪的景況。他們越窮苦越需要激烈的刺激品，而飲酒越多，神經越衰弱，越衰弱越要飲酒。資本家偏說他們飲酒太多所以窮困。教育家又說他們飲酒多所以性格敗壞。再一宗惡習是淫亂。工廠裏男女混雜，性交自由，這也許是廠主吸收勞工底方策，而勞動階級因之而風紀越來越壞，花柳病也愈多。至於為窮所迫，驅其妻女賣笑街頭，也是尋常事。而宗教家教育家偏埋怨她們不知廉恥。這樣的情形，勞工們不錯是要受衛生教育，娛樂教育，道德教育，然而這好像說飢民需要食肉糜。

第四，兒童及婦女勞動：工廠發達之後，就把婦孺都引入廠裏做工。一來因為機器進步，工作簡易，婦孺都可以勝任；二來因為婦孺的工價低廉。英國工廠對於勞動者的需要突然增加，所以從感化院孤兒院裏拉出許多兒童往工廠送去，這是英國勞動史上黑暗的一頁。鑑定的醫生和工廠勾結，把八歲的兒童報作十歲。當時的兒童市成了人肉市場。兒童在廠裏飢餓，污穢，睡眠不足，而常受酷刑，天折或自殺的不知其數。婦女加入工廠勞動，漸漸和男工對抗，更進而壓倒男工。她們過度勞動，害及健康，而且無暇照料家務，兒童死亡也因而增加。

第五，社會立法：英國從前的習慣，工價是治安裁判官決定的，他們當然袒護廠主

，在十八世紀時期，工人只好啞子吃黃連。可是景况實在太慘了，漸漸激起了社會有心人的同情，又得到一部份貴族人士幫助，議會便提到救濟的方策。却不是說貴族人士仁義為懷，實在因為工廠的利益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貴族紳爺們事不關己，所以把事情看得較清楚點。及後勞動階級的運動漸漸抬頭，資產階級在戰略上也應有相當的讓步以便緩和人心。因之社會立法便陸續制定，一八〇二年發布了最初的工廠法。The first Moral's of Apprentices Act。這是一為維持棉業及其他紡織工廠中徒弟及其他傭工者底健康和道德」而製定的工廠法。此案通過底原因，是曼徹斯特底工廠裏蔓延傳染病，而起因在過勞，飲食惡劣，衣服襤褸，空氣惡濁，工作時間過長及勞動者住宅人多不衛生等等。這法令禁止雇傭九歲以下的兒童，限定每日勞動時間為十二小時，禁止夜工，每月至少一次參與教堂禮拜儀式。其中涉及教育的，是：工徒上工開始四年間，須受與其年齡能力相當的教育——讀書，寫字，計算——受教育底時間，即在勞動時間之內，而且工廠主應設備工徒受教育的地點。因此，這法令又可說是英國最初的教育立法。這法令所規定的條件只適用於寄住廠內的兒童，此外通勤的兒童還依舊被虐待。由這時直到一千八百二十年，三十年前後，兒童早夭及殘廢的還很多。一八一九年又發布第二道法令。這是把社會主義者歐文的草案加以修正，禁止了九歲以下的兒童勞動，限定九歲至

十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勞動時間爲十二小時。一八二五年，又縮短星期六的勞動時間，且規定刑罰處罰違法者。一八三一年，又制度法律廢止九歲至十二歲的兒童作夜工；十歲以下的兒童，每天只許勞動十二小時，星期六則限定八小時。但此法只適用於棉織廠。那時，議會改而運動。工會運動已經發生，然而自由黨急進黨並不援助這運動，却是保守黨援助他們。就因爲新興的資產階級的代表畢竟擁護工廠底利益。一八三三年及一八四八年，又發布了重要的工廠法。不只在棉織廠，而且羊毛工廠和其它一切工廠，都禁止十八歲以下的勞動者做夜工；又規定九歲至十三歲的勞動時間，每週限四十八小時，十三歲至十八歲每週限六十八小時。又規定了對於兒童勞動者須施以教育。一八四七年，發布了有名的「十小時法」。限定婦孺的勞動時間，又限定工作時間在上午五時半至下午八時半之間，廢除了夜工。一八五〇年再規定工作時間在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之間，星期日則至下午二時爲止。一八七四年，規定童工底最幼年齡爲十歲。婦孺的勞動時間縮短了，又引起男子勞動者底時間縮短。因爲成年男子工作必須得婦孺幫助。一九〇七年，煤礦八小時工作法又製定了。從此以後，陸續發布了不少工廠改良的法令。

第六，勞動者運動：工會不是由某種特定的團體中發生的，乃是從事同一職業的工人，不限資本家的剝削，彼此相斂利用種種機會組織成立的。自羊毛工業，紡織工業爲

始，而漸次簇生其於他各種產業。激烈的鬥爭由是便開始了。英國底資本家看見這種團體可以妨害他們底剝削，便發動政府加以禁止。一七九九——一八〇〇年頒布了禁止工人組織底法律。工資只由資本家和工人自由決定，資本家有丁法律做護符，更可肆無忌憚地進行剝削。一八一九年又發布了有名的六法。工人底政治運動和宣傳，甚至被處極刑。工人的反抗運動由此而更加有力，迫使英國國會不能不於一八四二年廢除工人結社的禁令。工人們漸漸看出全國工人有聯合的必要，一八一九年以後，在社會主義者歐文影響之下，進行全國總工會的組織以替代以前地方的狹隘的工會。首先成立了全國的紡織工會，其後各業工人也羣起效法。一八三四年開各種工會的代表大會於倫敦，創立了全英總工會。雖然在一八三四年末，這組織已停止存在，可是它在工人運動史上具有偉大意義。工人運動從此成了民主政治運動底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一八三二年底選舉法改正，固然是資產階級發動的，而工人階級實在給予很大的援助。可是一八三二年底法律，工人階級一無所得。依此新法成立的議會，又計劃縮小救貧費，對於工廠法提案則充耳不聞。無產者依然沒有選舉權。這些不平蓄積起來便發而為一八三八年以後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 這是工人階級底第一個獨立的政治運動。一八三七年倫敦工人協會議決一個憲章，其內容要點是：（一）凡成年男子皆有選舉權；（二）廢除以

財產爲根據底選舉制；（三）國會以一年爲期；（四）議員皆有薪俸；（五）祕密投票；（六）選舉區平均分派。這草案發布之後，得到全英國工人以至小資產的民主派的熱烈贊助，爲求實現而奮鬥。自一八三八年開始了各地方的簽名運動，以備提交國會請願。一八三九年在倫敦開了勞動階級底國民會議。政府方面也開始彈壓。到了請願書送交國會時，簽名的達一百五十萬人，竟被國會拒絕。國民會議也被解散了。一八四〇年之末，勞動者有數萬人失業，在業者底工資減低到百分之五十五，又值荒年，哀鴻遍野，憲章運動又復活了。全國憲章聯合會仍堅持最初之六大原則，並提出十小時工作日，廢止貧民律，改善工廠法等要求。各地方勃起了罷工，憲章運動轉而爲抱着政治目的之總同盟罷工。一八四二年五月，署名請願書者達三百萬人。而內部團結欠鞏固，又和首次同樣被國會拒絕而失敗了。一八四三年以後，工潮低落，資產階級乘機懷柔工人，漸漸發展而成改良主義的合作運動。國會爲要緩和工人底鬥爭，遂於一八四七年製定了「十小時法」。是年冬季勞動者又有暴動，翌年受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而騷動益烈，憲章運動又作第三次請願，署名者一百七十萬人，而終於又遇高壓而失敗了。憲章運動結局雖不免失敗，而英國資產階級由是而認識了勞動階級的力量，在生意經上頭，不能不分給他們以相當的權利。而英國的勞動運動於第一次出現於政治舞台時，把和平議會鬥爭當

作唯一的鬥爭方法，是用緩和而受節制的步伐前進着，便成了它的特性。十九世紀後半，英國的產業在世界市場已達到不可動搖的地位，資本家這時候寧願犧牲一點，以求秩序安定，因之和工人們的鬥爭由衝突變而為協商，遷就。在工人方面也只是站在現制度上面，取得較有利的勞動條件。一八六〇年在倫敦和其他各都市設立了工會評議會 *Workmen's Council* 專心於取得法律上的承認和保護運動。工會法就於一八七一年制定了。一八七五年工會徒黨及財產保護法也製定了。從此以後，罷工始被認為合法了。這樣一來，工會的工作很多了，立法運動，團體交涉，工資計算等等都變成工會底分內事。各工會因此而發生了官僚領袖。一八八〇年以後，德國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勃興，英國在租界市場的地位動搖了。因為地盤動搖，商業地位不安定和時時發生底不景氣，英國資本階級和工人階級底態度也都起了變化。以前關於勞資協調的種種制度曾經相當有利於工人的，現在却都變為壓迫工人剝削工人的工具了。工人從此又發生一種新的革命精神。一八八八年至八九年經幾次罷工勝利，碼頭工人，瓦斯工人，海員和其他工人等底工會不到一年之久，已把二十萬不熟練的工人都組織起來。這樣的新工會和舊工會不同，會費收的很少，其濟制度多不設立，而以鬥爭為主要任務。而自一八九〇年起，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英國底資本主義重告穩定，資本家又以相當的讓步，使工人們就範。在一八八六

年工人出身的國會議員已有了十名，但他們仍形成自由黨的左派。後來曉得自由黨不能代表工人，遂主張另行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一八九三年獨立工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成立，重要的政綱是：（一）八小時勞動一律實施；（二）禁止包工制及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三）病者，衰弱者及老人由國家扶助；（四）免費教育；（五）實施累進稅以杜絕不勞而獲的收入；（六）撤廢軍備。一九〇〇年成立了工人議員委員會，這是以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為中心的一個政治結合。一九〇六年總選舉得到二十九個議員，同時獨立工黨改稱工黨。這時英國統治階級對工人的態度也變了。一九〇五年自由黨內閣成立，政策是在滿足工人底要求，以順利帝國主義底發展。爲了實施社會政策，特制定養老金制度國立保險法等，增收遺產稅及累進稅。這是要使工人運動改良主義化。直至第一次歐戰之前，自由黨都實行改良主義的立法。然而英帝國主義受了德美兩帝國主義底威脅，產業不景氣，因此不能不壓迫工人，而罷工運動也頻仍。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戰爭爆發，工人階級忽變爲愛國的社會主義者，英國底工會因爲戰爭的關係，竟「惜和政府及資本家妥協」。一九一五年，自由黨組閣，工黨領袖參加，和政府議定，放棄了平素工會視若神聖的綱領——反對婦女勞動，拒絕延長工作時間等——而承認戰時服務法。一九一六年工會臨時會議廢止一切例假日，限制同盟罷工。可是戰爭繼

續兩三年之後，因物價騰貴，罷工竟忍不住而頻發，到了最後一年竟有二百餘次的罷工。工會會員不堪變節的首領底壓迫，勢不得不於工會之外尋求真能代表他們指導他們底組織，工場委員會遂成了工人運動底領導。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的革命爆發了。翌年，德國也革命了。當時歐洲各國都有革命的可能，英國的工會又增加革命的聲勢。一九一八年末，工會勢力大漲，有了六百六十餘萬會員。一九一九年主張鑛業在工人管理之下，收歸國有。一九二〇年工人們反對英國政府干涉波蘭和勞農的俄國，拒絕運輸軍需品往波蘭。因戰爭而中斷了的工會運動至此而復活，且更加發展。在戰爭中及戰後所發生工會運動底變化，使工會內部產出了革命分子。這些革命分子和工會的官僚領袖起了衝突而團結起來形成了少數派運動。這少數派決不企圖分裂原有工會，只要引導工會站到革命的立腳點。一九二四年，工黨組閣以後，官僚領袖的醜態更暴露無遺，工人運動因此也更加左傾了。然而少數派的力量畢竟未能支配全英國的工會，直至最近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英國工會的態度還是和第一次大致相同。總而言之，英國的勞工運動直到現在還是以和平的改良主義為最有力。

綜合以上的敘述，我們可看出以下幾點：產業革命以後，向來農民和手工人的那種極其簡陋而又還可以勉強活得了的生活已經不能維持了。此後勞動大眾的生活若不得到

有組織的改善，簡直不能生存，將不如公園棲息底鳥類。換句話說，已往那種對於教育可有可無的生活已經崩潰，此後勞動大眾要得到生活，就是必要教育的。英國底國民教育就從此發生，這二百年來她沒有像德國那樣受到外國底侵凌壓迫。勞動大眾被產業革命把他們置於這樣背水陣的地位，便覺醒了。奮起爭鬥，再接再厲，而統治階級也漸漸認識了不能不管，而陸續給予相當的讓步，這樣的過程反映到百餘年來英國的國民教育史。

英國政府對於貧民底那樣悲慘的生活，在十九世紀之初，只打算用改良市政，開辦警察等方法去防止惡化。至一八三五年製造了貧民法之後，勞動者底苦悶更加甚。在英國的傳統習慣，很不容易認識政府有經營貧民教育的責任。義學之後，繼之以日曜學校，都是私立慈善機關。可是貧民越來越多，在教學上便要講究廉價的方法。於是 Andrew Bell 和 Joseph Lancaster 便不約而同地發明了導生制 Monitorial System 這方法好像是天掉下來的法寶，用一個教員可以教導二三百貧兒。在每一個貧兒身上所花的教育費，和以前義學比較，幾乎要節省七十倍。這樣價廉物美的辦法，愛錢如命的工廠主人們那能不喜歡呢！七八年前，我們國內傾動一時的小先生制，其制也是這一類的玩意。Bell 和 Lancaster 兩人雖各自宣傳自己的方法怎樣地道至上，其實沒有甚麼

差別，只是一個注重英國國教的信仰和儀式，他一個只教聖經而不重儀式罷了。Bell得到國教教會援助，一八一一年組成一個團體，名爲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roughout England and Wales。Lancaster 得到非國教派的教會和自由主義的慈善家援助，一八一〇年組成 The Royal Lancasterian Association 至一八一四年改組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這兩個協會成了英國舉辦貧民教育底大團體。導生制的要點，在把兒童們按其讀書寫字和計算底能力，分成八級乃至十二級，每級分配一定的相當的教材，而每級指定程度優越的兒童一人爲導生，受正教師的指導，做他的助手，而担任本級底教學。這樣一來，用一位正教員便可教二三百兒童了。這顯然是那時候盡量驅策童工學徒的工廠制底反映。這種學校裏底管理編制，常嚴肅，唯一的手段便是賞罰。獲獎的兒童在同學歡呼聲中遊行校內，受罰簡直是中的戴桎梏，受同學們公開的羞辱。這是刺激兒童底虛榮心和恐怖心，以養成他們底服從的習慣。其所教學的內容，不過是初步的讀書寫字和計算罷了。這樣的教育大受當代名流們底嘉賞。Peisner 教授說：「導生制目的不在求高，在多數人看來倒好，因爲中級和上級的慈善家們就不希望窮兒們有頭腦，恐怕他們作非分的希求。」這句評語是適當的。英國的國民教育，一八七

○年以前都不過這樣罷了。

自工廠把貧家幼兒們的父母兄弟拐去做工之後，一班無告的可憐蟲底境遇，早被社會主義者歐文看出了。一八一六年他創辦一個幼兒保育機關於自己的棉花廠內，收容兩足歲乃至七歲的幼兒。他注重幼兒們的養護，講究遊戲室，運動場種種衛生設備，教幼兒們會話聽故事，認識實物，而不要求他們讀書計算。有的點上，這是很進步的。後來 Wilderspin 把它「改良」，倒注重小學初步的學習了。一八二四年幼兒學校協會 The Infant School Society 成立，便成一種幼稚教育運動，可是期間不長。到了一八三六年 The Home and Colonial Infant School Society 成立，才繼承這個運動。這個協會底創辦者 Dr. Charles Mayo 和他的妹妹 Elizabeth Mayo 都是 Rosalozzi 底信徒，要把斐翁底教育精神輸入於幼兒學校，然其實是襲用其教學形式。這個協會底師資訓練院，後來成了美國 Oswego 師範學校底典型，也就是美國師資訓練底來源。到了一八四六年這訓練院受政府補助，一八六一年 Newcastle 委員會報告，承認幼兒學校 Infant School 爲英國初等教育之部而給以國庫補助金。

十九世紀前半期，全英國貧家底教育，只賴這一類慈善團體供給。這類團體因爲財力有限，所供給的教育固然簡陋得很，而貧民無心且無力計及兒女教育，所以就學

者也不名。義學和日曜學校收容兒童人數向來有限，及後採用導生制雖然可以大量收容，而兒童底膳宿衣服書籍等費用又成問題。一八〇七年國會曾提出一案，擬徵收地方稅開辦教區學校而結果通不過。一八一六年，是時勞動者運動各處已開始了，下院派出一個委員會去調查倫敦及其他各處的下層教育狀況。在委員未出動之前，已經知道許多事實；例如，一八一三年西倫敦 *Lancasterian Association* 遊說 *Covent Garden* 各戶就學發見四千七百九十名兒童之中，允入學者只得二千零四十二名，其餘都不允入學。極狹隘的住宅區內，每層樓都是好多戶雜居，其中有許多沒有臥具的。小孩子無衣無履，自然沒法入學。東倫敦一個日曜學校協會，辦理十所日曜學校，都是兩年結業的。至一八一六年教育兒童總數一千三百名，而教員全是盡義務的。自一八一六至一八三三年，*National Society* 和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 兩協會的教育事業都很發展，都採用導生制。其教育內容都是讀聖經，講道德。其實對這班貧苦兒童高談道德，「是誠何心哉」

一八三三年政府開始每年撥二萬鎊補助全國私立貧民學校，這是英國國庫支付教育款項之始，那時候工會已經趨向民主政治運動了。那時候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罕等大都市也成立統計協會調查貧民底無教育狀況以喚起大眾注意。

一八三八年即工人憲章運動開始之年，下院又派出一個委員會，着手擴大地調查

全國貧民教育狀況。那時計算三足歲至十歲底三兒童約佔全人口四分之一，其中有的家庭能夠送他們入學，而大多數工業都市，九歲至十三歲兒童在工廠傭工。委員會歸納起來，須設校收容兒童，其數目等於全人口八分之一，而現有學校殊不足供此需要。倫敦有些地方，學校所收容的兒童僅等於全人口十四分之一，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是在日曬學校及其他極劣的晝間學校。在 *Birmingham* 地方，委員會發見整萬兒童全不受教育，也無法受教育。其他地方也和此地情形差不多。較好的七處地方，其中兒童只有七分之一受到稍像樣的教育。倫敦之外，各大工業都市，里茲市受教育的兒童只得全人口四十分之一，伯明罕市三十九分之一，曼徹斯特市三十五分之一，此外十四個工業中心平均只得二十四分之一。委員會說：「這班無教育的兒童簡直不知道對上帝和對人底道德」。那時工人運動紛起，他們的兒童若又不曉道德，在上流紳士們看來，是很危險的。

●紳士們認識貧兒教育是必要了，可是很難得意見一致的救濟方案。國教派要由國家教會主持貧民教育，非國教派雖贊同教貧兒讀聖經，而不贊同用國教儀式，自由主義者又主張宗教與教育分離。因此，國會便無法成立一個方案。

一八三九年，樞密院設教育委員會，擴大政府教育工作，製定條件，下賜學校補助金，而且觀察各校狀況。一八四六年，實施新政策，設獎學金名額分給各師資訓練院，

此項獎金名額增大，以企改進全體師資。委員會無須求國會通過預算，逐年加多學校補助費總額，一八四六年增至十萬鎊，一八五四年增至二十六萬鎊，一八五七年五十四萬鎊，一八六〇年達八十萬鎊。

一八五八年，國會組織一個委員會，以No. 10. Court of St. James's Palace為領袖，稱為No. 10. Court of St. James's Palace Commission 調查國民教育狀況，並考慮其適宜的方策。這個委員會於一八六一年提出報告書，這可代表那時——憲章運動失敗結束之後，選舉法二次更正之前——英國統治階級對於國民教育底見解。委員會認為社會分成貧富階層是不可避免的，而國民教育應為適於下層階級的。貧家兒童能識字計算，使適合他們的生活條件。以宗教原理為基礎的教育是健全的一般政策。欲收得如此效果，貧兒三足歲應入幼兒學校，自七歲至十歲，十一歲或十二歲，應入晝間學校。有了相當年齡的兒童，若不准他們父母送入工廠傭工賺錢，在委員會看起來，是欠自然的事。因此，委員會不贊同強迫兒童就學期間太長而延遲其僱傭年齡，只可在就學期間務必使其出席。委員會發見那時各校在學的兒童有五分之三請書寫字不甚艱難，又能做日常生活的計算，他們認為相當的滿意。

一八六七年選舉法第二次改正，給大都市職工勞動者以選舉權。到了一八七〇年，教育的情景有點不同了。向來政府補助的私立學校不足供給教育底需求。六歲至十歲的

兒童就學的只得全數三分之一，十歲至十二歲只三分之一。大都市失學的兒童甚多。利物浦市有學齡兒童八萬名，在極劣的學校者二萬名，無校可入者二萬名。曼徹斯特六萬五千兒童之中不就學的一萬六千名。里茲和伯明罕也同樣地學校不敷。那時自由黨內閣首相 W. E. Gladstone 主張促進選民底教育，一八七〇年通過小學法。劃定學校不足底地方爲小學區，設學務局，付以建校之權。區內新建底學校和私立學校一樣受國庫補助，且由地方稅供給經費。公立小學與私立小學自此以後平行存在，由這道法令實施之後，兒童就學的才有校可入。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法律規定兒童強迫入學至十歲，而十歲至十三歲底兒童須由學務局檢定認爲合格的方許可受半日履傭。一八九一年所有小學教育全免費。英國小學教育底演進過程如此之遲緩，顯然可看出統治階級與勞動階級慢慢地妥協底痕迹。

英國底中央教育部直至一八九九年纔成立，可是還不是中央集權的，因爲英國底傳統思想認爲教育事業應聽各地方自由地適應其特殊需要，而不可由中央統制干涉。教育部對各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沒有多大威權。學校課程，教科用書及教學方法俱不由教育部統制。只是學制，學校層，教員資格及學校衛生須依照中央法令罷了。地方教育行政權在各縣市參事會 County, Borough or City Council 議會是地方行政機關，有處理該管區域

內教育的全權，只須報告教育部認可。會內設委員會專管教育，委員中有教育專家，如教員校長及教授等人物，負責教育計劃方案，至於政務則由秘書一人或數人負責。委員會底領袖則解為秘書長或主任委員 *The Secretary or Director of Education*。這個是富於行政經驗的教育專家。

地方公立的小學日趨發達，收容學生數達全國百分之七十。於是國教派的學校很不平。一九〇二年，他們藉保守黨底勢力，通過一條法律，國教教會的學校也得分潤地方教育稅，但其管理權則仍屬教會學校管理部，只是六個管理員之中由地方參事會派兩名罷了。自此以後，地方公立的小學稱為 *Provided School*，是屬於地方公有的；國教教會的小學稱為 *Not Provided School*，只供給公眾使用，而所有權不在地方政府，也還講宗教。行儀式，自行選任教員。這兩種學校都是實施國民教育底機關。此外更有純粹私立小學專準備升中學的。到了一千九百年，地方行政機關已經有權令兒童就學至十四歲。一九三一年教育法規規定各家父母有遣送五歲至十四歲的子女入學的義務，同時各地方也必須設校使其足收容全數學齡兒童。一九三六年義務教育年齡提至十五歲，而地方教育當局可有權延長至十六歲。按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統計，英格蘭及威爾士底學齡兒童就學者已達百分之八十九。

英國初等教育大約可分成三個階段：（一）幼兒部 Infant School 五歲至七歲；（二）初級部 Junior Department 八歲至十一歲；（三）高級部 Senior Department 十二歲至十四、十五、十六歲。義務教育限定為八年，大體由五歲至十四歲。而地方教育當局有權延長至十五或十六歲。男女分校或共校。每一部設主任教員一人。三個主任之中有一個兼任校長。學校課程和教法均可由各校長主任自由計劃，教育部只提示極概括的原則罷了。然而有地方教育當局和視學官的指導，一面適應地方需要，他一面也有全國共通的基礎。其學科大體是：聖經，國語，史地，自然科學及實用勞作，唱歌，圖畫及體操等。聖經是道德教育。英國人向來很注重的。但在公立小學則不拘宗派儀式罷了。高級部的實科有極濃厚的職業教育色彩，大抵聯合隣近數校，設有完備的工場。工業都市的學校固然如此，而農村學校也大多數如此，因為村民子女多數長大後不安居農村的。第一次歐戰之後，受了糧食缺乏的教訓，要復興農業，因此農村小學纔有設農業科的。

英國底勞動階級——第四階級——受足了小學教育，便算終結，再沒有升學底路。自工黨有了發言權之後，對此當然不滿。在第一次歐戰前後，延長義務教育，改造初等教育，開放中學教育等輿論漸漸有力。一九一八年以後，改造實際成功了。義務教育結

業者再要補充學力，大多數進補習學校。（半日的或夜學）一九一八年法令曾經把補習教育也定為義務的，由十四歲至十八歲，但未徹底實施。然而社會上補習教育機關也很多了。兒童十二三歲已屆青春期，身心都要有變化，而小學教育直延至十四五歲，實在太單調。在教育觀點說，也是不妥當的。一九一八年以後，兒童在小學滿四歲或五歲，到了十二三歲底時候，有少數被選升學。這一場選拔考試，不是普遍的，大多數平庸的兒童由主任教員勸令不必應考。考試是嚴格的，由地方教育當局主持，但小學和中學的教員也參與其事。在小學平時成績也提供參攷。及格的免費升入中心學校（Central School）或中學校。可是一面還要得其父母保證能供給其畢業，因為有的父母不能供其子女升學而且還要他們傭工賺錢。公立中學（Secondary School）是一九〇二年以後新興底中學。由地方教育當局設立，以收容中產階級子女，和歷來富貴階級專用的公衆學校（Public School）不同。自一九一八年以後，規定公立中學須設免費學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便收容由小學選拔升學的兒童。換句話說，把中學教育一小部分公開到第四階級了。各地方政府更須設獎學金名額以供給此類苦學生。因此競爭考試是很嚴格的。按一九三六年統計，全英國公立中學生約有五十萬人，若以百分之三十五推算，勞動階級子女受中學教育的應該有十萬人以上了。

英國小學底高級部原來不很發達，至一九一九年。教育部竟把高級部從小學規程中刪去了。十一歲以上的兒童大抵轉往中心學校。這種學校是專為小學生而設的一種新式教育。英國人又叫她做廢登學校。程度比較中學略低而比較舊日高級部則更適宜，更進步。換句話說，是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混合的。一九一二年倫敦教育當局創辦，用「中心」這個名稱是聯絡隣近各小學之意。中心學校供給普通教育和工商業教育，對女生則授以家事及其他宜於女子的職業訓練。其課程富於伸縮性以適應地方及學生個性的需要。修業年限大抵四年，也可以在學延長至五年。這種學校試辦成功，一九一八年以後，教育部竟把它事實上代替了小學底高級部。因此，發達非常迅速。中心學校畢業的優秀者，也可選拔升中學或職業學校。

英國底中產以上階級另有一個教育系統，由小教育而至於大學，儼然另設一個布爾喬亞的王國，這是英吉利的教育正統。布爾喬亞底小學教育機關叫做預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純粹私立，不受國庫補助金，立於國家統制之外。大多數是寄宿學校。學生一人每年繳費在一二百鎊之間。此類校數大約有七百校。畢業生直升有名的公眾學校，再升大學。預備學校的校長教員大抵是牛津劍橋大學出身。把紳士的校風陶鎔布爾喬亞底子弟。有名的導師制在那裏是很盛行的。

成人教育今日已成全世界的運動，而發祥地却是英國。開端於大世紀，至五世紀而具體，二十世紀而盛行。統計其原因，宗教底慈善和科學底發達當然都可計入，而社會經濟狀況和政治底事情底變化實在是有力的動因。產業革命促成了民主政治和勞工運動，大眾需要許多知識以供生活實踐之用。而他們又大多數不能享受正規的高等教育，因而敲破學府的壁壘而要求學術公開於大眾，這實在是社會生活變遷底應有的要求。英國成人教育始自大學推廣運動 *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 由維多利亞女皇的夫婿 *Prince Albert* 發起。牛津大學於一八七九年始於工業都市設公開講座，把學術公開於大眾。因而英國的成人教育運動與大學結了不解緣。到一九〇八年勞動者教育協會 *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爲 *W. E. A.*) 開設輔導班，才成了大規模的成人教育運動。這種輔導班，普通每班三十人以內，有三年制，二年制，及一年制之別，皆在一定時期舉辦。各科目有一定導師，大抵是大學教師，其授課時間，一半演講，一半討論，這是成人教育底一般的典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勞動者教育協會所開設的輔導班三年制的有二百二十九，收容人員達五千三百三十人。教育部對此種教育也很重視，一九二〇年部裏設立成人教育委員會，專司聯絡及指導各公私立成人教育團體底工作。一九二四年教育部規定多額底補助費，各地方教育當局給補助也不少。*W. E. A.* 的發起

人 Albert Mathison 後來更進一步組織世界成人教育協會 World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 聯合各國的成人教育團體。英國於 W. E. A. 之外，成人教育團體還很多。如：The Educational Settlements Association; The Cooperative Union;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Working Men's Club; The National Adult School Union;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bor Unions; Woman's, Institute; Rural Community Councils 等等，或由地方公立，或由私立。

英國底小學師資，在十九世紀頭大半期，都由教生制 Pupil Teacher System 出身。十三歲底兒童完了一定程度底初等教育之後，便約定充教生，在小學當主任教師底助手。這實是一種徒弟制度，教生跟隨主任教師練習教學工作，工作之餘，教師也隨時給他們補充一點普通學識，這樣的期間定為五年。滿期之後，受競賽考試，及第者受皇家獎金稱爲 Queens Scholars 因爲是維多利亞女皇朝代的。其考試不及格的只好終身作極低級的教學工作。受獎金者進教會辦的師資訓練院兩年畢業可得小學正教員資格。一八七〇年國民教育擴充之後，師資需要改進。教生年齡提高至十六歲，而給教生補充學力的中心 Pupil Teacher Center 也事實和中學程度略相等。教生在中心受訓練滿期，再加一年試教經驗的考試取得獎金，便升入師資訓練院。一九〇二年公立中學開設之後，教生未抵完

成了中學教育。繼進訓練院。按一九〇二年法規。地方教育當局有權設立訓練院。一九〇六年中央政府給地方以補助費辦理訓練院。一九二八年以後，這種訓練院完全由公款維持，只是還不直接歸國家管轄罷了。全國公立的訓練院有七十五校。其中也有三年畢業的。大學附設師範部以訓練國民教育師資始自一八九〇年，現在有了二十三所，一九一一年以後，畢業年限延長為四年，以三年工夫充實學力，一年受專業訓練。大學師範部底學術講習，還是以小學教育應用為目的，而不是純學問的研究。

英國底國民教育是為第四階級而設的。教員們自然也是屬於同一階級。他們不能像律師，醫生那樣的受社會尊敬，沒有顯達底機會，常被他人藐視。雖然經過長久見習試用底歲月纔得到一個正教員底地位，可是報酬很薄，生活清苦，常受着學校當局者和督學官底頹指氣使。學校底老闆——教會和地方自治團體——時時役使教員於教務工作之外，任意榨取他們底勞力。教書先生的有冤難伸，有筋難轉，真是古今皆然，萬方同慨！可是跟着勞動階級漸漸抬頭，先生們也覺醒了，一八七〇年，他們成立了一個全國教師協會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簡稱為 N. U. T. 現在有了十二萬會員，而小學教員佔百分之八十。這個團體介於勞資兩階級之間而形成一種中間勢力。他們認為二十九世紀的流弊，把國家對公務人員和教員底關係也墮落於勞資底關係。國家和自治團體，

盡量要用廉價購買勞動，而雇傭條件惡劣，生活程度低下，因此失却職務底理想，不能發揮高度效率。階級的組織脆弱的知識階級不能和權力對抗，沒有維持自家生活條件底力量。因此，他們喊出兩個口號：（一）要求教員的生活權；（二）教員須有發揮人格的容知的知識職業者 Men of Profession 的權威。他們雖然那樣的氣能萬丈，而還不失為穩健的改良主義者。會長 J. G. G. 底就任演說：『我們今天組成全國的小學教員協會，不是甚麼鬥爭的團體而對階級或其他團體挑戰。小學教育盡力增進國民底福利，而助成我國教育制度和教育機關底進步。我們同人希望作一種教養深厚底人物而工作，同時提高教員底社會地位，因而抬高教育底價值，促進文化以期增進教員底利益。』於此可見他們還是接受了英國勞動運動底一貫的妥協底精神。

英國三百年來揭威於世界，不像德法那樣地感受外患底威脅，只是國內底勞動者階級一天比一天欠老實罷了。因此，英吉利的國民教育是『安內』底產物，原與『攘外』無關。可是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德國和美國兩個新興底帝國主義者目灼灼地注視大英帝國手裏的牛耳，尤其是經過第一次歐戰之後，英國也感到國民團結底必要了。訓練公民，培養一致的愛國心既然成爲國民教育的一種重要工作，英國底階級的雙軌學制底缺點馬上就暴露出來。小學和中學不是表示學生底年齡和程度底相差，乃是表示貧富

貴賤的懸殊。受初等教育底兒童少年都曉得自家進這樣的學校讀書是受「階級的限定」，自家的身分命運和對國家所享的權利都不能和上流階級相比，有了這樣的事實底無言之教，再要給他們培養一致的愛國心，國民意識，豈非虛語！因此，從一九一八年之後，英國教育改造的中心問題，也就是怎樣消除傳統階級的隔閡，和德國法國的所謂「統一學校」運動大致相同。公立中學設定免費學額，地方政府籌設獎學金，以備一部分公立小學生選拔升學，這類設施是爲要溝通第四階級和中上階級的教育軌道。一九二七年教育部底評議委員會發表一個報告 *The Education of the Adolescents* 擬訂一個計劃，目的在消除學校教育底階級底隔閡。初等教育定於兒童十一歲或十二歲完成，由此而上都叫做中等教育。按學生底能力，生活及其所需的教育期間，把中學分爲幾種：第一種傳統地預備升學；第二種是普通中學但傾向於工商業；第三種繼續初等教育以收容資質較平庸的小學畢業生。小學生至十一歲，即受精密的測驗，分別升入適當的中學。教育部接受了這方案，一九三一年提出下院通過了，只是在上院擱淺了，原因是經濟狀況不佳，未能遽定爲法律。然而地方教育當局有權可以試辦，倫敦及其他大都市有許多試辦了。這樣改進底趨勢，從純教育的觀點說，是很應該如是。然而我們若認識教育是上層建築的結，就可曉得只從學校教育裏面消除階級的隔閡有多大效力。平等的社會必有平等的教

而機會均等的學制却未必能實現教育平等底理想。好比矮子穿長袍不能增加他底身長。

我們把英國勞動階級底發達和國民教育的演進平行地敘述出來，便可曉得其中底關聯。從統治者立場說，一面消極地對勞動階級相當地讓步，一面給他們以相當的滿足，而積極地籠絡他們，團結他們。這是一小人學道則易使一底又一解。從勞動者立場說，一面積極地爭取自家底生活權利，又一面消極地妥協求改良。這樣互相剋制，遷就而產出百餘年來底國民教育史。從現在說，他們雙方底目的都相當地達到了。今後的前途，還要看國際形勢和英國內部底經濟和政治怎樣演變。

一九四一，一，廿九，於東坡。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

自從教育成了國家底公共事業以來，某一國某一時期底教育，必然反映着那個國家那個時期底政治，尤其其國民教育，對於政治，真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把中國四十年來底國民教育，從政治的觀點作一番考察，決不是沒有意義底工作。中國受西方帝

國主義底侵略雖始自鴉片戰爭，而直到丁庚子之變，纔算是從知識分子而至於大官僚甚至於皇室都震動了，誠如陳青之著中國教育史所說：「時勢逼迫至此，不得不變法了，要變法不得不興學」。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而且要應用教育作求解放底工具，實在始自庚子以後。這四十多年來中國底演變，雖可通稱為民族解放運動，然其間顯然可以區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從辛丑和約至辛亥革命；第二期從民元至國民革命；第三期從國民政府成立以迄抗戰開始；而現在抗戰建國是第四期。每一期底國民教育，若把它配合各該期底政治趨向來觀察，確是一宗有趣味的事。

中國國民教育，見於政府法令，最早的是前清奏定學堂章程（一九〇三）。那裏於各學堂章程之前，編學務綱要一冊，詳述要旨。在那裏說：「蒙養院，初等小學堂，意在使全國之民，無論貧富貴賤，皆能激性知禮，化爲良善；初等小學堂爲養正始基，各國均在任爲國家之義務教育。東西各國政令，凡小兒及就學之年而不入小學者，罪其父母，名爲強迫教育。蓋深知立國之本全在於此」；「查開通國民知識，普施教育，以小學堂爲最要」。這都表明了實施國民教育底志向。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學部成立之後，不久便咨行各省強迫教育章程，說：「現在預備立憲，非教育普及不足以養成國民之資格。茲將查訂強迫教育章程十條，通行各省，以期實行」。所規定的辦法

十條是：（一）廣設勸學所；（二）各省城須設蒙學一百處，學額以五千名爲率；（三）各府州縣須設蒙學四十處，學額以二千名爲率；（四）各村設蒙學一處，學額以四十名爲率；如零星小數合數村爲一處亦可；（五）幼童至七歲須令入學；（六）凡有紳董熱心多設學堂者，分別給獎；（七）幼童及歲不令入學者，罪其父母；（八）以學堂之多寡定勸學員之功過；（九）各府廳州縣長官不認真督率辦理徒事敷衍了事者，查實議處；（十）各學設定後，每二年由提學使考驗一次。這樣有計劃地雷厲風行的氣勢，各省自然次第舉辦。按那時的統計，結果全國小學生人數，由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十六萬八千三百二十名，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增至一百五十三萬六千九百零九名了。按舊日科舉時代，全國應考科考的少年童生大概也有百多萬人，自一九〇五年停止科考之後，大概那一班少年童子全都入學堂了。在大一統官僚政治推行已久底封建社會，中產以上人家底子弟讀書求上進，早成了傳統的風習，不管國家是否設立學校，而社會上一部分閒者在讀書以備仕進，這是經常現象，不出於科舉，便出於學校。從這意味說，清末學校，那百多萬小學生，只能說是科舉時代應試幼童底一筆轉帳，而不能說是推行教育底成績。假如辛亥年清廷不顛覆，我們也可斷定那時強迫的國民教育決不會成功。那時期底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固然還很不夠推行普及教育，而那時所號召的變法維

新，預備立憲底政治作風也決不能有實行國民教育底決心和誠意。庚子之變，創鉅痛深，那時的統治者雖然未嘗不一時興奮起來。然而他們變法自強底自的不過要表示與民更始，而籠絡民衆以鞏固愛新覺羅氏底統治，此外又可以向世界列強表証自己改裝。他們最高的希望也不過抄襲法國或日本底政治面貌罷了。對於中國原有的封建社會，不只是不願改造，還生怕它動搖而拚命要維持原狀。這一點精神鮮明地反映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底教育方針。這些馬脚在學務綱要裏面老早有多處露出來了。例如：「中小學堂宜注意讀經以存聖教」；試問世界上那裏有把古典教育推行於一般國民的呢？總之所謂「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底教育宗旨，是要養成一批馴服的勤勞的臣僕，而小學教育更是「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聖教之心爲主」。換句話說，清末國民教育是要用教育力量給古老封建社會築防禦工事。殊不知要維持封建社會，最好是不要教育，因爲普及教育就是和封建社會不兩立的。縱觀近代國民教育底發生和成功，必須具備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由經濟條件逼成政治條件，英國是一個顯著的例。由政治條件促成經濟條件的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和日本。經濟條件雖差得遠而因爲政治條件頗強有力，也達到多少成功的是十八世紀的普魯士。雄才大略的腓立特烈大王，決心要建設普魯士王國而厲行國民教育，雖被社會經濟所限制而沒有多大成功，然總算成了歷史上國民教育底

先驅者。滿朝統治下的中國既然是受着帝國主義蹂躪的封建社會，而統治者對民衆又猜忌甚深，在如此條件之下，那裏有成功國民教育底可能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政治，在教育方面也廢止了讀經。總算是要把封建的外衣換掉。約法裏面規定了義務教育，而壬子學制也指定了初等小學四年爲義務教育期限。然而辛亥革命，國人只知道要推倒滿清，而未曾認識中國有從根本改造底必要，因而並沒有改造中國底意志。誠如總理遺教所指責的：『從前滿清盤踞中原的時候，一般革命家只知道致力於民族主義，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沒有注意。……在漢族沒有光復以前，一般黨人的心理，以爲漢人一經光復，便可以達到國利民福底目的。到了今天，才知道大大不然。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當日同志僅僅知道注重在民族主義，而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見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辛亥之後，一般謀國者誠然是一汲汲惟在於民國名義之立定，與統一之早達，不曉得要把民國建築於人民身上，而想從總統、國會、國務總理造起，甚至於想從各省都督造起，其本末倒置，在遺教裏很沉痛地指責過，無須多說。在這樣條件之下，義務教育云云當然不過一塊空牌子罷了。

癸丑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全國已在反動勢力支配之下。而民國四年一月袁世凱竟以

大總統令籌辦義務學校，又特定教育綱要，首先標明「施行義務教育宜規劃分年籌備辦法，務使短期成功以謀教育之普及」。又把初等小學改稱為國民學校「以符義務教育之義」。「國民學校」在中國成了法定的名稱實在自此始。也許有人會發生疑問：「一個反動首領袁世凱爲甚麼也須發煌煌命令推行義務教育呢？我們若曉得普魯士底腓立特烈，日本底明治都老早推行過，便不會驚奇袁世凱提倡義務教育了。不能說提倡義務教育的便不是反動政治。只可以說以反動的政治推行義務教育不能成功。若不明白這點原理，便不懂得教育底工具底意義。其實歷史上梟雄的統治者往往以教育作幌子，只要於他底統治立場有利，他也不惜賣點力氣在教育方面做多少工夫。那是數見不鮮的事，然而普及教育和反動政治畢竟有本質的矛盾，到了矛盾漸漸尖銳底時候，便會覺得窒礙難行，不會再起勁了。」

袁世凱死後，不久便成了軍閥攘奪，政客賣身之局，當然談不到甚麼國民教育。然而民國八年教育部又來一次通令各省限期實行義務教育之舉。這個辦法是從民國十年各省城及通商口岸辦理完竣，至民十七年不及百戶之村莊辦理完竣，其間共分七期。由城市而推及鄉鎮，再推及村莊，像煞有條理的計劃。這個計劃所以公布底原因大約是下面幾點：教育部的官僚比較多點兒書生氣，那裏在民國四年原有一套實施義務教育計劃

，這回跟尋舊案就容易辦出來了；那時有一回轟動全國的五四運動，教育部也受了多少刺激。第一次歐戰結束，中國也算是戰勝國之一，北京政府也想對外裝點門面；那時在野的教育團體也常常給教育部多少刺激，教育部對這些團體也得要敷衍一下子；當時山西省以辦理地方自治和義務教育而得了模範省之名。據十年袁觀瀾氏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報告：「山西省在民國七年提倡義務教育時，兄弟正在教育部當教育次長……民國八年不查調查結果尚不失望……男生多女生少，男童已有十分之九，而女童則不過十分之二。又總算是一個缺點。然比之各省尚強倍蓰。閻省長對此，窮思研究，畢竟想出許多好方法來……」由此可見山西省在當時是一個很有力的刺激。據陳寶泉氏報告，那時各省區議定有實施義務計劃的，有京兆、山西、吉林、江蘇、浙江、山東、察哈爾、河南、福建、安徽、江西、黑龍江等十二省區。而據教育部發表的統計，及袁觀瀾氏底報告，都是除山西省之外，餘均不足道。袁氏陳氏兩位都說：「近年以來天災人禍迭至，民生凋弊，教育難言」，「各省兵匪徧地，殆無實行之機會」。這自然是軍閥政治底結果。關於那時義務教育不能實施底原因，古棣氏頗強調國民經濟能力薄弱，籌款無術，（見現代中國及其教育）這固然不錯。而政治底原因實在更重大。按袁觀瀾氏估計，全國義務教育經費那時須得二千萬就夠了，江蘇一省則需二百萬。試問當時軍閥每一人剝削所得

還沒有二十萬麼？李純死在南京，僚屬們給他飾終，裝體面，捐贈東南大學鉅款，建築什麼秀山樓以紀念那位李將軍。若果把他生平剝削所得全數撥充義務經費，那怕幾回江蘇省還不夠用麼？民八五四運動之後，有平民教育促進社，有中華教育改進社，這些知識分子底教育運動團體都想用教育以求民族解放，而因為不能形成爲政治力量，便不能發生效果，充其量只可作爲後來國民革命底前奏罷了。

國民革命是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對外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是肅清軍閥官僚，剷除土豪劣紳，而最高目的是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以促進世界大同。這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底最正確路線，也只有這條路線，這革命路線也須配合國民教育方可收效。建國大綱規定「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一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此等煌煌的規定顯然是指明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在縣自治，所以要從各縣實施徹底的民權和民生政策，而一爲民國築此三千年之石礎」，「這樣偉大的革命工作，它底自身就是教育，也必須要教育。所以遺教說：「治人者是有知識的，治於人者是有知識的。從前的人民知識不

開，好比小孩子一樣，只曉得受治於人。現在的人民知識大開，已經是很覺悟了，便要「把治人和治於人的兩個階級澈底來打破」。我們須注意認識「打破治人和治於人兩階級」這就是教育，也必須這樣做纔需要教育。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裏面又規定：「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與失業學童之衣食當由公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陸續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校，爲年長者養育知識之所」。這更明白地指示革命建設和國民教育是一事底兩面，真是革命建設就必須教育，教育也只能在革命建設之中纔有辦法。如果太強調地把國民教育底不能實施歸咎於國民經濟力薄弱，籌款困難，那便是估低了革命政治對於教育底推動力。關於這一層，國父早解釋過：「或疑經費無從出，此不足憂也。以人民一旦義務勞力之結果，必足支持此費」。由此可見認真執行革命的政治，人民必然地認識受教育是和日常吃飯一樣的需要。至於籌措經費，培養師資，那都是技術上的困難，必可克服。反過來說，若沒有施行革命政治底堅決的意志，這些困難在人們的眼中便會幻成嚴重的樣子，國民教育便沒法推行了。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曾於二十一年製定了第一期實施義務教育辦法大綱，規定從二十一年八月起至二十四年七月止，爲實施義務教育第一期。在此期間，全國各縣市及行

政區特別區。應指定城市及鄉村各設一區或數區爲義務教育實驗區，實施義務教育。二十二年，教育部公佈小學規程，又於正規的完全小學之外，「爲推行義務教育起見，各地方得設簡易小學及短期小學。簡易小學招收不能入初級小學之學齡兒童，其修業期限爲一年，以授課時間折算，至少五百四十小時」。二十四年，行政院又公佈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規定分三期進行：自二十四年八月起至二十九年七月止爲第二期。在此期內，一切年長失學兒童及未入學之學齡兒童至少應受一年義務教育。各省市注意辦理二年制之短期小學。自二十九年八月起三十三年七月止爲第三期。在此期內，一切學齡兒童至少應受兩年義務教育。各省市應注重辦理二年制之短期小學。自三十三年八月起爲第三期。義務教育之期間定爲四年。義務教育之施行，除辦理短期小學外，並應施行下列各事項：推廣初級小學，充實原有學級之學額，厲行二部制，改良私塾，試行巡迴教育。至於成人教育，二十三年也公布民衆學校規程，規定凡年在十六歲以上之失學者均應入民衆學校。

自十七年以後，不容諱言的，由於革命低潮和國內未統一，國民教育也一時被擱置了。而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給我國一次大閃擊，而革命精神幾多少復活了。上面敘述的實施教育的辦法，就是革命精神復活底產物。這顯然是實事求是，盡量求適合國民經

濟能力以求容易實現底辦法。雖因第一期工作還在中途而抗戰爆發，以至無從檢驗其實施底總成績，而國民教育却因抗戰而要更加急進了。

我們受了九一八和一二八兩次日本帝國主義者底嚴重打壓，全國底革命精神振奮起來了；其中反應最快的，是近來友邦人士所稱道的「斯巴達廣西」。廣西於二十二年秋季開始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二十三年十月訂定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他們決定以政治力量為主，經濟力量為輔。期於六年內完成國民基礎教育。同時又以國民教育助成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等四大建設。廣西省建設綱領是全省建設之總綱，而國民基礎教育即為其中之一環。國民基礎教育之特點在合成人教育和兒童教育為一，又合地方政治與教育為一。這深得革命建國底精神。現在推行全國國民教育制度是從廣西國民基礎教育脫胎出來的。

盧溝橋底炮火激起了革命底火燄，認識了抗戰是革命必經的過程，認識了抗戰是民族解放所必須的艱苦鬥爭，口號由抗日救國轉變為抗戰建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鄭重宣言：「建國大業必非俟抗戰勝利之後重行開始，乃在抗戰之中為不斷的進行」；「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故組織民衆為抗戰時期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這回顯然是抗戰

喚起了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又要喚起國民教育。由此，抗戰建國綱領規定了「實行以縣為單位，改善並健全民衆之自衛，施以訓練，加強其能力，並加緊完成地方自治條件，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社會的基礎，並為憲法實施之準備」。又規定了「改定教育制度及教程，注重於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與擴充其設備。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戰區及農村。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專業以增進抗戰力量」。二十八年九月，國民政府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這裏規定：縣為地方自治單位。中華民國人民，無論男女，在縣區域內住六個月以上，或有住所達一年以上，年滿二十者為縣公民，有依法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縣之下劃分鄉鎮，鄉鎮之下劃分保甲。保民大會選舉保長，選舉鄉鎮民之代表。鄉鎮民代表會選舉鄉鎮長，選舉縣參議員。鄉鎮和保甲工作都分為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四種；鄉鎮長得兼任鄉鎮中心校校長，保長得兼任保校校長，而中心校教員須擔任鄉鎮公所幹事，保校教員須擔任保辦公處幹事。這樣一來，各縣民衆得要行使他們公民權，而教育又變成各鄉鎮各保大眾底事，便不得不謀配合運用了。教育部為應這種需要，乃把已往的義務教育和民衆教育合併為一面統稱為國民教育，於二十九年三月頒布國民教育實施綱領。同時又召集各省市國民教育會議，決定了二十九年八月起，全國實施國

民教育五年計劃。這回推行國民教育和以前的實施義務教育比較起來，有幾個特點：第一這回較為急進；以前的計劃分三期共計十年，而這回要於五年之內大致完成；第二這回把兒童教育和成人教育統一起來，在同一的教育機關實施；第三這回國民教育緊密地配合每縣之內各鄉鎮底政治，以發揮抗戰建國底精神；第四這回國民教育經費，頭兩年國庫及省庫共負擔百分之五十，後兩年百分之四十，最後一年也負擔百分之三十，這表示了較大的決心。

普及國民教育所必需的條件可以大別為三種：其一是經濟的條件。生產力發達了，可以改變民衆底生活，可以促成政治底改造，從而產出國民教育。十九世紀底英國是一個顯著的例證。若產業落後。公衆教育籌款困難，人民生計不足，自然談不到教育，這是顯而易見的原理。其二是民衆生活的條件。人民生活底內容至少要有文化底成分纔有學校教育底需要。在死氣沉沉的封建社會裏，大多數民衆固然是「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他們底生活要忍受，要安命，要迷信；就是少數的有產者底生活內容也不出乎一身一家底安全利樂，他們所需要的教育充其量也不過晉身之階，文身之具體了。這是中國向來歷史的社會的實況，而談教育者好像還未十分認識這點。其三是政治的條件。只是民權政治穩有國民教育底需要；民權實現了多少，國民教育就可以成功多少。

民權發展了，可以擴充人民底生活內容，也可以克服經濟的困難。在落後的國家要推行國民教育，得要多多仰仗民權政治。民衆自己管理自己大衆底事，他們便會切實想出許多好法子，而澈底執行。中國歷來國民教育之難於成功，就因爲不認識這番原理。例如袁觀瀾氏稱山西閻省長給山西義務教育想出許多好法子，殊不知就因爲只有閻省長一個人想方法，而不讓民衆自己想方法，所以山西底義務教育結局不成功。

這回中國施行國民教育底最有利的條件，無疑是抗戰建國，新縣制是要奉行建國大綱，把各縣變成民權主義的自治單位，造成全國三千塊之石礎。也就是認識了組織民衆，增進民權爲抗戰勝利之必要條件，而要把各縣組成自治的自衛的自給的戰鬥單位。民衆自己管大衆的事，爲他們自己而抗戰，爲他們自己而教育，便沒有不盡心盡力之理。廣西省訂定一以政治力量爲主經濟力量爲輔而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這完全是正確的。可是要注意這種政治力量必須是民權，從前山西就失敗在誤認「官權」爲政治力量。保甲這個制度，自從管仲而至於王安石而至於曾國藩，都是一治民「底工具，是自上而下的。現在雖還沿用這個名稱，而我們要遵奉建國大綱，使每縣人民直接行使民權，所以現在的精神和古來保甲根本不同，要這樣纔可以爲國民教育開闢優良的園地。

國民教育到今天幾實施了兩年，未便即刻檢查它底成績。然而兩年來聞見各方面底

報告，都是很感受經費不足和師資缺乏兩種困難。要克服這兩種困難，當然要從教育行政技術上做工夫。可是行政技術怎樣纔可以運用有效，結局還要依靠革命的政治底決心和誠意。有了決心，有了誠意，正是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全國高中以上底教育經費，自然比較國民教育底經費大好多。這些中等以上教育底內容，不容諱言還有好多不適合抗戰建國綱領規定「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若肯把這些不必要的中上教育加以整頓裁減，而移這筆經費去補設貧瘠地方底國民教育，可不是最好的辦法嗎？然而要教然這樣幹，就必須有一由大眾爲大眾「底政治。停辦了非必要的中等以上學校，同時就發動那批教師和青年學生去分担國民教育工作，可不是一舉兩得，國民教育師資和經費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增援嗎？然而話要說回來，近來師資不足就因爲青年知識分子不肯當國民學校教師。師範學校招不到學生，在職的小學教師紛紛改業。救濟教師荒當然要提高教師待遇，改善教師生活。可是無論怎樣提高，怎樣改善，也不能使小學教師們做大官，發國難財。如果社會上做官發財底門路還很多，各方面投機鑽營底機會還天天在那裏招手誘惑人們去趨附，又還有甚麼法子教青年們安心在爲國民教育而艱苦奮鬥呢？這又是政治問題了。

末了，我得到這樣的結論：進步的政治必產出進步的教育；頹廢的政治必不能完成

進步的教育。進步的教育可以助成進步的政治，而不能挽救政治的頹廢，更不能為頹廢的政治作掩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六日於桂林

國民教育底輔導和被輔導

「輔導」是現代教育行政上一個流行的術語，是由上級的教育工作人員去協助，指導或督促下一級的工作底進行。他們假定下一級的能力較低，而上一級的能力較高，因而下一級的工作，要得上一級的發縱指示。上一級的教人家怎樣教，他們所憑藉的是既定的教育法令或一般的教育原則，依據這些法令原則，而輔導下一級的工作進行底技術，如教學方法，學級編製，教具設備，校舍建築，學校行政之類，以求符合既定的法令或原則，即所謂增進效率。在這裏，可變的只是工作技術，而所要進行的教育底自身卻被認為毫無疑義而可以安靜地實施的。這樣的所謂輔導，是否可以適用於現在我們要進行的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要輔導的是甚麼？我們首先要注意認識清楚國民教育是喚起民衆共同抗戰建國底一種必需的工作，它是新縣制底一部，而新縣制卻是民權政治底石礎，要喚起全

國各縣民衆實際運用四權以造成堅強的地方自治單位，這樣的政治必須有國民教育，其實它自身就是教育。而國民教育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進程中纔能進行。那末，國民教育決不是漫無目的應識字教育，或常識教育，乃是由民權政治喚起的文化底需要，也就是民權政治所需要的教育。例如強迫入學，是不是遵照國民教育實施綱領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提出書面勸告，榜示姓名，再科以罰鍰，便可以發生效力呢？恐怕決不會如此簡單罷！如果是由於生計困難，衣食不足的，就得要在貧民生計想法子；如果是由於生活內容簡單，而感覺不到教育文化底需要的，就得要改造村民底生活，使他們有組織，有內容，從而啓發他們底文化興趣；如果是由於重男輕女底習慣，而不願使女兒或媳婦就學的，那就非對宗法社會底傳統迷信進行一場戰鬥不可。其他如籌措經費問題，建築校舍問題，經營校產基金問題等等，若按諸實際，多半的困難阻力，都是從封建式的落後的社會底傳統，迷信或黑暗勢力發生出來。我們要克服這些困難，剷除這些障礙，都要下一番革命的決心，進行鄉村底革命，改造，這番工作就是教育，也必須通過這種工作，纔能使落後的鄉鎮社會變成需要教育文化的社會。然而這樣的輔導工作，若只憑些教學法底花樣，甚至於什麼測驗，統計，調查底技術公式，可不是和叫亂民何不食肉糜一樣的粉飾太平的假話嗎？

國民教育爲甚麼要輔導？我們只要認識國民教育不祇是教師們在學校裏安詳地，恬靜地召集一班兒童或失學成人來課讀，乃是實際進行鄉鎮底革命，改造，我們要打破鄉鎮裏落後的閉塞的封建社會，要剷除黑暗勢力，而建設有組織的有內容的三民主義的新社會，那末，輔導底必要就活現在眼前。我們是保長兼任國民學校校長，要中心學校校長兼任鄉鎮長，理由就是在此，而不是爲要形式的統一，也不是爲節省經費。由此就發生問題：我們底校長，鄉鎮長，保長是不是鄉紳型的人物，他們自身就是封建勢力底體現者呢？或是一種沒出息，沒志氣的教學先生，久矣乎成了封建勢力底俘虜呢？老實說一句，鄉間讀書識字而有資格當校長或鄉保長底人物，大抵是屬於這兩型中之任何一型的。就饒他還未成熟，而社會環境也很容易使他趨於這類典型底傾向。那末，怎樣把這班已成的或將成的鄉紳型或教書匠型底人物改造爲革命建國底幹部呢？換句話說，怎樣給他們底人格常常注射消毒劑，防疫苗，而使他們可以擔任革命的工作呢？這便是輔導底重大目標之一。又假定人物底問題有了解決底辦法，而這番工作底進行還有極嚴重底問題。我們曉得各鄉鎮底社會生活若不澈底改造，便決不能談得到國民教育，即令遷就地，敷衍地辦起來，也決不是抗戰建國所要求的國民教育。然而改造鄉鎮底社會生活，這就是一場持久的革命鬥爭，談何容易！因而必須輔導。國民學校，中心學校底校長

，教師，鄉鎮長，保長，文化幹事等只是這場持久戰底前哨，先鋒隊，只由他們孤軍奮鬥，決不會有制勝底希望，因而必須輔導。我們由此可以曉得因為國民教育就是基層的革命建設，所以必須輔導。

按國民教育實施綱領第十條，每一鄉（鎮）應設中心校一所，稱某鄉（鎮）中心學校，兼負輔導本鄉（鎮）各保國民學校之責。中心學校是各保國民教育底直接而親切的輔導機關，每月須召集各保國民學校校長會議一次，討論各校應興應革事宜。各鄉鎮之上，有縣府底督導會議及各區教育會議，主持的是縣教育科長，督學或區文化股主任，而被輔導的是縣境內或一區內底國民教育。各縣之上，有分駐各行政督察區的省督學，在區內底省立師範學校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合成這一級的輔導組織，而被輔導的是區境內各縣底國民教育。再由此而上，便是以教育應為主的全省國民教育底輔導組織。我們看這一套的輔導機構，便可曉得：越低級的輔導機構，其所輔導的範圍越狹小，而輔導工作卻可以越來得具體，切實。越高級的，其所輔導的範圍越廣大，而輔導工作便不得不趨於提綱挈領，或祇給各地方以其所需要的某種力量。下一級的要仰仗上一級底指示或助力，做底工作纔容易進行，所遭遇的困難纔可望克服。由這意味說，輔導是從上而下的，下級的是被輔導，而上級的是輔導。然而上一級的輔導要怎樣纔能中肯而不是官

樣文章呢？給予下級的助力要怎樣纔可適合人家的需要，而不是庸飾的禮物呢？這就必須細心審察下級的報告，根據他們底請求，尊重他們底意見。由這意味說，輔導卻該是由下而上的，下級的在輔導，而上級的是被輔導。這樣的輔導同時又被輔導，彼此互為輔導又互為被輔導底微妙關係，必須十分被理會得清楚真切，輔導機構纔能成爲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輔導工作便可發揮民主的教育的精神而不是官樣文章。

由我的經驗，近來的輔導工作多半未合此理。例如國民學校教師暑期講習會，往往是由上級機關東拉西扯約來一批雜牌的所謂教育專家，拘來一批在職教師聽他們信口開河，什麼測驗啦，統計啦，教師修養啦，精神講話啦，一套又一套，都莫明其土地堂。教師們只好把這椿事看作帶國民學校教師底徭役，只好悶着氣花一筆公家的旅費來住幾個星期的集中營，只認定渡過了這一關，國民學校教師底冷飯碗便加上了一道箍籠了。至於國民教育推行底實際困難，或教師們痛切地感到的需要，固然很少提出，即令有不識趣的教師們冒昧提出來，而所謂專家者也只是矇目結舌或搖頭歎息支吾過去，反正那不是正規的精神講話，修養演講，本來是必答可不答的。這就是因爲不懂得輔導和被輔導底微妙關係，所以弄出來官氣十足而教育氣味稀薄。

現在我們推行的國民教育是配合全盤革命建設底整個社會底改造，而不是孤立的機

械教育事業，因而輔導也是全盤革命建設底輔導，而不是枝節的技術底輔導所能奏效。現在國民教育推行中所遭遇的困難，不祇是由於教師們底教育技術或管理技術底幼稚，乃是由於整個社會生活落後，傳統迷信重重，黑暗勢力根深蒂固，因而不容許教育文化有生長底餘地。須知任何技術都是由需要產出來的，在一個根本不需要教育底社會裏，那兒還談得到教育技術呢？再顯淺一點兒說，教育技術必須先有運用它底教師，而現在就沒有人肯當教師，還談什麼技術？爲甚麼沒有人肯當教師呢？這就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不是枝枝節節可以解決的。現在抗戰建國是一個改造中國社會底極好機會，趁這良機，運用大力一面改造社會，一面推行國民教育是可望成功的。二十三年，廣西省訂定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認定國民教育宗旨，在以政治力量爲主，經濟力量爲輔，普及全省國民基礎教育，而以國民基礎教育助成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四種建設。這幾句話是很中肯的。那末，國民教育底輔導，就該是政治力量——推動國民教育而改造停滯已久的封建社會底革命的政治力量。所以要有上級的輔導機關，用革命的政治力量，給下級國民教育底實際工作者剷除各種社會上黑暗的阻力，使社會由不需要教育者的變成需要教育的。這纔是輔導。所貴乎有革命政府就在乎此。有革命的政治力量做後盾，國民教育纔能成爲可望成功的事業，纔可有工作的興趣，纔能被人們認識它底工

作底價值，纔有人樂意幹這工作，纔談得到工作技術。上級機關是革命作戰底司令部，國民學校校長教師是前哨，前哨靠着司令部增援，而司令部憑前哨探知敵情，依其需要而發撥兵送軍火，至於如何射擊，如何衝鋒底技術，只要他們可能沉着作戰，自然可以從經驗中產出來。總而言之，現在國民教育底輔導，要深刻地體認革命建國底真諦，纔能尋着路線，決不是教育專家從歐美販運回來那一套洋雜貨。

一九四二，七。於桂林。

籌措國民學校基金問題

最近廣西全省地方行政會議，在教育一類之中，各縣長向省府請示及建議涉及國民教育基金的，共有十六縣之多。據會議中教育工作檢討綱要底報告，在三十二年度，各縣籌集國民教育基金，達到預定進度十之總算百分之六十以上十下的，全省有十八縣，未達到預定進度的共有八十縣，而尚未辦理的有兩縣。在會場中進行檢討時，出席各會員發言的頗多，會場空氣頗形熱鬧。會場中議論，大抵集中於兩點：其一是基金籌集底困難，其二是籌集基金和地方財政統一底抵觸。教育經費既然列入地方預算，統收統支

而偏偏又要給國民學校籌集基金，而且這項工作又爲各縣施政工作底一個要項。確有點兒令人不易理解。這個疑問，在會場中，得黃主席一番賢明而正確的指示——國民教育經費當然從地方財政經常支付，而此外還需努力籌集基金——各縣市當然會秉承這番指示做去。然而這樁事在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底過程上，確不失爲一種微妙現象，還值得把它分解一下。

國民教育經費從仰仗基金維持轉變而爲從地方財政經常地支出，這確是進步的現象。民權政治必須建築於開明的自由的民衆身上，因而無論如何，一定少不了國民教育——這塊基石。國民教育底量要盡力擴充，而質要隨時提高，因而決不是慈善事業似的基金所能供應。世界各先進國家，教育經費必列在地方歲出預算底首位，大體佔歲出預算總額底百分之五十以上。就是在德日義等法西斯國家也是如此，因爲他們雖不奉民衆做主人，而也要他們做有效的侵略工作。然而這一轉變——從基金轉變而爲地方歲出預算——在歷史上卻不是很順利的成功，因爲這是社會進步底徵象，是民權政治底測驗表，是經過比較長久的艱難的陣痛而產出來的。例如英國，在一八三八年——民衆底憲章運動開始之年——以前，英國全國的小學教育都委之於私人慈善團體之手，政府從不過問。從那年以後，英國政府纔連三接三地組織幾次委員會來調查研究教育問題。然而也只

多給些教育補助費罷了。到了一八六七年英國選舉法第二次改正，給大都市底職工勞動者以選舉權。從此以後，國民教育纔成爲英國所必需。一八七〇年，通過了小學法，各地方纔劃分小學區，設教育局，建設公立學校，由地方財政支付經費。一八八〇年法律纔規定兒童強迫入學至十歲。一八九一年全國小學纔免費。英國底公立小學教育運動直經過五十年纔告成功。美國底公立小學教育運動始自一八二〇年直至南北戰爭——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之後，全國纔普遍完成，大約也經過五十年。這五十年間，美國各地方議會屢次激烈地爭論，甚至再三取決於全體公民總投票，又甚至於向法院提出訴訟，經過幾多艱苦奮鬥，纔成功了用地方財政支付教育經費。然而在外國難得底事，在我們中國往往來得格外容易，義務教育經費的列入地方預算就是這樣的一個例。民國二十四年，教育部以第一五七九二號訓令公布各省縣市等籌集義務教育經費暫行辦法大綱，早已明白規定：（1）各省縣市各小學區內之義務教育經費，應視其設校之數量定需要經費之多寡，由各縣市就地自籌半數以上爲原則；（2）各省縣市各小學區內之義務教育經費，應由縣市教育行政機關核實列入縣市預算內，其在預算公布後增加者，應依追加預算手續補列。二十九年公佈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之第十五條及十七條，也都定立了國民教育經費從地方歲出預算支付底原則。由此看來，英美兩國都費了五十年工夫纔做到的，

而我們竟不很費力就在法規上決定了。這固然是——一種可喜的進步現象。那末，教育部爲甚麼又製定基金籌集底辦法呢？

原來中國底地方公立學校經費從地方公款開支。這在清末及民國初年早已如此。從沒有人像十九世紀初期底英美人那樣的公然提出異議。這一點也未嘗不可以說是中國人底良好傳統習慣，提到栽培子弟念書是最正大的事，誰也不敢有異議。可是自民國初年軍閥專政之後，便發生許多流弊。教育經費名義上雖規定爲地方歲出預算之一項，而在官僚心目中，仍把它看作可有可無之慈善費，遇着財政稍有困難，首先開刀削減的便是教育經費。又或預算雖然還列有這一項，而實際則積欠不支付，使教育事業陷於半死半活底狀態，這也是經過長久歲月人人共觀的事實。有許多地方款項收入，當初開闢這財源時，是以舉辦教育爲號召的，到了籌款告成，混入地方財政統收統支之後，教育卻沾光了。於是教育卻變成了「待魚忘筌」底筌，摸到了魚，便被人忘卻了。有些近於苛雜的稅捐，甚至於不名譽的稅捐，在開辦時是以辦教育爲名的。因爲別項用途底名義不易壓服輿論，只好用辦學爲名，而教育既不能染指於正常的收入，也只好向這類旁門想法分點餘瀝。例如花捐，賭捐，秤頭捐等。又如浙江全省教育經費靠着紙錢香燭等迷信雜費捐更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然而這類苛雜稅一旦混入地方統收統支之後，固然未必全

數爲教育支出，而一旦苛雜被裁，便宣告教育沒有經費了。這樣一來，教育便陷於一封諸無緣而抄家有份的底窘境了。在世界各國最進步最成功的辦法，教育經費列入地方歲出預算，而到了中國，卻受了政治不良底條件影響，便橋過淮化爲枳，呈出啜子吃黃連底現象。這便是一保障教育經費獨立，和一籌集學校基金，等燈燈明命之所以由來也。那末，現在我們努力地方建設，對於籌集學校基金之舉，該怎樣執行呢？是否把現有學校逐一籌定基金，而把現在國民教育推回到十九世紀之前美國和英國底那種貧民義學 Pauper schools, charity schools 底狀態呢？

我以爲現在籌集國民教育基金，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退步的，又一種是進步的。如果想籌得基金來抵消或減輕地方財政底支出，那便是退步的。即令成功，也只能使國民學校在極可憐的簡陋狀態僅僅維持開門，當然談不到擴充，更談不到提高發展。二、百多年前底英美兩國底貧民義學便是好榜樣。怎樣是進步的呢？那便是黃主席所指示的辦法，國民教育經費必須從地方財政歲出預算內統支，而於此外籌基金以作特種支付。必須嚴格遵守二十四年籌集義務教育經費暫行辦法大綱底規定，一視其設校之數量，定需要經費之多寡，而列入縣市歲出預算內，務必求其足用。要這樣纔能使國民教育配合縣政整個的建設而按年增加，步步發展。那末，還要基金幹甚麼？要這樣，基金纔大

有用處。一個縣市底教育總費底支出，當然要均衡分配，而不許對於那一鄉鎮村街有所厚薄。假如某一鄉鎮要求他們那裏底教育得加速的進展，特殊的充實，便不能從地方經常的歲出請撥大宗款項，在這場合使用得着教育的特殊基金了。例如融縣長安鎮，要把他們的中心學校國民學校底校舍建築好和長安街一樣的美麗清潔，便不能從融縣地方預算內請款，只好靠自己本鎮的教育基金底充裕。縣府儘可利用這樣場合，鼓勵各鄉鎮作教育建設底競賽。『長安女子一枝花，融縣女子賽過她』。縣府便可利用這點不甘落後底心理，鼓勵融樂鎮、東廓鄉底公民們募集大宗基金，把校舍建築，圖書儀器充實，教師優待。這樣一來，縣境內各鄉鎮底教育建設底競賽便可以蓬蓬勃勃發展起來，這樣纔是進步的辦法。然而決不能誤解籌集基金要來抵消地方教育經費，因為那是退步的落伍的想頭。

中國國民教育運動底發生，和歐美的有根本不同之點。他們的是民衆自動起來底革命底要求，我們的是革命政府對民衆底鼓勵和領導。他們底國民教育好比學生在膳堂吃飯，飯菜有點兒不好，便會拍桌子責難庶務。我們的好比主人請客，豐富與否全看主人對來賓底誠意。如果誠意不足，飯少菜薄，客人們也會忍耐，決不會拍桌子。而我們國民教育底目的，就要把民衆教育到會拍桌子要教育。

一九四三，十一，十三，於桂林棲梧居。

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

去年三月間，桂林某兒童保育院發生虐待兒童底問題，兒童們寫信到桂林大公報去披露，弄得滿城風雨，由輿論界呼籲援救而進到各界的實際慰問，喧鬧一時。後來，只聽見該院院長辭職，便算不了了之。過後不久，桂林市兒童節還是照例熱烈地開會慶祝。最近重慶市又有保育院餓死半數兒童底新聞，尊重兒童是世界的一種運動，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而現在還是一方面高唱愛護兒童，一方面却成羣成羣地餓死兒童。這種現象，自有它底妙處存在。將這個問題作一番比較，有系統地研究是有意義的；今天提出來講一講，可給大家一種參攷，給大家得到一條研究底路線。

尊重兒童與愛護兒童是近代的事情，是隨着科學的發展，文明的進步處越來越有利，在理論上也越來越精密進步的。在學理上提出尊重、愛護兒童底重要的，可歸納為如下兩方面：一方面是根據於生物學，從個體生存與種族保存的觀點出發。高等動物愛護兒童的本能很強，有人損害它底幼兒，無論它如何地軟弱，它都會起來拼命的，這就是

最顯著的一種強烈的要求。從進化的程度來講，生物越是高級的，其愛護幼兒的方法就越周到。另一方面是根據於兒童學，人類兒童需要父母照料，養育的時間最長，佔全生命四分之一的時間；人類長幼依賴的要求特別大，造成了人類底慈愛。兒童學者以此爲人類社會進化的有力樞紐，因而尊重兒童，愛護兒童的程度可成爲社會進化的標度。這種根據是很有力的，但是，單從這方面來看，將生物學和兒童學誇張，以爲這是愛護兒童的唯一原因則不免陷於錯誤。愛子是生物底天性，但是，同樣地生物也有吃自己親生孩子的天性：貓生下小猫，狗生下小狗，只要遇着牠餓，牠就要吃幾個的。如果承認生物具有愛兒和吃兒這兩種天性，則具有生物底通性的人類，在野蠻的部落裏，吃小孩也不足深怪。大飢荒找不到食物的時候，頭一批被吃的就是小孩和老人；打敗仗被追逐，跑得累了又沒有糧食，小孩是自然地被拿來充飢，有了歷史底文學底記載以後，也還有這種吃人的事實：聖人出世的春秋時代，宋國被圍，在城裏的人們沒有辦法也就吃小孩，左傳就有這種事實的記載。目前淪陷後的中山先生底家鄉——中山縣以及順德等地，成幫成幫的兒童成爲救饑的食物，澳門也有小孩子底肉出現於賣市。人類不只是吃小孩，而且吃的方法高明得多了：「子女玉帛」就是把小孩當「玉帛」的東西看，有以買賣，可以爭奪，可以交換，可以當作禮品的。把小孩來做奴隸，古今中外是到處有，地主

一家就有十個八個丫頭當牛馬一樣地使用。這些都不是無知無識的人幹，而是讀聖賢書，教養很高的士大夫幹的，工廠的童工問題，歐洲百多年來已鬧震全球。五六七歲的小孩，孤兒院底孩子成羣成羣地被拐到工廠裏去做工。做死了就埋在廠裏沒有人知道。人類愛護小孩，但有時也會吃小孩，而且吃得更陰險更殘酷，這是禽獸所不如亦不如禽獸的地方。我們從沒有聽到貓狗開工廠來吃小猫小狗，也沒有大狗拿小狗來當丫頭的事情；人類就懂得這一手法，吃得文雅，高妙，優美，這就是人類文明的另一個方面。

但是，我們並沒有搖動我們底信念，即是說吃小孩是不好的事。我們要堅決地去認識去撲滅這種殘忍地吃小孩底根源，歷史事實顯然地擺給我們看：人類文明是階級出現以後的事，人類高妙地吃小孩就是階級社會底產物。階級就是人吃人，吃小孩也就是當然的了。在階級社會裏，愛護小孩只是特權階級的特權，他們底小孩才是真的寶寶，窮人底却是阿貓阿狗。但是，進一步嚴正冷靜地來看，有錢人底那種愛護是否有利呢？不！那只是變像地吃小孩吧了——在這裏顯出了人類根本的不平等——是一樣的屬於悲慘的而不是幸福。幾十年前，俄國哲學家梭羅維夫（Л. С. Толстой）在他底名著善的本質裏面說，人是平等的，與人不平等的一是上帝一是狗，他由沙皇與人不平等而推論到沙皇不是人。讓小孩子過非人的生活，在封建社會裏尤其如此，丫頭越多的家

門，其小孩就越壞。我們山富貴家的父母對丫頭的態度可推知其小孩的性格。對丫頭較好的，其小孩還可有好的；對丫頭殘酷的，那家庭養出的小孩多半沒有一個是好東西的。於是被壓迫階級底小孩既然被犧牲了，而壓迫階級底也同樣地被犧牲。人類固有動物底通性，而階級文明使人類底根性變質而更兇殘於禽獸。於是改造人性就非從改造社會入手不可！百多年來尊重兒童的運動就證明了這論點沒有錯誤。

盧騷（1715—1788）是提倡兒童解放的第一個人。在日內瓦紀念他的銅像。旁邊是個身帶着鎖鏈的兒童，而他用手去解開它，這就是說他是兒童的解放者。是的，他是一個政治革命底理論家，同時也是一個教育底革命者，是文化底革命先鋒。他底榮獲藝術獎金的第一篇名著是一七四九年發表的「科學藝術底進步是腐化了還是淨化了人類道德呢？」，他這第一篇革命文章，指明了當時的歐洲文明腐化了人們的品性。第二篇是一七五三年發表的「人類不平等之起源」，在這裏他宣告天賦人權是平等的，人的不平等是人遺出來的。第三篇是「民約論」。第四篇是「愛彌兒」，一七六二年發表的。盧騷是兒童解放，政治革命及文化改造以至於風俗改造的第一個提倡者。由此可看到了這些是互相關聯着而不是分離孤立的事，這幾篇空前的革命文獻都出自他一人之手，這不是偶然的事。

德人巴薩多 (Basadow, (1728—1799)) 受「愛彌兒」的影響很深，他把貫穿於愛彌兒的理論見諸實踐。在夕魯翁地方辦理博愛學校 (1774—1793) 小孩穿短褲，闊領披胸，剪短頭髮即在這裏作第一次的出現。他的主張是不講宗派，不用古語，而用通俗的地方語言來教學，同時把教育與工作勞動聯繫起來，轟轟動動地幹了個時候。當時在康尼斯保任教授的大哲康德，曾多次去參觀，得到很好的印象，在他底著作教育論中也提及這回事。這種教育就是對於封建宗教教育，對於古典文雅教育的一項革命。但後來巴薩多被迫去職，而至一七九三年博愛學校也就停辦了。停辦底原因雖據說是因為他底脾氣不好愛罵人，其實是當時的統治階級以為他這種作風有革命的嫌疑，因而使他不得不停辦。這樣的一個大教育家，而社會給他的結果是如此。實在，大教育家每一個都難免被當代的統治者所猜忌的，的確，他們是與傳統不相調和而時時要改造社會的。

現在全世界小學教育底父親——教聖裴斯塔羅西 (1733—1807)，他年青的時候，是瑞士的一個革命黨員，當他為此而被囚禁的時候，適逢「愛彌兒」出版。他讀到了非常地受感動，即時立志以教育為改造社會的手段。在瑞士革命期間，他做的是教育一批戰地底孤兒底工作，拿他自那份小小的由產和他的太太底嫁粧變賣來辦孤兒院。收集附近因革命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孤兒，小乞丐來教養，這樣做了好幾年。他自己這樣記述道

在這幾年內，我只好生活於五十多個小乞兒羣中，以這些財產麵包和他們共同享受，我自己像乞兒般生活，而教他們成爲一個人。他底教育是從下層社會做起，他底名著「賢伉儷」就是說從教育平民着手改造農村以來助成社會革命的。一七九八年瑞士共和政府成立後，他底友人問他幹些什麼工作，他說他還是願意教育平民底小孩子，他還是辦他的小學教育去，在這里萌芽了以後全世界的小學教育——不論在教材或教法上。斐斯塔羅西在瑞士革命之前是一個革命工作者，之後，他專門從事於小學教育的改造，成爲小學教育的父親，他死後被全世界小學教育界，謚爲「教育之父」而他在革命前的那一段生涯往往是被人忽略的。

幼稚園底創造者，德人佛列貝爾（1787——1852），是斐斯塔羅西底學生，也是受愛彌兒的影響。早年被他底父親放逐，後來到斐特塔羅西那里留學。回國後創辦幼稚園（1840）——這個名稱是他偶然想到的。一八五一年，他底幼稚園以有共產革命嫌疑被普魯士政府查封。這樣摧殘的結果，使得最先有幼稚園的德國，其幼稚教育倒是最不發達的，過了幾年他就死了。後來，能夠深深了解他底教育學說的女學生貝卒亞，把他底幼稚教育傳到倫敦去。她在英國原有的貧民窟民學校平民學校塞開辦幼稚園，和原有的貧民學校相形之下，大受歡迎。她漸漸成爲幼稚園底母親似的，後來幼稚園教師都用

女的，就是由此始。幼稚教育後來傳到美國去，更爲發達，遠超過歐洲之上。而爲幼稚教育底發源地的德奧却寂寂然一蹶不振，這不能不說是因爲美國較高度的民主社會給幼稚教育以較佳的土壤。

英國幼稚學校的第一個提倡者阿文是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他看到當時在英國工廠里對待兒童太殘酷，太不合乎人道，於是在他底家鄉的一所紗廠，規定一種辦法，不滿十歲的兒童，不讓他們入廠做工。在紗廠里附辦幼稚學校以教育三歲以上兒童，他是人道主義的改革者，他認爲社會不好是由於政治和教育兩方面底原因。後來英國底工廠法限制童工底年齡和每日做工時間，而規定受教育時間就是採取他底辦法。而幼稚學校以後成爲英國初等教育之一部。英國初等教育之實施，推廣，普及，都和十九世紀英國工人們歷幾十年再接再厲的憲章運動有密切關係，更是世界週知的史實。在這裏我們看到兒童教育底創始和推廣都與社會改造運動，政治革命運動等等人類底偉大的實踐活動分不開的。

法國的母親學校，是始自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三七遂成爲初等教育之一部。法國在拿破崙失敗以後，王政復古，至七月王朝路易腓力的時代，政治要仿照英國底君主立憲，雖不免是保守的，而當時法國工業已很發達，迅速地走上現代化了，因而政權實際上

也已操在中產階級手中。教育部長周洛（1784—1874）開首奠定了初等教育底基礎。而教育六歲以下的兒童底母親學校也成爲初等教育底一段。法國政治上當時雖然還是王政，但是社會實際已成立民主的基礎，所以教育上才會有這種事實出現。

從上面的事實，我們兒童解放與政治解放，社會改造，社會運動，處處是拉在一起，沒有分開的。十九世紀的民主革命，雖然是很有限度的革命，而畢竟是空前的革命，因而兒童教育底事業隨着各國民主實現底或高或低而或多或少地展開來。德國儘管是幼稚教育底首創者，但辦得不如英法的澈底，而歐洲辦的又不如西半球底美國那樣來得澈底。在蘇聯革命前，美國是全世界幼稚教育最發達的國家，這就是因爲美國的民主程度最高的緣故。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廿二日夜晚十二時出版的一兒童世紀——作者愛倫凱夫人是瑞典底婦女運動家。她擇定那一個鐘頭來出版這部書，意思是說：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兒童應該得到解放了。但是，真正的兒童世紀是始於一九一八年蘇聯革命底成功。蘇聯在短短的二十年間，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美國那樣發達的兒童教育也就瞠乎其後比不上。在內戰時期，幾百萬被丟棄的流浪兒童，蘇維埃政府却把他們教育成爲建設的工人和革命的領導者。英國費邊派的名人韋白氏夫婦，在其所著蘇維埃社會主義新文化論著

中，却五體投地地佩服蘇聯。該書第十章人的改造說及蘇聯的兒童，從懷胎起一直到出生以後，由國家負責其保育及其教育各方面是如何地完善周到。托兒所底床位在一九三六年已達幾百萬個之多，使每一個母親只享受有子女的快樂，而不感育兒的艱苦。全國到處都有專為兒童而設的研究站，他們要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不論在科學上，藝術上，生產技術都會有人來好好地指導。第三次五年計劃，定一九四二年全國底統一勞動學校底學生數從第一年級至第十年級，即自八歲至十八歲，共有四千萬名，即是說全國每一個兒童都無條件地受足初等及中等教育。在革命以前俄羅斯文化那樣地落後，而在短的時間中，他們底成功這麼大，這就是由社會改造而達到人的改造底效果。這證明了廿世紀是兒童的世紀那句話，只在蘇聯實現了。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蘇聯的小圖書館」裏面記載蘇聯底教育家毫無愧色地這樣宣告：「我們的兒童能夠看到他們所做的一切不是爲了要使他們的長輩愉快，而是爲了他們自己，並且爲了我們的國家的整個的未來。蘇維埃的兒童是不慣於諂媚與卑屈的。他們不能像對一個操縱他們生死權的人一樣對下頭低頭。由於他們父母底榜樣與他們整個的環境，他們看到一切事業都爲他們而開放，一切要達到成功之路完全依靠於他們在教室裏底用功與懇切的努力。」

我們讀了這段話，若祇從理論上說，現代教育家都曉得的，然而使人佩服的就在他們那

單能夠兌現。爲什麼如此？就因爲他們那裏真正革了命，在那裏真正成功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人吃人的舊習肅清了，人性改造了，因而兒童們得到真解放。怪不得他們那樣說：『我們的兒童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里，比任何人更感受到新鮮空氣。這就是爲什麼他們能自由學習，發展與預計他們的將來。這就是爲什麼他們能了解他們的前途，知道愛他們的祖國，並且爲了要成爲蘇聯的良好公民與愛國者而奮鬥。』

我們領悟了要兒童教養事業大規模地推行，必須改造有史以來人類的劣根性；而人性底改造又不能靠『正心誠意』那一套玄功，而惟有憑社會改造。現在中國正在必須改造之際，因而兒童教養事業也零星地開端。可是我們必須深切認識這並非點綴昇平的慈善事業，更不是親貴們或命婦們底化妝遊戲，乃是一種緊張的革命鬥爭。假如剝削的社會機構還強頑地保留着，貪污還毒瘡般含膿着，那便是人還在那裏姿意地吃人，那末，任何冠冕堂皇的兒童教養事業都要變質。掛的儘管是『機房教子』底牌，而唱的還是一頓門斬子』底戲。現代兒童學，心理學底研究並非沒有貢獻，只是所貢獻的限於教養底技術方面。先要把兒童愛護變成社會上每個人都關心底事業，才感覺得到技術改造的需要。只憑兒童心理學，兒童本位的教育學說的講習研究，決不能變化人們的氣質，這一類的說教決不能化除人們吃小孩的獸性。

一九四五，四，二十，於平越文廟

丙 師範教育

恭候明日底教師

「今天的教育家 應該自認爲衝擊折銳的前線戰士。應該自認爲移風易俗的社會導師，應該自認爲筭路權樓的開國先驅 應該自認爲繼絕存亡的聖賢英傑」這是 總裁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鄭重而懇切地昭示我們的話。可是這樣的教育家中國確未曾有，要嗎，只好期待從抗戰建國產出來。因此，只好名之曰：明日的教師。

教育原來是一種傾向於「存乎其人」的事業，而在封建色彩渾厚的文化停滯的社會裏尤爲顯著。所以教師人格這番道理在中國最易被人了解，大家都相信這是無可置疑的真理。大凡沒有組織的社會，一切事業都靠個人的力量來維繫，從而個人人格的重要性很鮮明。而在有組織的社會就不這樣。那裏只見社會力在推動，而看不見人格的力量，若把舊式軍隊與新式軍隊，小商店與大公司，木作坊與大工廠比較一下，便可曉得。文化長久停滯於封建階段的中國，民衆不能有也不敢有大集團的組織的生活，從而社會自

身沒有推動事業的力量，各人工作也沒有服務社會底興趣習慣，只有對個人的畏威懷德。一切事業都靠著領導者如何控制鞭策，而在教育使來的更鮮明易見。教師人格的感召力固然是教育作用中間的一個要素，而在中國就幾乎是唯一的決定的要素。這就因為良師太難得而拆爛污的太多了。荀子把人之欲善證明人之性惡，他說就因為人性本來沒有善所以才希望得善。現在我們可以因中國教育這樣重視良師而證明原來良師幾乎沒有。

歷代中國可稱為名師的：第一是所謂帝王之師，他精通了統治天下之術，而自己却沒有做帝王的魄力，一旦魚水相得，便間接發揮其所所抱負。第二是一代宗師，他們飽學有大志，而仕進却不得意，於是乎講學授徒以滿足他的立名慾。這兩種人都有才學，有遠大的目標，而實在是問世一出的。此外一般教學先生大抵是潦倒窮途的文丐，只圖舌耕糊口，能解釋章句便算好手了。抗戰建國底今日，教師當然非自認有一戰士「一萬師」「先驅」「英傑」不可，而我們又不能空想立刻得到百萬以上的姜太公、諸葛亮、文中子、胡定安、朱晦菴。因此這問題就在乎怎樣才可以化百萬文丐為戰士。

近來教育言論界似乎有兩種流行方法：其一是罵，這是激將法，痛罵今日教師們底卑鄙、寒酸，不負責，沒志氣。這原來不很冤枉。可是平心而論，教育界雖有許多黑暗，污點，然而跟別行比較起來，頂多也不過竊鈞者罷了。他們都是沒有做大投機底雄才

大略底寒士。只騙點殘羹餘瀝，與其說是可惡，不如說是可鄙，可憐。而且這樣口誅筆伐，實在是懸着聖賢爲標準而數文丐之罪，正犯了「責之甚苛，而待之甚賤」之病，不會使被罵者感到甚麼痛癢。其二是捧，這是勵將法。把「師嚴道尊」「天地君親師」這一類傳統的高帽子給教師們戴上，而期望它發生孫悟空底緊箍兒，那樣的神祕效力。其實謹愿的聽見便受寵若驚，莫名其妙；狡黠的聽見却在肚子裏暗笑。我們若逢着乞丐便鼓勵他們做陳仲子，豫讓，不食嗟來，則豈非笑話！這又犯了一待之甚賤，而責之甚苛」之弊。「甚賤」與「甚苛」循環地互爲因果，罵不能使之憤，捧不能使之喜，於是乎吾道窮矣。

捧與罵兩法有相同之點，都是以各教師底人格爲對象；希望他們知恥憤發，或希望他們勇敢振作，都是對正各個人給以觀念的刺激而想引起我們所期待的反應。而其實這樣的效力是微乎其微。畫家倒聰明得很，他們要畫一輪皓月，決不在白紙上塗白圈，而偏用烘雲托月法。我們也應曉得要得良教師，千萬別從教師各人身上做觀念灌輸底工夫。烘雲是甚麼？是社會。我們要控制一個人底人格生長，也只能從他的環境下手。要求百萬以上的人格轉變，更是要從社會大環境下手。此外別無捷徑。利用社會底自然力和利用物理底自然力一樣，它是科學的，非人格的，而有實際的大效。古代靠手工鍊鋼，

偶得一口利劍便是曠代希世之寶。而現代科學的鍊鋼法，一天的出品可以有千百把利劍。這分別在乎能否利用自然力。若憑說教宣傳而希望得百萬良師，好比要用神祕的手工鍊出百萬口干將莫邪分給前線兵士，豈非妄想！孟子說：平常人要遇着文王才知振作，而豪傑之士便沒有文王也能發展。這是封建社會底觀點。他不能認識非人格的社會力的偉大，而只知渴望明主底人格的感召力和特出的天才。其實盼望大多數中才也能前進，只憑藉前進的社會。古人想飛行，便妄想乞靈於人格底吐納修練。而現代飛行却成功於非人格的。物理的機械。現代訓練百萬飛行員，不要打坐，不要吐納，不要鍊丹，不要尸解，而可以按期包成功。這就因為有了利用自然力底法子。

中國教師之不知振作，不能全歸咎於他們各人之自暴自棄，乃是社會環境使然，在官僚統治的封建社會，教育實在是干祿進身之階，而教師就不過是化妝師，胡琴師，若鼓勵梅蘭芳嵇監秋，胡琴師立志做貝多芬，豈非幻想！社會裏只有投機之路，奔競之門，而偏要百萬教師安貧樂道，那裏找得着如許滿坑滿谷的顏回呢！老實說：與其乞靈於教師個人的自覺，毋寧設法社會改造。

這回抗戰建國確是千載一時底良機。倭寇瘋狂的侵略是給我們的停滯的硬化的社會來一回「兵解」，新社會不由得不產出來。社會改造底大勢已定。我們只要別再眷戀原

有那凡胎皮囊，便不難水到渠成地產出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誰都知道反帝鬥，反封建底鬥爭是我們民族唯一的生路，而組織民衆又是抗戰建國底不二法門。在這樣鐵定的國基之下，教育便不難輸入戰鬥性，教師當然是戰士。全國社會若成了堅強的抗戰組織，一切事業便不難使工作者從事實看清楚自己崗位和民族復興底聯關，那末，服務興趣和責任感便不難油然而生。只要忠實服務。誰都能夠取得相當代價。願求進步的又都可以有機會發展。事實給證明了報國有道而投機無門，誰又還自甘腐化呢？現在中小學教師之紛紛改業，大學教授之不能忘情宦海，就因為報國之道尚未洞開，而投機之門還未盡封。他們除掉飽聽口頭宣傳之外，還未實際看見自己工作與民族復興之聯繫，而常常望見投機之門在那裏招手，只好全副精神顧念自己底前程，而所謂前程也者不外是憑資格呈履歷結與投而資緣奔競。在這樣條件之下，豈是貼一張「師嚴道尊」的符籙便能驅邪顯正？例如現在發動國民教育師資是一件艱而且巨的運動。加薪獎勵嗎？斷比不上汽車司機。給予「師道尊嚴」底徽章獎牌嗎？他們又未必愛佩帶這玩意。然而眼前一條大道却是：鄉鎮保甲組織真實成功了抗戰建國的基層。而國民學校老實成了一個推動的機關。那末，做國民教育工作便有意義了。工作告成了一段落的教師，如果要進一步學習較高級的學術技能，國家又一定切實給他們提挈玉成，這樣一來，我敢信國民教育前途有

望，要不然，就令天下兒童都尊稱教師爲爸爸，也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總括我的結論是：

一、中國教育之特別珍重良師，就因爲原來的社會不能有良好的師；

二、要教師的人格改良，却要從非人格的社會條件着手。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於曲江。

現今師資缺乏是壞現象麼？

近來無事慣疏慵，睡醒東窗日已紅；伸手枕邊探小說，權當紹酒兩三盅。這是在下近來一首打油詩，當然不敢想充大雅——其實小雅也夠不上——更不是要說「生活藝術化」，只是消遣罷了。四週前，借來一冊屠格涅夫底名著《煙底譯本》，其中有句名言：「由壞變好底過程不是稍好，而是更壞」，不覺拍案叫絕。試看：拆舊房蓋新房，拆卸剛完底時候，不是比未拆時更壞嗎？盲腸炎患者受手術剖腹底時候，不是比未開刀時更壞嗎？雞蛋未孵成小雞之前可不是像一個渾蛋嗎？習字底人若一旦要改變執筆法，可不是要經過一個期間簡直寫不成字嗎？凡此種種，諸如此類，都可以證明由壞變好，中間必經過更壞，這是至理名言。本來是懶洋洋地在讀小說，而給這句名言一下子啓發了，我

立刻就想到目前師資缺乏底嚴重問題。我們大可不必悲觀，這乃是可能變好底更壞階段。

讓我再來一段小說罷！玄奘法師往西天取經，當他由長安起程時，何嘗不行色輝煌，帶着幾個隨從呢？可是都經不起一路上風霜雨雪，猛獸山妖，還未出國，就只剩下法師一人一騎了。到了兩界山，好容易纔遇着一位力能打虎而慷慨好客底劉伯欽，可是他又自有職業，只能送法師一程，而不能陪往西天。當取經人合掌和劉太保拜別底時候，那一種淒涼寂寞底光景，真令人長歎「吾道終窮！」前途何之！「壞是壞極了，然而真正有法力，有道念底徒弟——齊天大聖，天蓬元帥，捲簾大將從此就要陸續出來皈依取經人了。這又不是由壞變好必要經過更壞嗎？中小學校長先生們放心罷！只要堅定地高念佛號，向靈山邁進，不怕沒有好教師！個中消息，聽我道來！

距今四十年前，中國開辦學校，那時簡直沒有師資。中學堂底理科教師往往要借才異國，聘西人或日本人。文科教席也不是科舉出身底老先生都能勝任，而還要受過多少新思潮底洗禮。速成師範，簡易師範，講習所，練習所等等急就章的師資訓練機關，各省都爭先開設，以應急需。那時建設師範教育，實在就為要有學校出身底教師，而不是真正認識了教育的專業訓練底價值。據說當時有人諷刺地說過：『如果為培養師資而須

設師範學堂，便也要設父範學堂以教人作父親。『意思是說：由學堂出身底人自然能當教師，好比長大到性的機昭成熟了便能做爸爸一樣；若偏要特設師範學堂實在是太多事了。民國以來，各級學校畢業生漸多了，師資問題便算『解決』了。民國七八年以後，簡直覺得有多了。民國八九年以後，大學要和高師摩擦，中學要和師範學校相妨。而教育界底論調就連三接二地指摘當時師範教育底結果不佳，甚至於說到那樣強辭奪理底話——師範學校制度是模仿日本的，所以要不得。其實所謂教育議論都是表面的口實。而骨子裏是各級學校畢業生大多數要闖入教育界，便覺得飯碗不夠分配了。民十二年改制以後，師範教育幾乎要陷於停頓。而中小學卻不覺得缺乏師資。然按其實際，並不是曾受專業訓練底師資足用，乃是大多數教席被其他各級學校畢業生充填了。如果不信，請看一看下面三段簡單的統計！據第一次全國教育年鑑，各省市十九年度底小學師資狀況，其總數和曾受師範專業訓練者底對比如左：

省市	小學教員總數	曾受專業訓練者
江蘇	二〇六、〇〇〇	二〇、二七九
安徽	一一、九〇〇	五、二七六
江西	一五、四三一	三、七三三

湖北	七、五〇三	二、二八九
湖南	五三、八七六	一五、九九三
四川	四七、九〇七	二三、〇八〇
福建	一三、六四五	二、九三四
雲南	一一、一七六	八、六八七
貴州	五、三七八	三、八六六
廣東	五四、二〇六	一三、九〇三
廣西	二二、六四一	四、九七六
陝西	六、七四五	百分之五十五
山西	三一、二三三	五、七五七
河南	六四、九四九	一四、四二〇
河北	三一、九三〇	百分之百
山東	三五、九七九	二三、八三三
甘肅	三、〇五〇	九五—
青海	八〇五	一八七

遼寧	一七、七五九	百分之七十
熱河	一、一一一	九四一
察哈爾	四四五八	二六八三
東省特別區	七三三	四八六
南京市	五八九	三七三
上海	一、〇六六	六三〇
北平	五二六	四三四
青島	七二七	三四八
威海衛	三二一	一〇七

統觀二十七省市區之中，曾受師範專業訓練底小學教員佔過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有安徽，雲南，貴州，陝西，河北，山東，遼寧，熱河，東省特區，南京，上海，北平等十二區，而其餘十五區都是不及半數的。這十二區之中，如雲南，貴州，陝西，遼寧，熱河等處原來是比較落後底省區，爲什麼師範畢業底教員反較多呢？就因爲裏頭含有很多是短期講習所畢業的。例如遼寧，百分之七十當中，講習所畢業的佔了五十，而正規師範出身的只得百分之二十罷了。又如陝西，講習所畢業的師資也佔了百分之三十

而正規師範畢業的只得百分之二十五罷了。其不及半數之十五區中，以江蘇省爲最甚。曾受師範訓練底小學教員還不到總數百分之十，這就因爲民十以後，蘇省勇敢地停辦了師範學校。浙江省大概也和江蘇差不多，該省報告簡直不說到教員資格一項。廣東全省底小學教員曾受師範專業訓練的只得總數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可以代表大多數省份。總而言之，全國各省市底小學教員，其曾受專業訓練者——講習所亦算入——還不能達半數。換句話說，全國底小學教席被非師範畢業者佔了大多數。由此類推，全國中學教員也大多數不是曾受師範專業訓練的。然則這二十多年來我們所以不感師資缺乏者，並非師範畢業生足夠了，乃是因爲各級各種學校底畢業生都擠入教育界來。而現今之所以忽然師資恐慌，就因爲他們有了出路。便不再往教育界裏擠罷了。這種現象可以籠統地把它說壞麼？

中國底讀書人，向來受落後的社會條件所限制，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做官，又一條是教書。做官的人有退而教書的，教書先生也有顯達而做官的。這兩條路若調劑得宜，便是太平盛事。若做官的太多了，便說是「仕途混雜」。若教書的太多了，便會「師道陵夷」。興學以來，讀書人增多了，而教書底席位也增加了。於是大多數讀書人若不得志於仕途，都只好教書，不管他自己所學的是甚麼，但憑某校畢業底資格，便要當教

師。距今十七八年前，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曾發表一篇論文，輪迴教育。大意說：教授們從外國販運些「學問」回來教給學生，學生畢業了，最好是往外國留學，留學歸國又還是當教授。如此反復輪迴，永劫不已，今青年們一旦反省，殊覺莫明其妙。後來有一位作家引申此義，把教師學者們比之於意大利蜂。當時社會上盛行養意大利種蜜蜂，養蜂的不是爲釀蜜而專爲出賣蜂種，因爲意大利種是馳名的。而買蜂的也爲得是取蜂種，如此輾轉傳授，意大利蜂便不在乎做蜜了，只有本國產的「國蜂」卻釀點蜜糖。學者教授們只教書不做事，倒是下賤的農民工人們做點兒有益工作以供養讀書君子。這好比意大利蜂無須釀蜜，那樣的辛苦工作只等「國蜂」去做，這便是二十多年來我們不感師資缺乏底真相。全國大多數讀書人都過着「輪迴生活」，「意大利蜂生活」。若誤解他們是熱心教育，有志繼往開來，便是大上其當。二十多年來「學潮」，原因雖很複雜，而多數人爭做意大利蜂至少也是有力的原因之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可以引申一句「國之患，在人多好爲人師」。

四年多抗戰建國底苦鬥，把讀書君子底「意大利蜂生活」打破了。工廠要人，農場要人，運輸交通要人，醫藥衛生要人，地方自治要人，訓練民衆要人，管理糧食要人，統制物價金融要人……這類事業工作都急不容緩。而職位底待遇也較優，於是乎讀書

君子們不得不離開學校裏底「意大利蜂生活」了。今後他們工作能否有成績，自然還要
看他們底真學問和工作底態度如何；而引他們轉方向不再在學校裏當意大利蜂，這一點
總算是好現象。在學校方面，陡然跑掉那麼一大批教書匠，當然不免恐慌，而爲教育前
途計，去請一批玩票的教師，也未嘗不是一個大轉機，我原來說過這是由壞變好底一個
更壞階段。抗戰建國期間，教育工作必要急起直追，而斷非「羣」意大利蜂」所能勝任
的。現在羣蜂既散，急須培養新師資。這個大問題當然非這短篇論文所能解說，而道破
了以前師資之充足並不是好事，使大眾都知道今後我們所需要的師資斷不能和以前的一
樣，這也許不是費話！

抗戰建國底四年多苦鬥已經打破了中國原來那種癱瘓的社會狀況，今日師資底恐慌
不過是總崩潰中底一斷片罷了。雞蛋快孵化了，若不能成鷄，便是臭蛋。我們不該念驚
，也沒有得原狀可以維持，只好努力前進。教育界底同志們！我們現在到了兩界山，固
不該想念長安隨來底夥伴，也不必妄求劉太保，大胆向前收伏孫悟空豬八戒罷！再前進
吧！再前進不遠，就連白馬也要換掉，別駭怕，前進吧！

一九四一，九，卅，於曲江。

答檀仁梅論資師慌

今日之師資大恐慌，一面固然可以成爲一個大轉機，而同時也是一大危機。檀先生呼籲「趕速公籌辦法加以挽救」，我自然同感得很。我也說過「雞蛋快腐化了，若不能成小雞，便會變成臭蛋」。要鼓勵優秀青年參加教育工作，固然必要優待師範生和提高教師待遇。然而還不止此。現今一般人民底擇業心理，還是以個人出路爲重而社會服務爲輕，這是半殖民地底環境所養成的買辦意識。要矯正這一點，不在乎講道德，說仁義，而在乎社會條件之改變；換句話說，便是三民主義的社會生活底形成。我們若不能在抗戰建國期間，堅決地、勇敢地，把社會全盤向三民主義推進，則一切事業還不外是個入替身之階，圖利之具。而教育工作既無甚名利可圖，當然得不到「有志之士」來光顧。須知「師資訓練」這樁事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它底解決底關鍵，不在狹義的學校教育而在全盤政治。不知檀先生以爲然否？

一九四一，十二，七，於曲江河邊廠。

話說新師範生

師範教育原來是後起的教育事業，在中國只有四十多年歷史，在歐洲也只有三百年。照這樣說，師範生原來是一種比較新的名稱。然而我這回要說的「新師範生」，却不是指時間的新，而要說性質的新。

近來全國各省都感到師資缺乏，而各師範學校招生又都得不到青年們踴躍投考，這確是一個嚴重問題。於是乎從精神方面，鼓勵青年們委身於教育工作；從物質方面，改善師範生獎學金和中小學教師待遇。這自然都不失為一種救濟辦法。然而有許多教育問題，要尋求它底解決途徑，最好還是從歷史的社會的觀點看清楚那問題底發生來由，便容易找着頭緒。師範教育問題也是這樣。

師範教育在歐洲是發生於宗教革命之後。原來初等教育是教會裏一種慈善事業。到了宗教革命之後，新教和舊教兩派對立，大家都要多得信徒，用現代話來說，便是爭取民衆。因此而推廣教育，增設學校，自然需要大批師資，師資訓練事業便從此發生了。宗教革命之後，人們底思想比較自由了，有一班優秀的教育工作者不滿意於歷來的成法

，而另有新的教育主張；他們要實現自己底教育新法，便從新訓練一批青年同志來幫忙，好比廣西建設近來的口號：「做新事，用新人」，這又是推進師範教育底一個原因。那時的教育事業還是教育底副業。充當師範生的又是一班平民出身底教徒，他們委身於教育事業，在心理上當然是仰體天主底仁慈，博愛，憐憫，而救濟一班貧兒底靈魂；從此教育精神便和宗教精神結了不解之緣。從中世以來，基督教會早成了封建領主底統治工具，在領主貴族們剝削之下，說仁慈博愛，好比儒家在君侯統治下講仁政，實在不過是一種偽善。然而我們若不配合着那時的歷史社會背景去觀察，而只從抽象的概念上解釋，就未嘗不可說教育精神和宗教心有許多相通之點。

到了十九世紀，現代國家勃興，把教育事業從教會手裏收歸國家統制，師資訓練便成了現代國家底一種教育要政。教育精神漸漸脫掉宗教的外衣，而換上哲學的裝束。說得最鞭辟入裏的，可推德國大教育家凱爾欣斯泰拿 *Kerckhoff* 所標舉的「教育愛」。他說，教育家底理想性格是屬於斯普耶格 *Sprenger* 所列舉的「社會的類型」。屬於這類型底生活，以愛為中心，而以服務，效勞為最高理想。教育愛是施與的愛，大異乎平常男女間之愛。戀愛是羨慕欣賞對方所實現的價值——如才貌等——而接受它，甚至於佔有它，總不免有幾分自利性。教育愛則不然。教育家之愛兒童，不是愛他們既成的

價值。倒是因為他們還未成價值，還欠缺價值，所以要把自己底渾身力量送給他們，幫助他們長成價值。因此，對方越醜，越愚，越不成熟，而教育家越愛他們。如果不脫少爺小姐底習氣，愛清閑，愛乾淨，而討厭兒童們底囉嗦，不潔，跳皮，無知，那便不配做師範生。教育家底一副「情眼」，要從無鹽看出西施，從阿斗看出諸葛亮；爲甚麼能夠如此，就因為他愛的是未來的可能的價值。換句話說，他愛的是人類要生長底價值，他底生活理想便是舍己獻身而爲他人，爲人類。這是理想的社會的類型。也就是教育家底類型。

凱爾欣斯泰拿這套理論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底聖經，大悲咒，如果您當教育當得煩膩了，辦學校辦到頭痛了，最好是暫時搖身一變做阿Q把這套理論在心中一番玩味，可以解除不少的煩惱，收住您的心猿意馬。我試用了十多年，倒收了相當的效果，到了現在還依然一介窮教書匠，未曾失身。可是要把這套理論去解決現在全國底師資恐慌，能不能呢？不！決不能！好比修仙的檢幾個山芋生菓來吃，運氣打坐，雖未嘗不可止一時肚餓，然而決不能用這妙法去救濟百萬饑民。現代國家要鼓勵人民服務教育，還不敢只應用凱先生這一套「精神講話」，而不得不乞靈於大人先生們「陽爲不睬而陰實愛之」底金錢，這便是優待師範生辦法。教員待遇辦法。優待師範生是一種預約去，預先約定出

們將來任教師，現在讀書時期便由公家負擔他們底衣食住等費用。教師待遇是一種社會保險法，國家把教員們平時底生活費用和子女教育，疾病死亡等額外費用都負責保證他們後顧無憂。世界各國規定得最周密的是德國，如教師底住宅費，醫藥費，兒女教育費，養老金，卹金等都有詳細的規定。這類辦法都是要用錢，是庸俗因，物質的。形而下的。而不是清高的，精神的，可是却可收效。然而這辦法是不是澈底有效而再沒有問題了呢？不！還有問題！如果優待了師範生，優待了教員，便可完全解決師資問題。那末，歐美各先進國便該沒有問題了。然而蕭伯納曾經諷刺地說過：『能者做，不能者教。』引申一句，便是『不能教者教人教。』由此觀之，歐美底有錢國家，雖然在優待師範生和教員，而願意當教師的還是一班沒出息的孩子，而當師範學校教員的更是沒出息的，像老夫之流是也！

這回可真困難了！要人們當教師，用精神訓話既不得，用金錢買收又不能，可不要『吾道窮矣』嗎？要是把全國兒童青年委託於一班『不能者』底手裏受教育，而這班『不能者』又是從那班『不能教者』底手裏教出來的，則國家民族底前途，豈不危乎險哉！然而我們想盡方法，聖人既失其智，而財神又失其靈，到底如之何而可呢？師範生和教員底待遇辦法，在原則上是很公平，很合理。然而為甚麼還不能澈底解決師資問題？

我們要曉得這層道理，最好是去坐幾趟火車，入戲院看幾回電影。——請勿誤會！我不是在說甚麼巡迴教育車，電化教育——我們坐火車，憑票入站，對號找床鋪；看電影也是挨次買票，對號找座，那都是最公平的辦法，誰也不能也不必作非分之求。然而倘若有力者可以免費坐車，或先包定臥車，看電影可以先給錢茶房們預留後排座位，那就很難責備大眾安份守法了。又如看電影前排的可以站起來看，而責備後排的君子自重，勿亂秩序，也就難得很了。記得三十年前，日本一位教育行政專家，松浦鏡次郎，說德國底教師待遇辦法是局部的試用社會主義。這句話確十分中肯。教師待遇底標準是民生主義的生活理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果整個社會都實踐這樣的生活，當然是最公平不過的。而壞就壞在「局部的試用」這五個字。全社會機構是獎勵人們自私自利的，智勇辯力者流若能往高處爬，辦銀行，營工廠，盤據要津，便得高官厚祿，洋其房而汽其車，摩登旗袍高跟鞋面白而脣紅者列屋而閒居，交臂而逍遙；在這樣環境之下，敢問老夫子亦動心否乎？則將應之曰：動！動！動！動！而別方面獨責備教師們鼓起他們底「教育愛」，挨束脩，養妻子，窮奢極欲連盤，心只買來豆腐三斤，還算是受了優待，國恩家慶；自非阿Q，其孰能甘之！在歐洲社會，原來階級分明，師範教育是屬於初等教育系統的，一班師範生都是平民，按他們底身份財產，只能受幾年義務教育，一旦准他們

進師範學校，預備當教員，已經算是升了一級，喜出望外，所以優待法還有幾分效力。而在中國則不然。人們要嗎索性不讀書，既讀書便忘不了一將相本無種，甚兒當自強。那一個條件。他們讀書就希冀立談之間取得卿相之位，珠玉錦繡。而偏預約他們吃豆腐。又豈可得哉！彼亦寧願稿頂黃馘以終老耳！歐美底驗方，拿到中國來便無靈。

豈不好在我們中國却有辦法，現在却是大好機會。便是抗戰建國，努力加緊造成三民主義的社會機構。在三民主義的社會裏，一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在那裏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沒有趙鄧紳，也不需要阿Q。在那裏，人人都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們擇業便只求自己性之所適，興之所鍾，而無須老想爬上高枝。因為就沒有高低。在那裏，一教育愛上是可以免現的教育哲學，而不是阿Q哲學，新師範生可帶一批三批長出來。這是我們中國解決師資問題底路線，也只有這路線。說到這裏，便別迷了教育底邊疆，師範教育便要從狹義的教育問題而轉入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這樣纔可得圓滿的解決。若只想憑改善教師待遇，則財力將有時而或窮。若只想捧出一頂一尊師重道，底高帽子而引誘人們當教師，便要等於請阿Q當導師，許他穿上訓導袍，戴上訓導冠，而高唱手執教鞭把您打！

歷史賦予今日師範教育之使命

現代師範教育是十九世紀民主革命底產物。它底誕生和轉變都離不掉近百餘年來歷史的背景。我們處在今天談師範教育，首先要注意我們中國固有的關於教書先生的那一種觀念已經絕對不適用。我們從來所謂教書先生是中國長久停滯的封建社會底產物，社會背景既然不同。那末，今天底師資使不該是舊日的教書先生。中國教育因為受了停滯的封建社會條件底桎梏，向來只是士大夫家子弟文身之具，獵取功名底敲門磚，因而社會上就有一班專靠販賣文字的知識做牛涯底人，這便是教書先生。這班人自身是功名不遂，謀生無術底無聊漢，是封建社會生活底落伍者。雖然有一句傳統的體面話——尊師重道，其實那裏含有極尖刻的諷刺。教書先生向來在社會上是無足輕重的，誰也瞧不起他們。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大抵都看見過教書先生那種寒酸可憐可鄙的神氣。青年們如不相信，請看兒女英雄傳安家那一位西賓程逸興先生。安家主人水心老爺雖很講究禮教，尊敬西賓，可是他家裏人自安太太，舅太太而至于伶俐丫頭長姐都瞧不起程老夫子，都把他看作一個討厭玩意，怪物。長姐勉強服從安老爺底命令，給程老夫子裝上了一袋

煩，可是馬上覺得他那一根旱煙管弄髒了自己的纖手，立刻去取水洗手。兒女英雄傳是前清中葉底作品，描寫守禮之家待先生尙且如是，其餘就可以不必問了。教書先用在封建社會底地位低微，並不是出自某人底自由意思，乃是社會條件使然。四十六年來，中國抄襲歐洲底師範教育，可是屢起屢落，要嗎受人家一陣捧場，要嗎給人家一脚踢下東洋大海，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語淵，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底社會底反映。我們如果不能掙脫掉這半封建半殖民地底社會桎梏，便休想師範教育得順利發展。

距今一百多年前，裴斯塔羅齊提倡師資訓練，原來他老人家把教育看作社會改造底手段，因而教師是革命工作底担当者。當時西歐各國正鬧着民主革命，所以師資訓練被普遍地採用，其中號稱成績卓著的是普魯士。我們要認識現代的師範教育，必須把握着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社會其間教育底變質。在封建社會，農民被束縛於土地，一般民衆最好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換句話說，最好是無教育。民主革命成功，民衆給資產者奪到手了政權，民主自由這個口號又已經從資產者口中虛偽地被提出了，再也不便完全把它收回去。工業社會已經成立了，要一般民衆再回去老死南畝也勢所不行了，他們老實有了幾分覺醒，爲生活而鬥爭底運動也天天來得緊張，資產階級就不能不設法安頓。爲資產階級打算，對內需要大多數有相當知識技能底勞動者給他們生產工作，對外需要大

批有相當的世界常識和國家觀念底壯丁給他們掠取市場，開拓殖民地。有如此種種的社會條件，便產出普遍的義務教育，職業教育。這樣的教育是給資本社會訓練公民，而不是爲少數士大夫家造秀才，它的性質因而大變了。教育成了國家社會底要政，被教育的人數如此普遍而衆多，便不得不講究教學方法和技術。因而教育事業就變成專業，而不是潦倒窮漢底托鉢化緣了。教育變質，教師隨之，這便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師範教育。我們摹仿人家的師範教育，爲什麼始終貌似神非呢？就因爲我們的教育還停留在封建階級。我們的教育還是造秀才，而並不是訓練生產者，殖民地開拓者。因而師資底地位也還停留在程逸興老夫子底那個階段，遇着安老爺便給他一番虛偽的禮貌，而依着舅太太和長姐的意便要給他坐落冷板凳，敬而遠之。

民主革命成功之後，教育大變其質，遠非封建時代所能比擬。教育這回不再是弄文墨，裝體面，而是生活，是經驗，是工作，是布帛菽粟，而非珠玉錦繡。教師因而不是生活落伍者，無聊漢，托鉢僧，而是有專業有技術的工作者；他們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食客，而變成了社會不可缺少的職工，要充足員額，要工作有效率。這才是現代的師資訓練所以成爲國家要政底理由，而我們生長於封建社會底中國人所幾乎不能想像的。可是資本社會底教育進步畢竟是有限度的。資產階級需要善良公民，而據羅素底解釋，公民

和自由發展的人格是兩樣的。他們所謂公民是僅有常識，能勞作生產，能當兵打仗，甘心給資產者造財富，開疆拓土奪取市場，而不敢過分地要求生活幸福。公民須滿足於目前資本社會生活秩序，而不可對於人生社會底過去現在未來有所思索，有所認識。總而言之，資本社會底教育是半啓蒙的而又半愚民的。這就因為資產階級要把他們底生活秩序永久化爲固定不易，所以資本社會成熟之後，又轉變成爲新教育底桎梏了。若借用杜威底術語，便可以說：資本社會底教育是生活，是經驗。可是那種生活經驗是要硬化的僵化的，不許再有擴充豐富底餘地。在這樣社會條件之下，教師雖然成了社會不可缺少的職業，而也只能做資產階級底忠僕，而不是民衆底導師。怪不得羅素說歐美的教師除蘇聯之外，都是庸俗之徒，因為他們只曉得替有錢人說話。那末，資本社會底教師只由程老師底地位普級爲華奶公戴勤底身份罷了。有野心的人們還是不興做教師，所以蕭伯納說「不能者教」。教育學者們儘管高呼「教育愛」，「教育神聖」，而骨子裏還是有一股酸味，但這不是醋酸，豆腐酸，而是硫酸硝酸鹽酸罷了。

中國自夷爲半殖民地之後，帝國主義者和封建殘餘構成了聯合戰線，讀書人搖尾乞憐於達官貴人買辦洋商底跟前，於是小學教師以偶充閩人公子底級任爲光榮，中上學校教師看得充未婚女生底導師爲權利，先生們早變爲匡超人牛布衣一流人物，再欲求爲程

逸兵而不可復得，這又怪不得有心人搖頭歎息師道陵夷。好在現在轉機快到了。五十年底民族解放底神聖戰爭，就爲得要搗毀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底極權，而世界反侵略大戰又應開了被壓迫民族求解放前進底大好機會。中國目前只有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底三民主義底大道，不由我們不努力向前。我們要嗎成功三民主義底民國，否則連殘破底封建國家也保不住，時勢只鼓勵着我們前進，再不容我們猶豫遲疑。我們要完成民族解放，就必須動員民衆，因而必需教育，而且動員民衆這樁事底自身就是教育。今天我們底教育固然不該還是替士大夫家造秀才，也不該是給資產階級造公民，而應是訓練爲民族解放追求三民主義而戰鬥的民衆。換句話說，中國的教育在抗戰建國底大時代不容得不變質。如果稍存半點逡巡退卻的念頭，便要一敗塗地。好比坐上飛機的只顧大膽直上雲霄，若是剛飛起過房頂，便心驚胆碎，想從窗口跳下來，就必至於粉骨碎身。那末，今天的教育家，恰如蔣委員長所提示的：『該是衝堅折銳的前線戰士，該是筮路禳樓的開國先鋒。』這才足歷史賦予我們今日教師底使命。再不容我們追念封建時代底虛幻的師道。也不許我們效學資本社會底庸俗的公民訓練者。我們自然要安貧樂道，可是安貧並不是甘心忍受帝國主義者和封建殘餘底榨取，而是爲民族講節約，樂道也不是樂冬烘先生身上那一塊酸豆腐似的道，而是三民主義的大道。我們當然要有嚴厲的教育愛，可是不是

什麼基督的愛，聖母的愛，乃是革命者對被壓迫民衆的真摯的同情。我們要指導民衆在抗戰中學習建國，又當然要有無窮的學問。無止境的進修，可是不是弄文墨尋章句，想從書中求顏如玉黃金屋，乃是實現三民主義，給人類打不平的真實學問。我們又當然不屑升官發財，可是並非因為升不了官，發不了財，而故意擺阿Q架子說人家的是酸葡萄，乃是要從社會裏剷除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奸商市僧底酵母。這樣的教育使命是大時代賦予我們青年教師的。世間許多事是隨着歷史底發展而轉變，歷史未曾發展到那一步，就算是聖人也不容易預知。孔子只能夢見周公，而決不能夢見中華民國。更夢想不到三民主義，就因為他那時代的歷史距離這階段很遠很遠。歷史發展到了，如果不甘心做蠢漢做落伍者，就要把握着新展開的意義，而努力用革命的實踐把新意義實現出來。歷史也只能提供我們以可能實現底機會，而實踐還要靠我們自己努力。我們全國的國民教育至少要有二百萬教師。這二百萬的革命戰士，就該立志做旋乾轉坤底大事。如果認清楚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一致努力奮鬥，中華民族的幸運，乃至於全人類的幸福一定可能從我們手裏造出來。青年教師們！起來吧！

關於培養師資再說幾句老實話

在國民教育開始實施之年——一九三〇——關於師資的嚴重問題，我曾經提出一個原則，是：

在實施國民教育這個實踐過程中，也就是在抗戰建國這個實踐過程中，訓練師資，以求質和量兩方面的困難得到綜合的解決。

一般教育行政底言論家，對於師資底量底補充和質底改進這個矛盾對立的難題，大抵吐些隔靴搔癢的折衷論，說幾句什麼「質量兼顧，不可偏廢」。做文章總算交了卷。近年來教育行政當局所酌量採擇施行的，如：擴充師範學校，增設各種速成的訓練班，進修班，講習班，改良待遇，實施輔導之類，從純粹教育行政底觀點說，也不能認為錯誤。然而凡此種種計劃，到如今，都給下面底事實粉碎了：師範學校招不了學生，中小學校請不到教師，在職教師紛紛改業，或無精打采，身在教室而心在市場。

這五年間，關於師資訓練，我曾經陸續發表好幾篇短文，每一篇都握緊這個原則——在實施國民教育這個實踐過程中，訓練師資。然而好像還未引起人們十分注意，也許

是因爲話說得還未十分明明，這却非我的話說得欠老實，乃是不便十分透露。這底聖訓。好在現在已經「天不言」。以人與事示之「了」。上面列舉的那些事實現象還不夠明瞭麼？

教師們底教育工作，當然是社會勞動力之一種。現代社會學告訴我們：關於勞動力，必須從其技術方面和社會方面雙方去考察。勞動力是因爲其技術熟練及專門化底程度而顯出其特徵的，這些都是勞動技術底內容。但勞動力底技術方面只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具體的勞動力寄存於特定的社會底再生產過程中，勞動者人格活動之中。有其社會的方面，即質的方面。生產關係，不單是技術過程中底勞動組織，其最主要的關係是特定社會中以生產手段之所有爲中心的人們相互的關係。所以勞動力的質，實際上是表現於後者的生產關係之中。勞動者爲促進生產往前發展而實行的團結，也是一個生產力。人類的勞動力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之中存在的。勞動力之轉化爲勞動，爲現實的生產力，也是在一定社會形態之中進行的。決定各個歷史階段上的生產力之發展的東西，不單是技術方面，並且是社會方面，是社會的勞動組織之性質。技術雖然是社會生產力底一個動因，而當研究技術之時，決不可忘記技術與特定社會經濟條件的關係以及勞動者對於勞動手段的關係。從這一點看，技術同是歷史的範疇。技術之有意識地科學地

應用，是不能在社會形態所造出的條件之外實現的。技術與科學底發展，能促進社會生產力底發展，具有進步的意義。但各特定的社會底生產過程，各有其特定的技術底基礎。而這些基礎又引起科學底發見與理論。而且科學與技術底成果在實際上被利用於生產過程之時，都因不同的經濟構造而顯出不同的社會的結果。

八、我們理解得上述的社會學的原理，便可理解現在的師資問題。若把師資問題抽象地孤立地看作技術和訓練問題，便不符合這問題底生動的具體的真相。須決定師資底優劣的，不只是技術方面，乃是社會方面。而後者纔是決定的動因。這稱為教師人格或德性的，不是從天而降的神祕啓示，也不是教師內心的靈犀一點，乃是受社會關係底影響而表現出來的工作者底工作態度和趣味。那末，我們還回到上面提出的『在實施國民教育這個實踐過程中』這句話。我們這個實施國民教育底實踐過程，是否配合了整個抗戰建國底實踐，而實現了改變整個社會關係，成爲可以促進師資進步底教育環境呢？換句話說，我們整個抗戰建國底實踐是否改進了我們的社會關係，而不只是一場戰爭而已呢？這是問題底關鍵所在。

一九四五，四，一，於平越。

教育自由

——尊師重道的——個新解釋——

距今二十年前，史普朗格發表他的名著——「人生類型」——指明了教育家的生活屬於社會型，是「愛」為中心的，大教育家克爾欽斯泰拿即時給以響應，發表他的名著——「教育家的精神」——教育愛——成為教育工作的靈魂已得到普遍的承認。史普朗格的「人生類型」的理論，雖脫不掉唯心論的色彩，然其中也道中了不少的真理。若把它揭棄過，修訂過，還是可用的。

人生必然求進步，其實通過生活過程中。人類天天在進步，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人類在共同生活中，交互傳達經驗，訂正經驗，擴充經驗，從而獲得進步；換句話說，人類在生而實踐的過程中學習，生活就是學習。因而可以說教育現象實在流注彌漫於生活的全面，隨時隨處都呈現出來。在生產中交換經驗，共同學習，從而生長，也是相長，這裏便充滿着喜悅，鼓舞，和樂，這便是最真摯最誠懇的「愛」。教育愛，如果不碰着別的障礙的人可說是人生必然的情操，是崇高的，也是極平常的，用不着說什麼「基

督的愛」，「聖母的愛」來渲染上一層神密的色彩。

儘管是這樣純潔顯明而光輝的事實，一旦踏上了不平等社會，通過了階級敵對互相疑忌的社會關係，立刻就歪曲，就變相。試設想一個家庭母子之間，商議一天的食物的分配，這原來是多麼誠懇，多麼親切有味的事。而「獵公餉狙，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便變成了陰險的操縱術。又倘若舊家庭姑媳、妯娌、兄弟之間，分用家私，分享剩餘，這就可成爲詭詐，閹割的總因。這理由是敵對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是否存在。我們由此可以曉得「愛」是教育生活的中心，也是人生的本來面目，然而經過敵對的社會關係所謂「愛」也不難表現爲虛偽、欺騙、或操縱。教育工作者一面固然應該欣賞「教育愛」的崇高純潔，而另一方面也不可忘却現實不平等的社會，須時時警惕。

由於社會的不平等，而構成了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這便是政治。從而政治生活以「力」爲中心，憑着「權力」以維持以控制那種支配和被支配的社會關係。如果那種政治是生活過程中所必不可少，是比較公允的，我們就可以說它是接近於正義，那是優良的政治，倘若表現得不好，「力」只是如強了壓迫、專橫、剝削，那便是惡政治。政治既然是富有統治性的生活，人們在那裏生活同時也得到學習，受到教育。而且統治者要求得到被統治者的諒解、心服，也不能只憑着刺刀、監獄，而也須借助於教育。然而

在惡政治中以表現出來的教育，也只能是虛偽、操縱、甚至於麻醉。如果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廣泛地喚起大多數的民衆，共同力爭自由平等，那便與教育匯合了。

教育雖然以愛仁爲主，而在生活過程中也必須明是非，辨善惡，從而爲得要控制生活。有時候也須用多少「力」。然而教育畢竟是以「愛仁」爲主的，對於不良的生活或不良的分子，也決不只是給以打擊，而必須努力求其轉變，覺悟。教育者若因乞靈於「力」，而墜落於惡政治的泥潭，那便不堪問了。教育對於醜的、惡的、病態的，應當寄以無限的同情，而設法治療他，矯正他，雖有時不免於用力，而實在因爲他陷在醜惡的泥淖中，而愛他更切，教育工作進行得更懇切。這纔是教育的風度。

那末，「教育愛仁」要怎樣纔表現得真摯而不流爲虛偽欺騙呢？唯一的條件是自由。因爲「教育愛仁」之所以可能，祇爲虛偽，其原因在敵對的社會關係。而自由平等正是打破敵對的社會關係底良藥。現在要提倡「尊師重道」，唯一的要件是尊師教育自由。教師的自由，原來「尊師重道」這句古訓，含有濃厚的封建社會的趣味。師之所應該尊，就因爲他山陰裏塞有一塊道，而那塊道又正是封建社會的神祕的統治權，麻醉劑。所以「尊師重道」這句話的本義，到了現在是再要不得的。只能舊瓶裝新酒，借用這句傳統的成語罷了。

自由是教育工作進行底基本條件。教育若沒有自由，勢必流爲欺騙。古來對於教師自由之壓迫，極枯。莫甚於宗教戰爭時期的歐洲。十六、十七世紀。那是歐洲人的一段最愚而悲慘的歷史。不庸諱言，中國最近十多年，惡勢力給教師們底壓迫，也幾乎等於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會。這是民族自殺底愚蠢勾當。現在既全國一致要求民主，我首先要求解除一切關於教師思想行動的無理壓迫，這纔可以講尊師重道。其實這是尊重民族的後代。我們既把兒童青年交給教師們負責教導，至少也要教師們是一個自由人而不是奴隸。距今三百年前，歐洲的教會正在對教師橫加壓迫底時候，我們中國大學者黃梨洲先生却有這樣的議論：「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今天我們中華民國爲甚麼不承受這番議論，而偏偏效尤三百年前歐洲宗教教育的污點，而一味強迫教師們呀萬歲呢！

一九四六推行師範教育運動週

世界師範教育運動史之戰鬥性

——卅五年三月卅日於廣西省會師範教育運動週演講

師範教育的任務是在培養一班教書先生。看去好像是很溫和與安定的事；但從歷史上來考察，每一趟師範教育運動的進展，必有偉大的社會鬥爭爲之前導。大話怕算賬，現在讓我們試來算算賬：

師範教育，四百年以前還沒有，它是近四百年來在民衆爭自由爭民主的鬥爭中產出來的。

現在從一五一七年起歐洲宗教革命講起。耶穌教自五二九年起統治歐洲，至宗教革命，爲時一千年。這一時期是歐洲最腐化最黑暗最反動的時期。羅馬教皇統治下的教會這幫人是貪官污吏，荒淫無恥，無所不爲的。本來基督教剛進羅馬的時候是以革命的姿態出現，但取得統治權以後就如地壞透了。十六世紀開始宗教革命爆發，然而這不是反宗教，也不是反耶穌，乃是反羅馬教會。新教領袖馬丁路德，他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他要打倒教會，打倒教會憑耶穌來的統治，打倒教會所說的我即耶穌、我說的話即耶穌的

話那種武斷。到這時候，民衆要直接聽耶穌的話，這就要講聖經。然而聖經是古文的，讀不懂，因之國語運動遂應時而起。用國語喚起民衆的師範教育小學教育等等也就從此開始。當時最重要的文獻即爲路德的「告德國各市長及市參事會書」(一五三四年)和「告家長爲兒童就學義務書」(一五三〇年)。這一方面是義務教育、國民教育最早的文獻。一方面也是師範教育文獻的最早者。現就後者來說說。

我們曉得，歐洲的教書先生不像中國的教書先生那樣的尊貴，是工人、泥水匠、老兵及補靴匠這些人幹的，不過教教小孩祈禱，唱唱讚美歌罷了。向來爲人所瞧不起。路德一反這種傳統，倡言教書是神聖而重要的事業：教師教育小孩是本着耶穌的意旨，其事業之神聖正像上帝造人一樣，並非一般庸人所想像她那樣下賤，非有高深的學問修養不可。這是破天荒頭一遭提起教育的重要與教師的修養的。爲甚麼會這樣呢？這乃是新教在革舊教的命使然。宗教戰爭鬧了二百年，舊教會遇着新教徒就殺，但殺來殺去，殺不光，反而越殺越光起來。於是結果就講和，不打——並非不打，乃是由打武的轉到打文的，在學校在教育上來爭——爭民衆。新教是如此做，舊教教了受訓，也覺不這樣做不行，自知前非，來檢討改良自己了。從這方面來着手鬥爭，培養師資，向民衆宣傳，這就是師範教育的由來。

回頭說舊教教力的師範教育運動。當時最有名的舊教團體是從西班牙法國這邊開始成立的耶蘇會。這是爲挽救舊教的厄運而組織的。創辦者是西班牙人 *Lois de Loyola* (1503-1556)，於一五三四年開始組織，至一五四〇年得到羅馬教皇批准。這會試驗學制，至一五八六年確定成立，一五九九年修訂，其師資訓練特別嚴格而有精神，成爲一種特色。民族國家成立以後，甚至現在很多教育法規即脫胎於此，而且有很多精神還起不上這個。入會者先被察明爲不貪污的，並須宣誓獨身、安貧、節操及絕對服從本會。準備充教師的須受初級教育六年，達十六至十八歲，始算第一步入了會。這同作爲新參者 *Novice*，經過兩年見習生活，以試驗他品性的長處及弱點，許多被發見品性不合而被革除的。見習期滿，無過，得保留。再宣誓願服務教育，入哲學科學學習。這期間是廿一至廿三歲完成課業，得充初級教師。如欲充高級教師，則任初級教師兩三年之後，再經考試入大學神學科。再受訓練四年的得充教師，六年的得充教授。學業完成，最後宣誓，這時期大約廿九至卅二歲。嚴密訓練師資即由這裏開始。一五六五年令各教區辦理師資訓練，以訓練初級教師。當其極盛之時，師資訓練的學校有一〇七所。時至現在耶蘇會勢力雖衰，但仍遍佈全世界。

經過新舊教唱對台戲，彼此比賽以後，十六七世紀即有較進步的師範教育理論問世

• 英教育家 Richard Mulcaster (1571—1611) 於一五八一年發表教育巨著 *Positions*，討論的範圍很廣，其中有兩章說明師範教育，即：第卅五章力說初級教師之重要，第四十一章論師資訓練——小學師資及中學師資之才能及修養。他計劃七個學院，訓練各種專業人員——語文、數學、哲學、師範、醫生、律師及牧師，師範學院之學科包含四類——政治學科、數學、專業陶冶、學科研究及教學法。今之師範學院即由此脫胎而出。然而這祇是相當進步的理論，英國在實際上還沒有見諸實行。

世界上首次成立正式師資訓練所，為一般教育史所承認的是在一六七二年法國里昂之神父 *Joseph de Beze* 創辦的一個地方師資訓練所。而第一個師範學校是在法國的 *Beze* (法國北部)，為法舊教領袖沙烈 (*Abbe de Salles*) 於一六八五年設立的。沙烈於一六八四年設基督教兄弟會，集不甘腐化的基督教兄弟在一起，共同生活，推廣教育事業，為工人階級設免費小學，辦理平民教育，用現代語教宗教。他盡力於小學教育好比耶穌會盡力於中學教育。沙烈的一「學校管理」(出版於一七二〇年)的辦法，好比耶穌會的學制，這是法國免費小學國語教育之始。小學之上，更有半日制之補習教育，以便使工人商人學習。他們需要良好訓練的師資，故先在 *Beze*，後再在巴黎開辦極具規模的師範學校。且認為師範生實習是很重要的，師範生受足教育之後，須在附校受富有經

驗的教師指導實習教學。

一六九五年德國教育家傅蘭克Hermann Franke (1658—1727)在 Halle 實驗其教育理想，組織 Instructioles，實施平民教育。一六九七年附設教育養成所以訓練理想的師資。這是德國頭一個師資訓練機關。

如上就是宗教革命以來，爲着爭取信仰自由讀書自由而起的師範教育運動。直至十七世紀末期，這期間可說是師範教育的開創期，而宗教革命爲其背景。

第二時期即將上一時期所醞釀的師範教育思想與理論去作全國性的推行。這就是十八世紀的事。普魯士在十七世紀還是個小部落，真正成爲國家是在十八世紀開始，弗勒特烈威廉一世卽爲建國而利用新教育——師範教育爲武器，厲行普及教育。一七三六年頒佈普通學校令——小學法令，其中規定教員之修養，資格俸給及待遇。德有名的傅蘭克早在一六九五年於 Halle 地方推行他的教育，以純潔信仰爲中心，注重工作教育，學生是在實驗室在農場工場做工的，爲着需要新教員，於是附設師資養成所。幫他忙的是他的兩個弟子 Semler 及 Hocker 皆爲新教育專家。到這時候兩氏被弗勒特烈大王聘爲教育設計家，來推行普魯士的新教育，建設師資訓練。一七三二年 Semler 於 Silesia 州之 貨兒教養院 附設教師養成所。弗勒特烈大王力求改良師資，乃補助這養成所，後至

一八一二年遂首先成爲州立師範學校，小學師資訓練機關成爲公立的這是頭一次。一七八四年 *Hercy* 在柏林設經濟實科學校，這是德國第二派中學（實科）的來源——在這學校里亦附設教師養成所。弗勒特烈大王認柏林師範學校爲全國的模範並爲全境小學師資之來源，盡力予以補助，其後又陸續分設師範學校於各處，推行至於全國，十八世紀校數有十多個，學生達三萬人。

再呢，說到現代——自十九世紀開始，這即師範教育的成熟時期。而現在的師範教育也不過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到現在，所爭的是民主。民主革命就是這一時期的背景，師範教育是成熟於民主革命時代！

法國革命政府於國民會議及教育委員會中，一面提倡普及教育，一面計劃師資訓練。一七九二年 *Condorcet* 之教育法案，於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之外，便是教師養成所，預計全國須設百餘所。這是革命政府的教育方案。可是政府內部門爭進行得極劇烈，至一七九五年革命即趨於下坡，致這方案未得推行。一七九四年臨時國會曾下令設巴黎師範學校，至一八〇八年拿破崙定爲巴黎高師。

德國被拿破崙擊潰之後，力求民族復興。教育家 *Herbart* 在法軍佔領柏林之時，作歷史上著名的演講，大呼教育救國，展開民族復興運動。這時適有舉世共仰的教育聖人表

斯培羅齊在瑞士轟轟烈烈的空前地做其革命的教育工作。裴翁爲小學教育之父，亦爲師範教育之父，他青年時爲瑞士革命黨員，曾被捕下獄。在監禁中得讀盧梭的「愛彌兒」，深受感動。後革命爆發，出獄，搜羅戰地孤兒來教養。不久革命成功，很多革命朋友邀他做官去，他說他還是做他的教養貧兒的工作。他傾家蕩產連太太的妝奩也賣掉了，在他的家鄉 *Yverdon* 辦教育，另一方面也兼辦師資訓練。這樣固得到瑞士政府的幫助。就連俄皇及法皇拿破崙也要去看看他。歐洲各地皆遣少壯教育家往 *Yverdon* 留學，德國尤爲積極 *Oelien* 從瑞士學成回德後，創辦新式師範學校於 *Konigsberg* 及 *Brunswick*。在教育方面上，以過去義務教育宗教性很深，故純爲注入式；受裴翁教育影響後，則轉重被發智慧心靈的原則。心理的教育方法之在這裏開其端。德國的師範生從此不論在質或量上均得有長足進步。至一八四〇年統計普魯士有師範學校四十五間，國民學校三萬校。後普魯士攻陷巴黎，很多人說是小校教師攻陷的；然而他們並非持刀槍去攻陷，乃是他們的教育工作喚起了普魯士民族的復興所致。

十九世紀於普魯士師範教育之改良大著助勞的 *Disselweck*，他一八二〇年任 *Mos* 師範學校校長，一八三二年特任柏林師範學校校長，成爲全國之領導。其主張三點：一、提高師範生學力——從初等教育階段提高到與普通中學生相等；二、涵養教育興趣與技

備，設附小；三、在職小學教師時時補充學力，出席高等教育機關之講習會。

當時德國師範學校有預備校，作為師範生的先修班，同時又當作附小，讓師範生實習。這樣一種兩棲性的東西，*Dieserker* 加以反對。一八七二年師範學校令制定之後，預備校與師範學校之關係，成為重要問題。一九〇一年法令改訂。始規定預備校課程三年，師範課程三年共六年。

法國，一八〇八年計劃每大學區設師範學校一所或數所。一八一一年史拉斯堡大學區始成立師範學校一校。一八三三年王政復古 *Quinze* 長教育時期，令每州設男子師範學校一所，至一八三七年全國有七十四校。一八七九年——第三共和——令各州於四年之內，必須籌設男女師範各一校。以後法國有一七九校，其中女校八十八。說來法國革命最早，但因為內部鬧亂子以至教育不發達。然而，法國的師範生的訓練是很嚴格的，須經三次及試：入高小有師範預備班一——三年——畢業完成，由國家舉行考試，及格得初級畢業之文憑；再入師範學校至二年級，結束後考試及格得高級畢業文憑；再入三年級受專業訓練，期滿考試及格，即取得師範學校畢業資格。法國原來耶蘇會勢力很大，這種嚴格考試的風氣即其影響使然。

英國，產業進步為世界之冠，但文化教育上却呈現得相當落後；在一千八百年以前

還沒有師資訓練。十九世紀開始以後，國家才開始過問教育，這是因勞工運動來的。因為當時英國產業革命成功了，社會貧富更爲懸殊，工人大衆過着非人的生活，痛苦不堪，因而奮起爲爭生活而鬥爭，流血。結果造成有名的憲章運動。慈善家爲勞工說說話，於是在衛生各方面補助補助。教育也一積事推廣。就需要大批的教師，由是三三和Lancaster兩人試行導生制 Non-Total System。選年紀比較大的小孩來幫助教師施教。當時一個教師教二三百個學生，導生制即爲價廉物美的補充辦法。這個用現在中國話來說就是小先生制，然而在英國祇是一種敷衍勞工的省錢辦法。後來Rowe、Wells、Went，則見習生制 Pupil teacher System 選拔十三四歲的教生。一校長訓練，五年之後受考試合格即充教師；此制至一八四二年之後，漸與導生制融合。見習生補充學力的學校稱爲中心學校，辦理得很不好，內容也很貧乏，引起各方面議論紛紛。一九〇三年法令凡見習生至十六歲時須曾受中學教育。一九〇五年，教育部批准預備師範生教生制 Preparand studentteacher system。這是一個大轉機。小學師資之候補者不選於小學生而選於中學生。預備師範中一面受津貼，一面在中學受教育，至十六七歲受考試及格，派往小學實習一年，始得進師範學校。英國師範學校稱爲訓練院 Training College，始於一八四〇年。大抵是教會設立。一八九〇年政府始認爲師範學院。一九〇二年，經國會贊成，政府

始允許各地方設立師範學院，倫敦首先成立。美國師範學院有三種：大學附設，地方公立和私立的，修業年限二年三年或四年。反觀英國十九世紀以來在師範教育上的進步也是由勞工運動逼出來打出來的。

再說到美國，美在十九世紀初期，公立學校運動才開始。教育家 FORTLIND 一七五六年於 Philadelphia 所辦之中學（學院雖也曾辦師資訓練，但那時附設的還不是專設的）。Samuel Hall 八二二年在 Concord 之私立師範學校是美國的頭一個，繼而 Canby 一八二七年在麻省之 Lancaster 設立第二個師範學校。一般的小學師資訓練大抵還是由中學（學院）兼辦。至南北戰爭成功，民主政治得到新的解釋，美公立教育運動遂蓬勃而起，這運動進至於高潮，師範教育也就推進一步：一八三九年第一個省立師範辦於 T. B. P. 州，修業由一年展至三年，並附模範附小，當時頗遭學院之忌。一八六〇年全國有省立師範十二校，一八六五年有二十校，是時美國公立學校運動最為緊張，裴翁的教育思想也由大西洋的那一邊傳至美國。一八六一年 Seiden 任有名於世的 Osage 師範學校校長，首先聘英國女教育家 Mission 又聘裴翁弟子 Hornhard Klus 來講究教育，宣傳於全國，名爲 Osage Movement。由上面看來可知美國南北戰爭帶來了美國的教育運動，這也還是打出來的。

一大堆的流水帳，我們考察了以後可得到如下的結論，即：宗教革命以後，民衆爭取自由平等，爭取生活解放，教育家也爭取優良的訓練，這樣，師範教育便爲近世新教育之產物；每當爭得劇烈的時候，師範教育就獲得一步的進展，也就推進了新教育！新教育一方面是平民化，一方面是學術化。平民化的教育必通用現代國語，平民化的教育需要大量有學術的師資。所以現代國語運動與小學教育，師範教育運動是一件事，而學術化是隨着平民化而來的。同時我們曉得，教育學術之研究以教育民主爲必要條件。十九世紀以來之民主未能澈底，從而師範教育仍屬於初等教育系統——不是學習階段上的「初等」，乃是階級地位的「初等」，即是平民階級的；民主是半真半假的，民衆也還是低一級，所以爲民衆設立的學校也還是低一等，這是很自然的事！一九一九年德國威瑪憲法曾經規定：「教師之養成應按高等教育一般實行之原則，全國有統一的制度」因而德國師資訓練機關改稱教育學院 *Pädagogische Akademie* 或教育大學 *Pädagogische Institute*，在九年中學之上。這可算是德國人所做的破天荒事，也是第一次歐戰結束德國革命以後，社會民主黨當政的產物。他們政治的主張雖不免傾向妥協，而教育主張卻是進步的。但不久革命失敗，希特勒執政。教育學院雖還存在，也沒有什麼發展了！

要師範教育改造，就須要改造全世界全人類社會！人類社會差一點平等，師範教育

也還是差一點進步！人類的平等是一般平民大眾爭來的，師範教育也是平民大眾爭自由平等之大潮流中爲教育家所爭出來的。上面一連串的歷史事實，確確實實地證明了：民衆解放與師範教育都是在酷烈的鬥爭中爭來而非等待所能得到的！小學教師看重尊重自己，也與社會有密切關聯；社會在要求自由平等，則教師必以民衆之朋友的姿態出而工作！在落後的社會裏，小學教師往往陷爲民衆的敵人或騙子，這到底是痛心的事！我們今日的小學教師，一方面是要配合人民大眾去爭取社會的民主解放，一方面也要決心立志爲人民大眾永久的朋友！這樣地幹下去，則社會前途越爲光明，師範教育前途更是無量！

丁 中學教育

四十年來中學教育之彷徨

一 更張之頻仍

民族解放的抗戰快滿三年，勝利的講途由隱約而逐步鮮明底時候，屈指一算，辛丑和約——帝國主義者羣給我們的枷鎖——已經到了第四十年，而我們的中學教育就在這年欽定學堂章程頒布而開始實施的。我們的中學教育誠然可以說是民族解放底一種工具，可是這副工具經我們修改了好多次，直到現在還不見得合式似的。試把四十年來的變遷簡單地列舉如左：

一九〇一

欽定學堂章程，中學堂四年畢業，連接於六年小學之上。

一九〇三

奏定學堂章程，中學五年畢業，連接於九年小學之上。

一九一一

分中學為文實兩科，且規定中學畢業須由省提學司復試，是業會考之權輿。

一九二二（民元）中學四年畢業，連接於七年小學之上，課程廢除經學而加入手工、家事、園藝、縫紉。

一九一七 中學後兩年分爲第一部與第二部，二部減少普通學科之授業時間而加習農業或工商業。

一九二二 採用六三三制，兼用四二制及二四制，初中得設各種職業科，高中分普通、農、工、商、師範、家事等科，課程用選科制。

一九二八 大學院公布中學條例，刪去二四制。

一九二九 教育部公布普通中學暫行課程，限制選科，初中第二年起得不必修英語，高中課程不分文理，只留選科十八學分。

一九三一 部令限制普通中學之設立，提倡職業學校，在普通中學設職業科或職業科目。

一九三二 公布中學法，限定六三三制，中學與職業學校分軌。

一九三三 高初中教學科目及其時數均畫一固定，並實行畢業會考。

一九三六 修正初高中課程，高中自第二學年起算學分爲甲乙兩組，至第三學年又得視地方情形，增設簡易職業科目以替代甲乙兩組之增習。

科目。

一九三七

試辦五年制中學，以準備升學爲目的。

一九三九

試辦六年制中學，又改訂高初中課程，初中第三學年英語又得改爲選修。六年一貫的中學專準備升學，而普通高初中文是兩用的。

四十年之間，經十多次改革，不能說不多。尤其是近二十年來得更密。這時間恰當我負責中學教育工作時期，真覺得應接不暇。然而細察這十多次改革，不難發見循環復之象。這固然一面表示了我們的教育界人士對中學教育之注意，而他一面也顯出工作進行之彷徨。可憐的中學教育！公胡爲乎獨彷徨！四十而不惑，難道真要等到五十纔知非麼？試看看迷人的歧途有多少！

二 歧途之四顧

第一、文化教育與職業教育之對立：這個問題在歐洲先進國鬧了一百年，原來是階級社會底反映。可是在資本產業發達的國家，職業教育還容易推行，只是它和文化教育底對立不易泯除罷了。我們生產落後的中國，士農工商向來貴賤懸殊，而讀書原是士子的勾當，一旦披襲現代的中學教育，當然這種對立即刻尖銳地顯現。可是我們的教育家

偏就無視，至少也輕視這社會條件。從欽定學堂章程起，就想用……欲就實業者俾卒業後可入……」意在使入此學者通曉四民皆應必知之要端，仕進者有進學之階梯，改業者有謀生之智能。這一類折衷，含糊，面面俱到，冠冕堂皇的條文來抹煞彌縫這種對立。民國以來，每次改革方案都不外這一套手法，只是民國的辭令異乎前情的辭令罷了。然而客觀的社會條件，不管你辭令如何巧妙壓登，法令如何嚴肅堂皇，它還是儼然存在。四十年的事實證明了，職業教育固難推進，也不是什麼文化教育，乃是地道的科舉教育，還是「仕進者有進學之階梯」那句是老實話。

第二，升學與非升學之對立：我們的學制，開始就把中學與職業學校分離，而且在法令上，形式上，是平等看待的，滿以為這樣便可解決了。誰知道在中學裏又遇着升學與非升學之對立。在清末那幾年間，中學畢業生還很少，人數大略填補了停止科舉期間的舉貢名額。換句話說，當時一批青年士子不出身於貢舉而出身於中學，所以不覺其多。而且當時高等學堂，大學堂招生正愁招不着合格人員，所以那時中學畢業生不論在「仕進進學的階梯」也能，在士林鄉黨也能，都恢恢然游刃有餘地。民元以後，中學生人數日增，而升學的比率日小，就發生嚴重問題：不升學的往那裏去？雖然在法令上有「通曉四民皆應必知之要端」；「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國民」；「適應社會生活」

等等冠冕堂皇的辭句，而社會的客觀的事實毫不可受影響。記得我在中學讀書時，問數學先生代數有甚麼用，他毫不客氣地答我那是考「拔貢」用的。這確是中國固有的社會生活，讀書是為求上進；若只是做「民」，不管是四民也罷，國民也罷，都不必讀書，更無須入中學。可是我們的中學生越來越多，就不「適應」這「社會生活」了。四十年來，中學與職業學校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始終避不了這歧途。反復地在普通中學裏酌設或增設職業科目，或簡易職業科目，可是職業學校地道的畢業生還難找出路，而選習點兒職業科目的中學生又往那裏去！

第三，文實分科問題：普通中學無論怎樣裁減，也少不到剛夠升學的學生數，那一條歧途既然好似無法避免。於是我們的教育家只好索性不管它，而老實來做預備升學的工作。這倒「適應」了「社會生活」，中國教育向來是培養能跳龍門的俊秀，誰有閒心管那班羸弱的落第者的死活！可是偏又逢着文實分科這可憐問題。這問題發生於一九一一年直到現在甲乙分組還儼然存在。民元以後的教育家熟悉了歐美教育思潮，「中學教育自身應有目的」這句口號必要高唱的；普通陶冶，文化陶冶底價值也要承認的；所以表面上不能把中學變成大學預科——這舊制度未便聽其復活。以前由於師資不良，設備不足，文科高中生未必見得國文通順而只是數理不懂，理科高中生也不見得數理優秀而

只是國文不通，這種事實更加強了高中課程畫一化底理由。想起中學生算學理化程度低劣時，便覺得數理應該注重；想起他們文理欠通，參攷書看不懂時，又覺得國文英文難於割愛。他方面又有人替中學生請命，而學生們負擔過重成績也更難合格，於是乎避名用實地分成甲乙兩組。可是高中分組之後，却又在大學一年級增加一套公共必修的基本科目——國文、英文、數學、中國產的文化科目，以資彌補。這樣一來，大教授們要軒尊降貴來替中學教員做修整工作了。這一幕彷徨喜劇雖只限於升學的「俊秀」，而實在是中國教育固有的「生命線」。然而就在這生命線上，我們的教育家也夠彷徨了。

這樣簡單地敘述，也可見我們的中學教育在四十年間到處碰壁，越幹越迷糊，簡直不曉得爲什麼幹，該怎樣幹了。

三 異軍突起而兵氣未揚之廣西國民中學

一九一八—以後，廣西省當局銳志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在教育方面，「爲便於繼續國民基礎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準及準備基層建設之幹部人員適應本省四大建設之需要，特設國民中學。」這一著在全國中學教育開一新紀元。確值得喝采。廣西全省底建設，以教養衛三位一體的鄉村爲基層組織而力求實現其遍傳全國的三自——自治，自衛，自給——政策。全省共有二萬餘村街，此項幹部工作人員至少需要五六萬人。指定國民

中學負責訓練此項幹部，目的既鮮明，而意義又深遠。確可以給全國中學教育指出一條活路。二十六年冬季，我避地到梧州，放下行李，便趕緊去參觀國民中學，可是就有點教人失望。後來見聞漸多，才曉得國民中學運動已經有低落底傾向。由於教員待遇，由於師資素質，由於傳統習慣，國民中學底前期兩年漸要模仿初中，而後期兩年漸要模仿簡師；這有點像剪了髮又熨髮，放了脚又穿高跟鞋，殊屬可惜。而且鄉鎮村街底工作人員又竟不取才於國民中學而另有幹訓學校。國民中學更覺得曲高和寡而不得不打算反串下里巴人了。然而基本原因大約還在鄉村組織底政治經濟方面底建設未夠基礎。從而鄉村未成民主的有機的組織，工作未能發揚踴躍。可是國民中學準會有遠大的前途，去年七月，我道過桂林，知道他們全省中學校長會議，已把發展國民中學作為中心議案。這回桂南又展開了英勇的抗戰，多受這一番刺激，我料廣西建設底前途無限，國民中學底使命當然很遠大的！

四 血路能否打開？

我們的中國教育陷入迷魂陣四十年，畢竟能不能殺出一路血路呢？能！只要別在革命之前戰慄！我們的中學教育原是被帝國主義者的鐵錘逼出來的，當然要重擊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可是踹入陣門之後，碰着了酒色財氣，給迷住了，竟如癡如醉，忘記在斷

殺。這樣狀態，得裏一個黨心雷才能覺醒。幸虧七七事變以來，敵人連珠地給我們黨心雷，現在該覺醒了，是在斷殺，抗戰建國！在這鐵定的國是之下，中學底使命毫無疑義是培養為民族解放而戰鬥的青年幹部。除此之外，千萬別再舒懷舊之舊念。發思古之幽情！國民中學底原定目的大可採用，但必須以不折不扣，不歪不曲，努力實踐三民主義為條件。好比女子剪髮放腳必須以勞動操作為條件。若髮髻穿高跟鞋而充下陳，便不如村婦包頭曳小足而挑飯送田夫。剪髮放腳誠是也，苟不操作則將焉用之！中國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況，中學生很難達到一百萬名，全國六十萬中學生若以之充洋博士高等華人就會吃貴糧食，若以之充地方建設幹部則尙恐不足。只要堅持着這原則，其餘學制問題，課程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至於生產技術人員底訓練，更須與生產建設緊密配合，自不消多說。生產教育與普通教育之對立，到民生主義建設成功時，自然會消除，而現在還不能不從對立出發。現在領導民衆，組織地方，一般的領導人員當然較技術人員用途大得多。再說到大人先生們認為生命線的升學問題呢，只要肯剷除身分資格那一串舊觀念，便也不難解決。民族復興確需要學術專家，而不需要學士碩士博士。在科舉舊病未除的今日，我敢大膽說一句：學位者學問之敵也；學位一日不廢，學問一日不興！大學和專門學校若老實成了學術供應場所，而非學位市場，那末，雖要學術的便可來學。如果

入學的缺少那一種求學工具，便應設法給他補足。在這樣意味，我贊成在大學附設無定型的預科，或先修班，給青年們個別地補習其所缺的工具，那便不是往日的預科了。求學和吃飯是同類的事。未曾聽見有人往飯館冒充吃飯而求掌櫃假造賬單的。然而假如國家規定有人能每餐吃高等海味席一桌，滿了一年以上，呈驗賬單屬實者，即獎給光祿寺博士學位，那一定會有人偽造吃飯賬了。現在大學慢藏着學位以誘青年，而又故意高其宮牆，嚴其門禁；怎知道：門外白袍立如鶴，一枝紅杏出牆來！

一九四〇，三，十七，於東陵。

怎樣做中學校長

那一位斲輪老手底輪扁對齊桓公說：「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這一段話固然反映出手工業時代底傳統習慣——密訣不傳，而亦道破了一般的教學原理——經驗只可憑實踐工作會得，而不盡可以言語傳授。大抵一個能拿得穩校長來做底人，必有他一套看家本領，——尤其是在這年頭——只是它不可說而他也

不肯說罷了。我自然是沒有看家本領的，可是也混了二十多年，要說沒有也一定沒人相信，倒不如乾脆說那是不可說而又說不得的。現在寫這一篇自然是可說而又說得的，這並非不忠實地把一塊假金磚來騙人，實在我所有的止此而已。讀者又何妨姑妄聽之！

一 現階段中學教育底使命

濟顛和尚突然地質問臨安一位大醫師：「剛蒸出屨的饅頭治甚麼病？」那位名醫簡直瞠目結舌不知所答，因為這味藥是本草綱目所沒有的。回頭被濟公一語道破：「剛蒸出屨的饅頭治肚餓。」這却是平淡無奇而人人知道的事。現在對中學校長問「現階段中學教育底使命是甚麼」也許就和「饅頭治甚麼病」一樣的無關宏旨底問題，可惜我却不懂得那些有關宏旨底「校長須知」，只好就這「無關宏旨」的來嚼嚼舌頭。所以不言做大學校長而又不言做小學校長者，正以現階段中學教育應負特殊的使命也。這不只是開筆擒題底作文法，實在要這問題解決之後，纔能知道中學教育工作底最高原則在那裏。中學教育是什麼？從現代底中學教育底理論，頗不容易找出圓滿確切的解答，然而大別可分為兩面：從中學本身說，中學教育是緊接小學教育之上，正對着青春時期，給以更高度的普通教育。從社會方面說，中學教育是把中庸社會底兒女，給以教育，使他們能負起社會中堅底責任。

現在再依據這兩層概括地說一說：從第一層說，中學生在中國底法定年齡是十三歲至十八歲——世界各國也大抵如此。——實際上是十五至二十歲的居多數。人生最寶貴的時期差不多給中學時期佔去了大半。青春時期的特點是甚麼？據現代心理學的綜合的研究，最顯著的第一點就是自我意識的抬頭。在小學時期，萬事都聽父母和先生安排，做甚麼事大抵出於無心，或半意識的。可是到了青年期，就有了自我意識，認識自己是一個人，自己有主張有欲望，有要求，很盼望人家把自己當作有獨立人格的看待。反過來說，他有脾氣，他會玩花樣，會跟父母先生鬧意見。第二點就是自我與環境對立。他們對環境要試探它，批判它，甚至於反對它。第三點是由第一第二兩點來的，一方面由於自我意識底發展，一方面由於對社會文化試探的趣味長成，漸漸要在社會文化底各方面，找着自己底立腳點爲自己發展底根據地。簡單地說，青年期正是整個性格發育成長得最旺盛的時候，而中學教育就是對正這時期底教育。

從第二層說，我們也未嘗不可以高唱人人都應有受中等教育的權利，中等教育機會要均等種種口號，然而這離開歷史的實在太遠了。若從歷史的實況看，便可曉得中學教育雖可美其名曰「社會中堅底教育」而實際自古迄今都是統治階級底教育。歐洲中世紀統治階級是封建領主和教會領袖，因而中學教育是他們底教育。十七八世紀以後，資產

階級代興，因而十九世紀以來，所謂中學教育現代化，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中學教育便不能不是他們的。最近二三十年來，歐洲底中學教育推廣運動也就因為勞工運動底勢力漸漸不可無視，所以中學教育不能不給第三階級分沾多少。美國底中學教育比較歐洲推廣得多，就因為他們開始便是工商立國，沒有好大的封建殘餘勢力，所以中學教育當然是工商業者所共有。蘇聯底教育推廣，這十多年來如此迅速，就因為他們底統治階層是勞工，所以跟着兩三次五年計劃底經濟建設而擴張。一、中學教育是統治階層底教育。二、這個命題是事實底敘述，這裏面並沒有包涵什麼褒貶底意思，只看他們怎樣運用罷了。也許有人質問道：現在美國中學生總數快要等於全國人口二十分之一。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預定十年學校底學生總數要達到四千萬，等於全人口五分之一。若一旦中學教育全普及了，還能說是統治階層底教育麼？對於這個質問底解答是：到了那種狀態，便是民權發達底極軌，全國人人都是統治者而同時也是被統治者，因而中學教育必然地普及了。

中國現在全國底中等學校學生不過六十萬人，等於全國人口七百分之一。這六十萬青年男女底家庭都要有相當的財產和地位，換句話說，有相當的財產和地位底中層社會底兒女纔能進中等學校。姑且假定每一個中學生代表一戶，那麼集合全國能送子女入中

學底人家還不能達到六百鄉鎮。照普通人口分布計算，不過一二十縣而已。若把六十萬中學生平均分配到全國各鄉，還不到每堡一人。實際情形如此，我們便不能不承認中學教育是中層社會底教育。也許有人要唱高調說：這樣不平等的現象不能讓它存在，中層社會應該打倒。殊不知中國現在中層社會正在崩潰中，恐怕要不打自倒，爲甚麼？因爲中國整個社會都在帝國底鐵蹄之下，用不着社會內部發生什麼急激的磨擦，而已就在崩潰。他們在經濟上沒法抵抗外力壓迫，一天一天在崩潰下去；人精神上受了半殖民地文化，買辦性文化底誘惑，同化，只提高了他們物質享受底欲望習慣，養成對帝國主義底依存性，而固有的儉約，勤勞，自尊底美德日漸喪失。照這樣情形下去，他們若不變成帝國主義者底扈從，工具，就必不免淪入貧苦之羣。中國社會除掉這少數中產階級之外，絕大多數散漫的貧苦農民，現在要推行一二年底義務教育也還辦未到。他們底文化水準幾乎要等於零，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裏受了長久的大工業洗禮底勞工；他們未曾覺醒，沒有組織，決談未到自動地負起革命大業底責任。在這樣寶况之下，中國唯一的活路，只是把正在崩潰中底中層階級救回來做大多數民衆底領導，中堅，協力解決帝國主義底桎梏，這便是三民主義底革命路線。那末，中學教育底使命是把中層社會底青年，正當他們人格成長最旺盛底時候，給以更高度的教育，使他們負得起復興民族和改造文化

底責任，簡單地說，養成三民主義底戰士是現階段中學教育底使命。我以為今日中學校長應該十分清楚地體認這一點奉為自己工作底最高原則。

二 工作實踐與學問修養

通行的教育理論書籍，每提到校長教師問題，便說一大篇教育家應當如何修養。中學校長沒有修養，自然不行——我曾提出一個至低限度的請求：校長須用讀書人——不過修養和工作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互為表裏的。修養底目的不是要做名士，充學究，乃是為工作而修養。正如陸象山說的「道外無事，事外無道。」事是人做出來的，若離了人，雖「事」底修養便談不到什麼意義。做校長底目的不是升官發財，也不是統治學校逞威風，而是教育青年，改造社會。這種工作不能空口說白話，而在賴學識去指導，用能力去實踐，這就非有修養不可。我敢向校長先生提供兩句話：「治事如治學，治學如治事。」原來治事和治學，對象只是一個，都是寰宇底現象。只是用處置底態度，行底態度去應付它，便是事。而用認識底態度去應付它，便是學。要處理它，必須認識它，所以說「知為行始」。處理得妥當，才認識得更清楚，所以說「行為知成」。進步的治學方法，不能只靠讀書，也不能只憑冥想，而必須蒐集，分類，觀察，實驗，因此「知」也就是行。若不能把書本翻譯為環境底事實，或不能於書本之外找研究材料，就不問

他所治的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要等於八股文、試帖詩。所以治學須能如治事，纔可叫做「通」。否則不通，是書獃子。治事要得閱歷，求長進，透入現象底奧底，發見它底意義；若不應用學問，不運用心思，便是魯莽。敷衍，不論經歷多少，總算等於水過鴨背，涓滴不留。用治學底態度去治事，事就好比學問底資料，是一部活書。我們一面研究，一面處理，不問成功與否，都可得一番趣味，增長一步見識。而且須遇着相當複雜，相當困難，才饒有興致。要在做事底過程中得到興趣，抵償勞碌，消滅煩惱，而不一定依靠成功底報酬，就惟有治事如治學。往往有的沒涵養的先生們遇事還未觀察清楚，便逞他虛驕的意氣，憑偶然底聯想，揣測是如何，如何，應這樣那樣，不知道他自己底行動實在並不是反應事實，而只是反應他自己腦子裏底幻像罷了。這樣做事，簡直等於酒醉，做夢，試想一個校長整天在醉鄉，夢裏，那學校還要得麼？

治事當然要理想，而往往有人強調自己底理想，就因為他要規避現實，無力分析事實，不能克服事實底難點，偏偏抬出理想來做烟幕。打算藉此而輕視事實，掩蔽事實，以掩護自己之無能。理想不過是在某種事實情景之下，可能進一步的妥善，若不依據事實，只是自欺欺人的空想罷了。遇着十分困難底時候，心中最容易浮起所謂理想，我們立刻須曉得這是一種魔障，它要誘惑我們躲入幻境，逃避現實！埋沒於事實裏面而看不

見理想，迷失了價值方向，固然不能治事。可是若高談理想，不顧事實，又好比要離開水面而凌空游泳。校長律身要謹嚴，宅心要公正，這是起碼底條件。然而若把道德太強調了，也會用自己底誇大的自尊心構成一個躲避現實底避難所。尤其是在今日底中國，一般人欲橫流，操守腐化，於是偶有一二能潔身自好的先生，他便把自己那一點小道行看成高貴到了不得，幻想他有了無限的神祕的感化力，好像真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正氣一到，百邪辟易。這可以叫做「道德的自信狂」。這實在是無力處理現實底變態的表現。您如果遇着一位校長，開口便正心誠意，閉口也齋莊中正，您就可曉得他老先生已經不濟事了。這好比秀才見了鬼，高聲念「乾元亨利貞」，不過是自己壯壯胆子罷了。孟子說得好：「徒善不足以為政」。我們決不能藉口修德化人而遁入空門！

三 中學校長應做的工作

中學校長應做那些工作？要把它列舉是不可能的。為便於研究起見，現在把它分為兩大類：一為對人工作；二為對事工作。對人的工作，又可分為：一、對教職員；二、對學生；三、對社會各界人士。對事的工作，也可分為：一、指導教學；二、領導體育；三、處理事務。

校長的工作不是事事直接經手的，多半是處在領導監督的地位。因而校長所做的事

，一定含有對人底成分，把它分爲對人和對事兩大類，未免有點牽強。以下姑就做事方面，分幾項來說一說：

甲 怎樣指導教員教學？

照現行規程，校長多少也教一點書，不過，直接去教書，總不是校長重要的職務，而事實上重要的職務是指導教員教學。這可分幾點來討論：

1 辨別教員教學之優劣：學校與學生發生摩擦，往往因爲教員問題，所以這第一步非做到不可。尤其是對於新教員更應該注意。這裏有一點困難，就是校長要像一部百科大辭典，甚麼學科的知識，都要精通，做個百科博士是不可能的。然而這裏有內容和方法底分別。關於內容，校長對於中學各學科，不能全都太外行，絕對門外漢。關於方法，校長非有相當把握不可。教員的缺點何在？優點何在？怎樣去鼓勵？怎樣圖補救？都要能辨別清楚，新到校的教員，或者缺乏經驗，或者人地未習，更應當隨時注意，善爲指導，否則一個有學識的教員也容易受誤會而被埋沒了。剛由師範學院畢業出來的教員，校長更須把他當作教生看待，懇摯地輔導他成材。在這一點應分擔一分訓練師資底責任。

2 使同科各教員教學彼此聯絡：除教學時數較少者之外事實上不能一科只有一位教

員。好比國語——一年級一個教員，二年級又一位教員，這樣就需要彼此有聯絡，以免重複衝突，而省掉不必要的精神時間。尤其是社會學科，不比自然學科那樣的界限分明，每級一位教員，若不互相聯絡，至容易犯重複衝突底毛病。可是中國人的習慣，不肯管他人的事。教員們自動聯絡不大容易，須由校長提倡時常開會，使同科教員互相交換意見，以期得教學的聯絡。

3 使異科教員教學互相關照：學科分類本來是抽象的，社會的和自然的現象，實在都是一個整體，不能劃分那塊是史地範圍，那裏是理化境界。不過為研究底便利，不能不分科。但分科之後，各科還是互相有關聯的，學校各學科要能互相關聯，學生們的頭腦能融會貫通，而獲得學習的結果，所以，提倡異科各教員教學互相關照，也是一件要事。

4. 鼓勵教員進修：這對於能力稍遜的教員，固屬必要；而對於能力好的教員也很有益。能力好的教員每每有一種毛病，愈老練愈懶於改進，這是一種惰性。比方教數學，老練的教員每滿不在乎地開口就講，連課本也可不用。其實一切學科都日在進展中，教學法也日新月異，守舊每漸變為落伍，這是很可惜的事。做校長的應以身作則鼓勵教員進修，造成濃厚的學術空氣。

5. 研究教學方法之改良：在教學方法方面，中國有一種壞風氣，學教育的人們研究教學法，而學其他學科的人們便忽視教學法。研究教學法的人們自己甚麼學科也教不好。因而文理科底先生更看不起教學法，所以前幾年國聯中國教育調查團到中國來，對中國的教學法曾這樣地批評：他們的教學法是學美國的，他們只能教他人教他們自己所不能教的東西。教學法底研究須由中學各科教員負起責來做。纔有實效。然而要教員們從事研究，也非校長提倡不可。

6. 提倡新教材之蒐集：這也和第四點一樣，愈是老練的教員，教熟了一套的教材，就老是依老賣老，不肯另找新鮮的。例如生物一科，生物種類，隨處不盡同，而生物學底研究也時時有進步。有新發見。所以生物一科教材非隨時隨地蒐集新材料不可。但多數生物學教員是把從大學所學的那一套來零賣。歷史也是一樣，據我所知道的，歐戰以後的教材很少補入的。一本歷史教科書由寫完而至出版，應添的新材料就不少，如果不重新蒐集，就不能把握時代。這種蒐集底工作，也要校長提倡。

7. 救濟劣等學生：一般教員對於學業或性格不良的學生，每每懷着輕視或討厭的心理，不願理會他們。站在教育立場，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校長應該矯正這缺點。對於劣等生，務必體察他們的個性，診斷他們的原因，予以合理的指導。

乙 校長怎樣領導訓育？

中學訓育工作最需要而最困難。因為青年期的中學生有一個特點，他處處要人幫助，處處要人指導；可是他有了自我意識，又很要人們把他自己看成人。很要人了解他，認識他的人格獨立。然他却又喜歡畫起一道防線，不肯把真像給人看。所以要費大工夫把他了解清楚，才能領導他，這是最困難的事。校長的訓育工作大別可為兩種：一是直接，二是間接。

先說直接的訓育工作

1. 訓話：最普通的訓育辦法就是訓話。紀念週，早會，臨時訓話，個別訓話等都是。彷彿訓話是校長的唯一法寶。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對學生訓話必須有事情，或有問題才行。不論是學校，社會，或國家底事情或問題，總要有一個。而且要能觸類旁通，引申取喻，根據事實發揮，由具體說到抽象，從一般看出特殊，這樣才能收效。拿句老話來說，便是要「言之有物」。否則好像講修身教科書，或聖諭廣訓，那只有令學生生厭。

2. 懲獎：懲獎是校長的特權，也可以說是校長的專門買賣。不過，濫用起來，就會弄得一團糟。所謂懲獎，並不是報復或籠絡底手段，而是改良進步底刺激。任何懲誠，要留有改良的餘地，還要鼓勵改良的勇氣。否則便等於報復，對學生非徒無益，而且有

害。所以對於學生，尤其是女學生，可保留體面便應保留，不可把他們的西皮全撕破。如果不關全校風紀秩序的過失，不必作公開的懲戒，以尊重其人格。至於獎勵，「獎」字在說文裏是將犬，是獎獵犬有功之謂。獎勵學生決不能濫，尤其是物質之獎更要謹慎。獎勵應在精神，不在物質，這是針對着中國民族性底辦法。有利則趨，瞪眼便害怕，而甚至於利令智昏，這是中國士大夫底一大缺點。要改造民族性，在教育上懲獎底施行，要十分審慎，懲不傷其人格，獎不使成獵犬。

3. 處理團體事件：處理團體事件：態度是第一要緊。尤其是二十餘年來，風雲變幻的政治，青年所受的影響很大。遇有不如意的事，他們就會用外交家的態度，向父母先生交涉。所以我們決不能用政治手腕跟青年們鬥法。自然，我們有經驗，有手段，正所謂「老奸巨猾」，鬥法底花樣很多，但這不是教育者應採的態度。我們的態度應該開誠相見，以至誠感召。其次青年初期底中學生在一個大團體中，年齡、思想、經驗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初中生與高中生固然相差得很遠，就是一年級二年級學生也往往趣味，經驗及成熟的程度參差不齊。通常一個大團體底活動，被年長狡黠者少數人所操縱，年輕天真者却莫明其妙，愛讀書的又多半不愛管閒事。要矯正這毛病，應依年齡經驗見識相差不遠的分爲若干團體，使各有其事，各盡其力，各得其所；而竭力鼓勵培植優

良生服務於團體。

4. 處理個人事件：處理個人事件底基本原則，在了解個性，明瞭真相，而因勢利導。否則單憑校規或校長權威來掛制，只是可漸而不可久，而且面服心不服，在教育上沒有效果可言。對學生的行爲，應從生理、心理及社會背景去追尋其遠因近因，分析影響及其行爲的條件，因素，從而明瞭其真相，善爲誘導。這樣事情就容易處理。你要領導誰，必須了解誰！否則自己的兒女也難信服您做父母的。

5. 管制全校環境：管制着全校環境，使學生了解生活規則之意義，而得環境底好影響。這點應爲校長訓育工作底中心。比較任何訓話還要有效。學校環境在在都是對着學生的一種刺激，一種暗示。如果學校環境處處都能給學生一種良好的刺激或暗示，訓育的工作，可說是已解決過半。否則，學校環境處處都可惹起學生不良的感受或反響，就饒您整天訓話，弄得舌敝唇焦，也沒有效用。

上面說的都是校長直接的訓育工作。這回再說到間接的：

1. 慎選訓育人員：往往有人以爲教書教不好的也可做訓育工作，過去的學監就類多如此。記得民國初年，我回到鄉間，聽到這樣的故事：某校學監，不學無術，而好作威福，學生們想了一個對付他的辦法，每逢學監來巡查，大家都拿一本書向他問難。後來

學校就不敢再來了。所以千萬不可以爲教書不好的人也這能當訓育人員，學問是取得學生信仰的一大條件。

2. 各訓育人員須有共同一致的步驟和方法；無論用級主任制或導師制，要各人的方法都完全一致，這是不可能的事。但在相當範圍內的一致是需要的。如果彼此步驟全不一致，方法各異。例如甲級許看這本書，而乙級則取締；乙級可作這活動，而甲級則禁止；這樣必引起學生之不平。有的導師受愛戴，有的導師則被抨擊。訓育的方法互相矛盾，這是大損失。

3. 各訓育人員須時常互相討論；訓育比教學困難。訓育工作雖可分組分級負責，但有時有的問題不是一個人所能思慮周全或單獨解決。必須互相討論，交換意見，才能收分工合作之效。前面說的齊一步驟，尤爲重要。否則彼此不相謀，各自爲政，許多小團體將成爲許多小部落，甚至引起糾紛。所以訓育人員互相討論，校長應爲之倡導。

4. 要先樹信而後樹威；做校長的大都知道樹立威信底重要，這自然不錯。不過，威生於信，不信便無威。無信之威那是假的，暫時的。反之，心地坦白，態度光明，處處得學生信仰，而心悅誠服。自然敬畏的心油然而生。沒經驗的教員多不明此理。

最後，對於訓育工作，再提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心和氣平。要這樣纔能了解學生心

理 辨別事件真相。遇着學生犯規過失，我們難免有火氣，可是自己應馬上救火。在盛怒之下，不可處理事件。必須心和氣平，以避免主觀武斷之弊。呂新吾說得好：『兩家動氣，一對小人』。

內 校長怎樣處理事務？

1. 處事底基本原則 校長處理事務，怎樣算是好？怎樣算是壞？這沒有一定的界限。但，基本的原則——就是事務底處理，須有教育的效果。任何大小事務，都以有否教育的效果為最高的評價標準。例如購買圖書是好的，但買一批宋明板本，它的效果就很少。這就不合處理事務底原則。因為中學底圖書館不該以藏珍本為貴。

2. 守法與從權：處理事務，守法與從權都屬重要。但兩者底調整，做校長的須有把握。第一，對政府法令 絕對要遵守。其次，根據國家法令所定的校規，已經訂定公布，也不能隨便更動。經校務會議通過的議決案，也非遵守不可。就是最普通的辦法細則，經過合法手續確定之後，也不容任意取消。這是一種守法的精神。可是，守法並非盲從。尤其是政府法令 多半是一般的概括的，拘束力不很大，須理解其用意，有疑問則須請示，這樣纔能夠運用不誤。對學校自訂的規程，也應勿忘其用意。這是就守法來說。至於從權 就是原有法規應付不了的當前事實 而參照原有法規，憑其原則精神，權

宜從事，以補原有法規之不足。可不是隨意推翻成法。

3. 會議與獨斷：按理說，個人獨斷不如集思廣益的會議。不過，運用會議，有一個原則。會議並不是校長用以推諉責任，或掩護自己。如果那樣，什麼都推到會議，會議又隨便通過，最後負責的還是校長。會議底要訣，事前必須有一番準備，找出問題，蒐集材料。根據事實，加以分析比較，開會時提出說明。這樣纔可從多數的意見中，獲得賢明的判斷和結論。這樣領導會議，似乎近於獨斷，但事實與妄行獨裁不同。要這樣負責纔可求得賢明的公斷。

4. 案牘表冊底運用：學校案牘表冊很要完備精細，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案牘表冊之功用，一為便於檢查，一目了然；一為引起注意，促進工作。可是往往有人誤會，以工具為目的，以為整飾好了表冊就算有了成績；彷彿貼了標語，就算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甚至於全校職員鎮日忙造表冊，而實際事務廢弛，真是使他們感到『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5. 領導職員：學校職員讀書較少，修養往往不足。大抵憑專長的技术從公。很容易有兩種缺點：第一，用慣了的一套技術，往往成了機械化，不容易改良求進步，有時且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校長須注意鼓勵其求改進。其次，有一種習慣以為在學校做

小職員，無能力教書，便看低自己身份，言行不檢，而被教員鄙棄，學生輕視。校長應指導他們進修，鼓勵他們自尊自重，勿自暴自棄。

總括以上所說都是校長怎樣做事，而對人也含在其中。至於對人方面，應付社會各界人士，也關係重大，再簡單地提幾點：

1. 對主管機關：應注意兩點：第一，奉命守法，雖然必要，但對法令或命令有疑問，就不必客氣，須隨時請示。其次，受主管機關委任負全校之責，辦的不只是例行公事，同時須以專業者的地位，隨時向主管機關貢獻意見。

2. 對學生家長：我們對學生家長必須改換掉從前西賓對東家底態度，東家是一家之主，他有權支配西賓——塾師——底工作。而我們的東家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張家李家把他們家裏的少爺小姐委託我們教導。所以校長可代表國家為主。學生是國家委託我們教導的公民。家長無權指揮校長底教育工作。倘若家庭環境不良可給學生以不良影響，我們還該設法矯正。更不可諂媚富貴家長而欺負寒門。

3. 對地方人士：我們辦教育，不是抱出世的態度去修道做和尚，也不是充紳士用威權去包攬地方事；而用教育者的地位，在可能範圍內領導社會，想賢明的方法，謀地方底改進。對地方人士自然開誠相見，領導羣倫，通力合作；但不阿諛遷就，趨權附勢。

因為我們的責任，是改造文化，復興民族，不能不認真工作。

寫了一大篇，末了，鄭重聲明一句：這都是一個饅頭治肚餓底理論，和「看家木頭」決無關。

一九四一，十一，十七，於東陵。

讀康德耳論中學教育普及之糾紛

康得耳 I. I. Kandel 於一九三八年發表一冊論文及演講集，標題是：教育底爭論 *Conflicting Theories of Education* 其中有一篇論中學教育底普及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把最近半世紀以來，歐美中學教育底推廣，因而引起議論和事實底糾紛，分析得頗清楚。原來美國學者對於中學教育底認識，是比歐洲學者較勝一籌，因為傳統底勢力在美國沒有像歐洲那麼強大，而社會又較高度地民主化。學者們底思想言論比較少所顧忌，所以容易接近真理。近來我們中國關於中學教育正在議論紛紛，康得耳這篇文章頗值得參攷。我現在要把它全篇撮要介紹出來，然後加以評論。

中學教育原來是富貴人家底教育，在歐美有一個好聽的名稱，叫做選拔教育 *select*

ive Education 一向都沒有什麼問題。橫豎是王孫公子少東們底教育罷了。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中學教育要推廣到中產以下人家，便發生問題了。問題是供給怎樣的育才適合於大多數青年學生。康得耳說，中學教育是老牌的，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臘，它的本質是選拔的，保持着傳統的所謂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在十九世紀各國中學是有特權的——如畢業生得升大學考文官等。可是十九世紀各國又一面厲行普及小學教育，最初只盡力使一般人民識字，據說識字可以提高公民資格和道德。而小學課程漸漸發展，於讀書計算之外，加入許多新學科，因而形成了高等小學，高級小學，中心學校，中間學校等。然而初等教育和中學教育還是不相聯繫的，其結果便是雙軌制——一種教育是給庶民的，又一種是給有力納學費的，或者說是優秀的。後來各部門的職業技術也陸續發生了，便形成好多種類的學校，彼此都不相關聯。

第一次歐戰之後，發生一種統一學制運動，在德法兩國都叫做統一學校 Einheitsschule。Boile unifie 在英國是中學教育推廣。這番改制底動機，據康得耳說，是：第一，承認個人底價值，而才能不限於某一階級；從個人和國家底利益說，都要盡量公開教育底機會，使有才者都得享受。第二，承認只憑初等教育不足準備現代生活。工業技術底變化，不只可使人們失業，且可使無訓練的青年不能就業；而且生活變更，勞動時間縮短

，都要求受教育期間加長，還要教育類型有變化。第三，教育被看作改造社會和個人底大投資。第四，受中學教育底人數加多了，傳統的學院式底課程漸漸被人們覺得不盡適應，因為學不好的學生漸多。入學者日多，各人底個性才能差別日大，因而引起人們對於中學教育底性質重新加一番考慮。末了，注意到一個問題——教育底分配——第一次歐戰後一個現象，知識底生產過剩，專門人才擠擁。

中學教育底改革運動，發展成爲以一般初等教育爲基礎，聯結初等教育和以後階段的教育，而按各個人底能力興趣，給以平等的教育機會。這樣的教育理想，康得耳引用 M. Leon Brunschvicg 一段漂亮話來說明：「國家所有兒童，好比在生長的植物，應該用同一方法保障他們底自發的生長，莖幹要得長到一定的高度，不受人爲的障礙，然後分出枝柯，他們底大賦生長能力要得盡其可能長到應有的程度」。

依照這個理想，把學制改組成統一的系統，便發生困難。據康得耳說，這樣一來，小學生到了一定年齡就會離校往中學去，因而妨礙及學校底權限。此外較困難的是用甚麼善法發見學生才能底差別，最困難的是怎樣安排適應的課程給才能各異的學生，而得到父母和公衆贊成。

從來選拔學生入學底方法是只憑考試，而近來已經證明這不可靠。據美國和德法英

各國教育界研究底結果，發見學生才能底方法，最穩當的應包括教師底估量，學校曆年底記錄，和各種測驗考試。換句話說，要學生所受教育各當其才，必須盡量蒐集多多記錄報告。然而縱令報告詳細可信，而適宜的課程也可準備安排，依然還有困難。據康得耳說，這困難是在人們比較喜歡傳統的學院式課程底傾向。在英國，這例子很多，學校原非準備升學的，而漸漸又傾於準備大學入學試底工作了。

這運動只達到一個公認之點，就是說，於初等教育之上，十一二歲以上底兒童，應受連續的教育。此外便未得到一致的意見。有一種傾向，是把初等教育和其以後的教育，中間畫一道界線。前一段是普通的，後一段是適應個人能力差別的。可是一旦考慮及分化底方法，又只是籠統地分為宜於學院式課程和宜於實用課程兩種，或者說，把學生分為學院的和非學院的兩種。據康得耳說，如果連續教育是要培養更開明的公民，便不見得公民底義務有這樣學院的與非學院的差別；而卻又未注意及在教學方法上求適應能力底差別，進度底差別，和教材內容底適應。因此，康得耳以為若把「分化」這名辭按名面解釋是很危險的；人人都應該完成做公民底義務，包括公私兩方面底生活行為，這便顯示了普通教育底期間需要盡量長久。首先應該考量如何因應趣味和才能，供給自由的或文化的教育。不幸而傳統的概念，所謂自由教育，只強調了外國語和其他大學入

學試驗底學科底學習。

康得耳以爲這是因爲人們不認識時勢變了，需要也變了，人們還死抱着一個舊觀念，而要用古老方法對待今日的青年學生。其實新時勢要求青年們學習學科以了解生活和世界底意義，只在範圍內容和學習方法上求差別的適應罷了。初等以上的教育，仍應供給青年們以普通學科，從此以後，纔連接於分門的教育。自由教育畢竟是否學院式的課程呢？康得耳引用英國教育參事會關於青年教育底報告書一段說話以作解答：「人文的或自由的教育，不是只從書本尋求。應該使學生小子和人類底廣大『利益趣味』相接觸，學校課程應在實際工作和關聯趣味上準備多多機會」。

康得耳解釋「利益趣味」(Interests)爲「生活饒趣而有意義」，這是屬於人類底大利益，而不是日用尋常的直接利益。生活趣味(Living interests)是負起繼承種族底精神遺傳，而使學生獲得吾人生活於其中底世界底了解。這樣的趣味，大異乎傳統的價值，那既不能培養了解，又不能影響於行爲態度。那麼，教學若不能影響及於品性，學校若不注意培養品性，更不消說是要不得的。

世俗只憑能否學習傳統的中學課程，區別學生爲學院的和非學院的，康得耳說，這是因爲都不能從生活趣味底觀點考量課程價值。傳統的潛勢力仍然很大，藉口訓練的價

值，或簡直把中學倒轉回階級教育。儘管說中學教育是十二歲至十七歲之間底進一步教育，而實際上傳統的學科還在復活。

首先應該考慮的生活趣味是甚麼？據康得耳底意見，首先是言語文學，這是人人公認的，同時也是準備升學試的學科，可是應該注重閱讀能力，能由書本獲得意義，發展欣賞，判斷和識力。其次為歷史地理，使學生了解人類底過去和現在。其次為科學，可不是專為升學考試用的物理化學，也不是預定每個學生都要成要科學家。科學如果在普通課程有真價值，便是培養對於自然世界底了解，和它對現代人生底關係。數學於日常生活及智慧的世界都有價值。所以普通課程也少不得它。附帶的音樂，手工，圖畫，不只是消遣，也可使生活豐富。在課程裏也應有位置。古語和外國語可使學生理解外國文化，古代文化，也可以學習。以上各種學科都可以供餘暇消遣，因而無須再把學科分為消暇和非消暇的。充足普通教育之後，由此而上，始分為專門，普通教育以較長期為佳。

要解決中學教育問題，康得耳以為不能輕輕插入一種新型學校而不牽動其他階段。新鮮的出發點，不在少數人底特殊利益和傳統的價值，而在乎現代社會底利益和學生底能力及需要。這不是要把質底標準降低，也不是無視各國家對於精華的知識底需要。只是主張普通教育首應注重對於現代世界底理解，在這樣普通教育之上，各人始選擇他自

已所能獲益的專門教育。

好了，康得耳底高見只是如此。他把近五十年來，歐美底中學教育改造運動，分析地敘述得如此簡明，誠不愧為胸羅全史的比較教育專家。然而他給我們極鮮明的印象是甚麼？是歐美底中學教育也還是在那裏兜圈子，在文化教育，自由教育和實用教育，職業教育底對立中間兜圈子，他們徬徨迷惑的狀況也和我們中國差不多。他們首先要乞靈於教育測驗和課程改編，然而據康得耳說還解決不了，因為縱令學生能力可以測定，分化的課程也能編製，而人們還捨不得學院式的教育。而且所謂課程分化，也只是籠統地分為學院式和非學院式，只造成對立罷了。至於解決底理論，*Mr. Jean Brunshrigg* 那一段植物生長先莖幹而後枝柯底譬喻的解說，固然至極妥當；英國教育參事會對於人文教育自由教育底解釋，康得耳自己對於生活趣味底解釋，也都中肯。然而我們讀了這類理論，總覺得是老生常談；這並不是說它平庸無奇，只因如此理論並無補於事實，便無異乎空談罷了。為甚麼如此合理的理論竟無補於事實呢？康得耳說因為傳統的潛勢力仍很大，人們不能從生活趣味底觀點考察課程價值。然而為甚麼傳統的潛勢力仍然很大呢？康得耳對此不加解答，而我卻以為這就是癥結所在。文化教育和生產教育底對立，據說蘇聯已經不復存在。然而從蘇聯底學校制度卻看不出什麼特異之處。他們底七年學校

大體和我們底初中階段相當，十年學校和高中階段相當，也都是普通教育。第二次五年計劃成功時，七年學校差不多普及了。第三次五年計劃預定到今年全國十年學校收容學生四千萬名，那更是普及了。由七年校或十年校而上，學生各擇其性之所近，或升學，或就業，升學的或進技術學校，或升大學，卻未聞有學生或他們底家長特別喜歡學院式的教育。蘇聯底教育學者，如平克微支之流，關於中學教育底言論，也不見有什麼驚人論；他們也只說這一段宜於普通教育，專門化不妨稍遲。然而他們居然消除了對立糾紛，這原因當然在社會裏沒有閒暇階級和勞動階級底對立，勞動服務和教育修養都是人均等底義務和權利，因而學習當然是求生活趣味，只求各人性之所近，而不希圖什麼高貴特權了。由此觀之，教育學者絞盡腦汁，發為言論，舌敝唇焦而還是困難重重的，一旦社會條件具備，便迎刃而解，真的，「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於事實之深切著明也」。康得耳先生長篇大論，快到了這緊要所在，卻戛然而止，幾乎要使人陷落五里霧中。

據我底淺見，中學教育，必然反映那裏底社會機構和政治。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英美德法等國內中學教育底所謂現代化，雖不得當局者很贊同而卒底於成，就因為社會機構已經變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所以中學教育不能不變。二十世紀以來，他們中學教育

改造之所以困難重重，就因為他們底政治還持盈保泰，且未有改造底決心。政治若改造了，中學教育必不能再守舊，十九世紀底歐洲是這個例。若政治在要改造，而同時又要改造中學教育，其改造能否成功，就要看推動新政治底決心和毅力如何。現在我們中國是這個例。

一九四一，一，廿一，於桂林七星岩。

國民中學與中國教育之出路

一 中學教育改革與全盤教育改革之聯繫

中國教育從頭一次學制頒布——欽定學堂章程——迄今四十二年，大小改革凡十多次，每次改革都把中學教育作為重要的對象。姑且提一提幾次底重大改革罷：由欽定學堂章程變為奏定學堂章程，中學堂便由四年畢業變為五年。民國元年（壬子）改制，中學變為四年畢業而且廢止了讀經，這樁事直到現在還累得一班立志力挽狂瀾底先生們心裏猶有餘痛。壬戌大改制，全國教育專家聚精匯神為得要穿上一套華美的洋裝，六三三制。二十一年（壬申）公布中學法，雖然還是初高中各三年，而職業學校分離獨立，選

科辦法廢止，六三三制已經名存實亡了。綜觀壬子，壬戌，壬申三次改革，好像中國學制在這「三壬運」，中學一段都犯了一「傷官」似的。最近十年來，什麼甲乙分組，五年一貫，六年一貫，花樣時時推陳出新，足徵中學一段之彷徨不安，今年又交壬午年，引古証今，這流年真難保又沒有事！別談八字，還是談教育！中國教育每次改革都這樣脫不了中學教育底干係，也可以說是爲改革中學而改學制，那末，也未嘗不可以這樣說：假如中學問題能得到澈底解決，大概全盤教育也沒有多大問題了；現今就因爲中學教育還在彷徨，所以全盤教育也沒有找着出路。爲甚麼中學一段在全盤教育裏面佔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試追溯歷史上學校教育底演進，便可想見中學是最老牌的學校教育。中國傳說古人十五而入大學，假令西周時代真有那樣的所謂大學，她底內容性質也應該和近世底中學相當，她是支配階級底青年子弟教育機關，要他們能繼承文化遺產；而古代學術還未有分門的發展，因而由此以上不再需要什麼專門學府了。歐洲古代希臘羅馬那些學校和中世近世歐洲底學校教育雖斷了姻緣，然也可以說她們和中國古代傳說所謂大學約略相同，也都是支配階級底青年教育。用今日底稱呼，也還是中學。歐洲近代的中學和大學，都起源於六七世紀時期的主教學校 Bishop's School。在那裏學習點兒希臘羅馬底學術餘緒，以養成教會底幹部人物。這類學校到了八九世紀，得了查理曼大帝提倡，就發達

起來了。從此以後，第一個結果是學習古典與否成了區別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底標幟；第二個結果是隨着學術底分化地發展，大學便從中學裏長出來，而中學竟成了大學底預備教育機關。例如巴黎大學底前身原是*Notre Dame*附屬的主教學校，至十二世紀初期，得名學者*Augustine*在那裏講學，招致學生幾千人，後來便成大學。由此可想見古來的支配階級要他們底子弟繼承文化遺產，而求久支配社會，就必然留意他們底教育，這便是中學底來源；因而中學和大學在歐美是同屬於高等教育系統的，德國和美國底中學底通稱，若直譯過來，便是高等學校。至於初等教育，對於一般庶民底教育，歐洲原來是教會底慈善的副業，可有可無；直至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成了功之後，纔分給這一點餘惠到平民。中學教育既然如此重要地位，而我們中國底中學教育快經過了半世紀而得不到很合式稱體的，那能不焦急呢？其實四十年來中國中學教育之頻頻改制，也未嘗不是反映着中國底支配階級在轉變。隨便舉一例罷：壬子廢止了讀經，三十年間雖出了好幾批衛道之士，而讀經終不可復；而近來中學要廢止英文，却又感到窒礙難行；這是表示了現代的中國底士大夫已經不需要讀經說古代的鬼話，而却需要懂得多少洋鬼話。『新鬼大而故鬼小』，其斯之謂歟！

二 近來對於教育之主要的非難

提起四十年來中國底教育，也實在可憐，在如此窮而且亂底社會條件之下進行着，捉襟見肘，扶東西倒，而國家民族出了倒幕事件又要教育任咎。例如九一八東三省給倭寇一夜之間叫火劫去了，當時就有人埋怨教育，說是因爲女學生披髮太長而裙子太短。那一類心血來潮而未會屈指一算底癡罵本來值不得重視，而實有幾分搔着癢處底非難，若歸納起來，大別有兩種：一種是說，中國教育太貴族化了，是少爺小姐底教育，和生產勞作脫節底教育，只造就一批高等消費者。這種論調由來已久，不過每逢時局有了變化底時候，言論表現底方式稍爲有點兒不同罷了。又一種是說，中國教育是閉戶造車，甚至於孤芳自賞，和政治完全脫節。這種論調大概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之後纔發生，以前倒很少見。到了最近抗戰爆發以來，這種非難似乎更有力量。這兩種非難在輿論界是很流行而有力的，教育工作者對於這兩種非難，也似乎認爲不能不接受。據我看來，要說絕對不接受固然不可，可是條件地接受也不見得妥當。我們既然要討論中國教育之出路，先要將這兩個問題弄清楚。

三 先決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却比較簡單。民國五六年時，第一次歐戰還未結束，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底經濟底壓力暫時鬆一下子，我們底民族工業曾一度景氣，那時便感到職業教

育底需要，同時便感到從來的教育和產業關聯不起來。因而職業教育底呼聲，尤其是在密邇上海底江浙一帶，一時甚囂塵上。從此以後，又輸入了許多美國底職業教育思潮，便成了一種言論，指摘中國教育是非生產的。壬戌改制，就希冀抄襲美國那一套中等職業教育過來作六三三制底骨幹，可是結局毫不發生效力。現在先要問一句：是產業發達造成職業教育，還是職業教育造生產業發達呢？中國教育誠然是和生產勞作脫節，自古已然，非自今日始，而把產業落後歸咎於教育，就有點兒當不起。只希望學校造就大批生產技術人員以逼成產業發達，就未免近於幻想。請看近百年來歐洲教育史，便可曉得現代職業教育是從徒弟制度發展出來的。產業革命之後，大規模的機器工廠代替了手工業，舊日徒弟制度不能供應新需要，因而現代的職業教育應運而起。不是職業教育造成社會產業，乃是社會產業規定職業教育。中國教育向來只養成士大夫乃是生產落後底必然的現像，這種病像當另求治療之方而不可妄想乞靈於區區職業教育。近來這問題快大白於天下了，四年半民族解放底血戰正在打開民生建設勢不容緩和新形勢，只恐我們不在革命之前戰慄畏縮，民生主義的生產教育是必須列入議事日程的。

第二個問題比較嚴重，指摘教育與政治脫節。這種論調從抗戰以來格外有力。然而最近忽然復活一種剛剛相反的論調，便是教育超越論，主張教育超越政治。在二三年前

，這種議論沒人敢說，而自去年以來，說的漸多，而且得到不少人同情，當指摘教育和政治脫節底議論還佔優勢底時候，對於這種教育超越論，應該一笑置之呢，還是應該同情地理解它所以發生底原因呢？指摘教育和政治脫節，反過正面來說，便是主張教育和政治配合。請看近來流行的議論，大抵認定教育是上層建築，什麼社會，什麼時代，便有甚麼教育，教育總離不開某時某地底政治。這番說明若是真確，教育配合政治便是歷史的事實，使用不着我們再來要求，再作主張。好比女人產小孩是生物學的事實，我們若因此而主張孩子必須由女人產出，那真是干卿底事。假如教育從來果是清高，果是孤芳自賞，不沾政治，現在我們發覺都是錯誤了，因而主張改正，要和政治配合，當然說得過去。可是歷史只給我們以相反的證明，教育就未曾和政治絕緣，從這一點說，教育超越論倒還像一種勇敢的主張。我們細察歷史的演變，教育雖從未會脫離政治，而總所關聯的政治却不是固定不易的，好比女子必和男子相配，可是她不一定從一而終。當舊的政治快要沒落，新政治要代興底時候，站在新政治底立場的往往要求教育和舊政治脫離而和新政治配合。可是教育向來是傾向於保守的，在這時候，教育大抵還是和舊政治要好，不輕易迎新棄舊。於是站在新政治立場的便可以指摘教育和政治脫節，然而也未嘗不可懇懇地超越舊政治以便向他自己送秋波。由此觀之，配合也罷，超越

也罷，都不是教育自身底主張，而只是新政治和舊政治之間爭風底話，或是吃醋底話罷了。我們若要把教育配合政治看作一種主張，一種要求，一種理想，便要先看準是那一種政治。好比男子要和女子結婚是自然的要求，不管他是翩翩美少年，或是癩蝦蟆，是賣油郎，甚至於是阿Q，只看這位好姑娘該找那個如意郎君罷了。關於這個問題，現代教育哲學有了大體一致的解答。例如德國教育哲學底鉅子納託爾普之 *Natorp* 說「理想底社會生活底教育條件，同時就是理想的教育底社會條件」。他認為理想的社會生活，不問其內容是經濟，是政治，或是狹義的教育制度，都應該是為人間性陶冶而設的一大組織；那樣的社會生活——政治和經濟等——是人生無限的課題，當然也是教育底理想。杜威在他底名著民主主義與教育裏面曾給教育提出選擇如意的政治郎君底標準：（一）這羣內分子有意識參與的利益有多少種類？（二）一羣與別種團體底相互作用，互相聯絡，至若何圓滿與自由底程度。若把杜威所帶民主主義的理想翻譯為今天的話，便是對內銷滅階級底剝削而對外銷滅國際底侵略，那樣的政治纔是教育底理想。簡單地說，按現代教育哲學底指示，教育化了的政治纔有和教育正式締結底權利。

四 中國教育須把握中國文化底落後性和三民主義革命的踏進性

我們討論過了上面兩個先決問題，知道了指摘中國教育底生產脫節，和政治脫節，

雖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而都不能籠統地沒批評地接受。我們要弄明白如何發展中國產業，纔能要求教育和產業配合；又要弄明白如何建設中國政治，纔能要求教育和政治配合。中國底教育要配合中國所可能的而且應當的產業建設和政治建設，這纔是中國教育底出路。中國底建設路線，我們已經有了很顯明的指路標，就是三民主義。我們天天念三民主義，到底只是口中念念有辭呢？還是認識清楚了呢？假如認識清楚了，我們應該承認今天以前的教育是失敗了。四十年來底教育，始而效法日本，繼而模仿美國，後又妄想步武德法，東抄西襲，都是妄想襲用已經成熟了的資本主義國家底教育。我們是產業落後因而整個文化落後底國家，距資本主義尚遠而且不可追蹤，而却用盡力抄襲他們底教育，那能受用呢！除非教育真可以超越經濟和政治而孤獨地發展起來。也許有人這樣想：我們現在就加緊追蹤資本主義底產業和政治；可是現代的歷史學社會學早答復了我們：此路不通。中國早成了帝國主義者羣底推銷商品底大市場和他們底原料底供給地，名義上雖為獨立國，其實已淪為次殖民地。在帝國主義重重壓迫之下，想學會他們那套工夫再去打他們，決不會有那樣便宜的事。帝國主義者表面上對我所謂友誼的提攜援助，充其量也有一個限度，就是不妨礙他們底商品推銷和資源勞力底奪取。若超過這限度，他們決不答應。因此，中國唯一的生路是三民主義的革命路線——打倒帝國主義。

，肅清封建殘餘。我們這條路線，不只是不步武資本主義，而且要躍進地超過他們。只有立志超過他們，纔可以打倒他們。以一個被壓迫的落後民族，採用革命路線，能不能超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呢？能！一定能！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已經爛熟而快要沒落，在他們體內已經孕育成一種否定他們自身底偉大力量，這造成了被壓迫民族底解放良機。到了今日，我們被壓迫民族若還不敢毅然決然踏上革命的路線，便是自暴自棄。全世界人類文化進步到了今日，我們這一部分被壓迫民族之所謂「落後」，可以用教育底觀點解釋為「未熟」。由教育看，「未熟」便是大有生長底可能，充滿着可塑性，而且未熟者自有其獨特的生長進程，決不必反復重演他底前輩底過程。用個譬喻來說罷！現在十二三歲底初中學生底國文程度當然比我們中年人落後，他們是未熟。然而他們學習若得法，五六年之後，他們便可成爲一位新作家，遠勝過我們。這就因爲他們處在新環境，走上新的學習路線，省掉了好多我們從前所不免的失敗和錯誤，所以他們能夠從比較我們落後而躍進地超過我們。可是我屢聽見有人這樣說：胡適之白話文做得好，因爲他讀過不少古文，所以青年學生還須多習古文以作根底。這種可笑的論調，若戴起教育的眼鏡來批判它，便是誤信了復演原理 *The Law of Reapitulation* 而忽視了成估低了新環境底教育力量。我又想起四十年前底一段笑話：辛丑條約之後，我的家鄉女子們都流行放

腳，那時一班中年婦女都放了腳，可是她們仍把八九歲的小女兒底雙腳照例纏裹，據說若簡直讓女孩子底腳長得和男子漢的一樣大，頗不雅觀，不如先纏幾年然後解放。這個先纏後放底妙法，恰和先逼少年學生模仿東萊博議古文評註然後改作語體文一樣，都是要青年重踏前輩底覆轍，這種辦法和帝國主義者「誠心」援助弱小民族一樣，都想人家踐踏他們自己底覆轍，就因為他們把自己看作絕對不易的標準，而不認識革命底力量。其實青年們自有其成長底路線，毋須襲踏前輩人底步武；被壓迫民族也自有其復興躍進底路線，也毋須步資本主義先進國底後塵。初中學生習文學當然也從文學遺產中取材，然而通過他們特有的學習進程，自有他們特有的奧伏赫變；被壓迫民族解放建國當然也要大量取材於現代的科學和技術，然而通過我們底革命進程，自有我們底奧伏赫變。所謂民族底自信心便是指這一點而言，決不是謳歌頌揚老古董。我們底教育要緊緊把握住這一點，嚴密配合三民主義底革命路線，纔有出路。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教育委員會許崇清先生關於黨化教育那一篇提案底文章，實在把這番原理看得透徹。我們須曉得所謂「落後」，是從既成熟的資本主義底觀點說的；若從我們被壓迫民族底立場說，只是未熟。這回世界大戰屢次證明他們確是老大了，我們不過未熟罷了。我們被壓迫民族由未熟而躍進於真正的文明，自有我們的路線。

五 青年知識分子在革命建國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

我們既然知道中國唯一的生路是三民主義底革命路線，而革命是一必須喚起民衆一的，愚弄民衆而高談革命那是法西斯主義者底大言不慚。可是中國民衆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文盲，在幾千年封建社會積威之下，他們愚昧懦怯散漫陋習甚深，據歷史底先例，等到萬分不聊生之時，不得已而暴動，也只是給草澤英雄做驅除底工作，用肝腦白骨給英主砌成大寶龍位罷了。怎樣把這批極大多數的蚩蚩者民變成革命的民衆，這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也許有人這樣想：先努力民衆教育工作，啓發他們底知識，改良生活習慣，增進健康，扶植生計，等到民衆教育功德完滿之日，他們自然會負起建國大任。自五四運動以後，流行一時的平民教育運動，大概暗地裏無意識地承認這是真理。然而我們仔細思考，便曉得此路不通。第一因爲我們早被帝國主義者扼吭拊背，要等從容和平的平民教育功德完滿，無異俟河之清，而且在帝國主義者底鐵拷之下，也勢不許這種工作能成功。第二這番理論是無意識地依據生活準備說，把平民教育看作準備將來不知何年何日底遼遠的意外的革命建國，而現在只從容地做中性的準備工夫，這和教小孩準備充足了教育之後再生活一樣的笑話。其實兒童底教育離不開兒童底生活，同樣地中國民衆底教育也離不開革命。要教育民衆喚起民衆必須在展開革命建國底工作自身之中，革

命就是教育，纔能成爲教育。那末，我們要問：在革命過程中負起教育這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盲大衆的是誰？中國須有一個階級，他們是革命建國底幹部而同時又是革命的民衆底教導者。這個階級祇能在那百分之十五的非文盲的知識分子之中。我們能否依照歐美先進國底成例，把革命建國屬望於資產階級呢？不能！我們是產業落後的國家，資產階級還未發展到想見革命底程度；至於新興的買辦階級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共同卵翼之下討生活的，他們更不會同情革命。我們又能否依照蘇俄底先例，把革命建國底大任屬望於勞工階級呢？也不能！近代工業革命成功之後，纔有大資本家，有了大資本家纔產出無產大衆；我們既還沒有可言革命底資本家，當然也沒有可負革命大任底勞工。就因爲如此，所以中國革命建國底大任祇有降於青年知識分子身上。中國已往的知識分子對於民衆的功罪怎樣，我們且不去算舊賬，而目前革命建國底大任，青年知識分子實在責無旁貸。中國知識分子有位居四民之首底傳統的自信，向來自命爲民衆底大哥。自戊戌以來，每次革命維新運動，不問大小，都是由青年知識分子發動的。不論什麼政黨，什麼政綱，什麼主義，若除掉青年知識分子，便沒人談。歷史的社會的條件規定了革命建國底大任不能不落在這班人身上。論中國教育，必須注視這樁事實。歷史早給我們指明了青年們有革命進取的朝氣，他們敢作敢爲，不顧利害。遠觀諸古漢北宋底太學生，

近取諸成或繼發直至於國民革命，都證明了青年們參與革命是熱烈的真摯的。他們有天赋血性的民族意識，目擊帝國主義底橫暴，勇於反抗；農村底青年未受帝國主義底威力所震懾，固然有胆量，就是都市的甚至於租界的青年也比他們底父兄更有血性，有骨頭，不容易甘心依附帝國主義者討生活。封建社會底殘餘勢力祇容易麻醉閉塞中年人底心靈，而青年們則容易感覺性格，力求掙脫。寒門底青年固然容易走上革命路線，而富貴家底青年因為習染未深，也可擺脫他們自身所屬的階級意識底牽累而從事革命。黃花崗之役，清庭底大官貴人知道了林文忠公底子孫也參加革命，皆大驚失色。其實每次革命秘密運動，都有富貴家青年在那裏工作，而決非他們底父兄所能贊成的。革命建國祇是於國家民族有大利，而不能担保於那一階級那一家門沒有目前的損害。因此幹革命工作的必須有犧牲自己階級底私利底決心，而這種事很難期望於中年以上的人們。青年們有這樣的好素質，所以堪充革命建國底担当者。然而若受不到好好的教育，一旦青春灰褪，火氣漸熄，便不難墮落腐化，甚至出賣民衆，出賣民族，歷史上也有不少實例。

六 國民中學底使命

我向來堅決主張現階段中國底中學教育底使命應該是造就革命建國底基層幹部，現在廣西底國民中學既專爲此而設，便可以代表中國應有的中學。只要全國各方面底組織

都一致以革命建國爲鵠的，不畏縮，不遷就，不敷衍，便不難在學校裏提起青年們以革命建國爲己任底自覺。現在全國中等學校底學生總計不過六十萬人，而按新縣制底區分全國可有八十萬堡，每堡還摸不到一個中學生，如果中學生還不能充革命建國底幹部，而希望三民主義實現，豈非夢幻！現在的中學教育還聚精會神用全力於革命建國幹部底陶冶，而徒然以資格出身誘惑青年，催老他們底青春，實在太無心肝。廣西國民中學開辦有年，是這國抗戰底產物，今後能否如願地成功，又當別論，而設校底宗旨我認爲十分正確。回憶清季的中學生因爲是辛丑條約底產物，個個都有幾分民族底自覺，以新中國主人自命，當時學校雖師資不行，設備簡陋，課程內容也還充滿着封建的科舉的餘臭，清政府也還十分期望學校穩健地保存國粹，而革命的暗潮正在滋潤着每個青年底心坎，極大多數希望前進。祇管說小事爲例：現在青年男女愛修飾不是爲世人所詬病嗎？清季中學生却以穿制服爲前進，男生不願穿長袍，女生更以抹脂粉爲奇恥大辱，甚至於假期回家，男生不願改穿長袍，女生不願重施脂粉，因而招父母尊長大不高興。這就因爲那時社會裏有一股革命的新力量在領導青年們前進。現在展開了全世界民族解放底大戰鬥，如此良機，豈可坐視其錯過！試依我底淺見，爲現階段的中學教育提供幾點：第一，培養耐勞任勞的健康身體。青年期底健康關係終身幸福，這早經科學證明，無須多說

。現在我們需要的青年健康不只是無病，而且要耐苦任勞，適用於現代各種工作。近年航空人員招考，中學生應試的整千整萬，而據說身體檢查合格者甚少甚少，這種現象殊堪寒心。今後中學教育應以增進健康體能爲第一要事。上面說過，青年是富於革命的朝氣的，那不過是自然的素質，若不加以培養發展，那也容易衰退的。據我底經驗，近來青年多患早熟，不是生理的早熟，乃是精神的早熟。二十歲左右天真純潔的青年，漸漸熟悉人情世故，會幾何時，便事事計較私人利害，對人對事敷衍應付，操縱擒拿，甚至於鑽營投機，頭頭是道，比諸父兄輩竟有青出於藍，真令人驚歎不止。這固然是近來社會大環境底「義方之訓」，而學校教育未曾給他們鍊成點防腐劑，也實在是教育和社會太過密切配合了。因此，我認爲中學教育底第二要事是給青年們訓練成批判現代文化底科學頭腦。我們革命建國既然必須取道於躍進的路綫，對於現代文化必須下一番嚴正的奧伏赫變底工作，我們底青年就必須有嚴謹的科學頭腦。現代科學底最大成果是給人們造成了一種發見真理日新不已底技術。科學底頭腦決不甘故步自封，決不輕易沒批判地接受現成的理論，這就是青年頭腦底防腐劑。中學青年不論在知識學習方面，或行動實踐方面，都必須盡量自由運用思考，做分析，批判，檢證，存疑探討等等工作。附和，盲從，麻醉，壓抑等勾當，不論其暫時的結果如何，必然是青年底催老劑，也就是民族

底催命符。青年們自由獨立地思考，有一個最好不過的定標，便是被壓迫民族底觀點。徵諸歷史，歪曲真理，顛倒是非的罪魁，必然是弄權得勢的壓迫者。他們幹多了歪心事，心中有了許多不可告人之隱，因而怕正視事實，怕面對真理，於是乎壓迫科學，迫害純正的思想家，現在納粹法西斯就是一個活例。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所要求的祇是公平，正義，所反抗的祇是橫暴，此外一切無所貪戀，無所忌諱，因而容易接近真理，歡迎真理，在這一點，民族和個人十分相像，壓迫他人的志得意滿，又患得患失，所以最容易流為懦怯，無恥，虛偽，墮落；而被壓迫的却淬礪了意志，清潔了胸懷，就容易奮鬥前進。這回世界大戰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例證。我們的青年現在固然必須堅持被壓迫民族底觀點，而尤須切記『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世界上人類若還有一個未得到真平等的，我們青年都應該同情地和他取同一的觀點以進行一切工作；在這裏可用得着一句古訓，『一夫不獲，是予之辜』這原來是古代雄主底一句騙人話，然而現在青年不妨把它老實實踐；却可使頭腦永遠清醒。我們底中學如能這樣教導青年，則一切學習必然是集體的，互助的，共同討論和自我批判必然可貫通學習全歷程，而以前那些競爭作偽取巧嫉妬等弊端必可以廓清無遺。一切學習資料都該是抗戰建國底大業所必需的，也就是青年所渴望的，不是爲騙交憑，取資格，耀鄉里，誇宗族，那末，課程問

題，教學方法問題也容易解決了，現在教員，學生和家長都有一個應付會考升學底個人榮達底觀念橫亘胸際，一切教材教法可不問其於學生身心是否有益，而希圖碰中考試，（其實考試也碰不中）這樣的教育使沒法突破洋八股底範疇。這種陋習如不在抗戰期間把它肅清，將不難誤盡青年，斷送民族，這實在不是故作危辭！

七 新教育底展望

中學教育和整個教育系統關係如此密切，要改造中學而不牽動其他階段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在這裏當然不便詳細論及全盤教育改造底具體方案，然亦不妨大體作一度隱約的展望。上面說過：革命就是教育；那末，教育必須在整個革命建國底進程中負起她底重大任務，發揮偉大的功能，此外不該再有別的目的。中央對於各級各種教育，只應製定全國一致的方針，提示實施的原則，至於具體辦法，則應聽各省省政府諮詢於專家，因應各地方之文化水準，經濟狀況及建設之進程，而精密地設計，時時都有自由伸縮修訂底彈性。例如中學教育一段，大體說，應該從學生十三歲至十八歲，而畢竟中學修業是六年呢，四年呢，還是三年呢？各地方得酌量伸縮。至於課程內容，按原則說，當然先普通而後分化，然而畢竟怎樣配合，也應按各地方需要而自由變動。不論是普通教育，或專門教育，學生入學應該求真學問，真修養，學校應該供給青年們以文化食糧，

供應他們實踐應用底資源，而不是出賣文憑資格。那末，在校學生可以因社會服務底需要和個人底興趣而隨時完成學業一段落便離校工作，而工作者也可以爲充實工作底需要而隨時入學進修。升學和進修都是爲工作而求適合各人底能力，當然不應有貴賤高低之分。對於離校工作底青年，學校可以給他們證明修業成績，或加以職業介紹底相當的評語，例如：可試充國民學校教師，任農場管理，或園藝工作等。至於學位稱號，那是科舉遺風和中世紀教會遺風底化合物，中西合璧的封建餘毒，必須立予廢止，方可希望有真正求學的青年。抗戰建國的大時代決不該保留如此不祥的枯骨。中國讀書人中科舉毒一千多年，好比鴉片癮甚深，非嚴予禁絕不可。剷除獵取資格圖晉身底虛榮觀念之後，對於那些資質聰穎的少年，社會需要他們受較高深的學問技術底訓練，而派定他們從早受準備教育，也只可以說是能者多勞罷了。那末，準備升學底教育也不會有什麼流弊。然而從事實際工作而未嘗專做升學準備底青年當然也有隨時進修求深造底權利和便利，決不應有什麼資格限制。只要嚴正地把全盤教育配合於革命建國底實際需要，則大綱既立，而其餘的修業年限，轉學，升學，補習進修等枝節問題，只是辦理底技術罷了。萬一不幸中國沒有前途，則新教育當然無從產出；然而中華民族有復興之一日，新教育必然是嚴正遵循革命路線的，現有的科舉式和買辦式底餘毒必在剷除之列。

論中學公民科

一九四二，四，十二，於桂林。

「教育新時代」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有黃中厘先生一篇「中學公民科之研究」，對於現行公民科課程標準之批評是「煩瑣零雜，缺乏系統，缺乏中心。」這批語當然很中肯。以理論上非常重要，例在中學課程之第一位底公民一科，而事實變成了中學生底催眠劑，課程大綱之零碎湊合，無生氣，乏趣味，當然要負大部分底責任。然而為甚麼公民科課程規定得如此拙劣呢？誠如黃先生說的「對於公民一課似乎有點模糊，喚不起明白切實的對象。」那末，公民科教學在現下中國之中學校，應表現甚麼特質，應發揮甚麼功能，確是值得研究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們中國人對於「公民」這個概念之模糊不清確是事實，而這事又是我們民族生活底現實底反映。我們現下還是徘徊於半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社會之間，受着雙重剝削，彷徨而未得出路，因為不曉得公民生活是什麼？恰如「夏蟲不可以語冰」。「公民」原非封建社會所有。「民者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者也。」封建社會底平民只被束縛於土地

，所謂「伏處賦畝之中，」勤勞生產，以供貴族地主官僚們底剝削，對於政治當然無權過問。在那裏只有官和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底對立。統治者出令立法，而被統治者只有服從守法；立法者無須守法，而守法者不僥過問立法。自己參與立法，而同時治平等地守法，這樣的「公民」，在封建社會絕對沒有。我們中國人向來經驗的都是封建社會的生活，要不做官去壓迫他人，便甘心低頭受他人壓迫。所謂「生不能任鼎食，則五鼎烹耳。」這句話道破了中國固有的社會生活底實況。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人一面受着固有的封建社會底超經濟的剝削，另一面又受着帝國主義底超利潤的榨取，弱者輾轉呻吟以待斃，狡黠者也只能在諂媚逢迎兩種壓迫者之下面分一點殘羹餘瀝，以苟延殘喘，甚至於自鳴得意，當然更不會知道公民生活是何物。我們由此可知道中國人之所以沒有現代公民底觀念，並非出自天賦，也非缺乏學問修養，乃是歷史的環境使然。我們受了悠久的封建社會底教育，近百年來又受着帝國主義底壓迫和麻醉，因而陷入如此病態。

那末，我們能否把現下先進的民主國家——例如英美——所有的公民觀念移植過來呢？這又不可能。他們底公民觀念是最近百餘年「產物」，受了近百餘年歷史底制約，有他們底特殊演變。試以英國為例；他們底政權最初只在君主和貴族手裏，經過了幾次政

治革命。現逐漸推廣到地主，推廣到工商業資本家，再推廣到小資產者及勞工階級。他們底政權之推廣是統治階級對下層底讓步妥協底結果。在另一方面，由於產業革命後資本主義之迅速地發展，資產權逐漸集中於少數富人之手。而形成勞資兩大階級之對立。一面政權推廣，又一面財權集中，在這樣矛盾的條件之下，他們所要求的公民是要甘於維持現狀、愛護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換句話說，他們底理想的公民是以法律上的平等查解的參政權為滿足，為慰籍，而不可正視經濟的不平等。這樣的公民觀念，我們不能有，也不該接受。我們還未掙脫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底桎梏，從這面說，我們還未有現代的公民資格。而乘此全世界民衆力爭解放底大時代，我們從事於三民主義底革命鬥爭，所必爭取的公民地位，當然遠超出乎現代先進的民主國家之上。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只以形式的法律的平等為滿足，而必要爭取政治上，經濟上乃至於文化上的實質的平等。我們現下所處的地位是：失敗則淪入苦海，成功則應為世界上最自由最平等的公民。那末，我們現下所需要的公民訓練，是應該學習怎樣進行爭取。我們中學之公民科，應該培養青年學生對於這偉大的革命政治鬥爭底深切的理解，而決不該只拉雜地注入些少法制經濟底破碎知識。現行高中課程標準，公民一科，只舉列些零星的法制經濟大意和道德項目，簡直是一篇流水賬。怪不得黃中雁先生說：「馬上令我們感覺到其太煩瑣，

無中心，無系統，似乎要把目前流行的種種時髦名詞應有盡有都臚列進去似的。」

公民教育和公民科課程當然有範圍廣狹之殊，而公民科不失爲公民教育底一種重要手段。公民教育必須有切實顯明的立場，然後公民科教育纔有中心。以這中心當作一塊磁石來統整各項社會科學所供給的知識。纔可以有系統，有生氣。關於這一層，黃中風先生有一段很中肯的話。他說：

「公民科內容雖涉及倫理、經濟、政治、社會、法律五部門的內容，但公民科應有其獨自的性質與目標，在內容上也並不是這五部門學科的綜合，而另有其獨自的內容的。雖然公民科所涉及之材料與各科屬於同一事項，但其處理這些材料的觀點與表出方法都不相同。譬如公民科雖涉及政治，但不是教授政治學的內容，也不是講政治學的理論，而是在某一種公民教育的目標，將現實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教授學生，訓練學生，以期養成國民對於現行之立國精神，政治制度，社會秩序有忠順之心理，服從之德性，並且具備關於政治生活的知識，組織的能力，判別的能力，責任的觀念，以及集體生活之精神與習慣，而這一切都是單純講授政治學原理所不能達成的。其他如社會、經濟、法律、倫理等也是一樣。」

黃先生所說的一獨自的性質與目標」，「獨自的觀點」，我以為應該是我們現在進

行的民族解放底鬥爭，三民主義的革命路線。要這樣纔能夠有機地統整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倫理底各項材料而成爲公民科底獨有的表出方法。否則難免陷入於無意義的堆砌。民族解放底鬥爭，三民主義的社會底建設，是一件艱巨的工作，不能只憑着一股虛矯之氣，或血氣之勇所可望完成。我們要認識世界大勢，要正視自己的弱點，要熟識人類社會演進底法則，要把握着現實環境底契機，纔能找着我們這個受病甚深而危機已迫的民族底復興路線。我們每個人所效力的也許不過是一部門，一環，一節底工作，而這一部一環一節底工作決不是孤立的，而必與全部工作成有機的關聯，我們就要認識這關聯，纔可望工作有效。同時每一部每一環每一節底工作又各有其所屬的現代科學底原則或技術，我們進行工作時，必須遵守這類正確的原則。運用這類新穎的技術，纔能望其有成。我們現下的中學生既然須培養成爲革命的中堅青年分子，就必須受這種智慧底陶冶，這就是公民科底職能，例如討論地方自治問題，或農村復興問題，或普通選舉問題，若只抄錄些法制條文令學生背誦記憶，那是最機械無味的苦工。若指導學生考究怎樣扶植真實的民權，而防止土豪劣紳底包攬操縱；怎樣鞏衛農民底利益，而防止地主市儈底愚弄；那一定是極緊張而饒有趣味的學習，而最新穎的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律學底原理和技術都變成珍貴的資料了。每一問題都引導學生謹守着民族的路線，平民的路線

，務期不上帝國主義底當，也不上官僚劣紳底當，這便是最高貴最純潔的德性涵養了。要是這樣，纔是目前我們中學生所需要的公民科課程。

依照上面的討論，公民一科實在不如依舊稱爲黨義較爲恰當。因爲我們要從三民主義的立場，引導學生們活用現代社會科學底知識和思考方法以理解目前在民族解放進程中所發現的各項問題。也許有人誤解黨義爲高頭講章，限制學生底學習範圍。閉塞學生底心思。那時一班「黨八股手」底罪過，而黨義不該負這責任。三民主義是我們這個久被壓迫的民族力求解放的理論，從這觀點去教育公民，是最正大光明的事。用這觀點去融鑄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以啓發中學生底睿智，也是最妥當的辦法。三民主義的觀點應該有勇氣直指真理，正視現實，而鄙棄一切歪曲附會，這就是公民科教學底良好最自由的方法。康得耳說得好：「……教育底職能如果是發展學生們對於處境底問題底理解便不能無視討論政治爭議底機會。當然的，可以說必須訓練學生們先認識正確知識底重要性而後達到一種遠見……如果學校與社會底關係，教育與環境底關係是有意義的，學校便須於適宜的程度上輸入社會底實在。如果社會在變化，學校所能做的便該是使學生們於爭議之中得到充足的事實底知識，而給他們訓練，使他們能根據此項知識而決定主意。（參考「文化雜誌」二卷一號：「論社會與教育變化」）由此可知優良的教學決

不是片面的淺薄的宣傳，乃是自由的智慧的理解。

現在先進的民主國家底公民，是僅有形式的法律的自由平等而沒有實質的。換句話說，他們的公民是一個畫餅，好看而不中吃。這是他們資本主義的社會機構使然。因而他們的教育家就在那裏弄點手法，把「公民」這個概念分析為「政治立場的公民」和「教育立場的公民」兩種意義。頭一種意義指享有公民權，第二種意義指智德體育發展到某種程度，具有某種能力。這樣就把公民之能否具有實質——能否完全行使其公民權——完全歸因於人們底學問修養，使用不着正視社會上經濟的不平等底事實了。這是資本主義底代言人底教育家們弄的狡獪，弄的玄虛。在公民課程裏只排列些空洞的道德理論，政治理論，和法律常識，令青年們學習了也摸不着邊際。而我們的中學公民科底課程標準也跟他們效顰，在一「教學要點」第一項這樣規定：「為正確青年思想起見，教材內容應取既定之理論為敘述式及說明式之編訂，其偏激性材料應從略。」這樣一來，豈不要尤上其當！

一九四三，二，三，於桂林。

漫談課外活動底指導

——參加桂林中等教育座談會之後——

課外活動，從課程論底觀點說，是與課程相對待的。這就是說：課程是每個個學生所必須的學習活動，而此外可以隨各人個性之所傾向，在某一方面多些學習——自由的學習。那麼，負責指導的當然是某一專科的教師，其指導方法與教學當然也不該有什麼質的特異。這是極顯淺的不成問題的問題。

可是這問題到了中國現今的學校，尤其是中等學校，却變得複雜了。一般人認定課外是正規功課外的一切活動，包羅萬象，漫無邊際。於是課外與課內，性質各殊，陣勢對立，相妨相尅。有課外必有課內，內重則外輕，外強則內弱。這也許是對對子造出來的病態。然而病態既成，歷時且久，我們便不可責難他該不該害病，却須把病症來分析，來診斷。姑假定病態是從對對子待來罷！那麼，解鈴還是繫鈴人，也許仿用對對子的方法可以把他分析。課外活動，若把「活動」強調起來，便可意味着課內靜寂，不活動，只有課外才得活動。若把「課外」強調起來，便是課內有課，而課外無課，課外即意

味着，「課」底壓力之所不及。從頭一種意味說，學生因為課內受死氣沉沉，感到窒息，感到苦悶，感到單調，而得不到生活樂趣，便難怪他們走向課外求得活動活動腦筋，吸點新鮮自由空氣。這病根當然是教學不良，剝奪了學習活動的機會，和生活脫節，從而逼到學生外向。治本之法，當然是改造教學，須要來一次教學革命。然而積重難返，不容易一下子改過來，則治標之法，最好還是不把課外活動硬來指導。如果指導，便恐怕又和課內一樣地不活動了。好比躲進防空洞，覺得悶氣，才靠近氣孔吸一口空氣，忽然又怕機關槍掃射，流彈從氣孔飛進，而連忙把它堵塞，那就會悶死人，從第二種意味說，「課」字應解釋作課稅，是一種抽剝。學生每天按時受課，就是精力天天被抽剝，抽得精疲力竭，而始終不知道爲的是什麼。只有照章完課，幸虧還有課外，這好比一個無稅的自由港，在那裏還可以自由做自己心愛的工作。這也還是罪在教育不良。倘若課內不是學生的重荷，而真正成爲他們有意義有價值的學習活動的話，學生決不會爭向課外走私偷稅。教學若不能改良，而又冒失地去指導課外活動，就會壓到民不堪命。試想若把自由獻金化爲攤派，豈不要比苛雜更厲害，百姓那能吃得消呢？須知「指導」這個名辭，字面雖然好看，而實在含有陰險的威脅的意思，近年早被一般人理會得。中國人向來有這種經驗，「治」可作亂解，「亂」也可以作治解，「戒烟」可作賣烟

解，「指導」又何嘗不可解作監視？把課外活動劃入「指導」範圍，便可立刻使學生與而生畏，結局弄到吞聲飲恨，啼笑皆非；這類事例，如戰時後方服務，如勞作服務，如社會服務，如集團出隊，諸如此類，十多年來，紙不勝書。事實具在，豈容抹煞？因此，我以為倒不如把課外活動當作自由獻金，不加「指導」，也許較好一點。記得二十六年「七七」抗戰開始，各校學生自動做後方工作，倒也起勁。及後戰時後方服務訓練辦法大綱一旦頒布，學生們便視為畏途，不久便只在每週授課時間表上剩下兩小時的「後方服務訓練」了。這不是一椿雄辯地自己表白的事實麼？課內授課要加緊來「提高程度」，課外活動又要指導它「納於正軌」，一邊是正稅，又一邊是攤派附加捐。學生們考試要及格，便無法清償活動；課外要活動，便難免考試不及格；真是：「醫得眼前瘡，剝卻心頭肉！」於是有良善仁翁們慈悲地呼籲「救救小孩子」，而教育家乃握玉尺，關天秤，看風頭，察寰境，度其長短。權其重輕，課外活動便不難在「救救小孩子」底慈善聲中停頓下去，也不難在「重振什麼什麼精神」底大聲疾呼中復活起來！真是把戲人有人，明眼兼快手。這是近年中國教育的藝術化。而一幕一幕的事實卻在一邊默默地啓示着它底真意義！

這番微妙的教育原理，真是杜威之所想未到，而孟祿之所未嘗學，而我們中國的教

育家卻不難從事實現象中體會而得之。偉哉！抗戰建國大時代！偉哉！勝利建國大時代！

今後中學教育往那裏走

二月初旬，在一個敍會席上，歐陽予倩先生說：「我索性不再讓小孩子上中學了，因為小孩子上了中學，精神會變優，身體會變弱。現在的中學給孩子們益處實在太少，而壞處實在太多。」這番話給我一個刺激。歐陽先生是文化界一個先進，現在還努力工作，而對於現在中學教育如此失望，當然不是沒有所見。設若長此下去，全國中學都變成貽害少年底機關，而開明的家長都忍痛不敢讓子女上中學，可不是一個極重大的危機麼！

我們中國教育之改革，迄今快鬧了三十年。有不少人發過各種議論，也有不少人手做過工夫，而結果越改越糊塗，到如今，還是彷徨無路。我們再談這問題，首先要避兔以前種種改革論底錯誤。以前提起教育改革，就有人動不動主張改革學制，好像學制

一旦變更，教育就可以變質似的。而事實卻恰相反，學制儘管改換頭面，而教育可以依然故我。中國抄襲國美的「六三三」制，而結局貌似神非，這是一個顯著的例證。因為學制應該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若背景不同，而徒然摹仿他人的制度，結局是一橋遺棄，化為枘」。隨便甚麼政客、官僚甚至軍閥都可摭拾一知半解底陳言濫調，來侈言改革學制，那真是信口開河。雖然不能說學制對於教育實際毫無影響，然而實際教育作風底轉變，決不是由學制來規定的。至於學風底轉變，也不是強調一兩種流行口號——如厲行生產教育，提倡政治教育，加強軍事訓練等——所能做得到的。倘若強迫學生勉地操業，便算生產教育，或排班列隊，立正稍息，便算加強軍訓，那雖不是信口開河，也不過是無知妄動。教育底改革，應該從民族社會發展過程中，尋着可能的而且應有的轉變而和它配合，纔有根據。

中學教育是甚麼？乾脆地說，是統治階層的教育。這是歷史的事實如此，無可諱言。歐美の中學是和大學同屬於高等教育系統，而與小學及師範學校——初等教育系統相對待的。所謂高等，初等，乃是指受教育者所屬的階層而言，不是說教育程度的高低。有怎樣的統治階層，就有怎樣的中等教育。例如歐洲中世，統治階層是教會的僧侶，那時的中學是純然的宗教教育。文藝復興以後，統治階層是貴族、大地主，和大商人，因

而中學教育是古典教育。至於近代，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成功，新興的資產階級已經代替舊封建的領主地主而取得了統治者的地位，從而中學教育不得不變質而為資產階級的教育。歐洲各國，資產階級雖取得了領導的地位，而也還有少數貴族殘留着和資本家聯合而形成一個統治階層，所以他們的中學教育還保存幾分高貴文雅的古風，而範圍界限也來得謹嚴，美國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國度，沒有貴族的傳統，所以他們的中學教育比較歐洲的更覺得平民化，其實這是徹底的資本主義化。最近蘇聯成功了空前的社會革命，工人和農民取得了統治權，因而中學教育變為工人和農人的教育。他們這個統治階層佔了人民的絕對大多數，是具有消滅階級功用底統治階級，所以他們中學教育推廣得非常之快，短短二十年之間，中學人數增至三千多萬。在蘇聯之前，中學教育推廣得最快的是美國，而自十九世紀以迄今日，經過一百多年，中學生人數只達到五、六百萬，就因為美國的統治階層畢竟是資產者。

中學教育既然是統治階層的教育，它便隨統治階層的需要而變化。十九世紀歐洲中學教育底現代化，便十分顯現這番原理。初期是古典與現代語及科學之爭。古典代表文雅而和現代語及科學對立着。其實就因為現代資產階級需要現代語和科學，而同時又因他們既成了統治階層，雖然改變了生產關係而在敵對的階級社會裏，他們還不能忘情於

舊日統治階級所慣用的裝點身份的工具，從而不肯毅然完全拋棄古典。到了前世紀末葉及本世紀之初，古典與現代語的對立得到了相當解決，而現代大體佔優勢了，又發生文化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對立。這回代表文化的卻又是現代語文和科學了。這是產業發達的結果，生產技術成爲社會之所需要。然而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是高等的產業知識，要能夠控制管理生產機關，卻不必動手操作。換句話說，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還是頭腦而不是身手。至於中級生產技術只聽中產以下的人們去幹，只需要他們有相當身手而卻不要他們有頭腦。因而職業教育還被擯於中學教育之外，頂多也只能作爲中等教育的旁門而與文化教育對立着。訓練身手而不培養頭腦，這顯然不是教育所應有的理想，此理很容易被教育家所理解。所以現代教育學者如克爾欽斯泰余 *Kerckhoff* 就主張身手與頭腦並重，而提出一個公民教育的概念，要求綜合文化教育與職業的對立。這派理論自然不錯，也很冠冕堂皇。然而統治階級企望生產技術人員所有的這頭腦是擁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公民頭腦，和勞動大眾自身所需要的頭腦恰是兩樣。對立畢竟無法解決。美國中學自六三三制盛行之後，普通科與職業科早已綜合。歐洲自第一次歐戰之後，也相當地把中學教育開放到小資產者，希冀懷柔中間層的民衆，然而文化教育與職業教育無論在歐洲或在英國仍然對立着。就因爲這是社會階級矛盾的反映，根源未解，影像便無法抹煞。

的。

中國教育向來受着封建社會的條件所規定，是地主官僚的教育，即培養士大夫。歷史上之國學、鄉學、書院，乃至今日從外國仿效來的中學，名目儘管不同，而始終跳不出這套。教育的內容以文章及禮教爲中心，文章好比歐洲的古典，這是士大夫文身之具；禮教好比宗教，這是一種重要的統治工作——治術。假如沒有歐美帝國主義來打破我們的大門，深入堂奧，也許現在我們的教育還是照舊不變。自帝國主義侵入之後，我們的統治階層，由地主變而爲次殖民地的地主，同時又產生了買辦。這個統治階層一面失掉舊日封建時代那一點美德——講多少禮教，節操底自尊心，和也利用閒暇講求文章學問等等底讀書人本色。而另一面又決不能有近代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因爲這個統治階層是帝國主義者用皮鞭踢翻了之後又一手扶起來充當代治次殖民地的工具的。統治階層既然是如此，他們的需要當然是獵取資格及吹拍逢迎，鑽營奔競的技術。從而中學教育成爲官僚出身必經的一道橋樑。學生可以國文不通，英文不懂，理化不行，史地不明，而必要的就是畢業文憑。封建社會崩潰了，而它的形骸還僵屍般保存着；現代的生產力根本沒有，而現代物質的享樂卻上了癮，且學會了新的搜括術，投機術。這樣的統治階層規定了今日的中學教育。統治者可以因爲不懂禮教而實行唾棄古典。反對禮

教，也可以因自己不懂而口頭提倡古典，擁護禮教；另一面又可以天天在壓迫科學，摧殘生產而鼓吹生產、頌揚科學。他們腸肥腦滿，酒醉飯飽之餘，隨着心血來潮而信口開河。也許偶然發見自己的少爺不會對對子寫賀帖而痛恨國文程度低落，也許因為小姐弄壞了收音機而乍感生產技術的需要，也許偶爾從洋樓窗戶望見馬路上的乞丐而覺得職業教育之應該提倡，回頭又想起共產黨可怕而覺得經濟不可不讀。有的不識趣或看風頭的教育家便跟着大喊其重訂課程，改造學制，改良教學，訓練師資，甚至於要提倡衛生教育以治病，提倡職業教育以醫窮，好比鄉下人先討個黃養媳過門來逼自己婆土快養男孩。三十年來，這類怪象，真瞧夠了！其實中學教育在這樣的統治階層支配之下，供他們使用，就必然腐化的是意中，而好的是例外，無論學校改用甚麼名稱，採用甚麼學制。雖也力說提高程度而並不希望學生真讀書，也主張嚴格管理而却不怕青年腐化，至於師費不良，設備不足，那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毋足怪者。可以肯定地說一句：今天中學教育敗壞底病根，在統治階層之日趨崩潰，溯於沒落。一個雞蛋碎了就得要長成雞，否則長期停留在渾蛋階段，就連一個蛋也不是了。今日學校之所以比不上舊日書院，中學生之比不上舊日秀才，其理由就在乎此。

話要說回來了。中學教育是統治階層的教育，我們又可以得到一個推論：若需要怎

樣的統治階層，便可能而且應該有怎樣的中學教育。中國由於二十多年來全世界民族解放底巨流之所激動，又由於近八年來抗日的惡戰苦鬥，羣衆有許多覺醒，也有未同流合污的中產者和小資產者覺醒了。這兩種人在長期的苦痛過程中，受了教育，有了覺悟，可能互相攜手而形成一個進步的新統治階層。

那末就看我們的中學教育，願意照舊作爲快要沒落的統治階層的教育呢，還是願意作爲進步的統治階層的教育呢？這是中國人的出路，也就是中學教育的出路。按照中國社會經濟的實況，受中學教育的除掉買辦地主之外，至少也須是中產者，也間或有小資產者。這班人是現代社會學所謂動搖分子，隨着時勢的轉移，可以前進，也可以後退。中國的中產者和小資產者尤其動搖得厲害，他們談譽爲得是上進，要爬高到人民大衆的頭頂上。自戊戌變政以迄今日，真不知有多少資產階級的青年，意氣軒昂，及後官做大了，財發多了，他們的人格，就像秋風下的落葉，一批一批墜入泥坑裏去。因而今後中學教育必須預防這一着。現在未腐化的中產和小資產者，一面受着民族解放底潮流所激動，一面又受着八年來覺醒的民衆所驅策，他們是可能前進的。國父遺囑上說：「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喚起民衆，不只要他們來追隨自己，受指揮，還要民衆起來監督自己，鞭策自己，總管得住小資產者的心猿意馬。所以說：脫離了民衆，

便無革命可言。現在未腐化而還有進步性的中產和小資產者既可能形成進步的統治階層，而中學教育又恰是給他們的教育，在與廣泛的國民教育合作之下，是可望有效的。青年習染未深，天真尚存，朝氣尚足，在社會條件適當地配合之下，中學教育可能培養他們成爲進步的分子，忠實地和民衆合作。這是今後中國中學教育的一線生路。

今後中學教育如敢毅然走上這條新路，則必須讓青年男女渡一種自由自在的學習生活，讓他們接受現代科學知識，運用它來認識世界，認識自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判斷，而得到智慧的生長。決不強迫他們作喊口號貼標語的工具，也不要求他們變成沒頭腦沒心肝的長工。科學的頭腦，熟練的身手都必須從自由的欣悅的學習得來的。只有名副其實的學校才能培育人才，而集中營只能訓練奴隸！——真國六·二·十。

今日的中學，如果還迷信舊路而又要妄想做禦法西斯，來一套甚麼訓練，以自欺欺人，那末，意志薄弱的青年就會變成精神的或肉體的癆病鬼，而意志剛強的就會在內心充滿着反抗或不信任的情緒。他們不得自由讀書，頭腦未受過科學的洗禮，只是滿肚子反抗精神，那是極危險的。所以那班訓練專家，天天在自誇防止危險思想，其實他們就是危險的製造者。他們口裏天天說嚴格，其實心裏甯願青年腐化墮落，而不願他們有知識有頭腦。好比鄉下地主願意兒子抽去鴉片，變成一保家令子。大人先生對付青年

之心，早已路人皆見，騙誰呢？假如中國社會依舊不變，今後的中學都可以變成舊日各府州縣的儒學，只有一個校長和一個註冊部，期期收學費，給地主買辦的子弟一批一批註冊，三年期滿，保送畢業會考，領受文憑，就萬事大吉。可惜時代的巨輪前進着，勢不容許中國落後，我們再不能尋百年前的好夢。現在的中學，縱令自甘暴棄，努力摧殘青年，也未必能阻住中國前進，只是必不免經過長期悲慘的浩劫罷了？那末，將來浩劫的造成，現在這班教育能手實與有力焉！

戊 雜 碎

循環論與責任感

——現今教育界底怨聲——

屢屢聽見學府中人茶餘酒後歎息而言曰：「現在大學教育那能辦得好！」一般中學畢業生底程度如此低落。「中學校長教師也慨乎而言曰：「近來中學生一天一天不好教了，請看小學教育多麼拆爛污！」小學負責者卻有他一手回馬槍，便是：「小學底師資不良而來源卻是中學」。中學負責者又可以起下承上地說：「新從大學出身底中學師資真有點兒江河日下」。妙哉！鬼公埋怨鬼婆，而鬼婆又反唇罵鬼公！這套循環論誠可與廿年前南開學生自治會底「輪迴教育論」後先輝映。

這循環論還可擴大圈子。政府中人說：「近來事事需才，而學校竟不能供給」。教育匠們又說：「圖書殘缺，儀器不備，先生啼飢，朝不謀夕，有甚心神，談天說地！」自命爲先進長辨者說：「現在學生們既可得公費，又可領貸金，還不好好地念書，真該

打屁股」。而青年學生們又說：「社會上事實告訴我們，囤積，貪污，結納，賄賂，敲詐，賣身是最有效而又可靠的出路，如果我們不學習這套吃飯底真本領，而老實教品勵學，將來窮無所歸，又有誰來救救這班狂簡小子！」這一類說話都是一邊說得嚴嚴正正，那一邊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請包老黑復生，也沒法斷得清。近年全國教育界，幾乎可以說是：不聞絃歌，但聞一片埋怨詬碎之聲。

近來這幾年頭，除掉大多數勸地種田厲老百姓和前綫浴血抗戰底兵丁之外，大抵方所謂讀書君子官商紳學之流，差不多每個人心裏都有多少毛病。您如果高興要罵人，就從這班君子之中，隨便取一批來作痛罵底對象，由第三者聽來，都覺得痛快。因此，就今日罵人底戰略說，最好是爭取主動。可是人家倘若也還您一手，旁觀者也不會覺得冤枉。於是乎變成人人都可進攻而不能招架底微妙現象。這好比近來的空戰，彼此都是冷不防給敵人一場襲擊，至若敵機來襲，自己的空軍隊伍就很少起飛應戰，因為要這樣纔可保存實力而避免損失。妙哉！抗戰大時代底護罵！

提起教育的眼鏡看，罵人也非絕對不可為，只要遵守嚴格的條件。好像是孔老夫子說過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罵人如果要喚起他或她底羞恥心，責任感的，那是道德的罵，也是一教育底罵。如果只憑罵人以掩護自己底痛腳，抵償自己底丟臉，

那便是不道德的罵，也可以叫做「政客」的罵。教育的罵一底必要條件是自己確實盡了責，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纔可以喚得起被罵的責任感。例如：先生罵學生，如果希望他或她改過遷善，那是少不得的，可是先生至少也要自己行檢無虧，學問過得去，否則變成了一「政客」的罵，學生們聽見冷笑，甚至於給侮罵。至於教育工作者彼此互相譴責，教育界對其他各界底埋怨，會長顯達者對青年後生底相責備，更要十分注意自己底罵人條件是否成立。若徒然只顧報復閃擊，以攻爲守，就無論爲公爲私，都不見得有益而無害。

記得十五六年前我曾說過的一段老話：教育家和藝術家心胸中都應該有多少煩悶，憂塊，因爲他們對現狀都有多少不滿，而懷念着較進步的理想。如果對現狀十分滿意而無事恭維，只好算是教育界底宦官，或藝術界底優娼罷了。然而藝術家底滿腔情緒可以寄託於自己手裏底資料，例如詩人小說家可以搖動筆桿，大放厥辭，便可以一澆憂塊，而得相當的滿足。教育家則不然，他們要對正現實的社會，人生，求實現自己胸中底理想，這件工作艱難而久遠，因而需要十分忍耐。我因而斷定教育家和藝術家底差別就在「骨氣和不骨氣」之分。現在把這段話重檢一下，也還覺得大致不差，然而也不敢說硬要教育工作者老裝成「鴛鴦不語科」。其實在不忘自我批判之下，也不妨侃侃而談，休管人

家當您是「夏器通」。只是要牢記着：罵人這樁事實在容易減輕自己底責任感。若常常埋怨別人，把責任都推往別人身上，自己便很容易無意識地不負責了。現在冒昧提出一個小小的一罵人原則：教育的罵，罵人底情緒和自己底責任感應該成正比；政客的罵，罵人的情緒和自己底責任心恰成反比。

根據這個原則，上面提出的循環論便也不難解決。社會上各界，各行，各階層彼此的工作行爲都是互爲條件的。您的工作，您的行爲，是他人的工作底條件，同時他人的工作行爲也是您的工作底條件。您要埋怨他人不給您以良好條件，就先要切實反問您自己是否給了他人以您所應給的條件。您底工作行爲如果不能給他人以好影響，而甚至於妨害或破壞他人底工作，不管是出於有心或無心，您都不配責備他人。還有一層，他人底工作行爲就饒它成了您底工作底不良條件，然而在那不良條件之下，您底工作也還有最低限度的奮鬥成功底餘地；如果您確在那不良條件之下努力奮鬥，而至於力盡援絕底田地，您纔不妨侃侃地責備他人底不是。站在國家民族底立場，尤其是從民權主義底觀點說，決不希望各界工作者飲恨吞聲像舊家庭底小媳婦似的。在「自反而縮」底條件之下，辭嚴義正地指摘他人工作底不對，這是正當的，而且是需要的，只不能藉罵人以掩護自己底不負責罷了。

近來好像有一種新作風流行着，那是不相罵而相捧。爲得預防別人挑自己底眼，便逢人恭維。把人家底工作大誇特獎。他或她是識趣的，便會依照「禮尚往來」底規矩，也還給我一場恭維。這樣多方面地互相捧場，互相標榜，久而久之，大家都可以認鹿爲馬，而英雄，豪傑，賢士，哲人從此滿街走了。這種新作風，表面上好像還不失爲忠厚之道，然而麻醉責任心而斷送民族生命恐怕要更加厲害，我希望各界，至少也希望教育界，勿流行這一套！

一九四二，五，七，於桂林普陀山。

女權與女禍

咱們中國人近年要慣了舶來名辭，而往往把自家固有而很通俗的名辭忘卻，若偶然被提起，倒覺得陌生了。「女禍」這個名辭，現在大學生就不會全都懂得，中學生懂得的更少，小學生呢，便全懂不得了，而「女權」卻是小學生全懂得的。好比擦洋火柴是人人習慣了的，而一旦及要用火口火石，便有許多人對這副東西難於想像了。像「女禍」「宦官」之類歷史底污點被忘卻了好像也是好事，然而主觀的忘卻和客觀的消滅未

總是一致。如果只因客觀地變相地存在而被忘卻，便不能恭喜。一種社會現象底來源在社會機構，倘若社會未澈底改造，而只是表面上制度變更，它便還可以變相地出現。例如科舉和八股都已經廢止了快四十年，而誰敢說中國現在沒有變相的科舉和改裝的八股呢？好比久患瘡疾底人不能因為暫時不打冷震便是斷了病根，也許瘡毒已經潛入了脾肝，要結成毒母。辛亥革命之後當然沒有了宦官制度，而曹錕時代底『彥清不明明是改裝底宦官嗎？』因此，現在做女權運動，還值得檢查一下舊日的『女禍』，要看看女權能否消滅『女禍』，要怎樣纔能把女禍消滅。從字面上說來，從前沒有女權，尚且女禍迭見，若加上女權，可不會助長女禍嗎？如果不能做這樣的推論，而理由又何在呢？

自從男子統治了社會，已經自認為天經地義，萬世不易，若偶爾有一回女子當權，便駭然以為天翻地覆，乾坤倒置，那是『禍水』，『為家之案』。從這意義說，『女禍』不過是從男子底觀點捏造出來底一個中傷女子底惡罵罷了。照樣反過來說，中國自古系社會屬潰以迄今日，除掉武則天統治那三十一年之外，其餘幾千年，由女子觀點說，都可以叫做『男禍時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是禍，誰是福，誰也說不清。若從禍國殃民說，呂后，武則天，韋后，那拉后乃至於梁冀底老婆孫壽，熹宗底乳母客氏等等都可以說是罪大惡極，然而自傳說的妹喜妲己而至於清末底那拉后，甚至乎

見於稗官小說底惡婦悍妻就請一位博學者指名，算起來總不過一百幾十人。而這幾千年內底暴君，污吏，奸臣，悍將，盜魁，劣紳，土豪，惡霸，地痞，諸如此類底「男禍人物」，真是恆河沙數，女禍人物在那裏比較起來，真是滄海一粟。從這方面看，未嘗不可以說，因為向來女子沒有權，倒很少造孽底機會。怪不得希特勒要普天之下底女子都回廚房去。然而對那恆河沙數底「男禍人物」又該怎樣處置呢？

女禍人物取得權柄底作風確又有點和「男禍人物」不同。她們第一步要犧牲色相，取得「男禍首領」底寵幸；第二步獻媚撒嬌而蒙蔽他底聰明，甚至於取得他底信誓；第三步相機抓住他底陰私把柄，使他在石榴裙下失卻了威風，擺不起臭架子；第四步籠絡吸引他底爪牙，使他們變為她自己底扈從；這樣便暗暗地成功了偷龍轉鳳，而把「男禍首領」底權柄移到她自己底纖手裏了。那班第二三流以下底「男禍人物」平時雖有音傳統的成見，看不起女子，而這種重男輕女底傳統成見，在他們腦子裏，畢竟敵不過「趨權附勢」底心理——被社會底必然所規定的心理。他們看有權勢的便是主子，不問是男性或是女性，好比有乳的便是娘。而且「女禍首領」往往比較男性的更易巴結，更易包圍，於是乎一批一批識時務的「男性俊傑」都爭為面首，而衆星捧月似的擁護這位女貴人了。新唐書裏說得好：「昭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財

事爲私弊；乘昏易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隳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檢玉悲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礎於龍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這段文章給千載後「男禍人物」讀起來，直要毛骨悚然，可以暫時地「人欲淨盡，天理渾全」。然而除掉「第稠既交」，「事爲私弊」，「牽不斷之柔」，「隳行已效」，「先哀誓礎於龍初」這幾套女性特有的擒擊手段之外，其餘的手法，何嘗不是古今中外做官的「男禍人物」全都通用的呢？

原來「人權」未必一定使人爲善，可是沒有「人權」底人們，不只是不能爲善，而連爲惡底機會也沒有了。自女系社會崩潰以後，人類社會裏，只有一部分男子有「人權」，而全數女子和大多數男子都沒有「人權」，於是有一「人權」底男子可以公開地爲惡，自己看作天經地義，而不覺得是什麼「男禍」。女子們蜷伏在只給男子作玩物底命運底圈子裏討生活，偶然千載一時地遇着男子中有權勢的，「易昏」的「中主」，她們就舉出她們自己天賦的特長——顏色柔媚——去顛倒他，蒙蔽他，而把他底權柄奪過來玩一玩，也算是給女同胞們搗了一下蛾眉，吐了一口蘭氣，而一般臭男子們便大噉起其「女禍」了。其實「人權」是不平等的社會底必然的產物，是少數有權者壓迫剝削大多數無權者，不管那少數有權者是男性或是女性。「人權」和「人禍」這兩個名辭是相對稱

的，只是人人——不分男女——實際都有了，平等的人權，纔可以消滅「人禍」。若只得一部分人有權，便不問其爲男或爲女，都不免有「人禍」。自古迄今只得一部分男子有權，因而天天都有「男禍」。只在人們的主觀裏不覺得有罷了。今後女權運動，倘若只把女子解放成今日的男子一樣，一部分有權而大多數無權，那末，今後的「女禍」也必然地加多，只是也可以和「男禍」一樣漸漸給人們看慣了便不覺得罷了。如果真要消滅「女禍」，從而肅清「人禍」，便須解放全數女子，而且又解放那大多數被壓迫的男子。這是唯一的辦法。不願做奴隸而又不願做「女禍」同胞們！高抬貴手吧！全人類解放了，婦女纔得解放；整個社會問題解決了，婦女問題纔得解決。沒有使全人類處於政治，經濟，社會底平等，沒有全社會底改造，婦女真正的平等只是子虛烏有的事。

一九四二，五，卅，於桂林。

五四運動底評價

五四運動迄今廿四週年了。這次運動，一向人們都把它捧得很高，認爲這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底一個新紀元，那時參加運動的人們個個都是開路先鋒，聖賢英傑，他們也引

此而自豪。到了近年，忽然跌價了。有人說，五四時代已經過去，甚至於認為幼稚，狂妄，殊不足道；又甚至於當年躬與其事的先生們也有許多「諱言五四」或「濤稱五四」，好像大有「想當年，悔不該」之概。啊！真是天上有不測之風雲，市面有早晚之價格！

歷史上的紀念，必須有可紀，可念。倘若根本沒有價值，便不能勉強造作。例如北洋軍閥時期所謂馬廠警師三造共和（六月三日）的紀念日，在段祺瑞當權的時候，也不過照例懸旗放假，而現在簡直再沒有人記憶了。事物有了客觀的價值的，如果把它過分誇大，那誇大的部份，也不能永久。例如桂林山水，確是秀麗玲瓏，然而偏要說它甲天下，這「甲天下」三字到現在却像是含有幾分諷刺了。從另一面說，如果確有價值，而人們硬要把它無視，把它抹煞，那也不可能。好比小孩子遇着打雷，趕快撫耳朵，可是雷聲還是客觀地存在。瑞士底山水是世界有數的。中古時代基督教修道之士，生怕受着塵世美景底誘惑而搖動了他們底道念，到了瑞士，便故意閉目不看山水，這倒是反對地證明了瑞士山水確是客觀的美麗。我們因此又可曉得一樁事若有人故意要把它抹煞，把它無視，這倒證明了它是有相當的客觀的價值。我們明白了這番道理，便可以評論五四。

五四運動第一個特點是：認識了中國底兩個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餘孽。這兩個敵人狠狠地聯合壓迫中國底生長，必須一齊打倒。清末底變法自強，維新運動，只曉得要防禦外患，而對內則安之若素。滿清朝廷常常把引起列強干涉，召致瓜分這一類危辭來恐嚇或說服民間的革命階級，他們就要把人民底注意轉向外患，以間接地衛護他們底富貴地位。人民也就不能看出清朝和他們一班官僚就是列強利用來束縛中國底工具。辛亥革命雖然毅然推翻清廷，然而那時候底革命思想還是以「驅逐鞑虜，還我河山」那一套封建時代底原始的民族感情爲主要成分，這只是民族主義內中底一斷片罷了。換句話說他們不是認識清廷是封建勢力底代表，是帝國主義者底工具而要打倒他們，只因爲曉得他們是異族政府而驅逐他們罷了。怪不得辛亥之後，一班革命黨人欣然要和總統，內閣總理，甚至於都督省長那一班官僚軍閥攜手而共治民國。五四運動却明白了外侮和內奸是狼狽相依的，要抵抗帝國主義，就不能容忍官僚軍閥。不論他們是滿人或漢人。

五四運動第二個特點是：認識了中國社會必須全盤改造。在五四之前，中國歷次的改革都不過是片面的，枝節的。修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那一班人只看見我們底工藝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所以要着手改良，至於其他方面却都該保存國粹。因而他們底口號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到了康有爲，又看出了法制要改變，官制要改變，而此外

還要擁戴滿清朝廷，且要奉孔子爲教主。辛亥革命，更進一步推翻了君主專制，而建立民主共和，然而也只多選總統，國會，憲法罷了。他們還未認識整個中國社會若非脫胎換骨，便不能生長。五四運動當時底論者，把中國固有的禮俗政教學術思想都加以無情的批判，總算是認識了中國社會須要全盤地改造。

五四運動第三個特點是：敢對禮教作全面的攻擊。禮教是儒家衛護封建社會底一套法寶，幾千年來未曾動搖，也未有人敢加以一矢。戊戌辛亥諸人皆未敢犯其尊嚴，封建勢力遂倚此護符而始終桎梏中國之生機。五四運動大呼打倒吃人禮教，打倒孔家店，這番勇氣確是前人所未曾有。五四運動所以開罪了於許多衛道之士，直到現在之所以還被人「諱言」，被人「羞稱」，也大抵還是因爲這一點。然而平心而論，這一點五四之功德不在禹下。禮教在宗法社會成長時期，確有它底歷史的任務。然而任務一旦達成了之後，它底功用也跟着消失。儒家偏要把它加一番潤飾，把它美化，而幻想爲生活底烏託邦，便徒然變成後來專制帝皇在精神上統馭平民底工具。而中國封建社會所以停滯如此之久，儒家思想確負好多分責任。中國地主們要永久維持他們席豐履厚的生活，最愛「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禮教是最合他們口味的。所以他們明知道儒家底禮治主義是一番幻想，決不能實行——從來也未嘗實行，而也要用它來做裝飾品，麻醉劑；

例如劉邦向來看不起儒生，後來容納了叔孫通底忠告，也就引用一班儒士來做工具。近來的洋行老關和買辦紳士們更不懂得什麼是禮教，什麼是儒術，然而他們聽見這套東西是教人安分守禮，擁護現狀的，便也如獲異寶，於是乎港督和太史們，軍爺們，尖頭曼們也都同聲同氣地翹聖衛道提倡風雅了。陸放翁詩說得好：『人生如春蠶，作繭自纏裹；一朝眉羽成，鑽破亦在我。』這寥寥四句共二十個字，竟把自然辯證法大體道中了。人們造文化，好比蠶蟲作繭，當然有它底功用，可是蛹變成蛾，繭便失掉它原有的功用而轉化為生長底桎梏，就得要憑蛾自己的革命實踐去衝破。只有對蠶不懷好意底人類纔肯那樣狠心把蛹烤死在繭裏而把它抽剝。最近幾十年來，禮教不只是地主官僚底工具，而且成了帝國主義者底工具，您道危險不危險呢？冬烘者流看見洋總督也推崇聖道，遂以為洋人也給我們儒術征服了，欣然要高呼『吾道其西』，這和蠶虫說人類剝繭抽絲是給蠶絲征服了一樣地可笑。儒教裏面雖未嘗沒有少許金粉玉屑，還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您要得它用，便先要整個地打碎它。好比鑛山裏底鑛石，您要掘破它，粉碎它，鎔鑄它，纔可以提鍊出千分之幾。如果當它是山神土地去燒香膜拜，便是大愚。揚棄 *Aufheben* 原是簸，揚米去糠，要大川用勁揚去，裏頭底米自然會落在箕裏。一種文化只要它裏面還有有價值的成分，便不會完全消滅。例如中國長衫，原是滿洲服裝，民國元年雖有

人提議恢復明朝衣冠，而結局不成功。這就因為長衫底價值是比明朝底大袖遺袍高些，聽說打倒禮教便担心中國文化消滅，實在是杞人憂天之談。五四運動對禮教作全面攻擊，確是值得稱讚的英勇。

五四運動有沒有缺點？當然有。他們雖知道中國社會要全盤改造，而還不曉得該怎樣改造，只隱約地把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作模範。他們提出了德謨克拉西和賽恩斯，而不曉得德先生和賽先生底來歷，他們是怎樣生長起來的。他們高呼了多年，只乾害了一場單思病。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是千呼萬喚不出來。他們更不曉得歐美所謂民主社會，已經是非老徐娘，快到當廢之年。中國為甚麼不能也不該踏上歐美的德謨克拉西底路綫，此外還有甚麼路綫是我們走的，他們都還沒有考慮週到。他們認定禮教是舊社會底維持，滿以為打倒禮教，舊社會就可以轉變，殊不知禮教底基礎在舊社會，舊社會若不顛覆，禮教隨時還可以死灰復燃。所以直到現在還有衛道之士在國民參政會提議學校恢復講經。國父遺教很明白地指示：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換句話說，要把中國社會徹底改為三民主義的，對外抵抗帝國主義者底侵略，對內剷除軍閥，官僚，貪污，土匪底滋生，舊思想纔可消滅。若只憑一班青年書生口誅筆伐，攻擊禮教，其實不能搖動它底根基。徒然養贖了資產階級青年底稚氣，感覺禮教不便於個人浪漫生活，便高呼打

倒，等到了富貴到手，入世稍深，便不願搖身一變而為舊禮教底擁護者了。不容諱言，五四運動者是一班有資產的知識分子，他們還未脫秀才習氣，動不動便以天下為己任。他們以為改造中國可以由知識分子獨力負責完成，毋須喚起民衆，更毋須服從民衆。其實從歷史上看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得起國家社會底實例很少很少，而對不起的隨處隨時都有，尤其是在革命時期。他們大抵當革命高潮底時候，發揮秀才習氣，慷慨激昂，氣餒萬丈，而其實是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公等碌碌，因人成事」。一旦到了革命低潮，他們便乖僻地能發能收，馬上一「君子豹變」，裝成穩健的態度，而慢步登朝堂了。要知識分子真正成為革命的信徒，必須喚起民衆，交權給民衆，由民衆監視他們，督促他們，纔可以預防他們豹變。中國底革命黨不能不是知識分子，這是歷史的命運使然。而革命黨必須喚起民衆來控制自己，纔能範圍得住自己底心猿意馬。所以 國父遺囑說：「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這句話是很有斤兩的。這一點是革命理論和教育理論底匯流。革命黨喚起民衆，而同時就該受民衆指導，服從民衆底利益。若革命黨脫離了民衆，便不成其為革命。教師指導學生，而同時就該受學生指導，被他們教育，若不然，也不成其為教育。革命是革命黨和民衆共同實踐，教育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共同實踐。雙方都是主動，也都是被動，五四運動諸人就未曾懂得這一層，這是他

們底最大缺點，他們頂多只曉得要民衆來響應自己，吶喊助威。以助自己成功，而不曉得他們應該去幫助民衆成功起來做他們自己底主人。我們看五四之後，所謂平民教育運動，只想教民衆認識幾個字，寫書信賬單，貼春聯，教他們習點兒衛生常識，勞作技術。這是十足把歐美底所謂公民來做模範，（安分受資產階級統治的公民）也就是「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那一句國粹思想。他們根本未曾想到知識分子應該服從民衆指導，受民衆控制，擁戴民衆作主人，纔配講革命。

末了，「五四時代過去了」這句話當作如何解釋呢？若說「過去」是意味着他們認識未清，路線未正，那確是過去了。若說「過去」是意味着反帝反封建已經完成了，那便未曾過去。若說「過去」是意味着想當年，悔不該打倒禮教，那更不過去。

一九四三，五，四，於桂林。

八·二七路線

——紀念三十二年教師節——

孔子誕辰被規定了爲全國教師節，用意當然在要我們全國的教師都效法這位萬世師

表。那末，研究孔子怎樣對待他的門人，總算還合抗戰建國底需要，至少也不至于是廢話吧！孔子生平對那種青年希望最大呢？卻是一班不容易任人擺布的狂簡小子。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孔子困在陳國，餓着肚皮，流離失所之中，懷念故鄉，而不想起東山沂水，或食不厭精，脍不厭細，而偏懷念着那班很不易擺布的狂簡小子。這就因爲只有他們纔是後起之秀，社會國家之寶。幻想着穩健的「中行」的青年，是事實上不可得而有；要有的話，只有狂狷，所以說：「必也狂狷乎」。狂狷是怎樣呢？是很不容易任人擺布的。他們有志氣，有理想，有主張，個性堅強得很，他們常常求進步，因而常常不滿意，不滿意自己底造詣，也會不滿意先生底教導。同時他們又不容易聽話，如果人們要籠絡他們，威嚇他們，那更無效。這樣的青年是最有出息的，對於先生也有好處。他們越學越知不足，因而刺激着先生，使先生也能「教而後知困」。庸俗的教師感覺他們不好擺布，而萬世師表的孔子最愛這種青年。好好地培這樣的青年培植起來，便可成爲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孔門大學底德育目標。

和狂狷相反的，頭一種是鄉愿，是小滑頭。孔子說那種人是德之賊，決不能成材的。

。孟子曾把鄉愿和狂狷比較地描寫，說：「非之無可舉也，刺之無可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這樣的滑頭青年，很會處世，很會適應環境，在學校裏操行容易列甲等，在社會裏能鑽營，能巴結，只是不能「入堯舜之道」，所以孔子說那是德之賊。還有一種和狂狷相反的是大傻瓜。他們沒有判斷能力，不論老師教什麼，他們只有默然聽受，既不懷疑，更無辯駁。孔子稱讚顏回，說他曾經整天和顏回講學，而顏回「不違如愚」。這可反對地證明除顏回一個例外，其餘「不違」的都必然是大愚了。顏回天資非常，而造詣又甚深，幾乎到了聖人境界，所以纔能「聞一知十」。從來不和老師抬槓。除掉這個問世一出的例外，其餘若默默地聽教的，如果不是鄉愿，便是大愚。鄉愿和大愚，原本都很好對付，從某種觀點，也未嘗不可說是善良學生，只因孔門教育宗旨在培植大丈夫，而不是製造奴才，便不容那樣的人物了。就是顏回那樣非常的大賢，可是因爲他對老師的教訓全是欣然接受，孔子也曾對他表示相當的失望。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他對老師從未有半句辯難，老師因而從他身上也得不着「教學相長」的利益。假如自己教的學生每一個都這樣聽話，就饒他們全是顏回，於老師也是頗不利的。何況事實

上絕大多數是鄉愿和大傻瓜呢？

孔門只開除過一個學生，就是升官發財的冉求。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是魯國第一號貴族，軍閥，冉求居然走上了他的門路，做了個把財政局長，幫他大刮地皮。一個學生成了一等紅員，炙手可熱，在一般學校，該引以爲榮，也許在接待室裏掛上他的放大相片，題明：『本校校友冉局長最近玉照』。而偏遇着這位邁慣四方步的孔老夫子，大發豆腐威，無情地宣布開除他的學籍。冉求不只幫季氏榨取老百姓，還要扶助他做帝國主義者。他替季氏計劃吞併魯國鄰近一個小邦，顛史，也曾被老夫子痛罵一頓。這樣的關學生，在本素堅持反侵略的孔老夫子眼中，是絕對要不得的。冉求這位仁兄大概是一位善於投機的政客，即現今所謂漂亮人物，看下面一章論語便曉得。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孔門同學公西赤——子華——出使齊國。冉求看見他就要和齊國君主公卿們交際，

大有發展機會；於是從這老師預先燒燒冷灶。他明知道子華家裏無須借穀養老母，而偏勸老師借題目給他家一筆津貼，以示籠絡。這是前清官場所謂「帶大肚」底勾當，可以一本萬利。又偏遇着這位古板孔老師向來只肯救濟窮苦學生，而決不肯隨便買收學生的，只勉強答應給六斗四升，再三請添些，也只多給二斗四升。這位漂亮仁兄氣不過了，索性自己開倉送子華家裏實物五百多担，這多麼闊綽呀！就因為這樣，惹得孔老師更討厭了。

孔門還有一個宰我，他是一個懶漢。有一天，宰我在校裏大睡其午覺。那時代的衛生學還不知道午睡是合衛生的，孔門校風又講究禮法莊嚴，而他居然睡午覺，如此藐視校章，孔老師當然要責備了。可是也只口頭懲誡幾句。末了，孔老師說：「我該給他怎樣處分呢？」就這樣了事，並不開除。這固然可見孔夫子對門生寬容大量，也可見聖人處事謹慎。假使真把宰我開除了。到了現在，孔夫子卻成了不夠衛生常識，而宰我卻鬧着了一個「不知也能行」了。宰我這位仁兄雖不大長進，而有一回也居然和孔夫子抬槓。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必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

三年之喪是儒家底極重要的教條。宰我對這教義懷疑了，據經濟的理由，說這教條不適用，主張縮短爲週年。孔夫子從道德的情操上說三年之喪是合人情的，最後要訴之於宰我的良心，問他居喪時食肉穿錦會不會心裏難過。宰我乾脆答道：沒有什麼難過。這回槓子抬得太大了。孔夫子真生氣。可是也只口頭懲誡，說他天性太薄，罷了，仍不開除。這可見聖人和門生辯論真理是非，一向自由，從來不爭什麼虛面子！也不把教條當作神聖不許反駁。

孔門還有一位朋友最愛和孔老師抬槓的是子路。孔老師有一趟拜見了衛君夫人，南子，子路居然疑惑孔老師要走內綫，大不高興。這樣一來，逼到孔老師連珠發誓，差不多要把自己一副老心肝剝出來給他看。子路反駁老師，常常老氣橫秋，有時候簡直目無師長。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必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縣是大軍閥季氏底領土。子路給子羔同學介紹往那裏做縣長，是等於引他走上軍閥門路。孔老師當然不高興，可是又不便說穿了，只好輕輕埋怨一句：「那樣簡直把小弟弟害了呀！」怎知道子路居然說出一番「工作實踐和書本學習底統一」底大道理來。辭嚴義正，老師被他駁得啞口無言，只好又低聲罵他一句：「嘴巴忒能說的真可惡！」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這回實在太放肆了。當面指斥老師迂腐不通。若遇着別位老師，定要說他侮辱師長，立予斥退。而孔老師只責他頭腦太粗，不能了解正名的大道理，而輕率反對。末了，還懇切把正名底原理給他解釋一番，希望他明白。我們看聖人教訓學生底態度多麼懇摯，多麼雅量。他老人家決不像堂子出身的姨太太似的那樣愛恭維，重面子。

我們從以上的敘述，可以歸納得孔門學風是這樣：

（一）國清漂亮的青年，若走上軍閥權貴族底門路，甘作爪牙，便認爲不可救藥，

立刻宣布開除。這是孔門開除學生底唯一條件也只有這條件。

(二)宿舍規則當然要整齊嚴肅，可是倘偶有犯規的，也只給口頭懲戒。

(三)學術討論，辯難，求真理，明是非，絕對自由，還大大地鼓勵。老師底學說，教義，任學生懷疑批判，決不忌諱。

(四)學生反駁老師，若偶然言語失檢，充其量只受口頭懲戒，決不至於退學。

這幾項教育方法都爲得要達到孔門教育底大目的，培植大丈夫。教育目的既然是養成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底大丈夫。教育方法就必然是不以威迫，不以利誘。明末黃道周上思宗疏，曾這樣說：「以利祿養士，則所象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這實在是至理名言。現在抗戰建國，教育當然要培植大丈夫，而決不要奴才。今天的教育家也有意效法萬世師表不？

話要說回來了：宋人有一首諷刺詩，這樣說：「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呀！原來如此！嗟夫！八·二七路線！公卿之路與？抑餓夫之路與？！這個年頭，大澆稽天，哀鴻遍野；教書先生，朝衣百結，飢腸九轉；誰又願意「放着公卿有路卻不走，餓鬼無門偏自尋」呢？！而况肚餓之餘，還要吃悶氣，作興還吃砒霜呢！那末，寫這一水篇，說說這幾廢話！……

一九四三，八，十四，廣桂林，棲梧屋

話 別

八月十六晨七時廣東文理學院茶會

我離開學院去曲江快足三個月，在這期間，諸先生維持院務一切如常，畢業考試和學年考試都格外秩序整然地舉行了。這固然是諸位對學院効忠，而我也沾了不少的光。本院學生這回挽留我底運動，雖然是一場風波，而表現得秩序整然，適可而止。外間各界都認識本院底光明純潔底校風，大異乎流俗。學生們這回運動，處處都替學院大局設想，而所需費用又都由各人底購費樽節捐款，這樣的清白真摯，可以說在中國學潮，未曾有先例。這當然是諸先生平時教導底結果，決非一時矯揉造作出來的。這回得黃麟書先生以教育廳長來本院兼代院長，如此解決，總算是圓滿。在一般慣例，新任交替，原任者大抵先行避去，而我離校已三個月，這回偏會同接收人員聯袂回校，這也是俗眼所認為新奇的事。總而言之，本院這回易長，經過三個，段月段都是奇迹，異乎流俗。我盼與諸先生和新任合作，一路向前造成無窮的奇迹！近來流俗，職務交代，原任者往往

存「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感。好比北平人搬家，隨行時必撕窗戶，破頂蓬，不肯留一所好房子給人人住。這樣狹隘嫉妬底心理，我們必須剷除。我們希望公共事業延綿發展，必須全無缺地交給後任，使他得到進步發展的良好條件。黃麟書先生盼望諸位合作，態度非常誠懇。諸位和他合作，諒必可造成一番奇迹。流俗者往往喜歡繼任者不成功，要藉此而對照地顯出自己往日底勞績，造成自己底去後之思，而證實自己是以一身繫全局之安危，聽見別人說及繼任者底稅改，表面上搖頭三歎，而心裏陰實喜之。這種英雄主義的思想實在太落伍了，現在斷不宜有。爲要異乎流俗，而繼續表見本院底特色奇迹；爲保存諸先生往日底勞績，繼續發揚光大；爲報答新任者底誠意，更爲愛護一羣純潔可愛的青年學生，諸先生都必須努力留校合作，勿萌退志！這是我今天最懇切盼望於諸先生的。

今後學院底前途，固然大半繫乎新任底措施和以後底環境，而也有好幾分繫乎諸位底誠意合作。了解是合作底基本條件。人與人之相處，要合作，要互相領導和被領導，就必須了解。因爲完人甚少，必有所長，亦必有所短，而各人底地位，職掌，觀點，習慣也必各如其面，我們必須了解他人而同時又使他人了解自己，這樣纔可合作，我們能了解誰，便能領導誰；能了解十人，便能領導十人，了解萬人便能領導萬人。教育家要

領導青年學生固然要了解他們，政治家要領導民衆也必須了解民衆。政治家所要了解的民衆動以千百萬計，所以只好集團地，階層地去了解他們。教育家所要了解的人多不過千百，少則百數十，所以要個別地了解他們。而必須了解才可以語領導。這是毫無二致的。如果一個人也不能了解，你便不能和一個人合作，不能領導一個人。世間往往有夫婦兩口子終身不和，就因為他們彼此不能了解。父子乖離，夫妻反目，原因大都在不了解。我今日對諸位先生臨別贈言，就是「了解」一語。我們與人共事，因觀點不同，職司各異，必不免有辯論，有爭執；甚至於聲色俱厲，拂袖拍案。在這樣情形之下而仍可合作無礙，唯一的條件便是了解。我能諒察他人性質底偏向，又體察他處境底困難，然後能領導他，忠告他走上較善的路綫。彼此能這樣地了解，那末，爭執，辯論不只是難免的，而實在是必須的。因為有了了解做條件，爭論必然是坦白的，公開的，誠懇的，決不至有誤會。雖爭至面紅耳熱，聲色俱厲，而彼此都可相信無惡意。世間只聞有陰謀，陰險，陰毒，而未聞有陽謀，陽險，陽毒。我們敢於公開地爭辯，就因為彼此相信早有「了解」之於人生和專門學問有同樣的重要。今天謹以此為臨別贈言。

一別十年

一九四四，三，八，寫給中山大學教育系同學通訊

一別十年了，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民國二十年我初到中大，恰逢高中部招生，作文題是「童年底回憶」。考生底試卷幾乎過半數開筆就是這兩句成語。我當時很詫異廣東中學生如此愛用陳言，而現在襲用起來卻又頗覺有情。這十年期間，變化真大，內容真富，我們在這裏雖中年變老年，年壯的變中年，然而大家都得躬逢其盛，機會總算不錯。機會是客觀的，給不同的主觀運用，功能可就各別，好比同是兩句濫調陳言，而有情或無味，就看你怎樣運用。目前這機會，當然有人利用它升官，有人利用它發財，有人名利雙收，也有人旺夫益子，可惜這一類法術，當年我們在中大教育系俱未之學也，而今似已追之晚矣。半年前校友陳孝禱君給我通信說據他大略調查，我們的校友大多數還守着這爛窮崗位，這可證明了我們的同學少年多不貴，這真值得欣幸！我們校友這樣跼守着窮苦崗位，是不是運用阿Q精神，泰然自慰當作是兒子壓迫老子呢？還是因為別無良策，就挨一天，算一天呢？抑或真從這大時代中受了教育，看出了

光明底動向，因而咬定牙關有所不爲，有所不懼呢？這個問題，我以為每天在憂米憂柴之餘，也很值得把它想一想。

我是教育陣地退下來的一個老傷兵，說好聽點就叫做「榮譽什麼」罷，也抬高不了身份，撈不着油水。既不肯自況爲被兒子壓迫的老子，又不能熱中地老子猶龍，而還活着的確是事實，總想從這人類空前的大轉變底大時代中學習點什麼。我們的本行教育認定人生自始至終都是學習。我們要求學習固然不是貪污，也不會因爲「發國難學」和「發國難財」有多少類似而被指爲「危險」罷！前年我見着一位二十年前的北平師大底老校友，他當過校長、督學，打過游擊，殺過鬼子，也救濟過傷兵，後來退下桂林郊外種菜。我問他還想教書不。他答道：「不想了！不知道和學生說什麼話纔好！」他誠慚乎其言之。他是山東人，大有「予欲無言」之慨。可是孔老夫子解釋得好：「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夫子後來補充得更好：「天不言，以人與事示之而已矣！」宇宙間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它們底起伏變化，都可以啓示必然的法則。這是最正確的真理，是原版的，哲人們所說的卻是翻印的。我們能從「人與事」中間發見那裏一貫的必然法則，這是最上乘的學習。有了這位自然大師，又何必聽儒生們小言詹詹呢！這個年頭，買書困難，讀書又諸多顧慮，幸虧躬逢這大時代，我們可以從「人與

事」中間領略原版的真理，比讀書聽講好過什百倍。我嘗自問在這裏每月挨幾斗糙米畢竟爲甚麼？我自己的答案是爲學習——從人與事當中學習原版的真理。只要勇敢地正視現實，細心玩索。便可看見一部活的社會學，活的教育學，活的哲學。也許再熬幾年，熬成個把八斗高才，等勝利降臨，還被遞去建設，建設，豈不快哉！

我也知道現在的所謂教育工作，文化工作，都不過那麼一回事。實在是到處碰壁，飽吃悶氣。然而若能曉得這不是因爲那一個不熱心，那一個缺德，乃是「人與事」中間有一個必然的法則。只要看清楚工作之所以變成把戲，氣力之所以白費，其中實在大有理法在，便是莫大的收穫，便可拍案叫絕，嚼糙米一大口，喝開水一大盅。我們可以看見蝸牛角尖裏底英雄們逞意氣，爭雄長，而他們卻常被蝸牛角搬運着，旋轉着，而蝸牛角又被蝸牛全身底蠕動牽動着，蝸牛全身又被大氣底濕度溫度影響着，所謂季候又是地球自轉公轉底結果。地球運行又是太陽系底物理的必然，我們從蝸牛角尖底英雄們底策畫看到太陽系，又從太陽系看到蝸牛角尖英雄們底得意，底失意，底震怒，底喪氣，底悲哀，其間錯綜牽連，都有理路可尋，這還值不得欣賞玩索。彌補艱苦麼？我這樣觀照，也不曉得還是不是另一種阿Q精神，肯詢諸老妻，她只注意柴米，只好轉而質之於中大教育系畢業校友們。

一九四四，五，八。

教育危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廿日出版

實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作人 林礪儒

發行人 陳勸先

印刷者 建設印刷廠

桂林桂東路

桂林 廣州
香港 上海

文化供應社 發行



廣州舊書業	
北區合作商店	
冊數	
定價	50

中國書店總發行	
冊數	定價
	50